

古代中国的
朝代更替与权力博弈

傅小凡
著

从权力诞生到地方割据
再到帝王集权
最终专制制度走向终结

许多王朝曾经历相似的困境
但不同的君王与能臣
却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百家讲坛名师
傅小凡教授 新作

目 鼎 盛 与 衰 亡



在历史的转折点，一窥王朝更迭背后的
权力博弈与明暗瞬间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古代中国的 朝代更替与权力博弈

傅小凡
著

鼎盛与 衰亡

从权力诞生到地方割据
再到帝王集权
最终专制制度走向终结

许多王朝曾经历相似的困境
但不同的君王与能臣
却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百家讲坛名师
傅小凡教授 新作



在历史的转折点，一窥王朝更迭背后的
权力博弈与明暗瞬间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鼎盛与衰亡：古代中国的朝代更替与权力博弈

作者：傅小凡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03月

ISBN：9787308271257

字数：188千字

（免费书分享更多搜索雅 书）

序言

吕不韦. 吕氏春秋集释[M]. 许维遹, 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93.

据《吕氏春秋·察今》记载：“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①这段意思是有个楚国人，搭乘一条渡船过江，不小心将佩剑掉进江里。他马上在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然后说：“我的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等到渡船靠岸后，他就按照所刻记号的位置下水找剑。其实渡船早已离开佩剑入水之处，他这样找剑岂不太糊涂了吗？

这就是“刻舟求剑”的寓言，它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时光就像江面上的渡船，在时间流逝的同时，空间也发生了转换。时间是不可逆的，每天都会将当下甩到身后变成过去，即使当时留下印迹，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因为时过境迁。因此，我们面对的只能是当下，而历史本身转瞬即逝，永远消失在黑暗之中。

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也无须面对早已不在场的历史本身。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现象，发现其深层的本质；透过王朝更迭的周期性，寻找其变化的规律。

第一章 权力与制度的建立

我们的历史起源于神话传说，那么开篇就从神话传说讲起。

虽然传说没有信史意义，但是很多历史传说与神话都包含了社会公权力的建立、性质与功能等信息，以及王朝更迭的方式、权力传承的制度等内容。这些政治领域中的永恒话题，在社会公权力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并受到广泛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流行一种“疑古”观点，认为周代以前的历史并不实际存在，只是史书中的臆造。然而，随着殷墟遗址被发现和发掘，事实无可辩驳，商代确实在中华大地上存在过。我们今天追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最久远也只能抵达周代。因为无论是制度、观念，还是文字、文本，都是周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虽然是商代的文字，早于周代大篆，但是人们发现它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末，因此并不见于历朝历代的史书。辉煌的周代在建立两百多年之后开始衰落和动荡，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最终导致西周灭亡，而灭亡的征兆，早在周厉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01 因功而王：从大禹治水看原始公权力的建立

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流传着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在远古时期，有一位被尊称为“大禹”的人，他带领民众战胜了洪水，重建家园，因此深受人民爱戴。治水成功后，舜帝将天下禅让给了大禹。大禹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们都知道他为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他也成为公仆形象与敬业精神的典范。

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开始怀疑大禹存在的真实性，认为大禹治水只是神话。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2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大禹是条虫”的观点，后来又将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论文集《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的观点在当时就遭到学界的激烈批评，鲁迅甚至在其杂文《理水》中加以讽刺。其实，顾颉刚的观点是：

“虫”是动物的总称，“虫”与“龙”也是相通的。显然他的意思是，大禹是虚构的神，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图腾，是一个符号和象征形象。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被称作“大禹”的人，姓姒，名叫文命。姒文命的高祖是黄帝，父亲是鲧，史称“夏鲧”。夏鲧因治水失败，被舜帝杀死在羽山之郊。显然，这个名叫姒文命的大禹是人而不是神，更不是一条虫。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30.

不过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古代文献中有这样一句话：“鲧娶于有莘氏之子，有莘氏谓之女志氏，产文命。”^①意思是，鲧娶了有莘氏的女志，生下文命。

关于鲧的出生地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和猜测，但这些大多基于传说、神话及对古代文献的不同解读。在众多关于鲧的传说中，较多提到的是他在治理洪水方面的事迹。相传，鲧是黄帝的后代，在尧帝时期，洪水泛滥，鲧被四岳推举负责治水。他采用了筑堤堵水的方法，但经过九年的努力，洪水仍未消退，最终鲧被舜帝流放到羽山，并死在了那里。虽然这些传说和故事不能作为确定鲧出生地的直接证据，但它们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鲧这一人物的记忆和想象，也为我们了解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然而根据史书记载，鲧生活在长江下游，有莘氏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②按照几千年前的物质条件，从长江下游到西北高原，千里迢迢，这两个人如何走到一起？

原因很简单，夏后氏居住的长江下游遇到自然灾害，被迫迁徙，其中向北迁的一支与中原氏族发生冲突，只好与有莘氏联姻，建立夏后氏与有莘氏的同盟。当时的社会处在母系氏族阶段，婚姻形式是从女居，因此夏鲧“出嫁”到有莘氏，夏后氏的族人为了与有莘氏联姻，必须北上来到西北高原生活。他们主要活动于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之间，黄河南段的西部地区。

蔡沈. 书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8：39.

关于“九川”的“九”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九”确指九道河；另一种认为“九”是虚指，表示众多、广大的意思。本书采用前一种意思，对后文提及的“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亦认为是确指九个州、九条路、九个湖、九座山。

我认为大禹确有其人，但是史料中记载的大禹治水的事迹，今天读起来的确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据《尚书·益稷篇》记载，“予决九川，距四海”^①，意思是大禹治理了九道河^②，将河水引入四方的大海。按照九道河的实际水域估算，它们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按照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运输能力，根本不可能。

难道传颂了几千年的大禹治水事迹完全是虚构的？显然不能这样轻易下结论。因为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远古时代发生洪水灾害的传说非常多。到了大禹时代，更是洪水为患，形势严峻。而且在古代传说中，治水的人物也不止一个大禹。大禹之前，还有女娲氏、共工氏以及大禹的父亲夏鲧。

认为大禹治水是虚构的神话的人，只强调“决九川，距四海”因其工作量太大而不具有可能性，可是我们完整地阅读和分析有关文献记载的大禹自己的说法，答案就完全不同了。大禹说：“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意思是：我决开九道河堤，将洪水导入四面的大海（古人将广袤的水域都称“海”，因此这里的“海”包括湖泊）；我疏浚田间沟渠，将洪水引入江河。

传说鲧一味用堵的方法治水，花费整整九年时间也没把水患治好。大禹花费十三年，使用了三种治水方法，分别是决、距、浚。决是扒开原有河岸，距是筑堤导引洪水流向，浚就是疏浚。以上这三种方法在现代人看来不仅科学有效，而且切实可行，这就让人相信大禹治水确有其事。

左丘明. 国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2：97.

由于大禹治水的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③。意思是：上天嘉奖大禹，让他担任天下的君主，并且赐姓

姒，以有夏为氏，理由是大禹能够领导人民过富足的生活。显然，夏王朝的建立，基于大禹治水的成功。

大禹治水成功促成夏代国家的形成，印证了恩格斯对国家本质的描述：在古代东方原始共同体内，有一些维护或管理共同体利益的职务，不得不由个人来承担。这些个人是氏族部落中的领袖人物，他们开始充当的角色，具有“社会公仆”的性质。

治水无疑是一项公共事业，大禹领导人民治水，“三过家门不入”，显然具有“社会公仆”的品质。

由于治水需要长时间、大规模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对各氏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一调配和指挥的过程中，大禹开始对各个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或者邦族施加自己的影响，甚至强制干预。久而久之，原来松散而缺乏约束力的邦族联合体发生了质的变化，权力逐渐集中，且最高首领凌驾于各个邦族之上，最终形成了具有集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国家由此而形成。大禹从原来的夏后氏部落的首领，上升为部落联合体的首领。

部落联合体的首领被赋予了某种全权，因而国家权力开始萌芽。这种权力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其功能在于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随着这种权力范围的扩大，它逐渐出现独立化倾向，最终走向社会整体利益的对立面。部落首领从“社会公仆”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人”，统治人民的君主就此产生，与之相应的，是一个国家建立了，这个国家就是夏朝。

所谓“夏朝”，实际上是一个大邦族统治下的由众多小邦族结成的联合体。这个大邦族就是夏后氏，因此这第一个王朝就以“夏”为名。夏后氏统治下的众多邦族控制的区域，构成了夏代国家的领土范围。邦国中的多数成员都曾经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跟随大禹左右，因为治水符合各邦族的共同利益，逐渐组建联合体。因此，这个邦族联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禹领导他们治水成功，众望所归，他们便拥戴大禹登上帝位。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51.

大禹不仅管理部落联盟和各个不同的邦族，而且将自己直接管辖的区域划分为九个部分，号称“九州”。据《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大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①。意思是：大禹划分了九个州，修筑了九条路，围堰了九个湖，丈量了九座山。那些曾经怀疑大禹的真实存在，认为大禹治水是神话的人，对大禹拥有对九州的统治权同样表示怀疑。

怀疑者根据现代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大禹九州涵盖的地域做了描述。在他们的描述中，九州几乎涵盖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国土面积太大，令人难以置信。怀疑者因此得出结论，大禹不可能有统治九州的权力，提及“九州”一词的《尚书·禹贡》是战国时期作品，九州是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假设。

大禹实际控制的版图的确不大，只是黄河中游从河、济到华山一带。但是不能因此彻底否定大禹曾经设立九州。比如，春秋中晚期的叔夷钟铭文：“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意思是，拥有九州，占据大禹建造的城池。此铭文对如何理解“州”字提供了线索。“州”字是“川”字加“点”，就是在河边建造的以堤堰为基础的城堡。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以城邑为主体，城即为国，城邑之外的郊野并不包括在内。因此，九州无非是建筑在河边的九座城堡而已，正是所谓“禹之堵”。因此，大禹在河边建立九个城堡并据此设立九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鲧只用堵的方式治水，失败了，因为一味地堵代表地方割据；禹治水不仅要堵，更要疏，堵是地方割据，疏代表统一意志。因此，大禹治水成功，意味着中华大地开启了天下一统的历史。

按照西方的理论解释，社会公权力天生具有恶性，如果没有法律限制，必然危害社会。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公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可是，我认为社会公权力具有善恶双重性，就看什么人使用。大禹治水的成功表明，在“人民公仆”的手里，社会公权力的善性得到了发挥，它可以统一全民意志与大自然抗衡，充分彰显了社会公权力存在的合理性。

02 禅让“神话”：至高权力该如何过渡

所谓“禅让”，主要指最高统治权力的交接，其中包含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权力的传承与过渡等。这是古代的“治道”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儒家一直推崇尧、舜、禹禅让天下的典故，也就是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可是，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高权力很难和平交接，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和血腥的杀戮。那么，史书中记载的，存在于遥远古代能让最高权力和平交接的禅让制度，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美好传说？这还得从尧舜之间权力的交接说起。

据《尚书·虞书》记载，尧说：“四方首领，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有谁能够顺应天命，替代我登上帝位，治理天下呢？”四方首领回答：“我们德行不够，不配登上帝位。”尧说：“可以在地位显赫的人中明察贤良，也可以在地位卑微的人中推荐贤良嘛。”于是，四方首领推荐：“民间有一位处境困苦的人，叫作虞舜，他可以继承帝位。”尧说：“是啊，我也听说过这个人，可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四方首领回答：“他是乐官瞽叟的儿子。他的父亲心术不正，他的母亲喜欢说谎，他的弟弟象非常傲慢。但舜能够与他们和谐相处，用自己的孝行感化家人，妥善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他的家人也都弃恶从善，不使自己沦于邪恶。”尧帝说：“那就让我考察考察他吧。”

于是，尧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以此考察舜的德行。经过多次考验之后，尧帝将舜召到都城，授予官职。又经过任职后的各种考察，尧帝对舜说：“舜啊，我和你共同谋划政事，借此考察你的言论，觉得按你的主意办事一定会取得成功。这种考察已经持续三年了，现在你可以登上帝位了。”可是，舜却以德行不够为由推辞，不肯继承帝位。尧帝坚持禅让，舜只好选择良辰吉日，接受了帝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尧将帝位禅让给舜的故事。

如果仔细阅读先秦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尧舜之间在完成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禅让”一词。即使出现“让”字，也是舜表达的推辞和拒绝，与一般理解的尧主动“禅让”的意思不同。对此，孟子的观点很鲜明。他的学生问：“尧将天下交给舜，有这样的事情吗？”孟子回答：“没有！天子不能将天下给予别人。”由此可见，将手中的权力交给别人，不是“让”而只能是“给”。被给予者拒绝接受时，才会用到“让”字，表达推辞、谦让的意思。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0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09.

“禅”字最初为“墀”，本义是锄草打扫、拓平整治以供祭祀之用的郊野土地。最早将“禅”字解释成最高王权更替的是孟子。他在反对天子将天下禅让给别人时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⑧意思是，天子不能将天下给予任何人，而只能向上天推荐某个人，尧所做的就是将舜推荐给上天，而上天之所以接受尧的推荐，是因为上天体察民心，百姓接受了舜，这才将天下交给舜。上天是不说话的，它的意志通过事物的发展变化体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⑨从此，尧舜之间最高权力的交接就成了“禅”，它是“给予”和“接受”两种含义的统一。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331.

将“禅”与“让”结合在一起表达最高权力更替的是荀子。他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⑩可是，荀子说“擅让”而不用“禅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荀子坚决反对禅让。公元前316年，燕王姬哙将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引起太子姬平的强烈不满，于公元前314年联合将军市被反叛。姬平和子之混战了几个月，死者数万人，搞得燕国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后来齐国大军乘机攻打燕国，并攻入燕国首都，燕王姬哙在战乱中被杀。因此，荀子反对君主违背天意擅自将权力让给他人。

显然，先秦儒家都反对“禅让”，可是，后代儒生却一直向往尧舜禹的禅让，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禅让是最高权力更替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必须遵从上天的意志，这就涉及社会公权力的合理性依据问题。儒家追求的“禅让天下”，是指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根据上天的意志和百姓的意愿，选择优秀的接班人，并且与接班人和平地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从中华传统美德的角度考虑，中国古代政治家在社会公权力产生之初，就提出了最高权力交接的最完美形式。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尧在交出权力之前，将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尧与舜成为翁婿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力交接并不是禅让，而是继承。

尧帝将天子权力交给自己的女婿舜，这种做法有违传统，因此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传说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大禹的父亲夏鲧。舜即位之后，夏鲧于羽山之郊被杀。这样看，夏鲧被杀是因为反对舜当天子，治水失败不过是个借口。舜不仅杀了鲧，还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驩兜放逐到崇山，将三苗驱赶到三危，宣称他们是“四罪”或者“四凶”。其实哪里来的什么罪和凶，无非是反对尧将帝位传给舜。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4.

很多历史文献都说，舜因大禹治水成功而将帝位禅让给他。其实，舜没等将帝位禅让给禹就死了。舜杀了大禹的父亲鲧，双方的矛盾至死都没有化解，舜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帝位让给大禹呢？其实，舜六十一岁当天子，在位第三十九年的时候“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⑩。意思是：舜帝在一百岁的时候还去南方巡视、打猎，根本没有来得及将天子大权禅让给大禹，就死在了苍梧之野。三年的大丧结束之后，禹也模仿舜继位前将王位让给尧的儿子的做法，将大权交给舜的儿子商均。可是，四方诸侯都拥戴大禹，大禹就这样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之所以如此，大禹全仰仗治水成功。

虽然尧、舜、禹之间的权力禅让是历史传说和儒家追求的理想，但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确曾经多次发生最高权力的“禅让”，尽管其实质与后世儒生吹捧的“禅让天下”根本不是一回事。例如，东汉末年，曹丕继承魏王爵位之后，一位名叫许芝的大臣请求曹丕登基称帝。曹丕却断然拒绝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三分之二，还向商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君主的职权，但完成使命后还是将权力归还给了成王。我的德行远远不如这两位圣人，像许芝说的这些话，我怎么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表达不清，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还乡。”

可是曹丕越是推辞，大臣们越是起劲劝进，劝进的表章多得数也数不清。面对这样的舆论，汉献帝刘协知道汉朝气数已尽，于是连下三道禅位诏书，苦苦哀求曹丕仿效虞舜，登基称帝。可是，曹丕却说：“听到这个诏命，真吓得我五内震惊，浑身发抖。我宁可跳东海自杀，也绝不敢接受汉朝的诏书。”曹丕的表演逼真，朝中文武大臣心领神会。他们一边上书，一边搭建受禅台。

经过九个月多的精心准备，大臣们数十次的上表劝进，汉献帝前后四次下达禅位诏书，延康元年（220年）十月十三日，汉献帝刘协将象征皇位的玺绶诏册交给曹丕，宣布退位。十月二十八日，曹丕在桓阶等人所上的“登坛受命表”上，批下了“可”字。第二天，曹丕登上受禅台，坐上了皇帝宝座，改国号为魏，建元黄初。参加受禅大典的有文武百官和四夷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典礼之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之间的事，我现在明白了。”

曹丕以禅代的形式来完成改朝换代，是极其高明的谋略。他向天下人昭示，魏朝的政权不是抢来的，而是汉朝皇帝禅让的。尽管汉魏禅代的本质是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仍然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它以最小的成本，换得政权平稳的交接。相对于通过战争手段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这样做没有杀戮，没有流血，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社会公权力更趋合理化的表现。

03 商朝为什么五次迁都

翻开记载商代历史的各种文献，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商族人曾经多次迁徙，被称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所谓“前八”，是指商朝建立之前，商族人曾经八次迁徙；而“后五”是指商朝建立之后，商族人曾经五次迁都。面对这一现象，也许有人不禁要问：商族人在先商和早商时期，为什么不断迁徙？这的确令人费解。要解开这个谜，我们还得从殷人迁徙的“前八”说起。

殷人迁徙的“前八”，指的是商族在成汤建立商王朝之前，从商祖契到成汤这一时期，历经四百多年，曾八次迁徙。据王国维先生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的考证，商先公八迁的顺序为：契居商（今河南省商丘市）、昭明居砥石、昭明又迁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相土迁东都、相土复居商丘、上甲微迁殷（今河南省安阳市）、上甲微复归商丘、汤居亳（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这一时期的商族人之所以八次迁徙，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还处于发展阶段，迁徙是为了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环境、拓展势力范围等。

从商族人多次迁徙的路线分析，其迁徙原因大致有四：第一，躲避灾难，寻找更适宜本族发展的区域；第二，受命于朝廷的分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第三，扩张和兼并土地；第四，为取代夏朝做战略部署。商族人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迁徙过程中成长壮大，为最终建立商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等待时机的到来。

这个时机终于到了。夏桀荒淫无道，残忍狠毒，常年不修国政，只知道挥霍享乐，天下生灵涂炭，众多诸侯离心离德。成汤经过多年的准备，最终在鸣条打败夏朝军队，俘获夏桀。夏朝灭亡，商朝取而代之。

成汤建国之后，从太甲到太戊，商朝统治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可是从仲丁到盘庚，商朝首都迁移了五次：第一次，由仲丁将都城从亳迁到隰；第二次，由河亶甲从隰迁到相；第三次，由祖乙从相迁到邢；第四次，由南庚从邢迁到奄；第五次，由盘庚从奄迁到殷。商朝统治者为什么屡次迁都？对这个问题，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去奢行俭说。此说一提出就遭到非难。因为奢侈是统治者的通病，不会因为首都换个地方就能有所改变。

第二，躲避水患说。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因为据殷墟卜辞记载，洹河水灾曾不止一次为害殷都，可是商朝自盘庚徙殷之后一直到商朝灭亡，都没有再徙都。

第三，游牧说。这种观点认为，商族人在盘庚迁殷之前是逐水草而栖的游牧民族，到了盘庚时才形成初步的农业。可是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商代社会生产中，农业已经是最主要的产业了。

第四，游农说。这种观点认为，商代农业比较原始，一处的地力耗尽就需要改换耕地，因此要经常迁徙。可是商朝历史五百多年，只有中间一百多年间多次迁都，其他时间长期定居于一地，因此“游农说”根本不成立。

第五，战争说。此说也很难成立。因为祖乙迁邢，南庚迁奄，有可能是为了防御西北和东南方向的敌人入侵。可是仲丁从亳迁到隰，是向东进入中原腹地；河亶甲从隰迁到相，是跨过黄河向东北；盘庚从奄迁到殷，是向西回到中原腹地。这三次迁徙，很难与防御外族入侵联系起来。显然，商朝首都多次迁徙另有原因。

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讲一讲商朝最高王权的更迭形式。

成汤建立商朝之后，由于长子太丁早夭，王位由次子外丙继承，随后就出现了“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外丙即位三年去世，将王位传给弟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去世，在伊尹的主导下，让太丁之子太甲继位，恢复了商族传统的“父死子继”传位形式。

太甲死后，王位传给儿子沃丁，可是沃丁死后，王位却传给了弟弟太庚。这可能是太庚强势，从侄子手中将王位夺走。太庚死后，王位传给儿子小甲。由此可见，“父死子继”主要来自父王的意志，而“兄终弟及”则是源于强势的王叔抢班夺权。

后来，比较弱势的小甲死后，王位被二弟雍己夺去。可是雍己治国能力太差，导致商朝国势衰落。因此，他们的三弟太戊夺去了雍己的王位。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是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治下，商朝进入繁荣时期。太戊去世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仲丁。仲丁的王位也受到王叔的威胁，于是将商都从亳迁到隰。

仲丁死后，王位被二弟外壬夺取；外壬死后，王位又被三弟河亶甲继承。为了稳固王位，避免王位被其他弟弟夺走，保证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河亶甲决定，将首都迁到相城。

可是，河亶甲死后，王位被他的侄子，他二哥外壬之子祖乙夺回。为了王位的稳定，祖乙将首都迁到邢城。在祖乙的领导下，商朝出现中兴，因为祖乙权威稳固，所以他死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祖辛。

祖辛死后，王位被王叔沃甲夺去。沃甲死后，祖辛的儿子祖丁将本来属于自己的王位夺回。祖丁死后，王位再度被沃甲的儿子南庚夺去。南庚为了稳固自己的王位，将首都迁到了奄城。南庚死后，祖丁的儿子阳甲，又一次将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从王叔手中夺了回来。阳甲去世之后，王位传给了儿子盘庚。

这就是商朝史中著名的“九世之乱”。从商王仲丁开始，父死子继的传位制度遭到毁坏，叔侄与弟兄之间为王位继承而不断争斗，经历了九世的动乱，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诸侯不进贡，王朝陷入危机。盘庚继位之后，面对这种局面，下决心第五次迁都。

从仲丁开始的前四次迁都，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斗争手段。从地方势力角度讲，首都迁徙，旧都必定边缘化；从随迁者的角度讲，离开旧都，是与过去的利益进行切割。因此，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迁都，都必定会遭到多方势力的坚决反对。所以，仲丁、河亶甲、祖乙和南庚这四次迁都的君王都非常强势，否则不可能完成迁都之举。那么，盘庚是利用什么手段完成迁都之举的？

首先，借助神力。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社会弥漫着对天帝和祖先神的迷信，人们几乎完全匍匐于神权之下，听命于神灵的主宰。盘庚就利用占卜的结果，借上天和神明的意志说服商朝的臣民同意迁都。可是，首都迁到哪儿才会给商族人带来新的生机？因此，新都城的选址问题就成了决定迁都成功与否的关键。

其次，盘庚选择了安阳，即回到商族人的故乡殷地。这里是商朝最理想的定都地点。因为殷地处于黄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水土肥沃，利于发展农业，同时“居天下之中”，既便于控制东部平原的诸侯方国，又便于进击西北高原之游牧民族。

那么，盘庚迁殷后，商朝进入鼎盛时期，从此不再迁都，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盘庚通过迁都打击贵族反对势力，消除了王叔对王位的威胁。在迁殷之前，盘庚即提出警告：“对那些不正直、不善良、违命不敬的人，以及奸诈和内外作乱的人，我要用割鼻甚至灭族之刑加以惩处，绝不能给新的国都留下遗患。”可见盘庚试图通过迁都镇压异己、除旧布新，消除对王权的威胁。

其次，盘庚通过迁都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信，从而加强了王权。盘庚迁殷时，以“天命”与“先王”为号召。迁都的成功，就是抓住了这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在当时就是政治权威的象征。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盘庚迁殷之后，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从此，王位纷争逐渐减少，王室内部稳定下来，王权得以加强。虽然此后因王位继承而起的纷争

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是毕竟结束了“九世之乱”那种争斗。这种最高权力由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后来在周朝发展到极致，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宗法制。这就是盘庚迁殷之后，都城两百多年不再迁徙的根本原因。

总之，通过商族人“前八后五”的迁徙活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键在于动起来，转换空间，改变环境，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的地方，增加新的机遇，形成良好的境遇和全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环境，新的理念，新的制度，才会有新的成功。

04 妇好与傅说是一个人吗

有学者认为“好”字是“子”字的古体字，甲骨文中的“好”有可能作为子姓的专名，因此读作zǐ。可是随着语言的演变，“好”的含义扩展，读音也变为hǎo。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导致了读音上的争议。

在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址中，有一座商代王室成员的墓葬。在发掘研究并确定了墓主身份后，人们在墓前竖立起一尊汉白玉雕像，其基座上镶嵌着两个铜铸的大字——“妇好”。不过，“好”字在这里要读“子”^①，它是雕像人物的姓；“妇”则是先秦时期对女性的尊称，相当于现代的“某夫人”。只见雕像所呈现的这位妇好，手持铜钺，目光炯炯，威风凛凛。斧钺在古代代表着军事统率权，同时也是王权的象征。显然，妇好是一位女将军，而且大权在握。其实，她的身份是商王武丁六十多位妻子中的一位，也是最受宠爱的一位。那么，武丁为什么最宠爱妇好呢？我们先聊一聊商王武丁。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姓子，是商王朝第二十三任君主。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丁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距今已经三千二百多年了。子昭从小聪明好学，品德良好，深得父亲喜爱。父亲即位之后不久，便立子昭为太子。父亲对子昭寄予厚望，因此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决心把他培养成有为的君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父亲派子昭到民间去考察和体验百姓的生活。子昭在民间考察时，结识了一位颇有才华的先生，他叫“甘盘”。此人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精通文武之道。子昭十分敬重这位先生，便拜他为师，随其习文练武。

后来，子昭告别了老师，一路向东来到奄城（今山东曲阜），这里是商朝故都。子昭来到奄城是想知道，当年商王盘庚为什么要将首都从奄城迁到北蒙（今河南省安阳市）呢？原因很简单，当时商王朝最高权力的更迭，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两种继承方式并存。这就直接导致王子与王叔争夺王权。从盘庚往上数，九代商王都是在权力争夺的杀戮中完成政权更迭的。

盘庚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王位，为了避免残酷的王位之争，于是将首都迁到安阳，离开了诸王叔和王子的势力范围，在一个新的区域里逐渐完善并且最终确立了“父死子继”的王位更迭制度。从盘庚迁都一直到商朝灭亡，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王族内部斗争的情况。子昭通过实地考察，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更加坚定了继承先王事业的决心。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02.

公元前1250年，子昭的父亲去世，按照父死子继的制度，子昭继承王位，号“武丁”。子昭继承王位之后，立刻将他的老师甘盘请来担任宰相。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即位后，“三年不语，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②。不过，在今天山西运城一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武丁当着众位大臣的面忽然得了昏厥症，被医官救醒后就不会讲话了。无奈之下，武丁只好将朝政大事全权委托给他的老师甘盘，自己隐居于太庙为父亲守丧，不准任何人打搅。

守丧三年期满之后的一天，武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名叫“说”的人来到他身边，与他谈论治国理政之道。他醒来之后立刻对众位大臣宣布，天神派了一个名叫“说”的圣人辅佐朝政，必须马上找到他。武丁先在满朝文武中辨认，没有他要找的人，于是又让画工按自己的描述画出“说”的肖像，复制数十份，派官差拿着画像，分别到全国各地去寻找这位“圣人”。

两位官差来到傅岩（今山西运城平陆县），遇到一位跟画像十分相似的人，正在士兵的监督下修筑城墙。官差把这名奴隶押回都城，送进宫中见武丁。武丁一见这位囚徒，激动地说：“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我梦中所见到的圣人！”于是当场赦免了“说”的一切罪名。因为他曾经在傅岩服过刑，武丁就赐他姓傅，称他为“傅说”，并且让他担任宰相。

傅说担任宰相期间兴利除弊，惩恶扬善，赢得朝中上下的高度赞赏。武丁在傅说的辅佐之下，国势强盛，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商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同时，傅说也得到了极高评价，史书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圣人，武丁中兴，傅说功不可没。

可是，担任宰相，治理国家，需要专业知识和大智慧。傅说在当宰相之前是奴隶，一个奴隶怎么可能直接担任宰相，并且辅佐武丁实现中兴呢？因此，我对傅说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关于傅说的身份，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夯土打墙的人。那么，傅说是以什么身份夯土筑墙的？据《吕氏春秋》记载，傅说的身份是“胥靡”，也就是囚犯，纵然有安邦治国之才，也不可能得到重用。

就在傅说备受歧视，连生活都成问题的时候，武丁发现了她，并且让她担任宰相。傅说有了发挥才干的机会，尽力辅佐武丁，这才有了商王朝的“武丁中兴”。这个君臣完美合作的动人故事，在中国流传了三千多年，令多少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心驰神往。可是，我总觉得傅说的故事很像神话，傅说的身份非常可疑。

甲骨文的出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傅说的怀疑。甲骨文记载了很多商王朝的事件和人物，对武丁时期记载得尤其多，却没有任何关于傅说的记载，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是历史典籍出了错，还是甲骨文遗漏了？甲骨文中对商朝各代帝王及一些有影响的大臣都有记载。比如，武丁的老师甘盘，在史书的记载中，他与傅说一起辅佐武丁，一个担任右相，一个担任左相。为什么甘盘在甲骨文中记载，傅说却没有任何痕迹？

与傅说不见任何记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她在甲骨卜辞中出现过两百多次。可是在商朝以后的历史典籍中，却从未出现过妇好的名字，也是一个字未提！这又是为什么？

通过甲骨文的记载，我们了解到，妇好不但是武丁的王后，而且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武丁朝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商朝以后的史书中居然没有任何记载，难道这些史书会刻意遗漏这样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这种极不合情理的现象，说明其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傅说与甲骨文中记载的妇好，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二人任务相同。据甲骨文记载，武丁时期，商朝对外的重大战争多数是妇好领兵作战。甲骨文中还记载了妇好向其他国家派遣使节、处理国家大事，以及主持祭拜仪式等。这些重要事务应该是傅说的工作，怎么会交给妇好去完成呢？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傅说和妇好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第二，历史典籍不可靠。最早收录傅说事迹的是《尚书》，其他几乎所有记载傅说传说的史料都晚于《尚书》。《尚书》成书于武丁时代的八百多年之后，在这八百多年里，尚未发现有任何史料证明过傅说的存在。

第三，名字可能谐音。“傅说”和“妇好”读音相近。口耳相传的故事记载成文，在从语音转化为文字的过程中，将“妇好”记成“傅说”完全有可能。

既然是谐音，却为什么将妇好记录成一个男人，而且将“妇好”写成“傅说”呢？这就是中华传统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作祟。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可能接受这位历史上的第一圣人竟然是一位女子。史书是男人写的，在他们心目中，商代第一位圣人傅说只能是男人。傅说由身份低贱的奴隶成为宰相的传说，恰恰证明他很有可能就是妇好。因为妇好原来的身份的确比较低，远远不及另外一个女人“妇妣”——商王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后母戊大方鼎的主人。

武丁和妇妣之间是一场政治联姻，在武丁当王的初期，商朝国力较弱，周边不少方国凭借实力不听商王号令。当时，一个实力强大的方国公主或者女王嫁给了商

王武丁，通过联姻增强了商朝的实力。商朝开始向外用兵，实行武力征服。显然，妇妁的地位取决于她娘家的实力。

据甲骨文记载，妇妁曾经有过一次带兵出征的经历。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年轻美貌、足智多谋、武艺高强的女将表现得非常出色，令武丁为之倾倒，她就是妇好。可是，妇好当时没有资格嫁给武丁，因为他们都姓子。武丁娶妻都是政治联姻，娶同姓女子与政治联姻无关，不合规矩，武丁自己也做不了主。于是，武丁只好昏厥失语了一段时间，醒来后对大臣说，晚上梦见天神赐给他一位圣人，并把圣人的样子画下来让大臣去找。于是，大臣找到了妇好。就这样，妇好以圣人的身份嫁给了武丁，武丁把国家的行政、军事等大权都交给了妇好。显然，从奴隶变成宰相的传说，很有可能就是从同姓下级军官成为王后的妇好，因为武丁非常钟爱而且特别信任这位能干的、帮他治国理政的王后妇好。武丁与妇好，既是恩爱的夫妻又是和谐的君臣，成为后世令人向往的楷模。

05 为取代商朝，周人做了什么

周文王姬昌在有生之年没有实现取代商朝的夙愿，但是他在位五十年建立的基业，为其子姬发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姬昌实际上是周王朝的开创者。那么，周国是如何从一个边陲弱小的氏族逐渐发展壮大为西方强国，最终取代商朝建立周朝的呢？这还得从姬昌的父亲季历被杀说起。

商王文丁二年（前1111年），季历兴师征伐燕京之戎——燕京之戎在吕梁山以东，今太原以西一带活动。然而，此次征伐季历吃了败仗，损失不小。文丁四年（前1109年），季历奉命领兵讨伐余无之戎——余无之戎在今山西屯留一带活动，是商朝北部的大患。这一次季历取得了胜利。文丁非常高兴，嘉奖季历并封他为诸侯之长。文丁七年（前1106年），季历征伐山西一带的始乎之戎，再次取得胜利。文丁十一年（前1102年），季历征伐太行山上的豁徒之戎，彻底消灭了豁徒之戎的势力。从此，商朝开始向东南发展，不再有后顾之忧。季历带着战俘去见商王，文丁给予季历极大嘉奖，封他为“西伯”。可随后商王突然翻脸，下令将季历囚禁。不久，季历就死在了商王的狱中。

季历屡战屡胜，为商朝立下赫赫战功，商王文丁为什么还要杀他？原因很简单，周族人的强大引起了商王的忌惮。商王本想利用周族人征伐戎狄，让他们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是戎狄被赶走了，周族人却壮大了，并且取代分散的戎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比诸戎更有力量，在商朝背后虎视眈眈。能够将商朝背后的戎狄几乎全部肃清的军事力量，如何不让商王万分警觉？可是季历被杀害的当年，商王文丁也去世了，其子帝乙也就是商纣王的父亲继位。季历被杀之后，其子姬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史称“西伯昌”。

西伯昌发誓要报杀父之仇。可是他在父亲被杀的同年，娶了莘国公主为妃。莘国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历史悠久，本来是有莘氏部族，被夏王封为莘国。商王成汤曾经娶有莘氏之女为王妃，并得到重臣伊尹。有莘氏在商朝是显赫的诸侯，与商王的关系极为密切。那么，姬昌在决心报杀父之仇的时候却娶商王的盟友莘国的公主，又是为什么？

这桩婚事可能是其父季历在位时约定的，也可能是姬昌即位之后决定的。无论什么缘由，从商王的角度考虑，显然是想通过和亲的方式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姬昌只能将计就计，让商王放松对周人的戒备。报杀父之仇，他还没做好准备。姬昌在渭河边用舟搭建浮桥，亲自迎接莘国公主，以示对婚礼的重视。

就在姬昌与莘国公主结婚后的第二年，姬昌举兵伐商，结果惨败。商王帝乙发兵反攻。周国在山西一带的根据地尽失，只好退守岐山，周国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姬昌为团结族人，重振国力，还亲自从事农业生产，为周人作表率。姬昌在位的五十年里，前四十年都在从伐商大败的低谷中艰难地恢复。

为了韬光养晦，麻痹商王，姬昌对商朝廷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努力改善与商朝的关系。从发誓报杀父之仇举兵伐商，到十分恭敬地服从商王，甚至在自己的家庙中祭祀商王的祖先，尽可能讨好商王。

在改善与商朝关系的同时，姬昌还努力缓和与周国西、北地区戎族的关系。姬昌开始安抚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而不是纯靠武力征服。比如，只要戎狄不侵扰，周人就为之供给部分粮食、布匹等物资，帮助他们在气候干旱的时候改善生活状况；戎狄则向周输入马牛羊、铜矿石等战备物资。双方各有所得，互利互惠，相安无事。

在姬昌的努力下，商王对周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到纣王时，姬昌得到朝廷重用，官至三公，成为朝中重臣。可是，杀父之仇必报，周取商而代志的志向不变。然而姬昌伐商失败退回岐山之后，东进的道路已经全都被堵死。周国在解决了来自西、北两方的戎族侵扰之后，进入了发展瓶颈期。

面对强大的商王朝，周国一时无力向东方发展，而西北土地贫瘠，夺来无实际意义，似乎只有向南发展了。但是，周国的南边是纵横数百里的秦岭山脉，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见向南发展的困难程度。不过，秦岭蜀道并非不可逾越。

姬昌伐蜀，以蜀国为首领的西南诸国纷纷归附，与蜀国为邻的巴国也加入周的同盟，接受周的领导。有了巴蜀的加盟，周国的影响力不但深入西南腹地，而且越过秦岭之后，周人发现了循汉水而下进入东部地区的道路。至此，周国人打通了从南迂回向东的道路。

可是，此时商朝依然很强大，周国比较弱小，如何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姬昌在伐商失败之后做了战略调整，在不得罪商王的前提下结好西、北，拓展南方，迂回东出。这种灭商的战略虽然并不完善，但是，姬昌实在制定不出更有效的方案了。他需要一个能够提出更完善战略方案的人。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著名的姜尚，由于其先祖封地于吕（今河南省南阳市），因此以吕为氏，又称吕尚。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478.

奴隶与农奴有着根本区别。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会说话的牲口”，只在生物学意义上区别于牛和马，他们虽然是人，却没有法律与道德

意义上人的权利；农奴是人，他们拥有法律和道德意义上人的权利，不能买卖，更不可随意宰杀用于祭祀。但农奴还不是农民。因为生产力低下，一家一户不能独立生存，他们必须依附于领主或者庄园主，从事集体劳作。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一家一户可以自主经营、独立生产，开垦荒地的能力增强，土地出现私人占有，农奴便逐渐转化为农民。

自从姜尚入周，姬昌便开始制定新的战略，转机也随之出现。新的战略说来也简单，就是加强道德宣传，即“阴谋修德以倾商政”^④。其实在修德方面，姬昌早已开始经营。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实行农奴制或者庄园主制；^⑤第二，要求贵族过节俭的生活；第三，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严格禁止用人作为牺牲；第四，虽然设置贸易关卡，却并不征税，山河湖泊不禁止人们捕鱼打猎，犯罪不株连亲属等。

蔡沈. 书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8：209.

姜尚入周后，修德的方法有了很大不同。他将道德作为手段，目的是推翻商朝的统治。具体做法分两步：第一步，制造舆论，寻找取代商朝的合理依据。比如，提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⑥的口号，体现了天命从殷商转移到周的观念。第二步，与商朝争夺诸侯的拥戴。比如，虞、芮两国产生土地所有权纠纷，互不相让，姬昌出面解决纠纷，主持公道。

从此，诸侯之间只要有纠纷都来找姬昌调解，许多方国见周国日渐强大，纷纷前来依附。崇侯虎察觉到姬昌的行为对商朝不利，于是向商王打小报告，商王将姬昌囚禁起来。但后来商纣王接受周国大臣的贿赂，释放了姬昌。人们普遍认为，商王此举财迷心窍，色令智昏，放虎归山。其实，商王这是极高明的一招。如果他杀了姬昌，西戎将群龙无首，周国必起兵报复。彼时商朝在东南与夷人的战事未息，商王必定陷入四夷交侵、腹背受敌的境地。释放姬昌既能安抚戎狄，东南的战事也可以持续下去。等到东南稳定，再回过头来对付周国，会更有利。

姬昌回国后不久就称“王”，史称“周文王”，他同时废商法、行周法，弃商“正朔”行周国历法，公开打出反商旗号。周文王之所以突然改变态度，就是因为虞、芮两国与周国结盟，周国入主中原的大门洞开。文王先征伐西北，以确保稳定的后方，随即发兵河东打败黎国，然后沿黄河北岸东进，征伐邶国，打败邶国后又攻打崇国。战胜崇国之后，文王将都城迁到沔水西岸。次年，文王逝世。临终时，他对太子姬发说：“我的一生，厚德广惠，忠信志爱。作为君主，不要骄傲，不要奢侈，不要沉湎于女色。住简陋的房子，为的是不浪费百姓的钱财。山林草木生长之时不要去砍伐，川泽鱼鳖生长之时不要去捕捉。工匠以时通其货，这叫‘和德’。天有不测风云，不积聚粮食，怎能防范？不经常考虑，就会有危险。”这是文王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为后人提供了治国理政的经验。

总之，姬昌为了取代商朝，主要采取道德的方式。首先是表面忠诚，骗取商王信任；然后用“以人为本”的精神治理国家，得到民众的拥戴；再以公平为原则处理诸侯间的关系。究其根本，就是与商王争夺民心。周文王努力的效果，在周武王推翻商朝时才会充分表现出来。

06 为何牧野一战，商朝就灭亡了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联合八百诸侯起兵反商。大军渡过黄河之后急行军六天，每天行军六十华里，赶到牧野与商纣王亲率的十七万大军决战。结果，盟军一仗打败了商朝的十七万大军，仅一天就灭亡了立国五百多年的商王朝。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还得从商朝末代君主说起。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748.

这位君主姓子名受，国号“帝辛”。可是这个称号几乎无人知晓，人们熟悉的是“纣王”。“纣”是帝辛的谥号，意思是“杀戮无辜，残义损善”。这是周朝人对帝辛的评价，为周朝取代商朝提供合法性依据。历史上，历代王朝对前朝的亡国之君，总会设法抹黑。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早有认识。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①意思是：纣王的恶行被夸大得很厉害，因此君子憎恶身居下流，一旦如此，天下的罪恶就都归于他一身了。

那么，帝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何落下如此骂名？据《史记·殷本纪》描述，纣王的天赋极高，思维敏捷，见解过人，而且体力强健，能够徒手和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大臣的进谏，他能言善辩，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借才能在臣子面前自我夸耀，凭借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没人能比得上自己。显然，帝辛是一位优秀且全面的人，但也因此导致他过于自信，甚至连鬼神都不敬。在牧野之战爆发前，帝辛已经在位约三十年，而且有百战百胜的战争纪录。面对带着一群乌合之众的周国新领导人，帝辛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准备一战将所有反商势力彻底消灭。

面对数倍于己方且严阵以待的商朝大军，周武王为了鼓舞士气，在阵前举行誓师大会，历数帝辛的种种罪行，宣称自己奉上天之命讨伐帝辛，并且严明作战纪律，特别强调不杀临阵投降的敌方士兵。誓师完毕，武王下达了总攻命令，军师姜尚率领精锐的突击部队向商军发起冲击。不到3万的疲惫之师，进攻阵容严整、以逸待劳的17万商朝大军，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如果不出意外，双方胜负应该没有悬念。可是让帝辛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两军刚一接触，商军的前阵士兵突然倒戈，回身杀向自己的后队，商军阵营顿时大乱。姜尚率领先锋部队立刻发起猛攻。商朝军队一触即溃，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帝辛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立国五百多年的商王朝灭亡了。一场战役就能改朝换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据我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养虎为患。比如，姬姓族人在公亶父的率领下，从豳地迁徙到岐山之阳。此时公亶父已经下决心取代商朝，并以“周”为国号。可是商王却误以为周族人是内附的戎狄，承认了他们占领岐邑的合法性，让他们把守西部边疆。周族人的强大，正是从定居岐邑开始的。

第二，种下仇恨。比如，商王文丁杀死了姬昌的父亲季历。

第三，麻痹大意。季历被杀，周与商之间结下血海深仇。可是姬昌却十分恭敬地服侍商王，赢得了商王的信任和重用，官至三公，成为朝中重臣。显然，姬昌将韬光养晦做到了极致，帝辛被姬昌迷惑而麻痹大意了。

第四，放虎归山。崇侯虎察觉姬昌的行为对商朝不利时曾向商王举报，帝辛立即将姬昌囚禁。可是，帝辛后来又接受周国大臣的贿赂释放了姬昌，并且恢复了姬昌西伯的封号，赋予他征伐的权力。

第五，低估对手。姬昌死后，姬发率兵抵达盟津，八百诸侯闻讯前来会盟，并且鼓动姬发即刻举兵反商。姬发觉得时机不到，把会盟的诸侯又都打发回去了。可是，姬发此举却没有引起帝辛的警觉，帝辛更没有主动进攻征讨周国。

当然，仅有以上原因，还不足以让商王朝在一天之内灭亡，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商纣王自身了。据史料记载，商纣王有以下几大罪状：

第一，非常残酷和冷血。比如，他发明了一种肉刑叫“炮烙之刑”，就是在铜柱上涂抹膏状物，下置火炭，令有罪者爬行其上。他从受刑人的惨叫中获得快感。

第二，生活非常奢侈。比如，他把商朝的王畿向南扩张到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再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内，他下令修建各种豪华宫殿、园林美景，然后和他宠爱的美女妲己一起终日歌舞；他还建造酒池肉林，酗酒无度。

第三，生性极其贪婪。他大肆地搜刮和占有民财，粮食装满了巨桥的仓库，珍宝堆满了朝歌的鹿台。他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对内穷奢极欲，必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负担都通过横征暴敛转嫁到百姓的头上，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但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反对，商纣王根本不知道收敛。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08.

第四，残害忠良，失去人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比干的迫害。比干是纣王的亲叔叔，看到纣王荒于政事，就直言进谏。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

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意思是，纣王越来越淫乱，微子多次劝谏他都不听，微子于是和大师（不知何人）、少师（即比干）商量后，离开了纣王。比干认为作为臣子，不能逃避责任，哪怕是以死相拼也要进谏，于是强行劝谏纣王。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就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他的心来观看。就这样，比干被纣王杀害了。

比干是商纣王的亲叔叔，商纣王对有恩于自己的亲叔叔尚且如此，岂不令朝中忠臣寒心？正是因为帝辛残酷地杀害了比干，导致了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朝野内外众叛亲离。所以，牧野之战中的“前徒倒戈”，会导致商朝大军失败。几万人统一倒戈，这显然是一次有组织的战场哗变。有研究认为，组织这场哗变的人是胶鬲。他是商王朝重臣，以贤闻名。纣王残害忠良，失去人心，使得这些贤人背叛商朝，帮助周国。胶鬲之所以甘心为敌国做内应，并且成功策反商朝的前线将士，只能说明商朝的部队将士憎恶纣王，也憎恶商朝的制度。

商王朝是奴隶社会。在这种制度下，田野间劳动的主要是奴隶，他们没有法律和道德意义上人的权利。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平日里会用绳索捆绑他们的手脚。如果逃跑被抓住，或者违反了奴隶主制定的规矩，奴隶不是被砍断腿脚，就是被处死。例如，在战争中被俘的东夷士兵，到商朝只能沦为奴隶。

与之相比，周国在制度上则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第一，周朝实行的是井田制，这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度，在田野上劳作的是农奴。农奴虽然依附于领主或者庄园主，但他们都具有法律和道德意义上的部分人权，不再只是会说话的牲口了。因此，农奴比奴隶有更高的生产热情。这种社会制度远远比商朝的奴隶制更先进。制度上的优势，使得周王朝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

第二，周国的贵族非常节俭。比如，周人也非常相信鬼神，可是他们祭祀鬼神时最高规格的“太牢”，也只用一牛一羊一猪。这与商王朝贵族动辄供奉成百上千牺牲品的奢侈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与商朝贵族残酷暴虐的行径完全相反，周国统治者非常尊重人的生命。比如，周国严格禁止用人做牺牲，即使国君去世，也只扎草人殉葬。这显示出周文化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从而赢得了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加强了内部的团结。为了进一步争取天下的民心，西伯昌表示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以此换取商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西伯昌的要求，废除了炮烙之刑。西伯昌因此得到了天下百姓的爱戴。

第四，政治上积极修德行善。与商王朝贵族贪婪地盘剥百姓相反，周朝统治者实行的经济政策非常开明：虽然设置贸易关卡却并不征税，山河湖泊，不禁止人们捕鱼打猎，犯罪不株连亲属。这在政治上的确是很清明的局面。

第五，重用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比如，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姜尚。他出身低微，志向远大，知识渊博，满腹韬略，可是商朝末年，政治黑暗，英雄无用武之地。七十多岁时，他才得遇西伯昌，终于有了施展雄韬大略的机会。在姜尚的辅佐之下，周国迅速强大起来。

总之，商王朝虽然经牧野一战灭亡，但是其灭亡的原因却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并且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多行不义必自毙。争天下的关键，在于争人心。

07 孔子心中的圣人周公都有哪些功绩

周武王面对商朝末年的各种危机，团结各路诸侯，终于在牧野之战中打败了商朝大军。商纣王兵败自杀，周与诸侯的联军占领了商朝首都朝歌，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新的王朝诞生了。可是，周武王在返回镐京的路上连续几天几夜难以入睡。武王的侍从立刻将这一严重情况报告给叔旦。

叔旦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姓姬名旦，由于他后来受封于周邑，且位居三公，因此人称“周公”或“周公旦”。当时叔旦是周朝的辅政大臣，负责主持朝廷日常事务。叔旦得知武王病重的消息，立刻赶到武王的寝宫，一见武王就问：“您这样长时间不好好休息，是要生病的！您为什么总失眠呢？”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18.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18.

武王亲切地说：“旦，你坐下，我有话对你说。”当周公坐定之后，武王说：“旦啊，上天不护佑商朝的迹象，早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看来，天意难测，灾难随时可能降临！我无法确定上天是否会保佑我们，如何睡得着啊！”没等周公回答，武王接着说：“旦啊，我一直努力了解天命，确定上天护佑，依照上天引领，憎恶商纣王及其恶臣；我日夜操劳，努力治理好西部地区，诸侯都服从我，足以证明我的德行。”面对武王的忧虑，叔旦无法回答，只是不停地流泪，衣襟全被打湿了。看到叔旦在哭泣，周武王对周公说：“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④意思是武王打算让周公旦继承王位，说周公是年轻明达的弟弟，为了国家事业，要兄终弟及，不用占卜，现在就立周公为王。武王病危时提出传位周公，既可能是真心托孤，也可能是对周公势力的试探。周公“恐，泣涕共手”^⑤。武王见叔旦拒绝，也没再坚持。兄弟二人对话之后不久，武王就去世了。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518.

从武王要把王位传给周公这件事情看，周公的确是王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是，周公旦心里非常清楚，兄终弟及会引发王子之间争夺王位的战争，所以拒绝了武王的美意，力主拥戴武王之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周公旦入朝摄政，主持朝廷政事及国家大政方针。但是，这引起了周武王的其他几个弟弟管叔、蔡叔等的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传到召公姬奭和太公姜尚的耳朵里，二人也开始怀疑周公的动机。面对召公和姜太公的质疑，周公解释

道：“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意思是“我之所以不避让而代行国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朝，无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和文王交代”。

可是不久后便爆发了“三监之乱”。所谓“三监”指的是周武王的三位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武王推翻商朝之初，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朝故都，让商朝贵族继续供奉祖先，延续香火，利用武庚统治商朝遗民。这叫“以商治商”。为了防止武庚叛乱，周武王将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商朝故都的周围，负责监视武庚。可是，他们三个人却和武庚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叛乱。从严格意义上说，“叛”与“乱”是不同的。武庚是叛，他要推翻周朝；三位王叔是乱，是对周公摄政表达不满。所以很自然，对他们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

成王委托周公率领周朝大军出兵东征，平定叛乱。大军在周公的率领下很快取得了东征的初步胜利。武庚兵败被杀，管叔自缢而亡，蔡叔被流放，霍叔被贬为庶民，那些跟着一起反叛的东部和南部的部族也都陆续被平定。原来的商朝故地彻底安定下来。

不久，周公继续东征，很快灭了奄国，将奄国君主迁到蒲姑（今山东省博兴县一带）。蒲姑曾经是商朝的盟国，并且参与了武庚叛乱，因此为周公所灭。随着奄国和蒲姑的灭亡，东方各股反周势力也都陆续被平定。

平定叛乱之后，周公着手建立新的制度，目的就是巩固地方社会秩序，理顺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了有效控制地方各邦，周公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封疆建国的方式。其特点在于以军事胜利和武装占领为先导，将自己最信任的人封到最重要的区域担任领导，藩屏周室，镇抚殷商残余势力，从而控制全国。比如，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让微子启代替武庚，封他为公爵，封地从商都迁到商朝旧都商丘，国名为宋。

商朝故都怎么办呢？周公心中早有人选。他将弟弟康叔封在那里，国号卫——就是保卫周王朝的意思。康叔姓姬名封，是周公的同母弟，在数位同母兄弟中，周公最信任康叔。因此，他将康叔封在商朝旧都这样的战略重地。卫国建立后，周公将大量商朝遗民迁到卫国。由此看来，周公封宋国和卫国，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管理商朝遗民。

成王亲政后，为了奖励周公的贡献，将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在奄国故地，国名为鲁——这里曾经也是商朝旧都；为奖励姜太公的贡献，将他的儿子姜伋封在营丘，国号为齐——这里曾经是商朝重要盟国蒲姑的所在地。如此分封，保卫东部地区、镇抚商朝残余势力的意图非常明显。齐国深入夷人腹地，鲁国地处商奄旧地，又紧邻徐戎、淮夷，可见齐、鲁两国在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

在周王朝统治区域的北部，活跃着一些游牧民族。为了防范他们南下侵扰，必须派一位信得过的人在北部建立诸侯国。于是，周成王就将召公的长子姬克封到周王朝的东北边境，国号为燕。这里在当时是北方及东北各族南下的必经之地，将召公之子封于此地，显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

成王十年（前1033年），周成王将弟弟姬虞封在“河、汾之东”——今山西境内，国号为唐，后改为晋。殷商以来，这里一直是戎狄分布的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晋国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它的历史使命是管理封国内的戎狄，抵御封国外异族的内侵。

宋、卫、齐、鲁、燕、晋等大国封立之后，周围又随之建立了一些附庸小国，这样就确立了周王室对地方统治的政治秩序。周公创建的分封制，王室宗亲分据要冲，既可藩屏王室，又能控制全国，基本解决了周对殷商曾统治的东方地区的控制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成功的举措。

其成功之处在于将家族与国家政体结合起来，完备了宗法制，从此“家国同构”“国家一体”。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国家管理体制建成后，周公又着手进行制度、规矩、礼仪等方面的文化建设，即所谓的“制礼作乐”。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道德原则。道德是一种社会准则，它是一切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合理性依据。周的传统就是重视道德，在宗法制度下，“尊尊”和“亲亲”是两条根本的原则。周礼更重亲亲，而后及于尊尊，先父慈与子孝，而后及于君仁与臣忠。由孝推及忠，由人伦推及君臣。

第二，嫡长子继承制。周国虽然坚持“父死子继”的制度，但是并没有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比如，文王姬昌舍长子伯邑考而传武王。当武王要将王位传给周公的时候，又改“父死子继”为“兄终弟及”，周公当然不可能接受。他不但坚持将王位传给武王的儿子，而且立武王嫡长子姬诵为周王，辅佐周成王平定天下之后还政于成王。从此，嫡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成为周王朝王位继承制度的标准。

第三，改革祭祀制度。周公摄政时对祭祀做了严格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牲制度这一野蛮习俗；祭祀时的牲品数量设立限制，最多不超过十二。其实，这是恢复了周国的传统，表明周公对周王朝建立的合理性更加自信了。

第四，制定相关礼仪。在礼仪方面，周公对商朝礼仪进行了彻底改造。删繁就简是基本原则，同时根据封建制度的要求，为加强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制定了覲

礼。原来以民俗为基础的冠昏、丧葬、朝聘、飧食、祭祀等礼仪，都依据周国传统的节俭精神，同时尊重各地风俗，做了调整。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九刑”不是九种刑罚，而是《刑书九篇》，同时又指出《刑书九篇》已不可考，其中有些可能是周公所作。

第五，制定法律。在平定武庚之叛和三监之乱以后，周公在商朝的墨、劓、剕、宫、大辟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赎、鞭、扑、流四种刑罚，合为九刑^②。周九刑与商五刑相比，恶性大为降低，是司法进步的表现。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256.

“周公作乐”之“乐”，由音乐和舞蹈共同构成，成为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史料记载，周公摄政第六年时，根据武王伐纣的故事制作了《大武》之乐。《大武》完成之后，在家庙祭祀时演奏，当然，还配有舞蹈。从此，作乐以祭颂武王就成了“国之大事”。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标志着周王朝的统治走上了正轨，对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后世的制度、道德、法律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周公的治理之下，周朝进入鼎盛时期，中华文明也开启了一段黄金时代。因此，孔子尊周公为圣人，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③，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08 西周灭亡的征兆是什么事件

公元前841年，周天子的王宫突然被无数手持棍棒、农具的国人包围，他们口口声声喊着要杀了周天子。所谓国人，是指当时居住在国都内及附近的人，包括贵族、平民、商人、手工业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士兵。国人声称要弑君，约等于全民造反了，周天子只好逃离镐京。这就是西周时期著名的“国人暴动”事件。这些国人为什么要暴动？那就要先介绍这位被追杀的周天子了。

他叫姬胡，西周第十位天子，死后谥号为“厉”。据《史记》记载，周厉王在位期间，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王畿境内的山林湖泽直接控制在周王室手里，不准国人进入。此举使周天子与国人陷入尖锐的矛盾，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而怨声载道。一位大臣因此进谏说：“百姓受不了了，都在议论纷纷。”周厉王命令一个姓卫的巫师监督国人，发现有国人敢说周天子的坏话，格杀勿论，史称“厉王止谤”。

周厉王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召穆公劝谏道：“你用强制的手段来堵民众的嘴，好比堵一条河。河一旦决口，就会有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决堤。治水要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人畅所欲言，否则会出大事。”可是周厉王根本听不进去。

于是，就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太子姬静被召穆公藏在家里，国人将召穆公家包围起来，非要杀太子不可。召穆公只好将自己的儿子交给了愤怒的国人，召穆公的儿子被害，太子姬静幸免于难。

国人之所以暴动，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是“专利”；其二是“止谤”。周厉王“止谤”的原因在于认为有国人诽谤天子，国人诽谤天子的原因在于天子宣布山林川泽都由王室独占，不让国人进入，更不许他们凭山河谋生。这两项手段显然都在激化社会矛盾。显然，矛盾的根源是周厉王与国人争利。那么，周厉王为什么这样做？这就得说说周王朝当时的状况了。

西周晚期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周王室的收入降低。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缴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西周取得贡赋的方法有二：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可是到周夷王时，已有诸侯不贡献，而且随着私田的不断开发，西周的井田制遭到破坏。因此，国人在山林湖泽捕鱼、打猎营利，对西周朝廷的经济收入造成了巨大威胁。

由于宗法制的血缘亲情纽带逐渐疏远，贵族内部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他们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周朝建立之初，国力强盛，边境的戎狄一直受到压制。可是到了周懿王时代，戎狄开始不断侵犯西周，甚至数次抵达京畿地区。显然，此时西周的国力衰落得很厉害。周懿王想扭转颓势，派虢公率领周师北伐犬戎，结果大败而归。

到周夷王继位的时候，周王朝国力衰落，诸侯不朝贡天子，彼此之间相互进攻。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受到挑战，中央的经济也开始走向崩溃。到周厉王继位时，周王朝的大厦根基已经动摇。面对这种局面，周厉王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任由周王朝继续烂下去，直至灭亡；要么革除弊政，打击与中央抗衡的诸侯势力，恢复政治、经济上的共主地位。周厉王选择了后者，并且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

第一，重用荣夷公，解决王室的财政困难。善于理财的荣夷公，在经济上帮助周厉王振兴颓靡的王室经济。可是，他的举措触犯了贵族及国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包括贵族在内的国人的强烈反对。史书抨击周厉王“专利”，实际上是指他利用国家权力，控制农业生产和经济资源。荣夷公帮助厉王打击贵族经济以加强王室经济，直接导致了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利益上矛盾的激化。

第二，任命虢公长父担任卿士，防御外敌。虢公长父的身份比较低微，周厉王破格提拔和重用虢公长父，打破了贵族对高层官员职位的垄断，此举自然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

周厉王出逃后，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管理朝政，这一时期的国号为“共和”。公元前841年为共和元年，从此，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的纪年。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周厉王死在彘城。召穆公和周定公一起拥立姬静为天子，是为周宣王。此前的十四年就是“共和行政”时期。可是，有一些人对“共和行政”时期是否存在，提出了疑问。

最大的疑点是，如果召穆公和周定公能够共同管理朝政的话，那么二人应该有能力平息“国人暴动”的混乱。可是当国人包围召穆公府要求交出太子时，召穆公居然需要用亲生儿子顶替，才能换得太子的性命。如此地位的二公，怎么可能阻止和镇压国人的反叛，又怎么可能联合执政呢？这的确匪夷所思。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显然，还存在一位强势人物，周定、召穆二公只有联合他，才能共同应对危乱的时局。那么这个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究竟是谁？西周厉、宣时期的一些青铜器提供了线索。青铜器的铭文中频繁出现“司马共”“伯和父”“师和父”等人名，

这三个名字其实指向同一个人。根据清华简《系年》记载，这个人叫“共伯和”，“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于彘后，他便入主周王室，代周天子主持了十四年的朝政。

原来，“共和”是人而不是年号，那么这位共伯和又是何许人？他姓姬，“共”是其封国名（今河南省辉县），隶属于卫国；“伯”可能是爵位，也有人说是排行老大的意思；“和”是他的名。史料记载，周厉王无道，国人暴动，周王逃亡，诸侯奉共伯和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了，共伯和派诸侯尊太子姬静为周王，随后共伯和回到自己的封国。

第二章 乱世与王霸的博弈

公元前771年，西戎大举进攻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公元前707年，周天子与郑国之间爆发“葛之战”，中国历史进入诸侯争霸时期。这个时期被孔子描述为“礼崩乐坏”，其实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转型期，但不可否认，它是一个乱世。面对这个乱世，人们纷纷寻找由乱到治的方法和途径。由于价值观不同，个人利益和背后代表的阶层不同，因此方法和观点也就出现了差异，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学说。然而，由乱到治的确不是在理论层面讨论就能够完成的事，必须经过残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才可以达成，因此法家和兵家成为时代潮流。与兵家和法家借助武力、暴力和诈术建立秩序相反，道家追求回归自然，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这些理论虽然在当时的实践中失败，却能在精神层面永存。战国时期的“王道”与“霸道”之争，“霸道”虽然胜出，“王道”却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

01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真的吗

公元前771年，西戎大举进攻镐京，周幽王下令点燃烽火，诸侯却不来勤王救驾，结果幽王被杀，西周灭亡。诸侯为什么不来救驾？据《史记》记载，幽王的妃子褒姒整天阴着脸不笑，幽王便点燃烽火，“诸侯悉至”，褒姒见诸侯上当便哈哈大笑。由于幽王博美人一笑的轻率之举，烽火从此失去报警功能，当西戎大举进攻时，诸侯就不来救驾了，西周也因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可是，此故事的真实性非常可疑，分析起来，有两大疑点：其一，点烽火报警是汉代防御匈奴之事，西周末年并无此举；其二，西周幅员辽阔，各地诸侯相距甚远，以烽火传递信息容易出现时间差，且按当时的交通水平，也不可能一点燃烽火就有“诸侯悉至”的情况出现。显然，“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虚构的。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周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年），宣王驾崩，太子姬宫涅继位，是为周幽王。在位第八年，幽王废了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

西周末年，西戎的势力很大。到了周幽王时代，京畿地区不断受到西戎其他部族的袭扰和蚕食，周王室在军事上几乎丧失了对西戎的抵御能力，只有靠西申国与秦人的相助才得以苟延残喘。可是，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周幽王却废了申后和太子宜臼，打破了申周之间的联盟。他之所以如此，是要打击日益强大的西申国，率领姬姓诸侯集团在抗击以西申侯为代表的姜姓诸侯联盟。

为了这一战略意图，幽王联合一些姬姓诸侯，形成以幽王为代表的姬姓势力集团，准备应对以西申侯为中心的姜戎联盟。然而没等西申侯集团前来进攻，幽王和伯服突然率领大军主动进攻西申国。这就让人不禁感到奇怪，幽王已经将姬宜臼驱逐，为什么还要发兵攻打西申国？

这是因为太子姬宜臼被废后，和母亲一起投奔外公（或舅舅）西申侯，想借助西申侯的力量夺回太子之位。西申侯一见幽王立伯服为太子，直接立姬宜臼为“天王”。幽王听说消息后大怒，立刻起兵讨伐西申国，姬、姜两姓诸侯联盟之间的战争就此爆发。就在周幽王讨伐西申国的时候，缙国和西戎大军突然出现在幽王和伯服的背后，与西申侯的军队一起，形成对幽王军队的两面夹击，导致幽王和伯服兵败被杀，西周灭亡。

就在西周灭亡的当年，天王决定将首都从镐京迁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那么，天王为什么要急着迁都？几千年来，人们普遍接受的理由有四：第一，骊山之役后，戎狄部族相继进入土地肥沃的关中平原，周王室已无力抵抗戎狄的进攻；第二，寻找强大的诸侯作为依托，重建周朝；第三，西周晚期，自然灾害频发，幽王时期饥荒严重；第四，西周的京畿地区几乎都毁于戎灭周的战火，关中地区经济萧条。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79.

但是，在天王迁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疑点一，西戎是帮助天王姬宜臼夺权的友军，为什么姬宜臼当了天子之后却要躲避西戎，将首都东迁到洛邑去？疑点二，西申侯对姬宜臼有拥立之恩，怎能轻易让姬宜臼东迁，自行放弃对周王室的控制权？疑点三，姬宜臼弑君父篡位，此举必为天下姬姓诸侯所不齿，他们怎么可能拥戴天王并且护送他东迁洛邑？疑点四，西申侯和天王联合西戎攻打周朝时，秦襄公率军勤王救驾，他与天王是敌人，为什么会率兵护送天王迁都？疑点五，入侵周王朝京畿地区的西戎是申侯和天王引来的，可事后周平王为什么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

如此自相矛盾的记载出现在《史记》中，太史公居然不做认真研究和考辨，就这样留给后人？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要先回顾幽王被杀后发生的事情。

幽王和伯服被杀，三王死了二王，只剩下天王一个。可是，以虢公翰为代表的姬姓诸侯马上拥立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与西申侯等姜姓诸侯拥戴的天王对抗，史称“携王”，关中地区再度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

可是，天王的确将首都迁到了洛邑并且恢复了社会秩序，重建周王朝，史称“东周”。那么，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完成的？两大对立的阵营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天王姬宜臼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得以摆脱以西申侯为代表的姜姓诸侯的控制，将那些反对自己的姬姓诸侯转变为自己的支持者，最终完成东迁，恢复秩序，重建周朝的呢？

由于天王联合西戎弑父灭周，所以二王并立之初，大多数姬姓诸侯都站在虢公翰所立的携王一方，与天王对抗。但是到了二王并立后期，形势发生了剧变，晋文侯杀掉携王，转而拥立天王，原来依附申、吕联盟拥戴天王的西戎，却突然改变态度“侵暴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变？

从各路诸侯的角度来说，发生态度变化有两个原因：第一，追求合法性。晋、秦、郑等诸侯趁乱夺取了大片土地，他们需要周王室承认其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第二，秦、郑二国的君主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获得周王室承认的诸侯头

衔。因为嬴姓秦人的祖先是商朝遗民，没有诸侯的身份和地位；郑国则是在二王并立时趁机立国的，需要得到承认。

可是，携王无视诸侯们提出的政治要求。与其相反，天王为了取得姬姓诸侯的支持，对秦、晋、郑等诸侯的政治要求统统予以满足，于是姬姓诸侯开始转而拥戴天王。

但是想要姬姓诸侯彻底转变态度，有一个道德障碍很难跨过，那就是姬宜臼和西申侯联合西戎弑君弑父之事。天王如果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就不可能与姬姓诸侯和解。为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姬宜臼将弑君弑父的罪名甩给了西戎，因此才会说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这样的话。

为了赢得秦国的支持，天王对秦国占领本来属于周的土地不闻不问，并且赐予秦君伯爵头衔，所以秦襄公才会有亲率大军护送天王迁都之举。天王对晋文侯的土地扩张不闻不问，使得周王朝的土地合法地成为晋国的领土。作为交换，晋文侯杀了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局面。在晋、郑、秦等国的帮助下，天王终于将首都迁到洛邑，并且逐渐恢复了周王朝的秩序。

总之，天王成功东迁表明了一个历史真相：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利益永恒。在利益的天平上，敌人和盟友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线。天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满足了强势诸侯的利益，最终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02 为什么有人敢射天子一箭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率王师并征调陈、蔡、卫三国的军队，联合进攻郑国。结果王师大败，周桓王在撤退时中箭负伤。这就是东周时期著名的“葛之战”。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周天子为什么要联合几个国家攻打郑国？郑国的将军为什么敢朝天子放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讲讲郑国是如何建立的。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宣王封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友于郑（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郑立国，公子友成为郑国第一代国君，是为郑桓公。从分封时间看，郑国立国的时间比较晚，距离周朝建立已经过去二百四十年，距离西周灭亡仅三十多年。然而，郑国作为西周最后一个建立的诸侯国，却在西周向东周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周幽王九年（前773年），郑桓公向周幽王提出请求，将封地移到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以东。得到周幽王的同意后，郑桓公便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向虢、郛二国君主借地。虢、郛两国的君主贪图丰厚的礼品，各献五座城池给郑国，郑桓公因此在中原有了立国的基础。不久，郑桓公下令将原封地上的居民东迁，把家属和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郛之间的京城（今河南省荥阳市京襄城）。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骊山之役”发生，军队统帅郑桓公战死，郑国人拥立掘突为国君，是为郑武公。幽王和伯服被杀后，以虢公翰为代表的姬姓诸侯立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王，史称“携王”；申侯等姜姓诸侯继续拥戴太子姬宜臼为王，即后来的周平王。关中地区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贵族和大臣们陷于两难：是拥戴携王，还是追随周平王？

郑武公很快表明态度，站在周平王一边，反对携王。因为郑国作为新建的诸侯国，渴望扩张领土和增强实力，而郑国的要求得到了周平王的支持。于是，郑武公就倒向了平王。在护送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郑武公趁势灭了郛国和东虢国，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郑武公病逝后，太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郑庄公经常利用自己王朝卿士的身份，以周王的名义征讨不听话的诸侯，此举引起了周平王不满。可是还没等出手制衡郑庄公，周平王就驾崩了。由于太子早逝，大臣们拥立周平王的孙子姬林为天子，是为周桓王。周桓王即位，准备将郑庄公的卿士权力分一部分给西虢公。郑庄公大怒，派手下大将带部队在天子领地上收割庄稼，周王朝和郑国的关系从此恶化。

周桓王五年（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以分郑庄公之权。周桓王六年（前714年），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郑庄公以天子的名义讨伐宋国。周桓王七年（前713年）二月和六月，郑庄公召集齐僖公、鲁隐公等诸侯两次举行会盟，组成三国联军进攻宋国，宋军大败。周桓王八年（前712年），郑庄公率领郑、齐、鲁三国军队攻占许国；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周桓王免去郑庄公左卿士的职务，郑庄公从此拒绝朝觐周天子。为了维护天子的权威，周桓王率领蔡国、卫国和陈国等诸侯军队讨伐郑国，结果周天子的军队大败，郑国将领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天子的威严扫地，周王朝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春秋霸政时期就此开始。

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权的实力下降；其二，卿士的权力太大，不但能够统率军队、受命立君、会盟诸侯、主持征伐，甚至可以取代王权；其三，诸侯王兼任王朝卿士，使得卿士能借王朝的力量，实现诸侯的一己私欲。比如，郑国三代君主皆为王朝卿士，为郑国称霸创造了条件，并且决定了春秋霸政初期的特点：卿士滥权，假公济私。

郑庄公因滥用卿权、霸凌他国，引起了周王警惕。于是周桓王起用西虢公入朝制衡郑庄公，最终剥夺了郑庄公的卿位。从此，鲜有诸侯兼任王朝卿士的现象，诸侯凭借卿权施霸政就不可能了。可是春秋霸政并未因此终止，只是霸政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是：诸侯们在无法获得卿位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期望得到天子的临时授权，代表天子会盟征伐，从而实施霸政。

比如，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春，齐桓公召集宋、陈、蔡、邾等诸侯在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县北部）会盟，目的是平定宋国内乱，确定宋桓公的国君地位，当时宋桓公也参与了会盟。但到了公元前680年，宋国背叛了北杏之盟的盟约，这对齐桓公的霸主权威是一种挑战。齐桓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决定出兵讨伐宋国。为了使自己的出兵更具合法性，齐桓公先派人带着丰盛的礼物去朝拜周天子，说宋国不尊重周天子，随便废立国君，请周天子兴师问罪。周天子想借齐国的力量来树立天子威望，遂答应齐桓公的要求，派大夫单伯带部分兵力，会同齐、陈、蔡三国合兵伐宋。宋国看到齐国打着周天子的旗号来讨伐，不想背负抗御王师、与天子作对的罪名，请求归顺王室，与诸侯和好。之后，齐桓公在公元前679年冬天请周天子的代表单伯，约集卫、郑、宋三国国君一起在鄆地会盟，各国诸侯看到周天子支持齐国，遂共推齐桓公为盟主，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开始确立。

由于天子地位下降，强大的诸侯成了受天子仰仗的力量。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去世，太子郑秘不发丧，暗中寻求齐桓公的支持。第二年，齐桓公召集宋、卫等国会盟于洮（今山东省鄆城县西南），拥立太子郑为天子，是为周襄王。因为拥立之功，齐桓公获得周襄王“赐胙”，即分享祭品的礼遇。

可是，王子带召集成周附近地区的戎族进攻洛阳，焚毁了王城的东门。在周襄王的迎击下，王子带逃到了齐国。几年之后，王子带联合大臣颓叔、桃子再次发动叛乱，带领狄人军队攻打周襄王，这次，叛军大败周军，俘虏周公忌父等人，驱逐了周襄王，王子带自立为王，史称“子带之乱”。

周襄王逃到郑国，因走投无路，只好向秦、晋两国求援。秦穆公立刻屯兵于黄河岸边，准备勤王。晋文公则分兵两路，一路迎接周襄王返回王城，另一路围攻王子带，最终平定了这场周王室之乱。为了酬谢晋文公，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欒茅四邑赐给了晋国，晋国从此成为周天子仰仗的主要力量。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文公大败楚国，向周王行献俘之礼。周襄王授予晋文公“礼乐征伐”之权。这决定了春秋霸政中期的特点：天子授权，霸政合法。

到了春秋霸政的晚期，诸侯开始追求霸政的合理性。其一是“尊王”，比如郑庄公擅自征伐宋国，名义上是为了维护朝觐天子的礼仪；齐桓公率诸侯国征伐楚国，名义上是因为楚国不向天子进贡。由于周王室和中原诸侯认为楚国不属于中原华夏族，因此，对楚国的征伐就包含了霸政的第二个合理性——“攘夷”。所谓“夷”，范围比较广，除了南方的楚国，主要是指西方、北方的戎狄。其实，春秋时期，夷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儒家宣扬得那么尖锐，周襄王、晋文公等都与戎狄有婚姻关系。蛮夷对周王室和中原诸侯国构成的威胁被夸大，目的无非是增强春秋霸政的合理性。

但到了春秋晚期，无论“攘夷”还是“尊王”都成了借口，霸主仅凭实力，根本不顾及合理性。比如黄池之会上，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夫差将自己说成是周王的忠实捍卫者，称霸也是奉周王之命。晋定公当面予以戳穿：“你自称吴王，僭越在先，却口称尊周王，实在说不过去。”

当着周王卿士单平公的面，吴王夫差为了在黄池之会上压过晋定公成为盟主，命令三万甲士在晋国军营外排列阵势、鸣金呼喊，迫使晋人让步。然而就趁着这次黄池争盟的时机，越军大举入侵，并且攻入吴都，吴国太子战死，吴国霸业戛然而止。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746.

勾践灭了吴国，便要接替吴国的位置，于是领兵北渡淮河，与齐国、晋国会盟于徐州，并且给周天子进贡。周元王派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可是勾践却“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⑤。显然，此时的周王已是强弩之末，只能听命于诸侯。所谓“赐胙”越王，是对其称霸资格进行正式认可，也是势在必行，双方皆借此装点门面而已。

强大的诸侯不再依靠在周王朝担任卿士或凭借王室赋予的权力称霸，也不再通过天子的授权获得霸政合法性，更不去寻找所谓“尊王攘夷”的借口为霸政寻求合理性，完全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谁的实力强大，谁就是霸主。当霸政既没有合法性，更没有合理性的时候，它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战国时期。

03 管仲如何管理领导

周庄王十一年（前686年），公孙无知杀害了齐襄公，自立为君。可是不久后，公孙无知又为齐国大夫雍廩所杀，齐国一时没了君主。齐国的贵族们讨论要重立君主，高氏和国氏两家贵族暗地里通知齐襄公的三弟公子小白立刻回国，小白接到消息之后，马上从莒国（今山东省莒县）赶回齐国。

据《管子》一书记载：公子小白的老师鲍叔牙先到达齐国，通过他的上下游说，再加上国、高两家鼎力支持，公子小白被拥立为新国君，是为齐桓公。鲁庄公听说消息，马上发兵带着齐公子纠讨伐齐国，希望立纠为齐国国君。双方展开决战，结果鲁军大败。在溃败中，管仲为掩护纠，一箭射中齐桓公，幸好只是射中衣带钩，有惊无险。鲁庄公兵败，狼狈逃窜，只好按照齐桓公的要求杀了纠，才避免被进一步追杀。

回到齐国，齐桓公问鲍叔牙：“何以定社稷？”鲍叔牙回答：“得到管仲和召忽，则社稷定。”齐桓公质问：“此二人是我的仇人，先生怎么能推荐他们？”于是鲍叔牙给齐桓公讲了一段过去的故事。

管仲、鲍叔牙与召忽三人，号称齐国“鼎之三足”，曾经共同辅佐公子纠。有一天，齐僖公突然派鲍叔牙给公子小白当老师，鲍叔牙不愿意，借口有病，闭门不出。管仲和召忽听说消息之后，一同前去探望。

一见面，管仲就问：“何故不出？”鲍叔牙说：“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君上让我给小白当老师，我被抛弃了。”召忽说：“先生坚决不干，我对别人说您病得快死了，就会免了你这差事。”鲍叔牙说：“您能这样做就太好了！”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日常事务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更不能长时间没事干。将来谁继承君位还不一定，您还是接受任务吧。”召忽反驳说：“不行！我们三人是鼎之三足，鲍叔牙教小白，等于去掉一足。我看小白是不可能继承君位的。”

管仲反驳说：“国人厌恶纠的母亲，因此厌恶纠，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太子诸儿虽然是长子，但他是庶出，前途还不定。将来统治齐国的人，一定在纠和小白之中，不会是别人。小白虽然没有小聪明，但警觉而有远虑，只有我能够理解和包容他。如果将来齐君去世，纠被立为国君，他必然一事无成，所以齐国将来需要由您来安定。”

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去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我也不愿活着；我们参与齐国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作为大臣，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岂能为纠一个人而死？只有在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的时候，我才会死。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死了对齐国不利。”听了管仲这番话，鲍叔牙动了心，进一步征求管仲的意见：“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你出来接受任命就是了。”鲍叔牙于是接受君主的任命，成了公子小白的老师。

管仲进一步嘱咐鲍叔牙说：“为人臣者，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近和信任，对君主说话就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意思是提醒鲍叔牙，侍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即使对小白有看法，但既然决定辅佐他，就必须一心一意。鲍叔牙对管仲的建议完全接受。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一番话，又问：“我能得到他们的辅佐吗？”鲍叔牙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否则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会建议鲁君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就会导致鲁强齐弱；管仲如不接受，必死无疑。”齐桓公问：“那么，管仲会接受鲁国的任命吗？”鲍叔牙回答：“不会！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想着让齐国强大，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即便知道必死，也不会接受鲁国任命。”

齐桓公问：“那么他对我会怎么样？”鲍叔牙回答：“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先君。他对您不如对纠亲，纠死他都不肯死，何况您？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鲍叔牙说：“施伯聪敏却怕事，您若及早去要，他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管仲。”桓公这才派使臣前往鲁国要人。

鲁国君臣的反应完全在鲍叔牙的意料之中。施伯对鲁君说：“管仲有难而留在鲁国，君上将国政交给他，如果他接受，鲁强齐弱；如果不接受，则杀之并讨好齐国。”鲁君同意了施伯的建议，但还没等见到管仲，齐国的使臣就到了。使臣对鲁庄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国的叛贼，现被鲁国收留。我要活的，如得不到，那就是和我国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公问施伯：“给不给啊？”施伯说：“给吧，齐君性急而骄傲，虽得贤才未必能用。如果齐君真的用管仲，齐国必定强大，天下诸侯都会追随他，岂独鲁国！如果杀了他，鲍叔牙是他的好友，会与鲁国为敌，还是把管仲交给齐国吧。”鲁君于是下令将管仲、召忽捆起来，交给齐国使臣。

当一行人准备出发时，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吗？”召忽说：“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让您当齐国的左相，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再用我身，是双重屈辱。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有生臣；我以死殉君，公子纠有死

臣。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实现功名，二者不能兼顾。您努力吧，我们各尽其分。”

一行人进入齐境时，召忽拔剑自刎，只有管仲回到齐国。

齐桓公召见管仲问道：“何以定社稷？”管仲回答：“您追求霸王之业则社稷定，否则社稷不定。”桓公说：“我只求定社稷，不敢有那么大雄心。”管仲再次请求，桓公还是拒绝。管仲告辞转身离开，桓公连忙把管仲叫住，流着汗说：“你一定要坚持，就勉力图霸王吧。”管仲说：“您同意追求霸王之业，我就接受相位。”

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趁诸侯间没有战事，稍微加强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国家尚未安定，您先扩充军备，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齐桓公说：“好。”

两年后的一天，齐桓公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荡船吓唬齐桓公。齐桓公一怒之下休了宋夫人，于是宋国君把宋夫人嫁给了蔡侯。第二年，齐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伐宋。”管仲说：“不行，内政不修，对外用兵必败。”齐桓公不听，起兵伐宋。诸侯兴兵救宋，齐军大败。齐桓公回来对管仲说：“我的士兵训练不够，兵力太少，所以诸侯敢救宋国。我必须加强军备！”

管仲说：“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对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对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会有危险。”鲍叔牙说：“您一定要听管仲的话。”齐桓公不听，命令封地内加强军备，增加关税和市场税，按作战勇敢状况颁发禄赏。

鲍叔牙对管仲说：“当初你动员君上追求霸王之业，现在国家乱了，怎么办？”管仲说：“国君很警觉，其智需要多教诲，暂且等他自觉。”鲍叔牙说：“待他自觉，国家就完蛋了！”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稍稍用力，就不会乱。环顾周边，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大臣，因此无人敢来侵犯我国。”

在以后的几年里，朝廷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死人的事不断发生。鲍叔牙对管仲说：“国家死了这么多人，这可怎么办？”管仲说：“没关系，死的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是国外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为官。”

三年之后，齐桓公要伐鲁国。管仲说：“不行。有土之君不应勤于战争，不在意一时屈辱，一种错误不犯第二次，国家就能安定，否则国家就危险了。”齐桓公不听，兴兵伐鲁，结果兵败长勺。齐桓公说：“我的兵力太少，我要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对手，看他们如何阻挡！”

第二年，齐国的部队达到十万人，兵车五千乘。齐桓公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过训练，军队也已增多，我要征服鲁国。”管仲叹息道：“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修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拥有十万士兵的国家不少，我们这是以少敌多。”齐桓公不听，兴兵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与齐国结盟，声称追随齐国，要求齐国不再进攻鲁国，齐桓公答应了。鲁国人请求齐桓公，会盟时不带兵器，齐桓公也答应了。管仲劝阻说：“不能结盟，这样会引来诸侯国对齐国的围堵；非要结盟不可，必须带着兵器，曹刿为人坚强而狠毒，是不可能守约的。”齐桓公不听劝，与鲁庄公相会。只见鲁庄公带剑，曹刿也带着剑。二人一见面，鲁庄公便抽出剑指着齐桓公说：“这里离国都只有五十里，不过一死而已。一同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上前护卫桓公，曹刿举剑拦在中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能近前。”管仲急中生智地大喊：“君上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两国以汶水为界！”齐桓公为了活命只好答应。

吃了大亏的齐桓公，回来之后努力整顿内政，不再增加军备，闭门思过，不过问国事，从此息兵罢战。管仲得以放开手脚治理齐国，其治国理政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主。

通过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齐桓公一意孤行的时候，管仲会稳住大局，使齐国不至于被齐桓公的错误搞垮；同时不断地提醒，努力纠正他的错误，且耐心等待齐桓公自己觉悟。而当齐桓公遇到危险时，管仲奋不顾身地保护他，从而真正取得了信任。只有得到充分信任，管仲才有可能施展拳脚，为齐国建功立业。

04 商鞅为什么被车裂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太子傅嬴虔重回政坛。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后台倒了，嬴虔的门下人看到了报仇的机会，立刻向朝廷告发：商鞅要谋反！

商鞅听说之后潜逃出咸阳，来到边境关口准备出境，可是天色已晚，他想要住店却没带身份证件。店主人说：“商君有令，住店者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叹了口气说：“唉！制定新法，贻害如此啊。”感叹完后，离开小店连夜潜逃到魏国。魏国人憎恨商鞅，拒绝收留，并且说：“商君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逃犯跑到魏国来，不送还不行。”于是把商鞅送回秦国。最终商鞅被杀，死后还被施以车裂之刑。

魏国人为什么憎恨商鞅？这还得从秦魏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说起。

秦孝公二十年（前342年），秦孝公派卫鞅（即商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击。当两军对峙时，魏公子卬接到卫鞅的信，信中说：“当初与公子相处得很好，如今你我却成了敌对国将领。我不忍心相互攻击，可与公子当面对面相见，订立盟约，好好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两国从此相安无事。”魏公子卬相信了卫鞅的话，与卫鞅会面并且结盟。会盟结束后，二人一起喝酒，帐外的士兵突然闯入，将魏公子卬俘虏。秦军趁机攻打魏国军队，魏军被打垮，卫鞅押着公子卬班师回国。

魏惠王派使者到秦国交涉，割让河西地区的土地将公子卬换回。为了躲避秦国进攻的锋芒，魏国还将首都从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为了奖励卫鞅，秦孝公把商於之地（今陕西省商洛市）的十五个邑封给他，赐封号“商君”，从此卫鞅便被称为“商鞅”。商鞅采用欺诈手段打败魏国，与魏国结下了深仇大恨。因此，商鞅只好逃到他的封地，发动部属和邑中士兵向北攻击郑国。秦惠文王领军攻打商鞅，将他杀死在郑国黽池，还将其车裂后示众，以儆效尤，后又诛灭了商鞅全家。

可是，商鞅逃难的这段故事在《战国策》中没有记载，仅见于汉代成书的《史记》。我也认为以商鞅的智慧，就算听说有人告发他叛国，他也是绝对不会潜逃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先讲讲商鞅在魏国宰相府担任中庶子的事。

商鞅是卫国人，本名卫鞅，祖辈是卫国的国君，因此又被称为公孙鞅。卫鞅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曾在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宰相府内担任家臣。卫鞅博学多才，很受

公叔痤器重。有一天，公叔痤病重，魏惠王亲自前来看望。君臣见面，魏惠王问公叔痤：“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痤回答：“我的家臣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望大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明白，魏惠王不愿意接受他的推荐。魏惠王起身要离开时，公叔痤打发左右退下，然后对魏惠王建议道：“大王如果不任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答应了。

送走了魏惠王，公叔痤又将卫鞅召到身边说：“刚才大王问我，谁能够出任魏国宰相一职，我推荐了你，大王不同意；我劝大王假如不用你就杀掉你，大王答应了。你赶快离开吧，以免被大王杀掉。”卫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遂不听劝，继续留在魏国。如此冷静、理性的卫鞅，怎么可能听说有人诬告他谋反就潜逃？这样做岂不坐实了罪名？

以商鞅的政治智慧，他心里非常清楚，秦孝公去世，支持他变法的政治靠山倒了，无论他是否谋反，都难逃一死。

可是问题来了。秦国太子即位之后，太子傅的门下人为什么要诬告商鞅谋反呢？几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得罪了太子和太子傅嬴虔。

事情发生在秦国推行新法一年后，秦国贵族挑唆太子犯法，于是商鞅下令，将太子傅嬴虔处刑。之后嬴虔又犯法，于是被处以劓刑也就是被割去鼻子。商鞅被杀，嬴虔算是报了割鼻之仇。然而，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肤浅，也低估了秦惠文王和嬴虔的政治水平。

太子嬴驷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因犯法而被治罪，只是由于太子的身份而未被处以刑罚；之后，太子傅嬴虔被施以劓刑。显然，这二人都是孝公时期的罪臣，且孝公执政期间并没有将二人赦免。那么秦孝公突然去世后，太子和太傅依然是罪臣身份，无论是太子继位还是太子傅重回政坛，都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新君上位必先为自己平反，所以，判二人有罪的商鞅就必须被处以车裂之刑了。商鞅究竟是否谋反，根本不重要，他必死。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君上位，不杀人不足以立威。况且商鞅当时在秦国的威望很高，不杀他，如何号令群臣！因此，商鞅之死就成了新君上位的铺路石。可是秦惠文王继位之后和嬴虔摄政期间并没有废除商鞅制定的法律和制度，甚至一个字都没改。二人如此仇视商鞅，车裂其身，灭其族，为什么不推翻其变法的内容？这就得说一说商鞅在秦国的具体作为了。

秦孝公即位第一年，向天下求贤。卫鞅来到秦国后，通过景监的推荐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卫鞅陈述治国之道，秦孝公却一直在打瞌睡。事后秦孝公训斥景监：“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我怎么能用这种人？”

景监以此话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他无法领会。”五天之后，景监请求秦孝公再召见卫鞅。卫鞅侃侃而谈，却还是不合秦孝公心意。事后秦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而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

卫鞅第三次见到秦孝公，这次见面交谈的内容，秦孝公很感兴趣，对卫鞅很友善，可是依旧没有任用他的意思。会见之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景监将秦孝公的话告诉卫鞅，卫鞅回答说：“我给他讲春秋五霸的治国故事，看来大王准备采纳了。请求大王再召见我一次，我知道该说些什么啦。”

于是，卫鞅又见到了秦孝公。这次，秦孝公和他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景监说：“您是凭什么让大王如此高兴的？”卫鞅回答说：“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可惜不能与殷、周相媲美了。”

秦孝公在重用卫鞅、进行变法之前，安排了一场“御前大辩论”。经过充分的辩论之后，秦孝公总结道：“我听说贫穷的巷子里怪事多，学识浅薄的人喜欢狡辩。愚蠢的人所嘲笑的，正是有智慧的人所悲哀的；狂妄的人乐于做的，正是有才能的人所失落的。我不再在意世俗的议论，决心变法，不再犹豫。”

御前辩论后不久，卫鞅草拟《垦令》，秦孝公增订修改，然后在全国公布执行。这是秦国改革的第一份正式法令，核心内容是“重农抑商”，具体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统一标准，訾粟而税；其二，不贵学问，必须务农；其三，禁止买卖，统购统销；其四，提高物价，扼杀商业。

首次改革取得成功后，卫鞅担任左庶长，放开手脚深化改革。法令制定好后，卫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杆，宣布：谁将此杆从南门搬到北门，就赏金十金。众人觉得奇怪，谁也不敢搬。过了几天之后，又宣布：谁能将此杆从南门搬到北门，赏金五十金。这个时候有人将杆子从南门搬到北门，官府果真赏了这个人五十金，以证明官府说话算话。这就是“徙木立信”的故事。

此事之后，商鞅立刻颁布政令，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什伍连坐，各户组织起来，一家有罪，十家连坐；第二，鼓励告发，与战场杀敌一样算作立功；第三，强制分户以消灭家族，不分户就增加税收；第四，鼓励军功，斩首记功；第五，取消特权，重定爵秩。

在初期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商鞅又进了一步，改革涉及的范围和层面比前一次更广、更深入，改革的程度也更彻底。据《史记》记载，这次改革大致上可分为四

个部分。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23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422.

第一，统一度量。商鞅颁布法令：“平斗桶权衡丈尺。”^③斗桶测容积，权衡测重量，丈尺量长度。同时对货币做了统一，即所谓“调轻重”^④。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232.

第二，重整耕地。“为田开阡陌封疆”^⑤，以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并且以亩为单位，将土地作为奖励和赏赐的手段。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4.

第三，收人口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⑥自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开始，商鞅正式推行人口税，使其成为秦国此后主要的税源。其直接效果是鼓励土地私人占有，并不因此增加税收，这使得更多荒地得到开垦，百姓耕种积极性提高。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232.

第四，广行县制。“集小乡邑聚为县”^⑦。商鞅规定，在县级单位里必须设置县令为一县之长，掌治该县；其下有县丞，佐助县令，组成县署。无论县令、县丞，其任免大权皆在中央；有任期，不能终身担任，更不能世袭。

比较商鞅两个阶段的改革就会发现：第一阶段，商鞅的眼光放在国内，着眼于如何整治国家，如何将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满足秦孝公要让秦国成为西方强国的愿望；第二阶段则是具有前瞻性的设想和计划。商鞅预计到将来他设计的制度和管理工作一定会广为推行，被天下人接受。因此，第二阶段的变法是在为未来秦国一统天下做准备。商鞅顺应历史潮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庄园主或领主制经济，瓦解贵族势力，推行土地私有制，广行县制，加强君主权威，为日后中央集权帝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国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秦朝。从秦到清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帝制，让今天的我们成为如此泱泱大国，而不像欧洲那样分裂为无数割据小国，的确得益于商鞅的顶层设计。

由此可见，商鞅的确有经天纬地之才。

05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消极无为”吗

众所周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有人因此批判老子的思想传达“消极无为”的观点，这完全是误解。老子活动于春秋晚期，这是一个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时期。面对周王室衰落、诸侯相互兼并的混乱状态，老子描述了天下大乱的状态，分析了乱的原因，指出了解决乱象的方法，同时也提出了避免灾难的建议。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47.

张景，张松辉. 详注. 道德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21：321.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56.

老子认为，“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①，意思是，由于戎马倥偬，小马驹都出生在郊外，这很不正常。那么，天下大乱的原因是什么？在老子看来，是财富的积累引发了人们的占有欲。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②什么是“可欲”？韩非在《喻老》中举例：“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③皮毛的珍贵引发人追求的欲望，给动物招来杀身之祸。

韩非接着又以徐偃王举例：“夫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说的是徐偃王治国有方，素以仁义闻名于世。有一年，周穆王巡视各诸侯国，到处都能听到徐国君主的名声，于是命令楚国趁徐国不备发动进攻，最终攻破徐国，杀了徐偃王。这就是徐偃王因为追求仁义的名声而导致亡国的故事。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徐偃王被杀有更深层的原因。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445.

由于徐偃王治国有方，徐国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国力不断增强，徐国统治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竟然有“地方五百里”，疆域涉及淮河、泗水流域的苏、鲁、豫、皖的部分地区；来朝贡者日益增多，最高时居然达到“三十有六国”^④。那么，这为什么会给徐国带来灭国之灾呢？

在周穆王统治时期，周王朝大肆对外作战，消耗了大量的财富，随即加重了内部剥削。诸侯国对宗主国的暴虐统治和沉重的赋税负担甚为不满，徐偃王就是反对周朝最强烈的国君之一，其具体表现是称王并且扩建徐国的都城，规模超过了天子的王城。据说天子王城方圆九里，徐国都城方圆十二里。显然，徐偃王不仅要

与周天子分庭抗礼，还要在中原称霸。这才是导致周天子指使楚国讨伐徐国的根本原因。而徐偃王号称以仁义治国，其实是为了与周天子争夺民心。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48.

正所谓“咎莫憯于欲得”^⑩，最大的错误都是贪婪的欲望造成的。自身强烈的欲望如果不加以克制，同样可以导致国破身死的命运。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国大夫智伯灭亡的故事。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48.

晋国曾经发生“六卿之乱”，即智伯联合韩、赵、魏三个大夫灭了范、中行两个大夫。可是智伯不满足，又向魏宣子索要土地，魏宣子不给。魏宣子的大臣任章问：“为什么不给他呢？”魏宣子回答：“无缘无故来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任章劝道：“没有缘由就索取土地，邻国一定害怕；胃口太大又不知满足，诸侯一定都害怕。如果你把土地给了他，智伯必定越发骄横。一骄横就会轻敌，邻国害怕就自然会相互团结。用相互团结的军队来防御对付轻敌的国家。智伯肯定活不长了！正所谓‘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您不如把土地给他，使智伯越来越骄横。”于是，魏宣子就把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城邑给了智伯。智伯很高兴，转而又向赵氏索取土地，赵氏不答应，智伯就围攻晋阳。这时韩、魏两家从智伯的背后进攻，与赵氏形成两面夹击，智伯最终灭亡。智伯的故事，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祸莫大于不知足。”^⑪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49.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57.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57.

因此，老子劝告人们：“知足之足，常足矣。”^⑫究竟什么是“足”？《老子》中没有正面回答。韩非在《喻老》中解释：“邦以存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⑬意思是，国家要以生存为最高目标，才可以称霸；人要以生命为目的，富贵才有意义。不要自己害自己，国就不会亡，身也不会死。韩非以此观点印证老子“知足之为足矣”^⑭的观点。国家存在，生命存活，就是最大的“足”。在天下大乱的时代，比起那些死于非命的人，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足”。

知足就是降低欲望，从而给个人、家庭和国家降低风险。作为一国之君，如何在乱世中降低国家的风险呢？除了知足，还要从点滴入手。因为任何灾难性的结果，都有一个逐渐积累的量变过程，因此老子特别强调要防患于未然。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61.

防患于未然原本是中医诊病的理念。中国古代著名的医生扁鹊曾对蔡桓公说：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回答：“寡人无疾。”扁鹊只好离开了。蔡桓公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十天之后，扁鹊再次见到蔡桓公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蔡桓公还是不理，扁鹊只好离开，蔡桓公更不高兴了。又过了十天，扁鹊再次见蔡桓公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蔡桓公依然不理，扁鹊离开，蔡桓公更不高兴了。又过了十天，扁鹊远远看见蔡桓公，转身就走，蔡桓公派人追上来问为什么，扁鹊回答：“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五天之后，蔡桓公身体疼痛，派人寻找扁鹊，回报说，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不久，蔡桓公不治而亡。^②

良医治病，从表层也就是从小毛病入手。人世间的事，也有腠理之地。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就是防患于未然的道理。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30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老子主张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反对主观努力超越自然规律，主张顺应自然以达到人的目的。比如，老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③意思是，要懂得自然规律，规律普遍有效，具有支配作用，就像天也就是道一样，永远不会消亡。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66.

事物有自身规律，要认识并且利用它，不违反自然规律，才可以建功立业。《韩非子》中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宋国人用象牙为其君主雕刻了一枚楮叶，花了整整三年才完成。制作的象牙楮叶与真楮叶完全一样，放在楮叶中，无人能辨别真伪。此人因此在宋国得到官职和俸禄。列子听说之后，说：“如果天地三年才成就一枚树叶，那么这大自然中的树叶岂不太少了？”正如《老子》所谓：“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④所以说，人不应该自以为是，总觉得可以超越甚至战胜自然；不自量力地想要越俎代庖，代替自然去改变事物，结果只会费力不讨好，甚至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再比如，晋国的卿士赵襄子向王子于期学习驾车。学会了之后，就与王子于期赛车。赵襄子三次更换马匹，三次落后。赵襄子说：“先生你教我驾车，没有把本事都教给我！”王子于期回答：“本事都教给你了，但你用之太过。驾车最关键的是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这样才能够速度快，跑得远。可是，您驾车的时候，落后于为臣时就想追上我；超过为臣时，又怕被我追上。在一条道上竞赛，

不是领先，就是落后。您无论领先还是落后，注意力全在为臣身上，根本不关注马匹的状态。这才是您落后的原因。”总之，我们做事时的关注点不能离开事情本身，因为规律在事物本身，方法在事物本身，意义也在事物本身。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416.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顺应自然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柔弱胜刚强。比如，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兵败后对吴国称臣，勾践不断鼓励吴王夫差发兵攻打齐国，目的就是削弱吴国。吴国与齐国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吴国大军在艾陵打败了齐国军队。吴国不仅在长江和济河流域张扬自己的实力，而且控制了五湖，与中原诸侯会盟于黄池。越国却乘虚而入，最终灭了吴国。这就是老子所谓：“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④意思是，要想关闭，必先打开；要想削弱它，必先使其强大，最终才能够“损弱胜强”。这就是利用自然规律。事物都有生命周期，最强大的时候就是衰败的开始；目前弱小的事物，会逐渐强大，最终必定会战胜强大者。

总之，“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无为”就是顺应自然，最佳实现方式就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关键在于顺应自然规律，遵循生命周期；事物最强大时，就是衰败的开始；目前虽然弱小，必定会逐渐强大；不去争强好胜，最终就会战胜强者。因此，“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既是治国理政的智慧，也是为人处世的方法。

06 孔子为什么认为自己像“丧家之犬”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22.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郑国。一天，孔子与弟子们走散了，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城东门。有人对子贡说：“城东门有一人，身高九尺六寸，双目炯炯有神，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以下像子产，腰以下比大禹短三寸。只是神色疲惫，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子贡将这番话一字不落地告诉孔子。孔子听罢欣然一笑，叹了口气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①意思是，外表不像圣人，丧家之犬却很像很像。孔子为什么承认自己像一只丧家之犬呢？这还得从鲁国当时的情况说起。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大夫季平子与郈昭伯因斗鸡导致双方争斗，季平子出兵武力占据了郈氏的封地。郈昭伯向鲁昭公申诉，要求昭公为他做主，于是昭公出兵攻伐季平子。季平子请叔孙氏出兵救援，叔孙氏援救季平子而攻昭公。这时持观望态度的孟孙氏见有机可乘，也带兵去援救季平子，三家联手攻昭公。昭公大败，逃亡齐国。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鲁国因此陷入内乱。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11.

面对这种局面，孔子为了维护鲁国君主的权威，与鲁昭公一起离开鲁国，来到齐国。孔子在齐国受到齐景公的盛情款待。有一天，齐景公问孔子治国理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意思是，君主要像君主的样子，大臣要像大臣的样子，父亲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像儿子的样子。齐景公马上称赞道：这话太对了！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11.

过了不久，齐景公再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回答：“政在节财。”^③提醒齐景公要注意节约以减轻百姓的负担。齐景公颇为赞赏孔子，想重用他并将尼谿的田地封给他。可是晏子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如果用儒家的礼节改变齐国的民俗，对民众并没有什么好处。听了晏子的话，齐景公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头。孔子治理国家的方法，在当时的确不合时宜。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11.

齐国的其他大夫也与晏子一样十分反感孔子，其中有人居然要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再次面见齐景公。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②显然是在下逐客令了。孔子只好回到鲁国。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651.

孔子回到鲁国之后，季氏的家臣阳虎多次求见孔子，都被孔子婉拒了。阳虎便在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只蒸熟的小猪送过去，使孔子不得不到他家来道谢。孔子刻意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去道谢，以防直接面对阳虎。孔子为什么不愿意见阳虎？因为当时鲁国的政治局势是：逃亡在外的鲁昭公客死齐国，其弟鲁定公继位，可鲁国的大权却掌握在季氏手中，而季氏的权力又握在家臣阳虎手中，即所谓“陪臣执国命”^③。这样的状态，与孔子“克己复礼”的追求完全不同。阳虎想请孔子帮他治理鲁国，孔子当然不愿意见他。

可是，孔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阳虎。阳虎对孔子说：“过来，我有话和你说。自己有德有才却听任国事迷茫，能算仁人吗？”孔子说：“不可以。”阳虎又问：“自己很想建功立业，却屡失时机，这算智者吗？”孔子依然说：“不可以。”阳虎继续问：“时光一天天过去，岁月不等人啊！”这句话触动了孔子，因为这一年孔子已经年近五十了，于是他回答道：“好吧，我打算出来做官。”虽然当面答应了阳虎，但回到家后，孔子依然拒绝出山为阳虎工作。

不久，阳虎起兵造反，要掌握整个鲁国国政。造反被平息之后，阳虎逃离鲁国，“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有所改变。虽然鲁国仍然由季桓子执政，但是无论鲁定公还是季氏，都希望孔子帮助他们治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终于有了入仕为官的机会。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503.

孔子担任中都宰仅一年，由于成绩显著，被提升为小司空，很快又升为大司寇，全面主管鲁国司法。有弟子问：“老师你在断案的时候，有什么高招吗？”孔子回答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④意思是，打官司我和别人一样，我的特点在于让人不打官司。

怎么才能“使无讼乎”呢？有一天，一位父亲状告儿子。孔子将儿子拘留，可是不予理会。三个月过去，父亲要求撤诉，孔子就把儿子放了。季桓子听说了，在背后骂道：“这老家伙骗我，他曾经对我说：‘治理国家必须依靠孝道。’今天可以通过杀一个人来教训不孝之子，他却把这不孝之子给放了。”

孔子的学生冉有将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完，叹了口气说：“上层有过失，却杀害下层百姓，岂不是滥杀无辜吗？三军打败仗，不能杀士兵；犯罪者再多，也不能滥用刑罚。因为罪责不在下层民众。法令松弛却刑罚严酷，那就是凶狠；庄稼生长有时令，征赋收税却无时节，那就是残暴；没有经过教育，而责令他做出成效，那就是虐待。结束这三种暴虐之后，才能够对犯罪者实施刑罚。”这就是孔子的司法观。

历史终究给孔子提供了一次充分展现才能的机会。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春，鲁国要与齐国结盟，准备在夏天时两国君主会盟于夹谷（今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境内），孔子担任傧相。齐国大夫犁弥听说消息，觉得有机可乘，便对齐景公说：“孔丘懂得礼仪，但是没有勇气，如果派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能够如愿。”齐景公听从了犁弥的话。

孔子猜到了齐国居心叵测，让鲁国国君带上武将和军队一起去会盟，以防不测。为了齐鲁会盟，齐国专门搭建了盟坛。两国布置停当后，盟会的日期也到了。双方按照规定的日期，各自的国君带着陪同之人来到夹谷。

各项会盟的仪式举行完毕，齐国的执事官高声道：“请奏四方之乐。”一群当地莱人突然拥到台前，在鲁定公面前舞刀弄枪地表演乐舞，并且步步逼近。这个时候，孔子快步登上盟坛，一边用身子挡住鲁定公，一边高喊卫兵上前。当卫兵冲上前，将鲁定公与莱人隔开之后，孔子怒斥齐景公无礼，齐景公急忙叫莱人退下。

即将签署盟约的时候，孔子发现盟书上有这样的话：“齐军出境作战，鲁国必须派三百辆兵车跟随，否则就是违约。”面对齐国的无理要求，孔子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国汶河北岸的土地，我们就无法成为盟国，如何能听从盟约的制约？”齐景公此时需要鲁国的加盟，因此必须妥协，只好答应了孔子的要求，双方签订了盟约，齐国在当年冬天将汶水北岸的土地还给了鲁国。

关于孔子“堕三都”的具体时间，不同史料记载存在差异，关键是在孔子“大司寇摄相事”之前还是之后。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提出“堕三都”计划，并派弟子仲由（子路）具体执行。叔孙氏的郈邑和季孙氏的费邑城墙被拆除，而孟孙氏的成邑因家臣公敛处父抵制未能成功拆除；可又有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之所以在时间上出现差异，原因有可能是事件存在持续过程：从策划到实施跨年，导致不同史料侧重记载起始或结果时间。但是，“堕三都”是孔子试图削弱“三桓”势力、强化公室权威的重要举措，如果

不是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他怎么可能实施这项决策？也正是因为此举失败，直接导致孔子在同年（前497年）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夹谷之会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孔子的威望，使他获得了鲁定公和季桓子的赞赏和信任。孔子开始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成为当时鲁国的第三号人物。这个时候，孔子实现他政治主张的时机到了。当时鲁国的政治情况是定公虚位、三卿擅权、家臣垄断，属于典型的“礼崩乐坏”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决定强公室、抑三卿、贬家臣，使鲁国按照周礼治国安民，也就是“克己复礼”。为达此目的，首先得抵制家臣，抵制家臣就必须从堕三都开始。

“三都”是“三桓”领地内的三个城堡，分别是“费邑”——季孙氏领地的城堡，“郈邑”——叔孙氏领地的城堡，“成邑”——孟孙氏领地的城堡。“三桓”都住在曲阜，而这三个城堡都不在“三桓”的控制下，而为他们的家臣所盘踞，用以与“三桓”对抗。这些家臣不仅侵袭“三桓”，而且干预国政，所谓“陪臣执国命”就是如此。“三桓”对此不满，孔子对此更不满。

孔子建议把家臣据以叛乱的三个城堡拆毁，这马上得到“三桓”的同意。第一步，比较顺利地拆了叔孙氏的郈邑。第二步拆毁季孙氏的费邑时，却遇到费邑宰公山不狃的强烈反对，并先发制人地以费邑兵力袭击曲阜。孔子指挥曲阜的兵力反击，取得胜利，迫使公山不狃败逃奔齐，终于拆毁了费邑。可是，堕成邑时却失败了。

孟孙氏起初是赞成堕都的，可是家臣公敛处父对孟懿子说：“堕了成邑，齐国人就逼迫北门，因此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你假装不知道，我拖着不办。”孟懿子照计行事，表面仍不反对堕都，暗中却支持公敛处父全力反抗，抵制堕都，从夏天拖到冬天，成邑岿然未动。十二月，鲁定公亲自出马围攻成邑，不仅以失败告终，同时暴露了孔子堕三都的真实意图。三位大夫于是明白孔子实际上是国君的人，便转向了孔子的对立面。孔子与“三桓”之间的矛盾被公开化，他的主张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同时，孔子也失去了季桓子的信任。

孔子只好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活。十四年里，孔子先后走访了七个国家，但没有一位国君能够采纳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恢复周礼的典章制度，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为，所以孔子的失败是必然的。十四年的流亡生活，既艰难又危险，因此当听到有人评价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时候，孔子欣然承认道：“然哉！然哉！”孔子的洒脱，表明他是一个追求理想的人，虽然当时失败，但他安贫乐道、志存高远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07 仁政理想是“乌托邦”吗

有人认为，孟子的仁政理想等同于“乌托邦”，是一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美好世界。以孟子的智慧，他为什么要宣传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主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孟子见梁襄王时的对谈说起。

梁襄王问孟子：“天下如何安定？”孟子回答：“统一就会安定。”梁襄王问：“谁能统一？”孟子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如今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人不喜欢杀人，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翘首以盼，愿意接受他的统治。”

劝告统治者以仁爱的方式一统天下，是孟子一生的追求。

孟子面见齐宣王时就直截了当地提问：“大王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齐宣王笑笑不说话。孟子说：“是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是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是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是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是身边伺候的人不够使唤吗？这些您都足够了。”齐宣王回答：“我不为这些。”

孟子说：“那么，您最大的愿望我知道了。您是想要扩张国土，使秦楚朝贡，自己君临中国，安抚四方民族。不过，以您现在的做法，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好比缘木求鱼。”齐宣王问道：“有这么严重？”孟子回答：“恐怕更严重。缘木求鱼，既捉不到鱼，却也没有后患。如果以您现在的做法来实现您的愿望，会有灾祸临头。”

齐宣王说：“可以说说你的理由吗？”孟子说：“假如邹国和楚国打仗，大王认为谁会胜？”齐宣王回答：“当然是楚国胜。”孟子说：“显然，小国不可与大国为敌，人口少的国家不可与人口多的国家为敌，弱国不可与强国为敌。中国的土地，方圆千里的有九块，齐国不过是其中之一。想用一征服八，这跟邹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区别？”

看着齐宣王一脸茫然的样子，孟子进一步解释道：“现在大王如果能施仁政，使天下走仕途的人都到您的朝廷来做官，说明您的朝廷政治生态好；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说明您的国家赋税低；天下的生意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经商，说明您的国家营商环境好；天下的游客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说明您的国家社会治安好；天下心中有冤屈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倾诉，说明您主持公道。如果您能做到这些，谁能够战胜您？”

此前，齐宣王曾经问孟子：“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的，所以没有传到后代来，我也没有听说过。大王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可以说说如何王天下吗？”

齐宣王问道：“要有什么样的德行，才可以王天下呢？”

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意思是，保护人民就能够称王，没有人可以抵御你。

齐宣王立刻问孟子：“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保民吗？”

孟子说：“当然可以。”

齐宣王追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说：“我听说有一天您坐在大殿上，只见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殿下走过。您看见了这个人便问道：‘这牛要牵到哪儿去啊？’那人回答说：‘准备用它来祭钟。’您说：‘放了它！我不忍看到它恐惧战栗的样子，若无罪而就死地。’那人问道：‘那钟不祭了？’您说：‘怎么能不祭呢？换只羊吧。’有这事吗？”

齐宣王承认道：“有这事。”

孟子说：“此心足以王天下。百姓都认为您吝啬。可是我知道您是于心不忍。”

齐宣王感慨道：“是啊，百姓的确是这样理解我的。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也不至于舍不得一头牛。我是不忍心看它恐惧战栗的样子，明明没有罪过却要走向死亡，因此用羊去替换它。”

孟子循循善诱：“您不要怪百姓认为您吝啬。以小换大，他们怎么知道您的想法呢？您如果不忍心‘无罪而就死地’，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笑着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想法呢？我也说不清楚，我的确不是因吝啬钱财而以羊换牛，就像百姓说的那样。”

孟子说：“没有关系，这是体现仁爱的一种方法。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活着，便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它哀鸣，便不忍心吃它的肉。因此，君子远庖厨。”

齐宣王高兴地说：“《诗经》中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啊。我这样做了，回头再去想它，却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先生您的这番

话，的确说到我心里去了！那么，为什么说这种心符合王道呢？”

孟子说：“假如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千斤，却不能够举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秋毫之末，却看不到一车柴草。’大王您相信吗？”

齐宣王说：“当然不相信。”

孟子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您的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人举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不用力；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是因为视而不见；老百姓得不到好处，是因为您不肯付出。所以，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不是不能，是不为。”

齐宣王说：“不能与不为，有什么区别？”

孟子说：“让你挟泰山跨渤海，你说‘我不能’，这的确是不能；为长辈折根树枝当拐杖，你说‘我不能’，这其实是不为。大王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不属于挟泰山跨渤海，属于给长辈折树枝当拐杖。尊敬自己家的老人，慢慢推广到尊敬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推广到爱护别人家的孩子。如此便可以统一天下。《诗经》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说的就是以礼待身边的人，才能管理好整个国家。关键在于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不推广恩德，就连妻子儿女都保护不了。古代圣人超过别人的原因，就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善行。如今您的恩德可以推广到禽兽身上，老百姓却得不到您的好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用秤知轻重，用尺量短长，事物都如此，人心更一样。大王，您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孟子的“仁政”理念并非空想，而是有具体内容的，每条都与百姓的经济利益有关。比如，有一天，滕文公问孟子如何治理国家，孟子回答说：“要让老百姓遵守秩序，讲道德，必须让百姓有恒产，有恒产的人才会有恒心。如果没有恒心，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出来。当这些没有恒产的人犯了罪时，就用刑罚惩处他们，这是欺骗和陷害百姓。哪有仁爱之人当领导，却欺骗陷害百姓的？”

孟子认为，在保证百姓的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对社会的管理必须尊重规律，维护百姓的利益。不违背农时，收获的粮食就足够吃用；不用眼太小的渔网捕鱼，鱼类才能生生不息；在草木生长的春夏季节不要进山砍柴、伐木，林木资源才能持续使用。粮食、鱼鳖吃不完，林木用不完，才能够保障百姓有足够的力量赡养父母、抚养妻儿，为老人送终而不留下任何遗憾。做到了这一步，只是王道的开始。

想要真正建立“王道”，还必须做到许多事情：在五亩宅园中种桑树养蚕，五十岁的人可以穿丝织衣服。房前屋后饲养鸡、猪、狗等牲畜，七十岁的老人就有肉

吃了。不打乱种植的时令，拥有农田的几口之家就可以保证有饭吃。如果君主能够做到这些，七十岁的老人也可以穿上绸衣，每顿饭有肉吃，百姓们不挨饿、不受冻，那这位君主就必然能够成为天下的王者。

在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在乡间办学校，认真开展地方的基础教育，以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养成尊敬长辈的良好风气，不能让头发白了的长者还从事体力劳动。显然，道德教化一定是在物质生活有充分保障，甚至百姓有幸福感的前提下展开。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一次对话中，讨论了社会公权力的性质问题，极具现代意义。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杀人与用刀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回答：“没有区别。”

孟子马上问：“用刀杀人与为政杀人，有什么区别？”

梁惠王回答：“没有区别。”

显然，社会公权力是中性的，可以为政施仁，也可能为政杀人。那么，什么是“为政杀人”呢？孟子解释说：“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壮马。可是，百姓脸上是饥饿的样子，荒郊野外到处是饿死的尸体，这是带着一群野兽吃人啊！野兽们互相厮杀、吃食，人都会感到厌恶。为官从政，就是百姓的父母，却率领野兽吃人。这能叫百姓的父母吗？”

孟子告诫梁惠王说：“有方圆百里的国土，就可以行王道。大王您如果对百姓施仁政，减少刑罚，降低税收，加强农业生产。让身强力壮者有空闲的时候学习如何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忠于职守，恪守诚信。回家时尊敬父兄，出门知道尊敬长官。这样的人才能够拿起武器抵抗秦国、楚国强大的军队。当你的敌国为了战争而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致使农业歉收，不足以供养父母，以至于父母因冻饿而死，家破人亡，兄弟分别，妻离子散。当敌国如此祸害百姓的时候，大王您带领大军去征讨，谁能够敌得过您呢？所以说：‘仁者无敌。’希望大王不要对此有所怀疑。”

通过孟子的上述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孟子的“仁政”理想在当时的确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却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其核心是执政为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仅符合儒家“仁政”的高尚理想，更是对这个理想的发扬光大。

第三章 集权与统一的奠定

战国进入晚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只剩下最后七个诸侯。它们不再争夺霸权，而开始争夺天下。东方六国合纵以抗秦；秦国破坏合纵，强势出击，一扫六合，建立大秦帝国。可是，靠暴政统治天下，终究不会长久。秦末天下大乱，战乱再起；楚汉相争，项羽兵败，刘邦统一天下，霸道与暴政终于结束。刘邦曾被封为汉王，因此他建立的王朝国号为“汉”。

新王朝的统治者虽然继承了大秦帝国建立的一些制度，即所谓“汉承秦制”，但是也汲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对制度和治国理政的方法都做了全面调整，主要理念是清静无为、简政放权，与民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因此得到了恢复，生产力也有很大的发展，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奠定了基础。

一个民族的形成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共同的地理环境构成的生存空间，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形成的凝聚力，共同的语言文字传承和交流文化，完善的伦理道德构成民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社会秩序，统一的民族服饰作为认同标志。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强大的国家作为全体民族成员的坚强后盾，让这个民族的成员有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就是在这时期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伟大而辉煌的国家——大汉王朝，这是民族和国家完全统一的时代。

01 纵横捭阖为什么最终合纵失败，连横成功

所谓“合纵”，就是弱国联合起来抵抗强国，以防被强国兼并；所谓“连横”，就是强国拉拢某些弱国进攻其他弱国。强国求扩张，弱国求自保。

战国中期，齐国、秦国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这就形成了连横；其他五国不甘示弱，与齐、秦两国对抗，因联盟为南北走向，就形成了合纵。合纵成，连横破；连横成，合纵解。合纵连横，相互拆解，这就是“纵横捭阖”。显然，合纵是东方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以六敌一；而连横则是秦国努力瓦解东方六国的联盟，以一敌六。可是，最终却是“连横”成功而“合纵”失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了说明这个原因，我们要从秦国首开连横先例说起。

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秦王派公子华与张仪率军攻打魏国的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得手后，张仪却建议秦王将蒲阳还给魏国，同时派公子繇作为质子前往魏国，向魏国主动示好。秦惠文王接受了张仪的建议，并派张仪出使魏国。魏王将上郡和少梁之地献给秦国作为答谢。就这样，在张仪的促成下，秦魏两国结盟。秦国主动向战败的魏国提出结盟，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从此开创了连横的先例。

这个时候，张仪遇到一位顽强的挑战者——魏国的犀首（相当于相国的职务）公孙衍。公元前325年，公孙衍与齐国名将田盼合谋进攻赵国，在魏国与齐国联军的进攻之下，赵国大败。通过此战，齐、魏两国都尝到了合纵的甜头。

之后，魏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合纵范围，着手建立与齐、楚两国的互信关系，派太子嗣前往齐国为质子，公子高去往楚国为质子。魏、楚、齐三国合纵，共同对付秦国。为瓦解三国合纵，张仪主导秦国、齐国和楚国在啮桑（今属江苏省沛县）会盟，试图拉拢齐、楚两国，以破坏齐、楚、魏三国的合纵。

公孙衍针锋相对，发起魏、韩、赵、燕和中山“五国相王”，试图将五国联合起来（齐国已于此前称王）。可是，中山国称王让齐国感到不满，“五国相王”的政治意图没有实现。

这时楚国出兵，在襄陵大败魏军。秦国抓住机会，发兵进攻魏国，占领了曲沃、平周，韩国的鄢陵及义渠国的郁郅等地。面对秦国的进攻，齐、楚两国按兵不动，齐、楚、魏三国之间的合纵根本不起作用。魏惠王因此对合纵失去了信心。

不甘心失败的公孙衍继续进行合纵游说，终于促成韩、赵、魏、燕、楚五国合纵抗秦。但是战争爆发时，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的军队。三国联军虽然一直

攻到函谷关，可是秦国军队借助险要地势，遏制住了攻势。军事上的失利导致五国合纵名存实亡。不久张仪来到魏国，一番劝说后，秦、魏两国再度连横成功。

公元前315年，秦国出兵进攻韩国，合纵诸国并没有派兵援助。此时在韩国当宰相的公孙衍硬着头皮应战，结果韩军大败。连横派大臣公仲朋趁机向韩王建议与秦国讲和，献给秦国一个大都邑，并主动提出与秦国一起南下伐楚。韩王非常高兴，立刻准备派公仲朋入秦谈判。

楚王听说消息后连夜召见陈轸商量对策。陈轸建议，大王除加强国内警戒外，还应立刻宣称出兵援助韩国，并且将楚国战车开往通向中原的道路，造成楚军北上的假象。同时派使臣火速赶往韩国，通知韩王楚国大军马上就到。韩王一旦相信，必定中止与秦国和谈，秦韩之间的战火就会重新燃起。

楚国使臣向韩王转达了楚国的决定，韩王果真相信了楚国使臣的话，立刻阻止公仲朋出使秦国，坚决中止与秦国和谈。秦王大怒，出兵与韩国在岸门交战。楚国按兵不动，韩国损失惨重，宰相公孙衍逃走。从此韩王再也不信合纵策略，彻底倒向秦国。由于秦军攻取了魏国的焦和曲沃，魏国也倒向了秦国。公孙衍苦心经营的合纵又一次破产，不久被杀。

在张仪的努力下，秦、魏、韩三国结成连横，进攻矛头对准楚国。三国联军压境，楚国君臣震恐。为了阻止秦军，楚国派景翠率大军驻扎北部边境。同时派三闾大夫率九军北上进攻曲沃和於中。同时主动结好齐国，得到齐国的配合，楚军进展顺利，攻取曲沃，继续进攻商於之地，形势对秦国非常不利。

为扭转不利局面，秦相张仪主动请缨出使楚国。张仪劝楚王：“如果与齐国断绝往来，我将请求秦王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秦、楚两国王族通婚，永远结为兄弟之国。这样既可削弱齐国，又对楚国和秦国有利。”楚怀王大喜，任命张仪为楚相。楚国很快与齐国断交，派遣一位将军随张仪去秦国接收土地。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摔伤，三个月没上朝，楚国迟迟没有得到六百里地。楚怀王听说了这件事，以为与齐国绝交不够决绝。于是派勇士到齐国大骂齐王。齐王大怒，毁弃齐楚结盟的信物，立刻与秦国结盟。秦齐结盟后，张仪才上朝。楚国使者问商於之地的事，张仪故作惊讶：“臣有秦王赐予领地六里，愿意把它献给楚王。”

楚使回国向楚怀王报告，楚怀王大怒，决定出兵伐秦。可是，面对秦、齐、韩三国联军的围攻，楚国损失惨重，丧失了丹阳和汉中等大片土地。楚怀王不服输，又增兵偷袭秦国，在蓝田一带遭遇秦军，楚军伤亡过半，楚王被迫与秦国谈和，

答应割让两座城池给秦国。秦国趁机要挟楚国，希望用武关以南的秦地交换楚国的黔中地。

楚怀王对张仪恨之入骨，因此对秦王说：“我不要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情愿献出黔中地。”张仪听说之后，再次主动请缨出使楚国。秦惠文王非常担心，说：

“楚怀王对先生欺骗楚国的做法非常愤怒，肯定想杀先生以解恨。”张仪冷静地回答：“我和楚国大臣靳尚私交非常好，靳尚侍奉楚夫人郑袖，楚怀王又对郑袖言听计从，况且秦强楚弱，我奉大王之命出使楚国，楚怀王又怎敢随意杀我？退一步讲，如果真的杀死我可以为秦国得到黔中地，这也是微臣最大的心愿。”

张仪再次出使楚国，刚刚抵达楚国就被楚怀王囚禁起来。靳尚听说后，对郑袖说：“秦王非常宠幸张仪，决定要用上庸六县之地贿赂楚王，同时秦楚联姻，以宫中非常擅长歌舞的美女陪嫁。秦国美女一定会受到宠爱，那时夫人必定会遭到疏远。不如夫人亲自为张仪讲情，让大王把他放了，夫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郑袖听信靳尚的话，便对楚怀王吹枕边风。楚怀王耳根软，考虑到秦强楚弱的形势，于是改变主意，赦免张仪，并且盛情款待他。在酒席宴上，张仪又开始游说楚王，楚秦结为兄弟之国，永不攻伐。楚怀王不顾群臣的反对，最终答应张仪与秦国连横，放弃合纵。

为了进一步扩大连横的规模，秦惠文王又派张仪出使齐国，向齐王晓以利害；张仪成功说服齐王后转而前往赵国，赵武灵王也接受了张仪的建议，与秦国连横；然后张仪又来到燕国，在张仪的游说下，燕昭王决定与秦国连横。燕、赵之间的联盟随之瓦解。

张仪接连出使各国，拆散了东方各国的合纵联盟，让各国纷纷转向秦国。可是，就在张仪在外交上取得接连胜利后返回秦国的途中，秦惠文王去世，秦武王即位。秦武王一直讨厌张仪，群臣中与张仪有过节的人就开始诋毁张仪，于是张仪被冷落。东方各国听说张仪在秦国失势，他苦心经营的连横瞬间就瓦解了，天下诸侯重新恢复合纵策略。

当张仪退出历史舞台时，苏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苏秦来到燕国，建议燕昭王与赵国合纵。可是燕王却说：“齐国是寡人的仇国，寡人恨之入骨，讨伐齐国才是我毕生的愿望，只是燕国国力不足。先生如果能够帮助燕国击败强齐，寡人愿意把整个国家托付给先生。”苏秦感激燕王的知遇之恩，决心一定帮助燕王复仇，打败齐国。

苏秦以抗秦为借口，开始在各诸侯国之间展开游说，终于再次促成六国合纵，齐心协力共同抗秦。六国君主都信任苏秦，让他当从约长，挂六国相印。公元前287

年，以齐国为主导的六国联军攻打秦国。但是由于合纵内部的国家太多，且彼此间矛盾重重，伐秦无功而返。

为了取得齐王的信任，苏秦假意与燕王的母亲私通，害怕燕王诛杀，出逃到齐国。齐王待苏秦为上宾，任命他为齐国相国。在苏秦的撺掇下，齐国灭了宋国。面对齐国的威胁，秦国发起合纵攻齐。结果，秦、赵、楚、韩、魏、燕六国联合起来。秦国以瓜分齐地为诱饵，派出质子前往燕国和赵国，建议燕赵共相乐毅担任此次伐齐的统帅。乐毅领兵攻取齐国的灵丘，五国军队在灵丘集结。

五国联军在济西之战中大破齐军主力，齐国节节败退。燕军攻入临淄城，将齐国的奇珍异宝、宗庙祭祀之器全部运到燕国。齐湣王后来被楚军杀死。乐毅留在齐地五年多，一直率军继续推进，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偌大的齐国竟然只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池，直到齐国将军田单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恢复齐国。

齐国受损太大，从此一蹶不振，秦、齐对峙的局面被打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下楚国都城郢，楚被迫迁都，秦国势力发展到湖南一带，楚国也被削弱了。之后还出现过几次诸侯间的合纵，但最终无法阻拦秦国一统天下的脚步。

从力量对比看，六国的总人口要比秦国的人口多，六国的土地面积总和也比秦国的国土面积大。可是，中原六国多次合纵，大都败于秦国的连横；秦国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其根本原因在于，各诸侯国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心怀异志，貌合神离，不可能精诚合作；而秦国拥有统一意志，和衷共济，对东方各国各个击破，最终取得胜利。可见，各怀私利的盟友是靠不住的，要成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02 大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540.

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亲政，开始周密部署统一六国的战争。李斯、尉繚等人协助秦王嬴政制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①为实现这一目标，具体方略分两部分：其一，远交近攻，先弱后强，先近后远；其二，用行贿的方式，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率兵进攻韩国，韩无力抵抗，内史腾指挥秦军攻克韩都，俘虏了韩王安，把所得韩地改建为颍川郡。这样，六国之中韩国最先灭亡。

公元前228年，赵葱、颜聚奋战数月，最终被秦将王翦击败。赵葱被杀，颜聚收拾残兵退回邯郸固守。郭开被秦国收买，因此劝说赵王迁下令开城向秦军投降。秦军攻下邯郸，赵国灭亡。

公元前225年，秦国派兵进攻魏国首都大梁。秦军统帅王贲引黄河、鸿沟之水冲灌大梁城。结果，大梁城崩塌，魏王出降，魏国灭亡，秦以其地建为东郡。

公元前223年，秦军统帅王翦经过将近一年的苦战，终于平定楚国各地，攻占楚都寿春，楚王被俘，楚将项燕自杀，楚国灭亡了。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统帅的军队，由燕南部对齐北境突然进攻，直趋齐都临淄。齐国则毫无作战准备，竟无应战之兵。在齐相后胜的劝说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王建被送于共地，饿死于松柏之间。随着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的灭亡，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胜利结束，大一统的帝国开始建立。

秦王嬴政结束了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大秦帝国的疆域，东至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为了统治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王嬴政创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树立了绝对的皇权，巩固了统一，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秦王嬴政采纳“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统一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承，“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他规定皇帝自称

“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典章制度。

李斯主张废除分封，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郡完全听命于中央朝廷和皇帝，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全国范围内的中央集权制从此确立。

秦朝建立了适应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行政机构，中央设丞相掌管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此谓“三公”。以下是分别掌管具体政务的九卿：郎中令、卫尉、廷尉、治粟内史、少府、典客、奉常、宗正、太仆。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县下有乡，乡设三老掌管教化，啬夫掌管赋税诉讼，游徼掌管治安。乡下设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设里正，以乡人中强有力者担任；司掌治安、禁盗贼的机构叫亭，亭设亭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在全境内强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李斯向秦始皇建议，把人们收藏的《诗》《书》等典籍统统集中起来烧掉，只留下医药、占卜、种植等类别的书籍。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于是，李斯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焚书的命令，这一行为是专制主义的典型表现，极大地钳制了思想的丰富度和发展进程。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548.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皇子胡亥随行。返回的路上，一行人走到平原津时，秦始皇病倒了。随行医官诊脉医治但毫无效果，病情越来越重，李斯于是催令人马急行返京。走到沙丘时，秦始皇预感到死亡即将降临，就召李斯、赵高进前，给长子扶苏写了一道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①这显然是让扶苏做他的继承人。可是未等诏书发出，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秘不发丧，把始皇的尸体安置在车中，让近侍太监坐在车上，传递批答奏章，送水送饭，一切都与秦始皇在世时一样。

李斯催促赵高尽快发出给扶苏的诏书，赵高却扣下不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扶苏继位后一定会重用蒙氏兄弟，那么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在扣留诏书的同时与胡亥密谋，然后又找李斯商量。李斯为了保住自己丞相的地位，参与了赵高的阴谋。

那么，这三个人密谋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毁掉秦始皇给扶苏的诏书，伪造一道给李斯的遗诏，册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一封给扶苏的信，赐扶苏和蒙恬二人自裁，把兵权交给裨将王离。扶苏接到伪造的圣旨之后拔剑自刎；蒙恬不肯自杀，被囚在阳周。使者回京复命，胡亥、赵高得知扶苏已死，立刻匆匆离开沙丘，急奔咸阳。

一行人赶回咸阳，立即发布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宣布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同时为秦始皇举行了葬礼。之后胡亥登基，称为秦二世，赵高升为郎中令，常居宫中参与决策国家政事。赵高实质上已掌握秦朝的大权，秦二世成了他的傀儡。

为了巩固刚刚篡夺的政权，秦二世与赵高一面大开杀戒，铲除异己；一面又封官晋爵，安置亲信。赵高铲除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蒙氏兄弟，虽然蒙恬已被囚在阳周，但还有蒙毅在，况且蒙恬的三十万大军仍驻守北部边境，这些对赵高而言都是威胁。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569.

赵高在秦二世面前进谗言说：“我听说先帝早就想选贤能，立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毅屡次谏阻，整天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诏仍立扶苏。现在扶苏已死，恐怕蒙氏兄弟不服，并寻机报仇。依臣之见，不如杀了蒙氏兄弟以绝后患。”秦二世听了赵高的话，拟诏杀了蒙毅，又派使者到阳周命蒙恬自杀。蒙恬说：“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①说完便吞药自杀了。

为了巩固篡夺来的皇位，秦二世在赵高的帮助下，滥用株连九族等严刑峻法，清除威胁皇位的同胞兄弟及心怀不满的大臣。赵高罗织罪名，肆意株连，大肆屠杀，几乎杀光了秦二世的兄弟姐妹和许多旧臣近侍。功高权重的大臣、将军被株连殆尽，赵高趁机把亲信安插到重要位置。

这个时候，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六国贵族也纷纷招兵买马，企图利用农民力量达到复辟目的；秦朝小官吏如刘邦等人，由于不满秦的统治，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虽然他们心怀异志，但因为眼前利益一致，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向披靡，极大地撼动了秦朝的根基。

就在秦王朝面对巨大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赵高设计除掉了李斯，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中丞相。见秦二世不理朝政，赵高开始阴谋篡位了。

一天，赵高命人牵来一头鹿献给秦二世，说：“臣有小马一匹，献给陛下玩赏。”秦二世大笑说：“丞相错了，这是一头鹿。”赵高正经地说：“陛下，这确是匹马。”秦二世问左右，到底是鹿还是马，群臣早就看透了赵高的心机，为了避免杀身之祸，纷纷说是马。那些实话实说的大臣，后来都被赵高杀害了。

此刻的咸阳城外，陈胜、吴广虽然起义失败，但项羽、刘邦领导的反秦义军以更加迅猛的势头继续战斗。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巨鹿一役中，秦军主力被项羽打败，精锐尽失，大将王离被擒，之后，章邯率二十万大军投降。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61.

六国旧贵族见机纷纷自立为王，并力西进。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②意思是，赵高杀了秦二世后，派人找到刘邦，想和刘邦约定瓜分关中称王。刘邦觉得有诈，于是采纳了张良的计策，派郦食其和陆贾去游说秦将，用利益引诱他们，然后趁机袭击武关，攻破了它。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75.

赵高杀了秦二世之后，召集百官，准备登基称帝，可是遭到百官的反对。赵高以“秦地益小”为由，宣称秦朝已无力维持“皇帝”称号，应恢复“秦王”旧制，并且“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③。子婴继位秦王的当天杀了赵高，并且灭其三族。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只当了四十几天秦王的子婴献上传国玉玺，秦朝至此灭亡。曾经所向披靡、一扫六合的大秦帝国，为什么仅仅存在十五年就灭亡了？据我分析，原因有四。

其一，中央集权制度不成熟，管理水平太低。一方面表现为权力缺乏有效制衡，仅一个赵高就足以控制朝政，架空皇帝，颠覆帝国；另一方面，一味地使用暴力手段，对内依靠严刑峻法，对外依靠军事打击，只能激化矛盾而不是缓和矛盾。

其二，六国虽亡，六国的贵族和百姓还在，观念还在，实力还在。虽然秦末战争开始于陈胜、吴广，可是他们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真正推翻大秦帝国的是六国贵族的东山再起。

其三，多年战争，穷兵黩武。一统天下之后，修筑长城、宫殿和陵墓，巨大的财政负担完全由百姓承担。百姓在经济上破产，国家的财政也就随之崩溃了。

其四，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嬴秦失去了精神动力。刚刚建立的大秦帝国一味地依靠暴政，完全靠刑法及功利主义的奖惩制度维系，这使得大秦帝国失去了精神凝聚力，没有核心价值观，大秦帝国的民众成了一盘散沙。这最终印证了强权而不长久的历史规律。

03 项羽为什么会输给刘邦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经留下千古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是她却不曾多问一句：既然不肯过江东，项羽为什么拼命朝江边突围？既然要自刎，为什么要选择在乌江边？为了解开这些谜题，我先梳理一下项羽的为人。

公元前207年，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五万前往救赵。项羽杀了宋义成为统帅，与秦军大战九次，使章邯败走，项羽率军继续北上进攻王离。大破秦军后，项羽于辕门召见诸侯将领，诸将无不膝行而来，不敢仰视项羽。于是项羽成为诸侯上将军，诸侯都归附于他。从这里就能看出，项羽是个随时敢杀自己领导的人，人品的确很有问题。

章邯率军驻扎在棘原，项羽驻军于漳水南，两军相持不战。项羽让蒲将军领兵，日夜兼行渡过三户津与秦军交战，将其击败。而后项羽率领全军又大破秦军。章邯再次派人来见项羽，想要和谈。随后项羽和章邯相见，并订立盟约。项羽立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归降的秦军为前部，行至新安。

诸侯的士卒都曾为秦服过徭役，受尽秦兵的鞭挞，而今秦兵投降诸侯，于是诸侯兵都把秦兵当作奴隶来驱使，这引起了秦兵的不满。公元前206年，秦兵暗地里打算造反。诸侯听闻秦兵的计划后告诉项羽，项羽认为秦兵人数太多，入关中后如果不听令，将会引起非常大的祸患，于是将秦降卒二十余万在新安城南连夜全部坑杀。这件事反映了项羽残暴的一面。如此残暴的人，显然是不得民心的，怎么能够一统江山？

项羽消灭秦军主力后，即率诸侯军向关中挺进。行至函谷关，发现有兵守关，项羽军无法通过；又听说刘邦已经攻破咸阳，自立为王。项羽大怒，立刻派当阳君英布率军攻打函谷关。

刘邦与项羽都是楚国将领，为什么刘邦能这么快就进入关中，自立为王呢？

楚军北路军以宋义为主将，西路军以刘邦为主将，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就是关中王。刘邦一路西进，攻城略地，扩大实力，获取补给，遇到一时攻不下的城池，便绕过西进。实在不能绕过去的，比如宛城，就听从张良的劝谏劝降对方。最后，刘邦的军队在蓝田大破秦军，秦朝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量。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十月，秦王子婴向刘邦献上了传国玉玺。秦朝至此灭亡，共立国十五年。

刘邦很得意地进入了咸阳城，以“关中王”自居。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刘邦有些留恋起来，准备就此住下，享受享受。樊哙劝他注意天下还没有平定，别忘了秦的前车之鉴，刘邦根本听不进去，直到张良亲自来劝，他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刘邦率军退到灞上，召集当地的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得到了民心。

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攻破咸阳后，立刻派当阳君攻破函谷关，四十万大军驻扎于新丰鸿门，而刘邦军在灞上只有十万人。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刘邦想在关中称王，并且用子婴为相，占有全部珍宝；范增也告诉项羽，刘邦在山东时贪财好色，入关后却不取财物女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了他。

刘邦率领一百多名骑兵来鸿门见项羽，范增暗示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一直没有动手。于是，范增让项庄于席间舞剑，伺机刺杀刘邦；而项伯也拔剑起舞，挡住项庄。张良见状，至军门找樊哙前来。樊哙强行进帐，对项羽进言，项羽无言以对。于是刘邦留张良将白璧和玉斗献给项羽和范增，自己以上厕所为由，扔下车骑，只带樊哙、夏侯婴等人从骊山道逃回灞上。

鸿门宴之后，项羽便领兵西进。进入咸阳后，他引兵屠戮，杀死秦王子婴，火烧秦王宫，大火连续烧了三个月。项羽打算带着搜集到的宝物美女回江东，有人劝说他：关中富饶，可以成王霸之业。但项羽见秦王宫都已被毁坏，自己又迫切地想回江东，于是不听建议。那人又说，都说楚人性情残暴，果然是这样。项羽听到后，把那个人杀了。

项羽分封各路将军为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是巴、蜀和汉中，共四十一县，国都为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封秦朝的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领关中地，以扼制刘邦。同时削减刘邦军队至三万人。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掌握军队最高统帅权。楚怀王熊心被尊为义帝——后来项羽把义帝迁到郴县并把他给杀了。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诸侯各自回到封国。刘邦领兵入汉中并烧毁栈道，表示无意东出，以麻痹项羽。同年五六月，齐国贵族后裔田荣不满分封，赶走齐王，杀胶东王，自立为齐王。八月，刘邦乘机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重返关中，很快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欺骗项羽使其相信自己只取关中，不再东进。项羽放心去攻打田荣，对西边没有加强防范。

刘邦平定三秦后，立刻东出与项羽争天下。刘邦率军从临晋渡河，很快攻下河内，俘虏殷王司马卬，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到洛阳。这时刘邦听说义帝被害，大哭一场，为义帝发丧，举哀三日。然后向各诸侯王发布项羽大逆不道的罪状，

并以此为名，号召各诸侯王率兵一起讨伐项羽为义帝报仇。四年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

刘邦在道义方面占据上风，因此成功说服五路诸侯加盟，兵马共五十六万，向东攻打楚国。项羽听闻后，留部将继续攻齐，自己亲率精兵三万去救援彭城，大破刘邦军，杀死汉兵十余万。刘邦军逃往南山，项羽率军追到灵璧东拦截汉军，汉兵落入睢水十余万人，睢水为之不流。项羽把刘邦包围了三层，却因一阵大风吹乱楚军，刘邦趁机率领数十骑兵逃脱。

刘邦逃往下邑，收集败亡散卒至荥阳，各路败军先后前来会合，萧何也发动关中百姓前来投奔刘邦。刘邦重振军势。项羽乘胜来战，却无法取胜。彭城大败后，不少诸侯反叛刘邦，归附项羽。刘邦在荥阳修筑甬道用以过河，取敖地的粮食，项羽军多次侵夺甬道，刘邦军无法取得粮草补充，军心不稳，只好与项羽议和，项羽同意。

刘邦部将纪信率领两千士兵，乘黄车假扮刘邦出城，说刘邦愿意投降。项羽赶来，见到纪信，问刘邦在哪儿，纪信说刘邦已经逃走了。项羽于是将纪信烧死，攻下荥阳。刘邦派人说服英布背叛项羽，进入成皋。项羽得知后迅速率兵前来攻打，夺下成皋，一路西进。刘邦逃往巩县，派兵阻挡，项羽无法挺进。

韩信于河北攻破齐、赵等国，并准备进攻楚国，项羽派大将龙且进攻韩信，被韩信破杀。这时，彭越进攻上谷城，项羽亲自前往救援，留大司马曹咎原地待守，并告诫他不要出战。项羽走后，刘邦军前来挑战。曹咎大怒，引兵渡汜水。刘邦军趁机发动进攻，大破曹咎军。项羽听闻曹咎兵败，引兵而回。刘邦听到项羽返回就全部退走。

项羽腹背受敌又粮草不继，于是送还刘邦家眷，与刘邦签订盟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和议后，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却趁这个时候突然撕毁盟约，追击项羽，想要把项羽一举消灭。但和刘邦约定一起出兵的韩信和彭越没有来。项羽引兵反击刘邦，大破汉军。刘邦于是深沟高壁，坚守不出。

刘邦以加封土地为条件，说动韩信从齐地南下，兵锋直指楚军侧背。与此同时，彭越、刘贾、英布及叛楚投汉的周殷北上合击项羽；加上刘邦率本部军二十万出固陵东进。汉军五路大军，合计近六十万之众，形成从西、北、西南、东北四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被迫率十万楚军向垓下后撤。

项羽引兵十万，先与韩信大战。韩信军佯败后退，令左右两翼夹击项羽。项羽军抵敌不住，往后撤。韩信趁机反击，项羽军大败，退回营垒坚守，刘邦乘胜领大

军将项羽重重包围。项羽率领八百骑兵趁夜突围，灌婴率五千精锐骑兵追击。最后，灌婴在东城追上项羽，并将其斩杀。

显然，项羽并非不肯过江东，也不是自刎而死。志大才疏、残酷暴虐的项羽之所以被塑造为英雄，完全是司马迁的艺术加工。他纵火焚烧咸阳宫，将所有典籍付之一炬，是中华文明的罪人。

楚汉相争，刘邦胜出，项羽失败，其中的关键在于：项羽只是一个现行秩序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新秩序的建设者。他进咸阳之后没有任何建树，只是推翻秦朝，却没有建立新的王朝，他所恢复的分封制既没有中央政权掌控，也没有血缘亲情维系，基本上是战国末期诸侯纷争的再现，因此分封完成的第二个月，诸侯间就再度爆发内战。刘邦正是利用了项羽的弱点，对各诸侯做出更大利益的承诺，赢得他们暂时的支持，最终战胜了项羽。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刘邦在张良、萧何的辅佐之下，开始了新一代王朝的建立行动，中华大地终于进入和平统一的建设时期。

04 刘邦是如何吸取历史教训的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登基称帝，国号为“汉”，定都长安。史家们都说“汉承秦制”，这不禁令人心生疑问：秦朝仅存在十五年，两汉则一共享国四百多年，既然制度有所沿袭，为什么两个王朝的命运却完全不同？显然，汉与秦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区别在哪儿？我们将西周初期的分封制度、项羽的分封策略与刘邦的分封策略做一个比较，答案就清楚了。

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有三类：其一，王室宗亲；其二，先代贵族；其三，功臣部将。项羽分封的诸王没有第一类，这是致命的缺失。因为分封制度实际上以宗法制为基础，所封诸侯出自王室宗亲并占据重要的战略区域，由王室宗亲中的大宗控制小宗及其他非宗亲的诸侯，这样才能达到拱卫王室的作用，让君主与诸侯的关系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也保证了周王室权力的上下制衡。

项羽分封的第二类诸侯，与西周相比有根本上的不同。西周的先代贵族是指传承很多代的贵族，无论周王室是否认可，其地位在传统势力范围内都被普遍接受，无须外力支持。项羽分封的先代贵族其实是战争中形成的割据势力，除军事实力外没有获得地方和民众的认可，也就没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必须得到强权的支持。一旦这个强权动摇，这些诸侯就会立即背叛，寻找新的靠山。

面对有实力的先代贵族，西周的分封方式是承认既定现实，不会随意迁徙。项羽则相反。比如，项羽对七国旧贵族的封地都进行了调整，所有七国的旧贵族都被分封到了母国之外的地方。这不是承认既得利益，而是利用分封来瓦解诸侯实力。此举必然引起被封诸侯的不满，分封的效果适得其反。

西周初期，王室的权威强大，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地方诸侯。可是项羽先以义帝的名义分封天下，不久又弑君篡位，彻底颠覆了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诸侯于是认为他们的权力是在战争中获得的，因此不愿受项羽的控制。诸侯与项羽之间，名义上是分封与被分封的关系，实际上是反秦战争的联盟在战后瓜分天下。这种强盗分赃式的联盟，一旦失去共同敌人，必然走向解体，直至爆发内战。

刘邦的分封策略有些类似于西周初期的分封制，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将地方的某些权力让给诸侯王，但是诸侯王必须接受天子的控制。这样就明确了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刘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建立大汉王朝之初恢复礼法，建立中央集权制，设三公和九卿，这些做法的确是“汉承秦制”。然而刘邦虽然在中央政

府这个层面继承了秦朝的一些制度，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建设上，他既没有像秦那样建立纯粹的郡县制，也没有像项羽那样全面恢复分封制，而是在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区域建立郡县制，其他地区实行分封制，即所谓“郡国分治”。

为了避免六国贵族威胁新王朝，刘邦将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氏，燕、赵、韩、魏等国的后裔十多万人迁移到关中地区。由于刘邦分封诸侯本来就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因此，他建国称帝之后就开始消灭异姓诸侯。从公元前202年10月至公元前196年10月，刘邦所封的8个异姓王被消灭了6个，逃跑1个，放过1个。异姓王的势力基本被平定了。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047.

平定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分封了不少同姓王。显然，刘邦借鉴了西周分封的成功经验，以宗法制为基础，分封天下，通过宗亲关系将诸王控制起来，并且起到拱卫汉朝的作用。几乎就在灭异姓王的同时，他先后封了10个同姓王。刘邦分封的同姓王都在异姓诸侯国的领地上，并且杀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⑤

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自率军与匈奴交战，结果在白登山被匈奴骑兵包围。刘邦采纳陈平之计，派人给匈奴王后阼氏送了许多礼物。冒顿单于在阼氏的劝说下撤兵。从此，汉朝开始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和平，汉朝初期北部边境基本没有大的战事。

内忧外患基本解决，和平时期到来了，国内的经济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西汉政府建立之初，人口锐减，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物价飞涨，社会物资极度匮乏，处在经济凋敝的困境中；百废待兴，生产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饥肠辘辘不能自保，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忍景象；天子出行，凑不齐四匹同色的马拉车驾，将军出行只能用牛车。

新建立的大汉王朝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破坏。当时有一个名为曲逆的大县，秦朝时期有人口三万多户，到了汉初只剩五千户，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五。据专家估计，秦朝建立时人口有三千万左右，到了汉朝初年，人口已经锐减到一千三百万左右。

刘邦和他的功臣大多是出身底层的老百姓，痛恨秦朝的严刑峻法和无休止的赋役负担。因此，汉朝的统治者不可能继续用秦朝的方式统治全国。除了实行“一朝两制”之外，在经济上，汉朝也实行了与秦朝完全不同的治理方法。那么，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陆贾在《新语》中指出，秦亡是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刑罚、骄奢淫逸、重用奸佞。汉家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必须“行仁义而轻刑罚；闭利门而尚德义；锄佞臣而求贤圣”，这三大原则，显然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

陆贾也信奉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黄老思想是老子思想和黄帝思想的统称，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强调君主不要过多干预民众的生活，让民众自己管理自己。汉代初年，经过秦末战乱，面对社会现实，陆贾主张“无为而治”，与秦始皇严刑峻法的“有为之治”相对立，正是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陆贾主张的“无为而治”并不排斥“有为”，它是“无为”和“有为”的统一，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主张除了皇帝，人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其二，要求法律在执行过程中注意公平原则；其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德治的有力后盾和保证。

陆贾还提出让利于民、与民休息的主张。强调政府不要在无用的事情上花钱，宫中不要收藏没用的东西，政府减少民众的劳务支出，降低民众的赋税负担。

清静无为是黄老治国思想的精髓，并不是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而是要求统治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不要过多干涉民众的生产和生活；要给民众充足的生产和休息时间，同时要爱惜民力，安定民心，发展生产。那么，汉初统治者都制定了哪些制度和政策，落实他们的治国理念呢？

第一，解决土地荒废与农民无地的问题，尽快将人口安置在土地上，劳力归农。将流散人口召集回乡，并规定地方执行安置回乡军士、分配田地等一系列措施。即便当时多数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手中，但也出现了一大批自耕农。

第二，减轻百姓的税赋负担，制定法律减少禁令以利发展生产。农田租税规定为十五分之一；限定官吏的薪金，限制官府的用度，平衡官府的财政收支；在维持起码的官府机构运转的基础上，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

第三，增加生产劳动力。方式有三：其一，释放奴婢；其二，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其三，鼓励生育，多生孩子可免除赋税两年。

第四，解除开发山泽的禁令。让百姓自由开荒种植或发展养殖业；矿山也开放给民间有资质者开采冶炼，发展多种经营行业，从而使物产逐渐丰富。这是官府采取的非常有力的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

总之，汉朝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也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因此，汉初的统治者彻底改变了治国理念，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这才从一个

烂摊子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大汉王朝四百多年的基业，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根基。这一切都源于将全新的治国理念转化为制度。

05 提倡“孝道”能治天下吗

了解《二十四孝》故事的人应该知道“亲尝汤药”的典故，说的是汉文帝刘恒还是代王的时候，非常孝敬母亲。母亲曾经患病三年，卧床不起。刘恒一直陪伴在母亲床前，母亲服用的药汤他都要先尝一下再让母亲服用，因此成为孝子的楷模。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联合皇孙刘襄、刘章兄弟，诛灭了吕氏家族的势力。朝臣认为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便决定另立新君。众老臣经过反复协商、评估和比较，最终决定，立孝子楷模代王刘恒为新皇帝。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17.

刘恒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号，但在他即位当天就表现出以德为先的仁爱之心。他下诏说：“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①大赦就是将已经被判决服刑的罪犯及在押待审、待决的罪犯无罪释放，当然，犯下“十恶不赦”罪行的罪犯除外。从汉朝开始，这样的命令逐渐形成惯例，每当皇帝去世或新皇帝即位，总要大赦天下。

由于两个月前吕太后去世时已经大赦天下一次，所以，这道诏令中更重要的内容是“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当时全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有的良民按照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爵位代表着相应的特权，比如在衣、食、住、行、生、婚、丧、葬方面，不同等级有特定的标准。每提高一级爵位，都可以从国家获得一定的耕地和住宅地。汉文帝一继位就赐全体百姓一级爵位，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是一件很荣耀也很实惠的善举。

可是，爵位只有男子可以获得，所以女子的赏赐为“牛酒”，可能为每一百户一头牛，十石酒。古代民间不得宰杀耕牛，也不准吃牛肉，更不允许在非节日聚众饮酒，只有朝廷下令恩赐，才可以公开吃牛肉、聚众饮酒。“酺”就是合法公开地一起饮酒，让百姓狂欢五天。皇帝即位时举行这样的欢庆仪式，是汉文帝的创举。

汉文帝即位之后，连夜下达诏书，赏赐的不是拥戴他当皇帝的大臣，而是对他取得皇位没有任何功劳的普通百姓。显然，汉文帝在向全天下百姓发出新政的信号，犹如宣布施政纲领：他的执政将更加注重民生，将给百姓带来更大的实惠。他将未来王朝巩固的基础安置在普通的平民百姓身上。汉文帝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与他的治国理论密切相关。

所谓“百善孝为先”，大孝子刘恒登基当皇帝之后特别重视道德。据统计，在汉文帝下发的诏令中，“德”字出现的频率很高。那么，汉文帝是如何用他的执政实践，诠释“德”的深刻内涵的？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62.

汉文帝执政最大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司法的改革上，而且力度很大。据《史记》记载，刘邦入关后宣称“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②可是司马迁的这一说法很成问题。因为“约法三章”充其量是对他所率军队的纪律约束，不可能在军事以外的其他政治、民生等方面全部废除秦法。将汉初法律与秦法对比就会发现，二者不但内容变化不大，甚至连文字、语言风格都极其相近。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18.

汉文帝即位后第三个月，下达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③意思是，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标准，必须公正、公平。如今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并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和兄弟，还要没收财产，将年轻的亲属收为官府奴婢，我非常不赞同这样的法律。

汉文帝即位第二年，下令废除“诽谤妖言罪”，这项罪名显然也是秦法的内容。废除的目的是使国家的治理政令畅通，欢迎批评进谏。如果法律有诽谤妖言罪，群臣不敢尽情对国家提出建议，皇帝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怎么能够容纳各方的贤良人士？于是，汉文帝即位伊始，就废除了这项最容易被恶人用来害人的罪名。

汉文帝的司法改革中，最具道德意义的是废除肉刑。汉文帝主张废除肉刑有三个理由：第一，肉刑并不足以制止或减少犯罪；第二，百姓犯罪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化不够，应该给犯罪者重新做人的机会和途径；第三，肉刑过于残酷，与德政宗旨完全相悖。汉文帝在诏书中提出废除肉刑的四大指导原则：其一，用其他的刑罚代替肉刑；其二，对苦役刑罚要规定时限；其三，废除将罪犯罚作官府奴隶的制度；其四，所有的苦役刑徒都有可能重新回归社会。这些原则表现出道德对法的引导和去恶性，增加了法律的劝善功能。

汉文帝的德政还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得”——要让人民有所得。因此，文帝在进行法制改革之前，就着手对国家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目的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比如，秦朝时的田租实行什一税，即税率为十分之一；刘邦称帝之后为争取民心，曾经宣布十五税一，即税率为十五分之一；当政权基本稳定之后，

又恢复了十一税。汉惠帝登基那年，确定田租为十五税一，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

汉文帝登基后不久，下“重农之诏”，要求各地方政府重视农业，关心农业生产。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所以法定的田租率为十五税一，减半征收，实际税率就是三十分之一，也就是大约3.33%的税率，低得不能再低了。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28.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32.

汉文帝即位第十三年，在废除肉刑的同时，又颁布了“除田之租税”^①的诏令，全部取消田租的征收；同时颁布“除戍卒令”，取消当年的戍卒征发；后来又“丁男三年而一事”^②，即将原本成年男子每年应服一个月差役减少为每三年服一个月。

多次降低税率，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那就必须努力缩减政府的财政开支。文帝在减少开支方面主要有六大表现：第一，从即位那天开始，废除进餐时乐队奏乐的惯例，节省宫廷开销；第二，在当皇帝期间，对他居住的宫廷没有任何扩建；第三，不再圈地建立新的园林，并且经常在灾荒发生的时候允许灾民进入禁苑打猎、采集野菜；第四，减少皇帝装备的车马数量，不增设皇帝的仪仗队；第五，要求妃子穿短衣裙，裙裾不可以拖到地面上，并且将这一习惯推广到全社会；第六，在为自己开凿“霸陵”时，陵中的装饰物都是砖石，陪葬物品都用陶器。

在军事冲突态势缓解的情况下，汉文帝取消了卫将军一职及其所辖军队，缩小军队规模，除留下小部分现役士兵外，大多数士兵退役复员，回家乡务农。

此外，汉文帝在当政的第十二年宣布撤销全国所有的关卡，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货物流通，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间的商品自由生产和流通。在西汉建立之初实行自由的商品经济，是个非常大胆的创举。

总之，汉文帝“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通过司法改革和各项惠民之举，落实在制度上，执行在政策中。统治者带头勤俭节约，朝廷各部门缩减开支，政府放手发展自由的商品经济，把经济搞活，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让老百姓的利益落在了实处，使得为政爱民的道德情怀不再是一句空话。

06 刘邦的孙子们为什么起兵造反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聚众三十余万，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以及匈奴和东越国，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兵分三路，进攻长安，这就是西汉著名的“七国之乱”。许多人不禁要问：这七位藩王大都是刘邦的孙辈，他们为什么要起兵造反？这还得从晁错给汉景帝上的《削藩策》说起。

御史大夫晁错在《削藩策》中建议：仅三个藩王就占了半壁江山，现在削藩，他们肯定造反；现在不削藩，他们将来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造反，祸害小一些；现在不削藩，虽然造反会迟一点，但祸害更大。那么，这些藩王为什么要造反？这就得说说领头造反的吴王刘濞了。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二哥刘喜（又名刘仲）的儿子，刘濞的吴国掌管鄣、吴、会稽三郡五十三座城。当初与民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吴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财政非常充裕。汉文帝刘恒即位不久，刘濞就派吴太子刘贤上京朝见汉文帝。皇太子刘启和吴太子刘贤一块儿下棋，为输赢发生争执。刘启抄起棋盘朝刘贤的头上砸去，砸得刘贤鲜血直流、不治身亡。

当皇帝派人将刘贤的尸体送回吴国归葬时，吴王气愤地吼道：“天下不是同宗吗？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为什么要送回来？”愤怒的吴王将送丧的队伍赶回长安，安葬太子。此案虽纯属过失伤人，却激化了汉朝皇帝与吴王刘濞之间的矛盾。吴王刘濞借口身体有病，从此不进京朝见皇帝。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121.

地方诸侯不朝见皇帝，在当时可是重罪。有一天，汉文帝亲自向一位吴国使者询问吴王的身体情况，这位使者只好承认：“吴王确实没生病。可是朝廷这样不断逼问，非要搞清楚，这让吴王感到紧张，唯恐皇上治罪，更没有安全感。这个心结只能请皇上解开。”汉文帝理解吴王的丧子之痛，于是让吴国使者带话：“吴王刘濞年纪大了，以后不用定期到长安来朝见皇帝。”同时赐予吴王手杖。此外，汉文帝五年（前175年）时，汉文帝宣布“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②，吴王自己也能铸币发行。有了铸造货币的权力，吴国的经济实力更为强盛。

吴国有了足够的财政来源，因此不向百姓征收人头税。凡调用劳动力，吴国都按照市场价付给老百姓报酬，从不无偿征用民力，此举深得百姓拥护。每年，吴王

都会到国内各地巡视，访问和选拔有才能的人，赏赐钱财给乡间民众；还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禁止其他郡国的官吏到吴国来追捕逃亡者。

吴王刘濞二十岁封王，执政四十余年，名声很好，统治也相当稳固。可是刘濞因为太子之死，心中一直对朝廷存有芥蒂，与其保持距离，并且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随着吴国实力一步步强大，他与朝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汉景帝即位后，面对越来越强大的郡国，决心要加强中央集权，排除一切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他对吴国的强盛尤其担心，因为他曾经失手打死吴王的太子，总担心吴王迟早会前来报复。于是，双方相互警戒，矛盾不断加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晁错给景帝上了这道《削藩策》。皇帝对晁错言听计从，立刻下决心削藩。他先削掉赵国的河间郡，然后宣布削去楚国的东海郡，不久又将吴国的鄣郡、会稽郡划给朝廷直辖。早在汉文帝时期，齐国就已经被分为七个小国，汉景帝即位之后又对七个小国进行持续的削藩。

朝廷的削藩之举，使得本已心怀不满的藩王们行动起来。吴王刘濞最先开始行动。他亲自前往胶西国拜访胶西王刘卬，与其正式结盟。刘卬立刻派出使者去联系齐国、淄川国、胶东国、济南国、济北国，这些藩王都答应一起举事。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朝廷削吴国的会稽郡、鄣郡的正式文书下达吴国时，吴王刘濞立刻宣布起兵，并且向全国各地的藩王发出文告：“朝廷贼臣当道，吴王愿意在诸王的协助下，起兵消灭贼臣。”

刘濞还在文告中做出战略部署：寡人将率领吴国五十万大军，请东越王、楚王和淮南王一起西进；南越王愿意出兵三十万，请长沙王先平定长沙国以北地区，然后与南越军一起向西进入蜀郡和汉中；请齐地的诸王与赵王平定河间郡、河内郡之后，或者进军临晋关，或者与寡人在洛阳会师；请燕王平定代国和云中郡，联合匈奴下萧关，进军长安。

吴王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寡人年六十二还要亲自指挥，小儿才十四岁也要参军。因此，年纪比寡人小，比我儿子大的男子，都必须服役！”吴王因此动员了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吴王还派遣使者前往闽越、东越等地，东越果然发兵相助。吴王指挥这支大军渡过淮河，打算和楚王刘戊的军队会师。

楚王刘戊的响应最积极，他迅速集合军队，与吴军合兵。胶西王刘卬同时起兵，杀死了朝廷派来的所有二千石以下官员。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也都起兵响应。但是原来准备参与叛乱的齐王刘将闾因后悔而没有起兵；济北王刘志想按约起兵，但阴谋败露无法参与。这样一来，参加叛乱的藩王一共有七个，所以史称“七国之乱”。

消息传来后，汉景帝立即拜周亚夫为太尉，作为军事最高指挥官，并组建起有三十多个将军的部队，交给周亚夫指挥，前往迎击最重要的叛军吴楚联军。这个时候，一位名叫袁盎的大臣悄悄向汉景帝建议：“吴楚两国发出的文书上说：‘高皇帝分封子弟为王，各有封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诬陷诸侯有错，削夺封国土地。’藩王们因此造反，一起西进杀晁错，要求恢复故地。现在只要杀了晁错，派遣使者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行，恢复封国被削减的土地，就可以兵不血刃，结束战争。”

袁盎之所以出这样的主意，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因为晁错曾经追查袁盎的贪腐行为。汉景帝听了袁盎的建议，沉默了很长时间，叹了一口气说：“如果这样能让他们退兵，我也不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对不起天下。”袁盎说：“臣很愚笨，觉得只有这样办，请皇上从长计议。”汉景帝接受了袁盎的建议，任命他为太常，准备去吴国议和。十几天后，汉景帝通过中尉召见晁错，把晁错骗出家门，直接拉到刑场，晁错穿着朝衣就被腰斩了。

可是杀了晁错，危机也并没有被化解，吴楚联军还是猛攻梁国。朝廷军队总指挥周亚夫发布命令，以荥阳为朝廷大军的集结地点。大军集结之后，周亚夫并不出战，也不援救梁国，只是派遣几支轻骑兵支队，深入吴军后方截断吴军的运输路线。

梁王几次派人到周亚夫的大营求救，但周亚夫就是不出兵。梁王又派使节飞报朝廷求救，汉景帝特派使节要周亚夫出兵。周亚夫回答统帅有权“便宜处分”，还是不出兵。吴王把大量军队调动到进攻梁国都城的前线，已经导致后勤吃紧，又被汉军截断粮道，因此才半个多月，军粮就消耗殆尽。吴军攻城不下，只好转向周亚夫的大营下邑求战，但周亚夫坚守不出。

吴王迫于军粮匮乏，一心要和周亚夫大军决战，希望打败汉军后夺取汉军的军粮补充自己。为此，他只得尝试夜袭汉军大营。周亚夫半夜里听报吴军偷袭军营的东南角，立刻断定吴军是在声东击西。下令在大营西北角集结兵力，果然，吴军主力全力来进攻，被周亚夫大军逮个正着。一场混战后，吴军溃败，僵持近三个月的战局急转直下，汉军从防御立刻转为追击。

吴王只带了数千名士兵连夜逃亡，一口气逃过长江，与东越援军合兵。可是汉朝已经派人说服了东越酋长。东越军趁吴王检阅的时候杀了吴王，将首级送到长安。楚王也在军队溃散后自杀身亡。汉景帝得知周亚夫大军获胜，立即发布诏书传令全军，严惩叛乱的参与者。各诸侯国的官吏基本被杀光，造反的诸位藩王更是难逃一死。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这场“七国之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质上是中央集权制与分封制之间矛盾的总爆发。汉朝政府简政放权、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走向反面，“郡国分治”的体制走到了尽头，因为割据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动荡和战争。当七国的叛乱被平定之后，整个大汉王朝实行纯粹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条件就成熟了，这为大汉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7 汉武帝为何选择“独尊”儒术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皇太后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的祖母，驾崩了。汉武帝表面非常悲伤，内心却是长出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刘彻即位六年了，这皇帝却当得不开心。原因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权倾朝野，皇帝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现在太皇太后去世，刘彻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当皇帝了。那么，他自己的意愿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刘彻即位之后做的一件有重大影响的事说起。

公元前141年正月，十六岁的刘彻即皇帝位，立刻着手组织儒生加入自己的高级领导班子。皇帝下诏，让丞相、御史、列侯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朝廷接受策问。显然，刘彻要在他们中间选拔人才，这是科举制度的滥觞。

全国各地推荐了一百多人来到长安，皇帝连下三道测试题，将他十几年来思考的问题全都提出来，想听听这些青年才俊的意见。汉武帝强调说，他思考的是具有根本原则性的最高理论问题，即“古今治道”。此举意味着汉代的治国理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各位才子各抒己见，争相回答皇帝的问题。其中，最能打动刘彻的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中表达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三层含义：第一，天是最高的权威，是无形无限而有德行和意志的最高神，同时又包含着规律和自然的真谛，表现为四季更迭与气象变化；第二，君主的权力源自上天，是皇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第三，天意就是民心，人心的归附是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依据。

董仲舒将儒家思想提高到社会主流的地位，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代表全民的意志。董仲舒对皇帝指出：“诸子百家思想各异，造成全国思想混乱，统治者没有统一标准，法律因此多次改变，使得民众不知道遵守什么才好。”他因此建议皇帝：“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思想一律禁止。”这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主张学术标准统一，法度才能清晰，人民才会知道应该遵守的价值导向。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为汉武帝描绘了一幅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君民融洽的画面，把汉武帝的施政纲领和远景规划神圣化、理论化、具体化。董仲舒的思想代表了汉武帝的治国理念，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丞相卫绾给皇帝上奏说：“在所举的贤良中有研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的学术的，其学皆属扰乱国政，应统统罢黜不用。”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

窦太皇太后听说后不禁大怒，一声令下将卫绾免职，刘彻只好继续任命另外一位儒者赵绾为御史大夫。赵绾上任后不久，就与郎中令王臧不约而同地上疏建议：“遇事不必请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听说，立刻将二人打入大牢，二人在狱中被逼自杀。显然，太皇太后此时已经是汉武帝想要变革政治的最大障碍。可是，汉武帝刘彻不敢公开与太皇太后决裂。

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驾崩，刘彻这才得以放手追求他的目标。于是他下诏令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不久又下诏举荐贤良文学。刘彻要从道家的“无为之治”，向儒家的“有为之治”转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在各地举办乡学，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其他各家学说；并且建立举贤机制，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官制度。

儒家主张“君权天授”，就是不允许有人挑战君权。可是即位的最初六年里，刘彻一直受太皇太后的挟制，这让他忍无可忍。太皇太后驾崩后，政治体制中依然有人挑战皇权，挑战者就是当朝丞相。于是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做丞相的惯例。

为了有效地控制朝廷并且限制丞相的权力，汉武帝设置了一套脱离政府系统、由自己直接控制的机构，史称“内朝”（又称“中朝”）。在内朝任职的官员，往往在职务名称里加一个“中”字，表示是刘彻的亲近之臣，比如“侍中”“中郎”“中大夫”。以内朝御外廷的体制建立之后，凡是重大问题的决策，基本上由内朝官表达天子的意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参政议政的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于是权力更加集中。

秦始皇按照法家理论建立了监察制度，监察负责人就是位居三公的御史大夫。秦朝的御史大夫有双重职责：其一是作为副丞相协助丞相治国理政；其二是负责纠察百官并监察丞相的任职情况，是朝廷的最高专职监察官。汉武帝以此为基础进行改革。首先，御史职责专业化，只负责对百官的监察，处理与罪法劾案有关的事务，天子诏书、天下奏章之类则由丞相专门负责；其次，在天子与监察系统之间增加了一个新的监察层次——内朝诸吏。汉武帝通过内朝诸吏直接掌握了监察权。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424-2425.

建元三年（前138年）十月的一天，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一起进京朝见皇上。汉武帝宴请他们，席间奏乐，气氛欢洽。突然，中山王刘胜哭了起来。汉武帝惊奇地问：“何故悲伤？”中山王一边哭一边说：“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

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①意思是，我虽然才德浅薄，但能成为皇族的一员；地位虽然低下，也能做东方的藩王，从亲属关系来说又称兄。如今群臣与皇上没有丝毫的亲戚关系，也没有什么重要作用，却成群结党地聚在一起议论，相互帮助，使得皇族被排斥，骨肉亲情消散。这就是伯奇所以流离失所，比干所以被剖腹的原因啊。《诗经》说：“我心里忧伤，像被棒槌击捣；和衣卧而长叹，因忧愁使我衰老；心里的忧愁啊，就像头痛一样难受。”这话就是说我啊！

听了刘胜这番话，汉武帝陷入了两难：既要加强中央集权制，又要兼顾皇室宗亲之间的感情。这个时候，主父偃建议汉武帝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在王国范围内也可以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自此，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减弱，再也无力与中央抗衡。此后，地方的王侯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汉武帝还找借口，一次就削去了当时一半的侯国。

汉武帝后来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则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此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通过这些措施，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分裂割据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作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地位相当于钦差大臣。

汉初的简政放权、清静无为，是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六十多年过去，经济繁荣了，但这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上，中央财政的力量并不强大，这与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汉武帝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首先，盐铁专卖。这项制度的实施，既为国家开辟了新的财源，抑制了私营盐铁的富商大贾从中谋利，又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解决了长期困扰政府的经费问题。

其次，收铸币权。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私铸钱币运到京师销毁，并且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41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441.

再次，均输平准。由国家出面，通过税收、征购等方式，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控商品流通，这就是“均输”；同时，政府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这就是“平准”。“均输”与“平准”配套并行，“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⑩，调剂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牟利。此政策实行之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⑪。

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汉武帝的“有为之治”才有可能充分彰显其威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结束了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另一方面，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获取西域各国资料，同时瓦解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盟，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总之，大汉王朝终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毕竟是法家理念的制度化，与儒家的价值观之间依然存在理论与制度不统一的问题。因此，汉武帝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社会意识形态从道家的“无为之治”向儒家的“有为之治”转化。儒家思想中的“君权神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一统”“忠孝”等价值观，与中央集权制的需求基本吻合。于是从此，儒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逐渐融为一体，对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儒家理念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08 武力反击匈奴是穷兵黩武吗

汉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派三十万大军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准备等匈奴大军进入伏击圈，将其一举歼灭。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狡猾的军臣单于识破了汉军的谋略，引兵北还，使“马邑之谋”落空。从此，匈奴拒绝与西汉和亲，四处袭扰西汉的北部边境，汉匈关系破裂。人们不禁要问：汉武帝为什么要打破汉匈之间的和平局面呢？这还得从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匈之间的关系说起。

汉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阻挡匈奴在军事上的进攻，更没有改变匈奴小规模袭扰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匈奴骑兵不时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杀掠人民畜产，对汉朝北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破坏。总之，和亲的方式只是避免两国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可是局部的骚扰、掠夺和杀戮从来没有停止过，北方边境地区的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绝佳的战机出现了。

公元前133年，雁门马邑豪强聂壹通过王恢上书献计，请击匈奴。此计在朝廷形成两派意见。韩安国一派全力主和，并且提出两条理由：第一，高皇帝遭平城之耻，仍遣刘敬往结和亲，延续五世，有利天下；第二，卷甲轻举，长驱深入，联络运输困难，难以成功。另有王恢一派则全力主战，也提出两个理由：第一，高皇帝不报平城之耻是为了天下安宁，如今边境数警，士卒伤亡，棺木相望，天下已经不安宁；第二，出击匈奴并非一定要深入其地，可以诱敌入边，奇兵伏击，一定会取胜。

汉武帝决定采纳王恢的意见，执行聂壹的计策。韩安国、李广等六位将军统兵三十万，执行诱敌伏击的计划；聂壹假装成内奸，逃到匈奴大营对军臣单于说：

“我能斩马邑令丞，带领全城投降，您可以得到城内的全部财物。”马邑当时是北部边境的后勤补给基地，有大量的物资。贪财的军臣单于信以为真，马上同意。到了约定日期，马邑城门高挂着几个首级，城北百余里散放着畜群，三十万汉兵在马邑附近埋伏。军臣单于率十万骑兵进军马邑，途中见畜群无人放牧，心生怀疑，于是突然进攻汉军的一个亭，抓了俘虏，得知汉军计划。军臣单于大惊，连忙退兵。

汉军见军臣单于没上当，立刻追到边塞，可匈奴已经远去。首次兴师动众，结果计划失败。主战的王恢负责攻击匈奴，当时却不敢出击，汉武帝因此迁怒王恢，降罪于他，王恢下狱死。从此汉匈关系破裂，和亲断绝。匈奴攻击汉朝边疆设施，侵略边境居民，百姓苦不堪言。

汉武帝决心彻底平息边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战争。霍去病的一句“匈奴不灭，无以家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从公元前129年冬开始，到公元前119年秋为止，大约十一年时间里，大汉王朝对匈奴占据的区域一共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收复被匈奴占据八十多年的河套地区，从此扭转了对匈奴战争被动的军事态势；控制整个河西走廊，并在之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汉朝防线向西推进，打开了与西域的河西通道。

连续十几年的大规模战争和多次的沉重打击，使匈奴国力大为消耗。公元前117年左右，匈奴单于伊稚斜派使者请求和亲。由于汉朝在长期战争中也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汉武帝有意休战结好，廷议改变对匈奴的政策。但是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汉朝廷对议和的条件在此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臣中有的赞同恢复传统的和亲政策，可是丞相长史任敞却主张匈奴单于对大汉王朝称臣，方能议和。这个建议很对汉武帝的心思，于是他派任敞出使匈奴。可这显然是错误的决策，汉朝应该以对等地位与匈奴建立关系。果真，伊稚斜单于一听让他称臣就大怒，议和没有结果。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公孙贺率一万五千骑兵出令居数千里，到匈河水不见匈奴踪迹而还。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派郭吉出使匈奴，依然坚持强硬的主张，要求乌维单于向汉朝称臣。乌维单于大怒，扣留郭吉。但乌维单于自知兵弱，很少侵犯边境，并多次派使者到长安坚持要求和亲。

元封四年（前107年）夏，汉武帝派王乌到匈奴摸情况，王乌见到乌维单于，乌维单于降低了条件，表示要派太子入质于汉以结和亲。不久，汉武帝派使者杨信去正式谈判。乌维单于在穹庐外接见杨信，当杨信提出将上次非正式协议确定下来时，乌维单于却反悔了，说这样的和亲不符合过去的传统，于是和亲谈判再度失败。

汉武帝只好再次派王乌出使匈奴，谈判和亲问题。乌维单于想多得财物，就哄骗王乌说：“吾欲入见汉天子，当面结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武帝信以为真，在长安为乌维单于修建府邸。乌维却又提出要汉朝廷派高级使者到匈奴，同时派匈奴使臣到汉朝。可是，匈奴使臣到长安，因病服药无效而死。汉武帝派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带数千金护送匈奴使臣归丧。乌维认为使臣被杀，扣留路充国。于是和议中断，乌维单于不断制造边境冲突事件。

元封六年（前105年），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庐立。詹师庐年少好杀伐，国中动荡不安，内部矛盾加深。左大都尉想杀詹师庐，派人暗中报告汉朝准备降汉。太初元年（前104年）夏，汉武帝派公孙敖在五原郡北长城外筑受降城，准备接纳来降的匈奴；再派赵破奴率领两万骑兵出朔方，向西北行军两千余里，到达匈奴的浚

稽山。这时，詹师庐发觉左大都尉的计谋，杀左大都尉，发兵迎击赵破奴。赵破奴被生擒，两万汉骑覆灭。詹师庐派骑兵攻受降城，劫掠汉边而去。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461.

太初三年（前102年），詹师庐死，匈奴立句黎湖为单于。第二年句黎湖单于死，其弟且鞮侯继位。天汉元年（前100年）春，汉武帝组建中郎将苏武、副中郎将张胜等百余人的大型使团，使之带着厚礼来匈奴谈判和好。这一次，汉武帝诚心诚意地希望双方修好，不料且鞮侯竟态度傲慢起来。和谈不成，苏武正要回国，恰好匈奴内部爆发起义，起义者大都是被俘的汉人。起义失败，事情牵连到副使张胜。且鞮侯下令拘禁汉朝使者，威逼苏武投降。苏武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①说完这话就拔刀自杀，经抢救活了下来。

汉武帝得知苏武被拘的消息之后，知道匈奴没有和好的诚意，决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出酒泉远征，在天山山麓与右贤王大战，各有胜败；同时又命骑都尉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北进，命路博德挺进西河袭击匈奴。

李陵奉命按指定路线从居延遮虏障出发，行军三十天，直到浚稽山，在山间安营扎寨。且鞮侯率三万骑兵包围李陵。李陵追击杀敌数千，且鞮侯调八万骑兵围攻李陵。李陵杀死随军妻子，麾军血战，又杀伤匈奴共五千余人，匈奴打算收兵。就在这时，汉军叛徒逃降匈奴，告知匈奴，李陵弓矢将尽，后无援兵。且鞮侯立刻发起总攻并大呼：“李陵快降！”李陵且战且退，退到遮虏障北一百八十里的峡谷被困，士兵伤亡大半，箭尽道穷。李陵命令斩旌旗，埋藏珍宝，令士兵各自突围。突围时校尉韩延年战死，李陵投降，只有四百人回到汉朝。

天汉三年（前98年）秋，匈奴攻入雁门。第二年正月，汉武帝命李广利第二次出击。李广利将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将兵万余与李广利会合；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公孙敖率万骑、步兵三万出雁门。且鞮侯得报，自率十万精骑在水南截击李广利。两军鏖战十余日，不分胜负。

太始元年（前96年），且鞮侯死，长子狐鹿姑继位。征和三年（前90年）前后，狐鹿姑单于多次南下上谷、五原、酒泉挑衅。汉武帝组织了一次十多万人的军事行动，命李广利将兵七万出五原，商丘成将兵三万余人出西河，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狐鹿姑单于采用引汉军深入的战术，将全部辎重转移之后，自带精兵渡姑且水待战。

商丘成挺进到追邪径，不见匈奴一人，还军时被匈奴三万骑追击，在浚稽山大战九日，击退追军。马通军到天山，与两万匈奴骑兵相望，没有交战而去。李广利

出塞北进至夫羊句山战胜匈奴右大都尉与卫律，乘胜追到范夫人城，匈奴奔走，不敢交战。正在这时，汉朝发生政治变动，李广利妻子被收监。李广利得知，又忧又怕，部属劝他投降匈奴。李广利不听，想立功赎罪，率军北进到郅居水，与左贤王大战。这时，李广利妻子被收监的消息已经在军中传开，有的部将不满李广利冒险进军邀功，谋划兵变，被李广利杀了，造成军心浮动。匈奴乘机袭击，李广利兵败投降。

汉朝军队的失败，使得匈奴气焰嚣张，狐鹿姑单于派使者赴长安，要与汉朝订立条件苛刻的和约。汉武帝不允，派使者去谈判。狐鹿姑布置左右侮辱汉朝使者，被严词斥回，和议没有成功。

此时，汉武帝已到晚年，不再好大喜功，且新近损失几员大将和几万士兵，汉朝一时无力再出兵。匈奴方面，一则因为受汉兵深入穷追几十年，战争负担沉重，人心厌战；二则瘟疫流行，庄稼歉收；三则单于以下都想和亲，因此也没有条件再南进了。后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远遁，南匈奴内附汉朝称臣。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最终以汉朝取得决定性胜利告终。

对于汉武帝用战争手段反击匈奴的做法一直有争议，反对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有人甚至用成本核算的方法，说明汉朝反击匈奴之战得不偿失。可是通过对汉朝与匈奴之间战争的简单描述，我们就明白，双方战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匈奴人挑衅，汉朝军队自卫反击。从当时的局面看，和平固然可贵，但是，如果一个朝廷保护不了自己的人民，任敌国摧残、抢掠、杀戮，那么，人民会认同这样的国家吗？人民固然需要和平，但是没有强大的国防力和雷霆般的反击力，哪来的和平？和平永远不可能靠乞求，只能靠战场的胜利去赢得。虽然汉武帝在与匈奴之间的战争过程中也犯过错误，比如，非要对方称臣导致汉匈之间长期得不到和平，但是从总体上看，汉武帝武装反击匈奴的举措是正确的。正是因为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汉王朝才得以屹立在东方，才使“汉”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族称，并使我们因此感到非常荣耀。

第四章 战乱与融合的开始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先是党锢之祸，后有黄巾起义，发端者各有各的野心；董卓之乱，诸侯崛起，天下分崩离析；三国鼎立，争夺天下，各有各的打算。“道不同不相为谋”，各方之间相互竞争，而所有的争夺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司马王朝统一天下后，“八王之乱”中皇室宗亲之间的争斗，又导致天下大乱，短暂的统一无非是利益分割之后的暂时平衡。在这样的环境里，社会公权力完全沦为私人的工具，失去任何合法性，更不具备合理性，因此这些王朝都不可能长久。没有强大且合理的公权力，社会动荡，战争不断，人们生存艰难，活下去就成了唯一目的。

01 东汉末年战乱的原因是什么

汉光和七年（184年）三月五日，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头戴黄巾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起义军所到之处，烧官府，杀官吏，攻破豪强地主的坞壁，各州郡长官四处逃命。一时间，各地黄巾军纷纷响应，东汉王朝受到了强烈冲击。这是中国历史上组织最严密、政治主张最鲜明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之一。那么，东汉末年为什么会爆发黄巾起义？这还得从当时腐败的政治情况说起。

东汉政治腐败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宦官擅权。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宦官出身低下，皇帝觉得没有威胁，因此最信任他们；其二，宦官常在皇帝身边察言观色，容易愚弄和迷惑皇帝；其三，当皇帝年幼或无力执掌朝政时，宦官便乘机擅权；其四，母后临朝，不得不让宦者传达政令，宦官于是从中窃取权力。总之，无论哪个王朝出现宦官擅权的现象，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宦官人品低劣。

面对宦官害政祸民，有一个奋起抗争的阶层——士。东汉统治者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了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了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他们恪守儒家理念，在朝廷中形成了耿直派官僚集团。士人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并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

东汉末年有清议之风，名士与太学生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评论朝政，褒贬人物。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导致了所谓的“党锢之祸”，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居然在两年之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对士族造成了严重打击，朝廷内外的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1820.

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迫害的大都是性格比较耿直的士人，而且对皇帝也比较忠诚。士人们看到同伴不断被杀戮，对东汉的腐朽统治逐渐产生厌恶，甚至不再希望其继续存在。例如，当时的名士郭泰说：“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①有的士人则公开宣扬“天下将乱”“汉家将亡”。这表明以士人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已经对东汉王朝失去了信心，甚至渴望天下大乱，改朝换代。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7.

章和二年（88年），汉章帝驾崩，年仅十岁的汉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为了在政治上取得豪强的支持，窦太后宣布“罢盐铁之禁”^⑧，将朝廷的盐铁大利出让。窦氏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其结果是窦氏政权虽然暂时得到了稳定，但是地方豪强财力大增，政治野心随之扩大。废除盐铁官营，削弱中央集权，势必增强豪强割据势力，这是东汉灭亡的征兆。

东汉豪强分两种：一种是无市籍的地方豪强，他们同时也是封建王朝的大官僚，比如汝南的袁绍和袁术；另一种是有市籍的地方豪强。市籍就是专门的商人户籍，他们世代经商，社会地位比较低，但财力雄厚。地方豪强平时以大宅院为中心，筑起堡垒，宅院里又有制造各种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这种工匠与商贾、牧人等，都是地方豪强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垒外住着佃农，他们在暴力胁迫下变成半农奴的身份，叫作“徒附”。这些没有耕地的农民，只能依附于豪强，像奴婢一样为主人耕种，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生活非常贫困，还要替豪强当私兵，即所谓“部曲”。因此，东汉地方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腐朽性和破坏力都特别强。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86.

城市经济发达的结果，是商人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最终失去土地，走向破产，不得不沦为徒附甚至奴隶。不甘心沦为徒附的农民则涌向城市或成为流民。从西汉开始，流民问题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到了东汉时期，流民问题一直不断，汉安帝以后越来越严重。正所谓“黎民流离，困于道路”^⑨。

东汉的危机在思想领域中的表现之一，是“谶纬神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谶”具有应验、灵验之意，比如“亡秦者胡”；“纬”是用神学的观点解释儒家经书。对谶纬神学的迷信之所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根本原因是儒生制造谶纬以维护话语权。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政治黑暗腐败，统治者失去执政信心，于是借助神灵强化自己的权威；其二，儒生面对黑暗腐败的政治无力抗衡，不敢抨击朝政，只好借助神灵加强话语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当统治者依靠编造迷信的预言迷惑百姓时，他们的末日就到了。

在今文经学走向谶纬神学之路的同时，古文经学则走上了烦琐注经的末路。比如，桓谭解说《尚书》两个字用了“十万余言”。烦琐注经导致一些儒生不再关心现实政治。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统治者采用高压政策，关心现实、讲真话，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其二，统治者利用权力和功名诱使人们读经，儒生明哲保身且有利可图，统治者可以愚弄百姓。

王充. 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75.

然而，在整个社会都被迷信思潮充斥的时代，王充却以独立的思想意识，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他用接近当时口语的文体写作《论衡》，批判神学迷信，并且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等领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王充说：“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⑧意思是，天道本身无所谓正确或错误，人对天道的认识则有真伪之别。正确的认识具有指导作用，错误的认识会导致虚妄的迷信。因此，如何区别真伪显得格外重要。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47-1648.

在历史研究领域，仲长统提出了卓有见识的观点。他将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王朝开创时期；第二阶段，新王朝建立之后；第三阶段，王朝陷入腐败并发生内乱，同时引起外患，中央政权失去控制力，地方豪杰崛起，天下再一次陷入大动乱之中，最后的胜利者成为新的一任天子，新的王朝重新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演进的，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常然之大数也”^⑨。

面对黑暗腐败的东汉社会，《太平经》提出“太平世道”的社会理想。这是一个没有自然灾害，没有人间的不公正，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残害与战争，人人相爱相通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虽然美好，但是在东汉时期，它只能是农民阶级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即使如此，它的积极意义还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乌托邦，既有对东汉黑暗政治的批判作用，也具有引导民众追求理想社会的功能。可以说，在不知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发展的东汉末年，这是唯一的既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又具有理想色彩的思想。虽然它以宗教臆语的方式，近乎荒诞地出自所谓“真人”之口，但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直接成为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

《太平经》的太平世道理想，集中表现了作者的社会理念。这种理念对东汉的社会状况与腐败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太平经》努力为实现太平世道设计了方法，似乎意识到，社会理念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才能变成现实，而这种方式似乎只能是武装起义。

在黄巾军起义之前，从汉安帝到汉灵帝，各地发生民变多达六十七次。起义的人数不断增加，区域也在继续扩大。面对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朝廷不但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解决，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反而愈来愈残酷。

与之前的农民起义相比，黄巾起义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谋略；准备全国同时起事，以图一举击垮东汉王朝统治；并且收买了一些宦官做内应。一切准备就绪，就等良辰吉日的到来——这一天就是甲子岁甲子日。可是，正在

他们布置起义，调动各地的信徒准备配合洛阳附近的各州郡起义军一举攻下洛阳的时候，内部出了叛徒向朝廷告密。朝廷立刻在京城展开大搜捕。此时离起义日期还差一个多月，这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张角的部署。张角立刻派人迅速传告各方首领，仓促间发动起义，向统治者进攻。虽然这次起义蒙着宗教色彩，它依然显示出了空前的规模与气势。

然而，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起义还是被统治阶级打败了，起义军并没有实现目标。虽然其失败有军事因素，但究其根本，还是“太平道”的社会理想是乌托邦。在农业基础上产生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超越农民意识——作为统治者就是封建专制主义，作为被统治者也只能渴望有明君、良臣的清平世界。农民意识是不可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的。但是，他们对“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永恒的。

02 曹操的“道”是什么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6.

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各路诸侯纷纷起兵，拥戴袁绍为盟主共讨董卓。大战之前，袁绍问曹操：“如果讨伐董卓失败，如何退守？”曹操反问袁绍：“您觉得如何是好？”袁绍回答：“占据黄河，背靠燕代，兼并戎狄，向南争夺天下，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曹操不以为然地回答：“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①后来曹操果真胜出并且统一了北方。那么曹操的“道”是什么，又是如何御“天下之智力”的呢？

曹操举孝廉之后任洛阳北部尉，负责城门的警备。他专门做了五色棒悬在城门左右，如果有人犯禁，无论什么身份，一律用五色棒打死。几个月之后，皇帝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反规定夜行，果真被棒杀。一时间，整个洛阳城没有人再敢犯禁。可是，曹操此举却得罪了当朝的宦官，同时也遭到地方豪强的怨恨。为了避免给家族招祸，曹操托病辞官回乡。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2.

回乡后，曹操决心继续等待，直到“天下清”^②再出任官职。可是不久，他突然接到朝廷的征召，任命其为都尉，很快又升为典军校尉。连曹操自己都纳闷，官运怎么就突然亨通了呢？原因很简单，黄巾起义爆发了。曹操拜骑都尉，赴颍川征讨黄巾军。战争激发了曹操的政治热情，锻炼了曹操的军事才干和政治能力。使之在后来的中原逐鹿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过人的胆略。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

曹操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升为济南相。济南地方长官与豪强勾结，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曹操上任后，将大部分地方官员罢免，同时禁止民间迷信活动，济南国“政教大行，一郡清平”^③。可是曹操的这些做法又得罪了朝中宦官和地方豪强。为了避祸，他没有接受东郡太守之职，而是称病回乡。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8.

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一些军阀纷纷拥兵自重，意在夺取皇帝宝座，董卓是其中最野蛮、最凶狠、最无耻的一个。董卓入京后擅权恣政，欺凌圣上，又肆意排除异己，意欲斩杀诸路豪杰。于是众豪杰出于各种目的，云集一处，拥戴

袁绍为盟主，开始了讨伐董卓的战争。曹操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然而他却与其他军阀完全不同。比如，袁绍提出要立刘虞为帝，曹操坚决反对，说：

“我们因董卓暴虐而起兵，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的响应，是我们‘以义动故也’^⑩。如今皇帝年幼，受制于董卓这样的奸臣，这并不是君主的过错。在这样的情况下废掉君主，必然遭到天下人的反对。如果你袁绍执意要立刘虞为帝，那我就独自去攻打董卓。”那么，曹操这里说的“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3.

从曹操对待袁术的态度就能看明白了。董卓被除后，袁术在九江称帝，部下皆称臣。其官署、衣服等都以天子的标准制作。有人劝袁术称帝，他一时不敢，怕曹操反对。后来袁术称帝时，曹操亲率大军征讨，将他赶过淮河，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看来，拥戴天子，统一全国，恢复和平，就是曹操最大的“义”。显然，曹操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绝不是一般的地方豪强。正如曹操所说：“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⑪此处的“义”代表的就是国家统一，所以他迎战袁绍就有了正义性。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3.

刘表死后，其子刘琮继位，在蔡瑁等人的劝诱之下归顺朝廷，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基本实现统一，曹操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时的情况的确如曹操的自我评价：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⑫经过曹操的努力，军阀被灭，北方统一，东汉末年的战乱将要结束，这就是最大的“义”。

位极人臣的曹操，完全有可能取汉帝而代之，天下人都如此怀疑他。曹操却以齐桓公和晋文公为例，表明自己的心迹。可是，既然没有篡汉之心，曹操为什么不放弃兵权，将朝廷的权力还给汉帝呢？曹操的回答是：“现在将兵权交出，回到自己的封国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我一旦离开军队就会被人加害。既为自己子孙考虑，也为国家安危考虑，我不能为一时虚名惹杀身之祸，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曹操总结了自己战胜诸侯的原因：“我能够战胜各路豪强，是因为借助了汉朝天子的力量。我凭借天子的号令，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我所要做的事，没有谁能够阻拦，心中的愿望几乎都实现了，最终荡平天下，完成汉朝丞相的历史使命。这是天助汉室，而非人力所能。”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53.

曹操顺应了民心，因为人们渴望统一。当然，所有地方割据势力都想当皇帝并且统一天下，这就要看这方势力想用什么样的政府来统一四分五裂的国家。可以说，国家由谁来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治国理念。曹操心里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⑩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也表达了这种志向。他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应该是对曹操所谓“以道御之”的最好注解。所谓“道”，就是曹操追求的理想社会；所谓“天下清”，就是国家统一，社会和平，百姓安居乐业。

以这样的“道”御“天下之智力”，典型表现就是曹操发布的《求贤令》，而且他在几年之内连续下了三道《求贤令》。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2.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求贤令》的核心观点是“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⑪。在历史发展到转折关头，社会由衰败向兴盛转化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各类人才。曹操强调“唯才是举”，就是不顾及社会舆论对人才的道德评价，用人仅以才能为标准。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4.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的《求贤令》强调“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⑫。意思是：人无完人，对有才华的人，不能用道德标准苛求。曹操举陈平与苏秦二人为例，他们在道德上都有不足之处，但是陈平辅佐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而苏秦则帮助弱小的燕国抵御强国的进攻。所以，不能因为人才有缺点就不用他们。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的《求贤令》强调不计较人才的社会地位与出身，甚至对那些曾经犯过重大过失的人，也应该以用其才能为主。曹操这样说，出于两点考虑：其一，当时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如果用道德标准加以限制，就发现不了人才；其二，如果一味强调道德标准，人才会为敌人所用。

从曹操全新的用人标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所恢复的社会秩序不再是对汉朝制度的简单承袭，在道德观上已经有了重大改变；东汉以降，豪强世族垄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把持官吏升迁之路的局面，将得到彻底的改变。一时间，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类人才云集，这必然给曹操的政权和他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带来新的气象。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4.

“以道御之”更重要的是解决吃饭问题。东汉末年，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能力急剧衰落。在这种情况下，谁能首先解决粮食问题，谁就是这场政治角逐的胜利者。因此，曹操接受枣祗等人的建议，开始在许下屯田，正所谓“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④。曹操的屯田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也使流民安顿下来，无论对恢复农业经济还是恢复社会秩序，都极其重要。

建安十四年（209年）秋，曹操下达抚恤令：对有亲人阵亡而失去生存依靠的家庭，地方官员必须坚持发放粮食，并且经常抚恤他们。打败袁绍之后，曹操又发布命令免除当年的租赋，并且明确规定每亩的田租、每户的庸调，不允许擅征其他租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下令：七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和儿子的妇女，十二岁以下失去父母兄弟的儿童，双目失明、身有残疾，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人，均由国家养活。贫穷且生活无着落者，政府给予救济。年龄超过九十岁的老人，国家负责赡养。

曹操的“以道御之”，表现了曹操的理想追求：国家统一，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失去经济来源的人都有生活保障。虽然，这些政策并没有超出孟子所提倡的“仁政”的内容，但是孟子的仁政是理论上的设想，而曹操将这种理想初步化作一时的政策或者相对稳定的制度，即使没有确切材料证明这项政策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并且真正成为一项制度，但是，能够形成一时的政策，也算是一种进步。

03 诸葛亮为何“出师未捷身先死”

唐上元元年（760年），唐代大诗人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只身前往武侯祠凭吊，留下千古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许多人不禁要问：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有经天纬地之才，怀安邦治国之略，可为什么五次北伐，次次无功而返，最终死在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呢？这还得从诸葛亮的志向说起。

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表达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他说：董卓之乱，引得豪杰并起。曹操名声不大，人数不多，最终能够战胜袁绍，其原因不仅在天时，也靠人的努力。如今曹操拥兵百万，且“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历三代，地势险要，民心归附，任用贤才，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只能是联合的对象。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913.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913.

看着刘备沮丧的表情，诸葛亮说：荆州北面是汉水和沔水，疆域向南抵达大海，向东与吴会相连，向西可直通巴蜀，这里是用武之国。但是现在的主人没有能力守住这块地盘，这对使君您是天赐良机。因此，必须先占荆州，再占益州。益州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汉高祖成就帝业之地。但是益州之主刘璋昏庸无能，张鲁占据汉中构成威胁。益州民殷国富，刘璋不知体恤民众，有智慧和能力的人，渴望得到明主。您是汉室宗亲，以信义闻名天下，如果能够占据荆、益二州，凭借其天险，向西与当地各民族搞好关系，向南安抚夷人和越人。对外与东吴建立联盟；对内完善各种制度。一旦天下有变，命一位上将军带领荆州军队进攻宛洛，您亲率大军出秦川，东西夹击，“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②？真能如此，“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③。这是诸葛亮的政治志向，也是刘备的毕生追求。

可是，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之后，情况发生逆转。先是关羽进攻襄阳时，孙权派兵偷袭江陵，夺取荆州，杀害了关羽。失去了荆州这一大根据地，刚刚建立的季汉面临严重的危机和考验。当刘备准备发兵攻打东吴，夺回荆州，报关羽被杀之仇时，更大的政治危机出现了。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改年号为黄初，汉朝正式灭亡。第二年，刘备称帝，其政治主张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兴复汉室变成继承汉室正统。因为刘备自立为帝并不具备合法性，所以他如果再提兴复汉室，号召力明显下

降。此时的汉室已然成了刘备的“家室”——过去的汉室忠臣，其“义”是君臣之义，以及天下苍生的共同利益；而今再提“义”字，只是蜀汉一隅之“义”，刘备一己之私利，其正义性与合理性都大打折扣。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918.

公元221年7月，刘备亲率大军出兵伐吴，几乎全军覆灭。刘备感到前途茫茫，不愿再回成都，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在托孤遗诏中对诸葛亮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定国家，最终完成大业。皇子刘禅可以辅佐就辅佐，否则先生可以取而代之。绝对的信任，换来了绝对的忠诚，诸葛亮流着眼泪对刘备表白：“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⑧这句话表达了诸葛亮的心志，也说明了诸葛亮将完成刘备的托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辅政生涯，从此开始。

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丞相，主持蜀汉政权，重新建立了与吴国的联盟，三国鼎立的局面大体稳定下来。诸葛亮开始沉下心治理蜀汉，他要为北伐中原、统一全国积蓄力量。

关于治国之道，诸葛亮认为，治国的方法与治家一样，务立其本，本末分明。本就是领导者，末是被领导者。家中有长，国中有君，所以国君必须有权威，就像天上的众星拱北斗一样。整个封建国家像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底层是人民，中间是各层的官僚机构，上层是大臣，最高层是君王。这种结构是不能改变的，就像天上群星的位置无法改变一样。

为此，诸葛亮提出了明君的标准。第一是知：了解人性，知晓外情，熟悉社会，体察民情，只有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第二是公正：建立完善的国家机构，各个部门的官职都很齐备；官职有高低，爵禄有序列，为政要清廉，有能力强的大臣辅佐。任何人都不能因自己的私利干扰社会的公利，邪恶不能压倒正义。这些都是治国的根本。

诸葛亮. 诸葛亮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0：64.

对于管理百姓，诸葛亮提出“治人之道”的概念。他说：“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⑨意思是，管理人民的最好方法是进行道德教育，以改变世俗的风气，向民众示范应该干什么。这种教化和示范，最好是身体力行，垂范天下。如同日月的光明，民众必然会追随与仰望之。

诸葛亮还认为，治理民众就像育苗，要给它们除杂草，这就是限制奢侈之风，提倡节俭。民间喜欢制作无用之器，积聚无益之货，来自远方的各种金银珠玑，奇

珍异宝，并不是普通百姓使用的东西；各类锦绣绮罗，玄黄衣帛，也并非一般人应该穿的衣服；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既妨害农事，也不是百姓应该追求的装饰；豪华的房屋，高大的萧墙，雄伟的坟墓，铺张的风尚，这些都不是普通民众的追求。

理想的国家和社会，人民必须安居乐业。对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民众谋福利，诸葛亮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无论国还是家，不怕贫困而怕不安定。当时的社会状况是诸侯追求私利，引起民众争夺，到处造成灾害，强者欺负弱者；从事农业的人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多，到处是游民，人民难以安居乐业。所以，要让全社会的人都能够各尽其职。

诸葛亮. 诸葛亮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0：33.

不过，诸葛亮并不一味地反对手工业和商业，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④蜀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是非常贵重和豪华的奢侈品，魏国和吴国的贵族都非常喜欢。因此，蜀锦是蜀汉与境外通商以增加财政收入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当然，诸葛亮更重视的还是农业。他认为曹丕面对的内外矛盾很多，所以一时无暇顾及蜀汉，这正是蜀汉休养生息的好机会。农业生产发展，人民才能够富裕，才会有钱加强军备。只待曹丕受挫，便可趁机北伐，从而达到用兵而不战，不用劳民便能够定天下。

可是，兴复汉室的政治口号已经失去号召力，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必然失败。因此，诸葛亮的政治态度和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初出茅庐的乐观自信，到最后一次出发北伐时的悲凄苍凉，这种情感与观点的变化，折射出蜀汉命运的由盛转衰。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见了天下三分的局势，制定了“联吴抗曹”政策，然而，没等到“天下有变”，根据地就失去了一半。刘备不甘心蜀汉闭守益州一隅，势必要夺回荆州，诸葛亮何尝不希望如此？但是，刘备兵败夷陵后，蜀汉不但元气大伤，而且永久失去了夺取荆州的机会。

实际上，即使占据荆、益二州，实现诸葛亮的设想也很困难。荆州与益州之间相隔千里，其间大都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贫困地区。从成都到汉中，从汉中到长安，相隔其间的是著名的蜀道，不仅距离遥远，且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923.

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②，刘备嘱咐诸葛亮讨贼，诸葛亮义不容辞。敌强我弱，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不北伐，王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因此，诸葛亮的北伐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军事行动。

诸葛亮每次出征，结果大多是无功而返，主要原因是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粮草供给不上。蜀汉实力弱小，很难对魏国构成威胁，诸葛亮长途远征，魏国将帅只守不攻，以逸待劳，仅长安之兵就足以阻挡进攻。诸葛亮心中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坚持出祁山，在几乎无望的情况下与魏国交战。

诸葛亮最后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为了尽一个托孤老臣的责任，报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晚年的军事行动，既是他实践理想的过程，也是他追求道德境界的过程，更是对他壮志难酬的痛苦心灵最好的自我安慰。然而，无论目的如何崇高，手段如何巧妙，战争必定会给交战双方的人民带来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当“兴复汉室”已经毫无意义时，北伐也越来越具有诸葛亮的个人色彩。这场战争不具备正义性，也就没有了取胜的可能。

04 曹操为什么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119.

据史书记载, 曹操曾经夸赞孙权说“生子当如孙仲谋”^②。那么, 孙权究竟有什么本事, 居然能够赢得曹操如此夸赞? 这还得从孙权的哥哥孙策遇刺说起。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 孙策遇刺伤重, 临终前对张昭等人说: “中原正在大乱之中, 凭我们吴越的兵众, 三江的险固, 足以观其虎斗成败。你们要好好辅佐我弟弟。”然后将孙权叫到跟前, 将印绶交给他, 并且对他说: “率领江东兵众, 决战两阵之间, 横行争衡天下, 你不如我; 但举贤任能, 使其各尽其心, 用以保守江东, 我不如你。”当天晚上, 孙策伤重不治身亡, 享年二十六岁。

孙权继承父兄基业之初, 面临的局面非常困难, 他需要高人辅佐。孙权问鲁肃: “汉王朝处在倾覆的危险之中, 四方各路豪杰纷纷割据。我继承父兄的基业, 希望能够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绩。先生有什么办法帮我完成这一事业?” 鲁肃建议孙权: “占据江东, 成鼎足之势, 以观天下政治局势的变化。北方事变多, 局势复杂, 要乘此机会, 消灭黄祖, 进攻刘表, 溯江而上控制整个长江流域, 然后登基称帝, 进而统一天下, 建立与汉高祖一样的伟业。”

鲁肃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取天下的设想, 与诸葛亮《隆中对》的估计和取天下的设想, 是英雄所见略同——都是先三分天下再统一。然而, 其中的不同也非常明显。诸葛亮要结好孙权, 先抗曹操, 则霸业可立, 汉室可兴; 鲁肃则是先占长江流域, 登基称帝, 然后统一天下。显然, 荆州成为吴蜀两家必争之地, 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鲁肃的一番话打动了孙权, 因此孙权对鲁肃非常器重, 将其视为知己。鲁肃的建议对孙权完成统一大业的步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东吴君臣心目中, 目标不是割据江东, 就是一统天下建立帝业, 根本没有“兴复汉室”的追求, 吴蜀之间的政治理念差异明显。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118.

曹操拿下荆州, 长江天险与孙权共有。于是他借着荆州之胜的余威, 继续挥师南下, 沿江布阵, 准备一举拿下东吴。大战之前, 曹操致书孙权: “近者奉辞伐罪, 旄麾南指, 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 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③孙权接

到曹操的信之后，召集部下开会，讨论对策。大军压境，东吴将士个个感到恐惧，几乎所有人都主张投降曹操。

鲁肃对孙权说：众人的观点只能耽误大事，这些人不可共图大业。谁都可以降曹，唯独您不能。我鲁肃如果降曹，他会给我封官，官阶不会低于东吴；您如果投降曹操，地位如何处置呢？孙权觉得还是鲁肃了解自己的心意。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1.

就在这个时候，周瑜从训练水师的基地赶来，一见孙权立刻表明态度：“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②并且列举了曹操必败，东吴必胜的几个理由：其一，北方并未统一而且很不平安，西北的马超、韩遂都是曹操的后患；其二，曹军善于陆战，东吴军队擅长水战，曹操伐吴是舍其长而就其短；其三，当时天气寒冷，战马已无草料，北方士兵不习水土，必然生病。曹操不顾一切冒险而来，犯了兵家之大忌。

孙权听了周瑜的话之后说：“我和曹操老贼，势不两立。君一席话与我的意思完全一致，真是上天授君于我啊！”有了鲁肃、周瑜的支持，孙权更有信心，所以他才会抽刀砍断案桌一角说：“谁再敢建议降曹，与此案相同。”

决心虽然已下，但毕竟敌强我弱，为了保证立于不败之地，东吴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曹。于是孙权接受鲁肃的建议，与刘备联合。此时的刘备由于曹操占领荆州，无处立足，只能退到夏口。他采纳诸葛亮的意见，决定联吴抗曹。孙刘两家之间虽然埋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此时刘备力量较弱，所以矛盾还没有展现出来。大敌当前，两家只能走到一起。

曹操在平定北方的过程中，以及在恢复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确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超人的才能，他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是在挥师南下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孙权与刘备。三人的抱负是一样的——统一中国，并且都认为这个历史任务应该由自己来完成，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孙权与刘备，以及他们的谋臣周瑜、鲁肃和诸葛亮，结成统一战线，共同阻止曹操统一全国的进程。

全国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因为真正的统一意味着和平与安定。但是，统一大业由谁来完成，历史又充满了偶然。曹操、孙权、刘备，三人都认为自己上代表天意，下顺从民心，都在为完成统一大业而努力。三种力量都有其合理性，冲撞在一起，互不相让，成鼎足之势。虽然他们的追求和理想与历史趋势一致，但是他们之间却无法调和地发生冲突。三种都具有合理性的力量发生冲突，历史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三足鼎立之势形成，其中曹操最强，刘备最弱。与曹操抗衡的主要是孙权，地域上也是孙权和曹操为邻，刘备处在孙权的附庸地位。力量与实际地位的差异，导致孙刘两家对彼此关系的定位不同。刘备认为自己是“联吴抗曹”，两家地位平等；孙权则认为刘备兵败荆州后无处安身，前来投奔，是东吴的臣属。

曹操遭受赤壁之败后，一时无法对东吴构成威胁，益州牧刘璋内外交困。周瑜认为伐蜀时机已到，所以向孙权请命：进攻益州，然后占据汉中，进而与西北马超结成联盟，待控制了益州与西北之后再进攻曹操，就可统一中原。孙权同意了周瑜的建议，并派周瑜率水军往夏口。刘备立刻派关羽屯江陵，张飞守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刘备自己驻守孱陵，完全控制入蜀通道，不许周瑜的军队通过，孙权只好将周瑜召回。不久，周瑜因病去世，此计划暂时搁置。

可是不久，刘备却发兵占领了益州，孙刘两家的矛盾因此激化。孙权令诸葛瑾索要荆州诸郡，刘备当然不答应。孙权随即给江南三郡安置长吏，均被关羽赶走。孙权大怒，派遣吕蒙等带两万多兵马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同时又派鲁肃率万人屯巴丘以抵御关羽，孙权亲驻陆口指挥。孙刘两家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这个时候，曹操派兵攻占了汉中。刘备怕失去益州，因此派使求和，并且做出重大让步。孙刘两家重修旧好，再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两家以湘江为界，暂时解决了荆州之争。

鲁肃死后，孙权问吕蒙：“是先袭取徐州，还是先攻打关羽？”吕蒙说：“徐州与河北之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即使派七八万人，也不一定守得住。不如攻打关羽占领整个长江，形势会更加利于东吴。”孙权表示赞同，让吕蒙接替鲁肃的职务。孙权想用和亲的方法，智取荆州，但是遭到关羽的拒绝。孙权大怒，下决心武力偷袭荆州。为达此目的，必须防止曹操进攻，于是孙权派人向曹操请降。曹操接受了孙权的投降。为了既得利益，孙权不惜向往日的死敌投降。而东吴政治态度的转变，狂傲的关羽毫无察觉。

不仅如此，关羽还发兵北上攻打襄阳。虽然初战取胜，却未能占领襄阳城，反而给孙权提供了战机。孙权立刻写信给曹操，要求出兵讨伐关羽，以报效丞相。曹操乐于看到孙刘两家开战，坐收渔翁之利，因此让徐晃（一说曹仁）将孙权的书信用弩射给关羽看。正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吕蒙白衣渡江，袭取公安，俘获将军士仁；进攻南郡，麋芳投降。同时，陆逊领兵控制长江峡口，切断了荆州与巴蜀的联系。关羽退还当阳，败走麦城，被俘拒降，父子被杀。于是孙权占领荆州全境。

刘备之后亲自率大军进攻东吴时，孙权派使者到蜀汉求和，其理由的确冠冕堂皇：“关羽与先帝之间，谁更亲？个人恩怨与国家兴亡，哪个更重要？争夺荆州

与恢复汉室，何者事更大？都是报仇之事，孰先孰后？”将这番话与孙权夺取荆州的行为相比较，就可以深切感受到以孙权为代表的东吴统治集团的政治特征。总之，东吴孙权集团以保全江东基业为目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对敌人称臣，对盟友背后捅刀。即使如此，孙权的能力是不容否认的，这也正是曹操夸赞“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原因。

05 三国归晋的原因是什么

公元263年，魏军攻入成都，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公元265年，司马炎逼迫曹奂禅让，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晋，魏国灭亡；公元280年，晋灭掉吴国，天下一统，史称“三国归晋”。魏、蜀、吴三国都想一统天下，为什么三国都灭亡了，最终的统一大业是由司马氏完成的？这还得从曹丕称帝说起。

曹丕以“禅让”的方式迫使汉献帝退位，建立魏国，自己做了皇帝。曹丕国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文治国。比如，曹丕在称帝的第二年下诏：将孔子尊为大圣之才，认为他具有帝王的品性与能力，诏令鲁郡重修孔庙。黄初五年（224年），曹丕又诏令限制祭祀对象，最大的礼是祭祀天地，其次是自己祖先的宗庙；其他的对象，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名山大川，都不在祭祀的对象之列；胆敢设置非祀之祭、传播巫祝之言的人，统统以左道治罪，依律惩处。同年立太学，以五经为讲授和考试内容，并且设置《春秋穀梁》博士，组织儒生，编纂经学著作大全。

黄初二年（221年）八月，孙权遣使称臣，朝臣皆贺，唯刘晔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应该出动大军，直接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击其内，吴国必亡；吴国亡则蜀国势孤，不能久存。曹丕认为，别人称臣而降再去讨伐，会使其他归降者不敢来，不如接受吴国的投降，从背后袭击蜀国。刘晔认为，蜀国远而吴国近，一旦得知魏国讨伐它必会退兵；刘备是因愤怒而兴兵击吴，得知我们伐吴，自然认为吴国必亡，从而愿意进攻吴国并与我争割吴国的领土。但是曹丕不听刘晔的意见，决定接受孙权的投降。

从战略上考虑，曹丕错失良机，是军事决策失误，但是这与他的治国方略并不矛盾。可见以文治国，在三国鼎立初期是不合时宜的。虽然魏国内部政治局势基本安定，但是全国没有统一，曹丕因自己的理想是以德治国，满足于孙权的归降称臣，以为是自己恩德的感化，导致统一大业再一次推迟。

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曹丕实行重文尊儒的国策，选择人才的标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恢复汉代的举孝廉制度。人才标准除了忠信，还要精通经学，熟悉文法。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政治传统得到恢复。

确定了新的人才标准之后，还得有人进行评价，并且将评价过程制度化。具体做法是：中央政府选择贤而有识鉴力的官员，按其籍贯兼任“中正”，负责察访各处的士人，根据家世和行状定品，用“九品”评定其等级。这就是“九品中正制”。曹丕通过这种制度，承认士族有做官特权，并且在经济上予以优待。因

此，他获得了士族的拥护，士族中的拥汉派消失了，他也得以废汉帝名号，建立魏朝。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和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士族的力量日渐强大。

由于郡县的中正多由士族成员担任，因此评价与品定人才的权力逐渐为士族所垄断，品评的标准也由德、才、出身，逐渐转化为不论德、才，只看出身。士族不但垄断了评价权，也垄断了上品地位，从而垄断了士人升迁晋爵的道路。魏朝的政权实际上成为士族的政权。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从而使东汉时期以来外戚、宦官、士族三个集团的争斗，在魏朝终于确定了士族是最后的胜利者。

朝廷的士族与地方豪强结合，逐渐形成士族豪强。他们不但与朝廷分庭抗礼，而且把持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人才选拔权，进一步加强了地方豪强的政治势力。东汉末年的一些现象再度出现，只是没有了外戚与宦官，只剩皇权与士族豪强的斗争。正是强大的世家豪强阶级，成为司马氏夺取政权的社会基础。

世家豪强坐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曹丕对皇室宗亲的态度。曹丕称帝以后对宗室颇多猜忌，同姓王公很难自处。魏国的封国徒有虚名，同姓王公只有名义，实际上根本没有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都难以保障。魏国的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与别人交往。这样做的结果的确消除了同姓王公对曹丕政权的威胁，但是也削弱了曹氏皇族的政治力量，为世家豪强坐大以及日后司马氏夺权铺平了道路。

曹丕如此对待皇室宗亲，本意是防止诸侯割据称霸，但有些矫枉过正。况且魏取汉而代之，是势力使然而不是恩德所致，所以并没能得到全国的接受和认可。在这种情况下，限制自己宗亲王公的力量，同时将重权交给异姓，反而使曹氏政权处在危险之中。显然，魏国的灭亡是由于曹丕自毁基础。

曹叡死后，曹芳即位，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从此，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逐渐激烈，公开的斗争表现为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权力争夺，史称“曹马之争”。一开始，司马氏在政治上并没有占据上风。曹芳罢宫室之役，听从大臣的劝言，表现出努力做一个中兴之主的姿态。

然而，曹氏集团的重要人物曹爽却并没有对自己的骄奢行为做出任何改变，曹氏集团在政治上的低能，更是帮了司马氏的忙。比如，曹爽兄弟几个人经常一起出游，大司农沛国桓范提醒曹爽：“你们是掌管国家大事、统领朝廷禁兵的人，最好不要一同出门。一旦有人将城门关闭，城内没有自己人，你们将无法进城，岂不太危险了？”曹爽说：“谁敢？”可见，这个曹爽不但骄奢无道，而且狂妄愚蠢。

宫廷政治斗争逐渐白热化。先是司马懿杀了曹爽，后来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人，阴谋以太常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事情败露之后，所有参与者都被司马氏诛杀。司马氏以此为借口，废皇后张氏，立王氏为皇后，最后罗列了许多罪名，废掉皇帝曹芳。

曹芳被废后，曹髦即位。曹髦在诏书中号召全体公卿、朝廷重臣、镇守四方的众将士尽忠帝室；又号召曹操时代的重臣子孙，竭力保卫皇家；接着，他阐明了自己对“人君之道”的理解。曹髦想用仁德之治的方式，以慈爱为先，中兴曹氏江山。

曹髦的确想有所作为。他即位后马上宣布减少乘用的车马和各种用具，降低后宫开支，将宫廷和官府中一些百工技巧和靡丽无益之物统统取消。曹髦从节俭做起，试图表现出一个中兴之主的新气象。他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曾经亲临太学，询问诸儒经学问题，目的是通过大兴儒学，达到中兴曹氏江山的目的。

然而，随着司马氏的威势越来越大，曹髦完全被架空，最终被司马氏杀害，年仅二十岁。曹髦的死意味着曹氏集团的彻底失败。虽然曹奂被立，但他只是一个傀儡，作为魏国皇帝的象征，成为司马氏最终以禅让方式夺取帝位的工具。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

能够取代曹氏的司马氏，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作为河内大姓，司马氏世代“伏膺儒教”^①。司马懿值“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②。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儒家传统，是儒者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司马懿是位政治家、军事家，当然也善于权术与阴谋。通过他对一些事物的态度和他的某些施政方针，我们可以把握他的政治理念。而这些政治理念，正是司马氏最终战胜曹氏的依仗。

司马懿主张节用，这对民众有利，所以他很得民心；他也主张减轻百姓徭役，这是儒家仁政的传统，也是获取民心的重要方法。无论他的出发点是狡诈的政治手段，还是真心地以苍生为念，其结果都会减轻对贫苦百姓的压榨剥削，客观效果还是必须承认的。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

在其政治生涯中，司马懿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关心民生。他多次向曹操建议发展生产，开展屯田。这种军垦或军屯的方式虽然不是司马懿首创，但的确是既能解决军粮问题，又能保卫疆土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对这样的建议，曹操当然采纳，“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③。

嘉平四年（252年），关中发生饥馑，司马懿上奏魏帝，建议迁徙冀州的农夫五千人到上邽一带种田；在京兆、天水、南安一带开发盐业，以充实军费。这些建议显示出司马懿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他的这些方法的确对恢复经济、让人民休养生息有很大好处。

农业离不开水，重农业必重兴修水利。司马懿在执政期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魏国的经济实力有着极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司马氏集团赢得了民心。司马氏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农民的休养生息，有助于社会安定，也因此获得了农民的拥护。

曹氏与司马氏的对立和斗争，是东汉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对立与斗争的延续。官渡一战，曹胜袁败，一些士族官僚慑于强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时与曹氏合作，但他们从未放弃过恢复的念头。司马懿比曹操年轻二十四岁，在曹操死后活了三十二年，的确印证了那句俗语：“战胜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比敌人活得久。”司马懿利用曹氏子孙的昏庸无能，奋起反击，逐渐形成政治上的优势；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则继承其父的遗业，终于推翻了曹氏政权，并且取而代之。士族统治在此时达到了东汉以来的全盛时期，并最终一统天下。

06 西晋王朝为何如此短命

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割据并州，称大单于，后改称汉王；四年之后称帝，国号“汉”。公元316年，其子刘聪派兵攻占长安，俘虏了晋愍帝；一年后，晋愍帝被杀，西晋灭亡。西晋仅存五十二年，统一的中华大地就再度陷入分裂与混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西晋王朝会如此短命？这就得从西晋政权的性质说起了。

西晋是门阀士族与皇室联合统治的时代。“门阀士族”是世家大族的政治化和极端发展，皇室就是最大的门阀。晋立国之初，司马氏便着手建立忠于自己的政治结构，大封群臣以结其心，并且以法令的形式肯定并满足门阀士族的经济权益。门阀士族的特权，在政治上的体现是皇权与地方势力的妥协，在经济上的体现是土地国家所有制与贵族官僚大地主占有制的妥协。

早在司马炎代魏之前，司马氏父子便让其亲族子弟出任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的军事最高长官，镇守咽喉地带。西晋建国之初大封诸王，就是这种措施的延续。晋武帝于咸宁二年（276年），以镇东大将军齐王攸为司空，后又封其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以汝南王亮为太尉，太康十年（289年）又封其为大司马、大都督。

在司马炎时期，藩王出镇制度以诏令等形式被确定下来，就是让藩王担任镇守边关的将军。藩王出镇的地方要么是吴、蜀边境，要么是咽喉地带。司马氏本身就是门阀士族，要想巩固其政权，就必须使司马氏的地位凌驾于其他门阀士族之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增强司马氏的力量，使司马氏通过公权力统治其他家族。

古代中国社会特有的行政体系又一次得以实施，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统治者自身强烈的愿望。一方面，统治者希望加强宗室力量来藩屏王室，稳固其政权；另一方面，由于门阀势力强大，司马氏担心政权旁落，所以在拉拢门阀士族的同时大封藩王，以制约其力量。

晋武帝分封亲族为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封的藩王大多无实权，也没有就藩于封国，依然留在京城；第二个阶段，从晋武帝立太子到其晚年，一改藩王空有其名的局面，遣藩王归其封地并努力增大藩王的势力，最终使其独霸一方。

出现这种政治转向，表明晋武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顾虑。一方面，他深知藩王政治对中央朝廷的挑战和威胁；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太子继位之后无法控制门阀士族。于是，晋武帝在确立太子之后，就让藩王就于封国，让其独当一面，想

通过家族的势力稳固司马氏政权。显然，西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就是藩王与门阀士族瓜分中央与地方军政大权的过程。

晋武帝先后一共分封了几十个藩王，并实行移封就镇制度。这使西晋的藩王制度初具雏形。全国统一之后，朝廷在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被废除，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大为削弱；在废除州郡之兵的同时，晋武帝又使藩王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一举措显然失当，晋武帝允许藩王掌管地方各州的军事，企图以藩王之兵稳固司马氏政权，却为藩王割据奠定了军事基础，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祸根。

在经济上，藩王除了分割中央所收赋税的大约三分之一之外，晋武帝晚年的一些举措又进一步强化了藩王的经济实力。因此太康十年（289年）后，藩王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这就为藩王割据奠定了经济基础。

这种把国家政权当作既得利益，在各种势力集团之间进行分割的政治制度，就像强盗劫掠财富之后的分赃，必定因为分配不均而爆发冲突。为了维系司马氏政权的正常运作，晋武帝大封群臣以结其心，这些功臣成为司马氏政治集团的亲信势力；而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集团是门阀士族集团的另外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司马氏的亲信势力与姻亲集团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将门阀制度的腐朽性暴露无遗。

门阀制度腐朽性的另外一大特征是它封闭了低级士族和寒门庶族通向上层的道路。上品士族寄生在朝廷的肌体上，无视国家兴亡，争权夺势，骄奢淫逸，妒贤害正，浮华清谈；而寒门士族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渴望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得不到应得利益的人，特别渴望重新洗牌，不惜打乱秩序。这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西晋朝廷大力扶植藩王势力，使其日益强盛，并与门阀世族形成鼎立之势。这两股势力彼此互不相容，矛盾重重。一方面，藩王得势时，门阀世族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社稷倾危之际，门阀大族绝无休戚与共之心，只想谋取更大利益。总之，藩王与门阀之间的利益不具有兼容性。

虽然藩王与藩王之间有血缘关系，具有藩屏王室共同义务，一旦王室继承人不能承担起治国的重任，藩王便可以主动站出来，弥补君主行政职能方面的不足。但是，藩王势力的发展具有伸缩性和不确定性，一旦权力中心出现真空，藩王的野心就会被激发，反而会成为中央政权最危险的颠覆者。

公元290年，晋武帝驾崩，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外戚杨骏辅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为阻杨骏独揽政权，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入洛阳。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

贾皇后让晋惠帝下诏，宣称杨骏谋反，洛阳全城戒严，要楚王司马玮领军保卫皇宫，围攻杨骏府第。司马玮率军火烧其府第，杨骏逃到府中马厩被杀，后被夷三族，其政治势力被消灭。

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大臣卫瓘共同执掌，楚王司马玮任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贾皇后未能独揽大权，因此极为不满，不久就以晋惠帝的名义下密诏，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了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第二天，贾南风派中将军王宫到司马玮处宣布，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和卫瓘，因此被处死。至此，朝政大权被贾皇后完全掌控，她的亲戚党羽多被委以重任。

贾南风无子却想当皇太后，于是派人将太子司马遹灌醉，然后让他照抄一篇事先写好的文章，呈送给晋惠帝，逼他退位。晋惠帝为此要处死太子，因张华劝阻而未成。于是贾皇后让晋惠帝下诏废除太子，将其囚禁于洛阳郊外金墉城。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与孙秀等人密谋推翻贾皇后，他先劝贾南风杀了太子，然后又伪造晋惠帝的诏书，以杀太子的罪名逮捕贾皇后及其党羽，并且处死了她。

赵王司马伦伪造诏书，自封为相国，从而掌握了朝政大权。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晋惠帝被软禁于金墉城。司马伦称帝之后，齐王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其党羽被消灭。

公元301年4月，司马冏迎接晋惠帝复位，改元永宁。司马冏担任大司马，主理朝政；司马颙、司马颖被封高爵，拥兵自重。司马冏独揽政权后不可一世，没有臣下之礼，俨然自己就是个皇帝，而且沉迷女色，荒废政事，给其他有野心的藩王提供了讨伐的借口。

司马颙首先上表陈述司马冏的罪状，兴兵进攻首都洛阳，声称驻军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为内应。司马冏派兵攻袭司马乂；司马乂率兵奔袭皇宫，号称奉天子的名义攻打司马冏。司马冏战败被杀，两千名党羽被夷灭三族，司马乂独揽大权。

司马颙见朝政被司马乂独揽，心怀不满，多次派人刺杀司马乂，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司马颙令部将张方领兵七万，与司马颖二十多万大军合兵一处，进攻洛阳。晋惠帝下诏，令司马乂为大都督，兴兵迎击。双方连续作战几个月，东海王司马越趁司马乂军队疲惫，勾结禁军将领，在夜里捕获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司马颙，司马乂为颙将张方所杀。

司马颖官拜丞相，司马颙官升太宰。之后，司马颙废皇太子司马覃，以司马颖为皇太弟，丞相位置不变。可是这一举动却引起东海王司马越的不满，他率十多万

士兵，带着晋惠帝讨伐司马颖。司马颖率五万大军击败了司马越，俘虏了晋惠帝，把晋惠帝送到邺城，改年号为建武。

不久后，晋惠帝突然死亡，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晋怀帝一登基就下诏以司马颙为司徒，让他回朝廷。可是在回京城的路，司马颙被南阳王司马模派人掐死在车内。公元307年，晋怀帝改元永嘉，大赦囚犯，废除诛三族之刑。太傅司马越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至此，东海王司马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从公元291年晋武帝驾崩，晋惠帝妻贾后与辅政外戚争权到公元307年晋怀帝即位，动乱历时十六年，主要有八个藩王参与，因此史称“八王之乱”。其间各次战争的性质，不仅是藩王争夺最高权力，也是门阀士族争夺自身利益。诸藩王纷纷欲窃取皇位，相互混战不已，导致国力大衰，北方游牧民族乘虚而入，西晋濒于灭亡。当晋愍帝被俘时，坐镇建康的藩王司马睿与镇守关中的藩王司马保并没有联合起来共赴国难，而是为了做司马氏政权的继承人而明争暗斗，最终错过了收复失地的最后一线机会。西晋王朝随着藩王之间矛盾的终止而覆灭了。

总之，皇室、藩王和门阀士族，这三股势力像强盗瓜分赃物一样对社会公权力进行分割。这种政权从建立之初就既不具备合法性，也不具备合理性，因为它们只代表家族利益。所以，腐败是必然的，迅速灭亡也成了西晋的宿命。

07 淝水之战取胜的是正义方吗

公元383年8月，前秦和东晋之间爆发淝水之战。前秦军队号称一百多万，东晋兵力不到十万，结果前秦大败，东晋大胜。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的战例。那么，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前秦是氐族贵族在长安建立的地方政权。苻坚即位之后，励精图治，使前秦迅速强大起来，很快用战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且将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为达此目的，苻坚采取了三大政策：第一，诛杀顽固保持落后生产方式与文化习俗的豪强贵戚；第二，把大批贵族迁徙到关中就近监视，防止他们进行分裂活动；第三，推行法治，选任廉吏，整顿吏治，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而不用。经过改革和整顿，前秦在政治上安定下来，初步扭转了西晋时期门阀士族垄断地方政治的腐败局面。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7.

在经济方面，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苻坚曾经多次“劝课农桑、有便于俗”^④；为了解决干旱问题，苻坚多次动用国家力量，组织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苻坚还多次下令减轻自耕农的负担，同时颁布抑制商贾的政策，限制他们盘剥农民；并且在朝廷上下提倡节俭，意在减轻农民的负担。

在文化方面，苻坚提倡儒学，广兴学校，恢复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亲临太学，对学生的经学水平进行考核，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他甚至自豪地宣称将在他手中复兴周孔文化，再造两汉盛世。显然，苻坚已经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自居。那么，与之对立的东晋又是什么状态？

西晋灭亡之后，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史称“东晋”。东晋虽然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但与西晋完全不同。东晋政权的最大特征是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与皇室之间的联合，双方共同构成所谓“二元政体”。这样的结构，将北方士族、南方士族和司马氏拢在一起，形成了暂时的平衡和稳定。东晋时期皇族势力较弱，国家基本由世家大族控制，世家大族势力进入鼎盛时期。

然而，东晋的世家大族并没有力量北伐中原，统一天下。从力量对比看，前秦占绝对优势。从制度上比较，前秦采取开明政策，加强中央体制，有望再现“文景之治”；东晋没有了诸王的乱政，世家大族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对中央集权制的挑战，但其自身的腐朽性还没有充分显露。无论是前秦还是东晋，谁也不能代表

政治制度方面的正确或者先进。双方都想统一天下——目标一致，方向相反，双方都对，就看谁不犯错误。

公元382年10月，苻坚召集群臣商议，准备亲自率大军南下灭晋，可是前秦多数大臣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东晋上下同心，政治清明，又有长江天险可恃，非可图之国。前秦应该养兵积谷，静待时机。苻融也认为东晋内部团结，百官用命；而己方连年用兵，士兵疲劳将领倦怠，对敌有忌惮之心，不可伐晋。他指出，鲜卑、羌、羯等族人遍布长安各地，大军南下之后，一旦心腹地区发生变乱，恐将后悔莫及。但是苻坚根本听不进正确意见，坚决要兴兵伐晋。他下令征兵百万，给北方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而失去了人心。从军事战略角度分析，苻坚在战略决策上犯了致命错误。

与之相反，东晋是应战的一方，因此既没有道德负担，也不存在决策失误。同时，东晋的“二元政体”结构决定了东晋王朝的兴衰成败与世家大族自身的家族利益息息相关。所以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是保国，其实是保家。这就使得东晋在士气上又胜出一筹。

苻坚不仅在战略决策上失误，而且在军事部署上也犯了致命错误。比如，苻坚令苻融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令姚萇指挥另一支部队沿长江东下；命幽、冀等州部队由彭城南下；苻坚亲率主力，从长安出发为中路军。三路总兵力达到九十多万人，从东到西绵延一千多里。这样的蛇形长阵，人数再多也很难形成战斗力，徒增后勤补给的压力而已。

更为致命的是，前秦的一百多万大军，基本上是乌合之众，成分太复杂。比如，慕容垂是鲜卑族人，姚萇是羌族人，苻坚则是氏族人。虽然苻坚主张各民族平等相处，但是不同种族的将领与前秦统治者难免离心离德。

前秦虽然来势汹汹，但是长达千里的长蛇阵，使得东晋在部署上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局部优势。东晋集中全国优势兵力与前秦的局部对峙，至少可以形成势均力敌的状态。

东晋的战略方针是扼守长江南岸，阻止前秦军顺流而下，从而在江北牵制前秦军。为完成这一战略目标，东晋武帝司马曜任命桓冲为江州刺史，控制长江中游，阻止前秦军由襄阳南下；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统领八万“北府兵”进赴淮南，沿淮水一线抵御前秦军。所谓“北府兵”，主要由流落南方的北方流民构成。他们是雇佣兵，又经过多年军事训练，因此是一支专业性强、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的部队。

从战术层面分析，东晋方面明显占据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东晋巧妙地使用了心理战。比如，东晋军乘胜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东岸。苻坚等人入城瞭望，见东晋军部伍严整，士气高昂，以为附近的“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因此，苻坚对苻融说：“敌人很强大啊，你怎么说敌军兵力很少呢？”心中始有畏惧之意。

其次，谢玄使用了激将法。东晋军列阵淝水东岸，前秦军在对岸列阵，两军夹淝水对峙，东晋军无法渡河。谢玄派人苻坚传话说：“将军率军深入晋地，沿淝水布阵，这是准备持久作战吗？如果你方稍向后撤，让出一块地方，使东晋军渡过淝水，两军一决胜负，不是很好吗？”

前秦军诸将都认为不能让晋军渡过淝水河。苻坚却自有打算，说：“可以稍退一步，让他渡过淝水。等他人马正在渡河的时候，用骑兵夹击砍杀，一定可以取胜。”于是苻坚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前秦军后撤。这个时候，前秦军队的弱点就充分暴露了出来：本来就缺乏军事素养的乌合之众，一旦后撤，阵脚立刻混乱了起来。

东晋军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攻击。前秦军前阵，降将朱序在军中高声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军后阵将士信以为真，四散奔逃，导致全线崩溃。东晋军乘胜猛追，前秦军人马相踏，昼夜不停地拥挤着往后跑，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是东晋追兵杀到。就这样，几十万前秦军，逃散和被歼灭的占了十之七八。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单枪匹马逃回关中。历时四个月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军胜、前秦军败而告终。

总之，通过分析淝水之战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战略上失误，则战争无法取胜；虽然战略上失误，如果战役部署得当，可以保证不败；如果战略上失误，战役部署亦不得当，但是战术运用上稳妥，可以避免败得不那么惨。可是苻坚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上都犯了错误，因此导致了淝水之战的惨败。淝水之战与其说是东晋胜了，不如说是前秦败了。要想不失败，必须保证绝对不犯错误。

08 北魏孝文帝为什么要实行汉化政策

鲜卑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活跃的民族之一。进入黄河流域之后，该民族先后建立了吐谷浑、前燕、代、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八个政权。魏晋以来，鲜卑人走出东北地区，进入蒙古草原，然后一批又一批地向南和西南迁移。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越淮河，处处都有鲜卑族人的足迹。其中，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且意图统一华夏。

鲜卑族人在统一中国北方之后，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统治，避免像前秦那样，淝水一战失败便土崩瓦解。如何使这个通过军事占领建立起来的政权长期维持下去，并且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北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直接威胁着北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这是一次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面的改革。

北魏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加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从土地所有制、国家赋税制到人身关系的依附性等方面，北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对北魏拓跋氏以及下层民众而言，意义极为深远，为北魏进一步的政治和文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由于长期战乱，人民流徙、死亡，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北魏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初，大规模强制人民迁徙，加之许多土地的主人因犯罪被流配籍没，户绝地荒的现象更加严重。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之后，流亡人户逐渐返回乡里，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自行开垦无主的荒地，豪强地主也乘机侵夺、占有大量土地。由于土地关系紊乱，产权纠纷层出不穷，有的豪强地主宁肯让自己霸占的土地丢荒，也不让农民耕种。一方面，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却有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得不到土地而无处谋生的农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二是啸聚山泽，起义反抗。前者使国家的纳税户口减少，赋税来源受到损害；后者对北魏统治者来说是更严重的威胁。潜在的社会危机迫使北魏政府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缓和社会矛盾。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政府颁布了均田令，以封建国家的名义对土地实行分配和调整。这是一项影响相当深远的重要措施。从北魏开始，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均田制的具体内容虽有若干变化，但封建国家一直沿袭了这项法令，并在我国广大地区不同程度地推行过。作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均田制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至唐中叶才崩溃。

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开垦和耕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这就是均田令的目的与实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均田令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有的地方多少也把一些荒田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均田令对奴隶制的冲击，手工业者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北魏初期，手工业者被控制在官府手中。北魏统治者为了加强这种控制，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下令禁止私家收养金银工匠，又令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必须以其父兄之业为业，不得私立学校授徒，否则授业与开设学校者均满门抄斩。延兴二年（472年），北魏孝文帝下令，商人及各类手工业者，如愿意可以转而从事农业生产。其后有的工匠甚至当上了低级官吏。到了太和十一年（487年），开始允许民间生产各种丝织品。

在生产方式改革取得成就后，北魏统治者着手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封建经济基础。北魏政府首先对其中央和地方的吏制进行重大改革。北魏前期，中央和地方官吏一律不给俸禄。中央官吏可以按等级分享虏获的战利品或受额外赏赐；地方官吏则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在管区内任意搜刮，不受任何限制，所以他们无不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压榨，以增加自己的财产。诸州的军府镇将几乎全是代北地区来的鲜卑人，他们南下的目的就是攫取财富。这种极具劫掠性的政治制度，显然不利于北魏在中原的统治。为了改变状况，太和八年（484年），北魏朝廷正式颁行俸禄制度，官吏按季受禄。俸禄制度实行后，官员贪赃数额满绢一匹，便会被处以极刑，所以其实行多少有助于遏制贪污的风气，从而为其他重要改革的推行创造有利条件。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4393.

中原文化的核心是典章制度、等级秩序。鲜卑部落的族姓本来没有高下之分，官爵也只以武功为准，文成帝后才禁止鲜卑贵族与卑姓通婚，以提高鲜卑贵族的社会地位。鲜卑语是多缀语的，鲜卑人的姓氏也是多缀语的。北魏孝文帝既然禁止使用鲜卑语，自然也要把鲜卑复姓改成汉字单姓。太和二十年（496年），北魏孝文帝下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⑤由此可以看出，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姓，以黄帝后裔自居，因此鲜卑族不再是“五胡”之一，而是中华正统。由此可见，北魏统治者的汉化，完全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

北魏孝文帝在把鲜卑姓氏改为汉姓的基础上，根据汉族的门第高下，把鲜卑的高门列为甲、乙、丙、丁四等，称为“四姓”；规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氏，与汉族的崔、卢、李、郑四大姓门第相当。八姓以外的

贵族也规定了门第，并严格按照门第选拔人才，从而使鲜卑贵族和汉族的世族一样门阀化。北魏孝文帝还选择崔、卢、王、郑等中原大姓和陇西李氏的女子进入后宫，并为五个皇弟分别聘李、郑、卢等姓的女子为王妃；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了汉族高门。通过确立门阀制度和婚姻结合，鲜卑贵族和汉族的地主阶级贵族进一步糅合起来。

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又进行了职官制度和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完全模仿两晋、南朝的官制、军号，同时又加以发展，把过去北魏王朝中部落组织的残余大都废除。至此，北魏政府的组织系统和文武内外职官的名称几乎与两晋、南朝没有区别了。经过这样的官制改革，在孝文帝看来，北魏王朝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继承华夏正朔的正统王朝了。

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同时，北魏统治者又展开了包括语言、姓氏、服饰、信仰等更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北魏初定中原，鲜卑人自然使用本族的语言，军中号令也都用鲜卑语；汉人在北魏朝廷为官也都学习鲜卑语，或置“传译”。但是拓跋部的经济和文化远远落后于汉人，鲜卑族人口也处于少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语言已很难再继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了。所以，他索性下令禁用鲜卑语及其他各族语言，以汉语为北魏唯一通行的语言；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官员说鲜卑话，犯禁者一律降爵黜官。北魏孝文帝还想通过消除鲜卑族和汉族在言语方面的隔阂，逐渐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

鲜卑源自塞外，其俗编发左衽，而传统儒家以“左衽”为亡国的象征，所以改变鲜卑百姓的着装与打扮，自然有缓和民族矛盾的用意。北魏孝文帝要使鲜卑族在外表上也与汉族人一样。他先按照汉魏官服制定北魏官员的五等公服，然后又模仿南朝样式对鲜卑妇女的服饰做了规定。这样做，无非是想通过衣冠礼乐方面的改革，说明北魏王朝是华夏正统文化的合法继承人。而且，北魏孝文帝还规定迁居洛阳的鲜卑族人死后就葬在洛阳，不许归葬平城，并且将南迁鲜卑族人的籍贯也一律改为河南郡洛阳县。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2.

汉化还表现在改变信仰方面。北魏王朝前期保持着一年一度“祠天于西郊”^④的仪式。根据史书记载，整个过程充满着巫覡气氛，属于原始宗教的习俗。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后，废除了西郊祀天的仪式，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仪式。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和神，这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时代，需要很大的决心。北魏统治者既改变祖籍，又改用汉族的祭祀方式和祭祀对象，表明他们已经以汉族的祖先为自己的祖先，以汉族的神灵为自己的神灵，祈求汉族的祖先神灵保护他们的统治，这样的汉化实在够彻底。

第五章 鼎盛与衰亡的转换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随后东魏为北齐所取代，西魏为北周所取代。北周弱于北齐，却最终打败老对手北齐，统一了北方。隋文帝实现南北统一之后，开始对国家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在杨广登基时，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可是隋却二世而亡。李世民通过政变继承帝位，其合法性备受质疑。李世民通过编写和篡改历史为自己进行辩护，同时努力治理好国家，造福天下苍生，以建构其执政的合理性。这样的努力，为大唐王朝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武则天称帝，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唐玄宗对“至道”的追求，迎来了大唐王朝的开元盛世。可是安史之乱后，盛世不再。王朝有如个体生命，有生有死，有盛有衰；旧的时代终结，新的时代孕育；腐败王朝灭亡，新王朝取而代之。然而，在这兴衰演变的过程中，不变的是美好的社会理念，它提供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不变的是天下苍生的福祉，它奠定公权力存在的合理性。王朝政权可更迭，唯此二者为永恒。

01 北周如何后来居上，打败北齐

在北魏分裂之初，西魏明显弱于东魏；西魏变而为北周，东魏变而为北齐后，北周依然弱于北齐。那么，北周是如何后来居上，最终打败自己的老对手北齐的？这还得从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说起。

西魏建国之初，宇文泰手中的兵力在邛山会战中损失惨重。关陇地区的六州鲜卑人数量本来就不多，长期持续的战争使兵员的补充更加困难，宇文泰不得不招募关陇豪右的子弟补充军队，这些新编的军队又都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这样一来，宇文泰的军队中不仅有六州的鲜卑人、鲜卑化的汉人，也有关陇豪右的子弟。两群部族不同、语言不同的士兵在同一支部队里生活和战斗。

宇文泰为了团结这支鲜卑与汉人的混合军团，消除他们的族群成见，从而打造一支新军，便让有功的将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大部落）及九十九姓（大氏族），并赐以三十六国中的一个姓氏，让他们担任该姓的“宗长”，并且记入族谱，表示他们都是鲜卑氏族的嫡系子孙。有的鲜卑复姓已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改为单姓，现在一律恢复原来的复姓；同时，又令鲜卑和汉族将领所统率的士卒，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赐姓作为自己的姓氏，像鲜卑族人一样，以氏族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从而使这支鲜卑人的军队虽有关陇豪右子弟参加，却无法从姓氏上辨别他们的民族差异。

宇文泰企图用古老的氏族关系来组织府兵，搞好将领与士兵间的关系，使他们好像血缘近亲一样并肩作战，以改变士兵的地位，提高府兵的战斗力。可实际上，鲜卑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消亡已久，宇文泰将毫无血缘关系的鲜卑和汉族士兵硬用氏族关系黏合在一起，不可能使府兵真的回到氏族关系中去。但是由于这种府兵多少还带着自由民色彩，因而在六镇兵户看来，府兵的身份地位得到了提高。因此，府兵的战斗力还是有了一定的提升。

由于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令鲜卑部下极为反感，所以宇文泰推行鲜卑化政策消除民族差异，并且试图缓和民族矛盾。一时间，鲜卑语成了北周国语，鲜卑服装又盛行起来。表面看，这是汉化政策的倒退，但实际上却是更加彻底的汉化政策。因为历代北魏统治者的军队以往基本上由鲜卑族人组成，军队将领更是如此。宇文泰吸收关陇豪右汉族人进入他的军队，虽然表面上改为鲜卑复姓，并承认其为鲜卑嫡系，但是他们汉族的血缘和文化并无太大改变。实际结果是将汉族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与鲜卑贵族一样。北魏孝文帝只是采用汉人的礼仪制度，穿汉服，说汉语，娶汉女，用汉族文官，改汉姓，但并不让汉人掌握军事权力，汉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达到与鲜卑人平起平坐的程度。然而宇文泰让汉人改姓鲜卑姓之

后，汉人就能进入军事领导层，掌握了决定国家命脉的实际权力。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最终导致鲜卑族政权逐渐转移到改姓鲜卑姓氏的汉人手里，鲜卑人彻底汉化，最终形成关陇豪强集团。

这是一个代表西魏、北周关陇政权利益的政治集团，不仅包括鲜卑贵族上层，以及关、陇、河东一带的汉人世家大族，且并不排斥山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的联合阵线，如此，才能与雄踞山东一带的高欢和偏安江南的萧衍相抗衡。在关陇豪强统治集团形成之后，宇文泰军团中的高级将领，即府兵统帅部中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与他们的继承人，构成了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在八柱国中，除了宇文泰之外，还有柱国大将军李虎，即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柱国大将军独孤信，其长女是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第四女是李渊的母亲，第七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在十二大将军中，杨忠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可见，周、隋、唐三朝的创业皇帝，都和关陇豪强集团有着血缘上的关系。自周、隋到唐初，其将相大臣也有很多是关陇豪强集团重要成员的后裔。

在关陇地区的汉人地主中，门阀制度的传统势力不如山东地区那样强大。宇文泰任用汉人地主时并不注重他们的家世门第，而是更多地考虑他们的才能和武功。所以，北周官员没有门第家世的“清浊”之分，比起北齐和南朝的萧梁来，政治上要清明很多。这显然也是吸取了北魏孝文帝改革模仿东晋建立门阀制，最终导致社会政治腐败的历史教训。宇文泰从汉与鲜卑两大群体中同时吸取有生命力的资源，为北周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北周的崛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实行均田制，并且与国家赋税政策联系在一起。北周的均田法规定，已娶妻的男子受田一百四十亩，未娶妻的丁男受田一百亩。得到国家给予的土地的同时，每个得到授田的男女也必须承担一定的国家义务。民自十八岁到六十四岁都要缴纳租赋。因此，均田法虽然起到了抑制兼并、打击豪强的作用，却并未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只是将受益者从大地主换成了北周朝廷。官府通过均田令扩大赋税收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依然残酷地剥削着农民。

就这样，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一天天强盛起来，有效地抗击了东魏的进攻和柔然的进犯。553年，宇文泰趁梁朝内乱，蜀中空虚，出兵占领蜀地；第二年夺取江陵，杀梁元帝萧绎，将后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驱使江陵士庶数万人到关中充作奴隶。556年，宇文泰病死，其侄宇文护掌握大权。第二年，宇文护废掉西魏恭帝，立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为帝，由此建立了北周。武成二年（560年），周武帝宇文邕即位。

建德元年（572年），宇文邕杀掉专横跋扈的宇文护，把府兵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后又把府兵的军士改称侍官，表示府兵要从属于皇帝，作为皇帝的侍从，府兵与

柱国的从属关系因而大为削弱。周武帝大量招募汉人农民充当府兵，从而使府兵的鲜卑部落组织形式进一步消亡。他运用外交策略，与突厥和亲，娶突厥可汗的女儿为皇后，与突厥联兵伐北齐。

此外，周武帝还有灭佛之举。北周寺院多达万余所，僧侣人数在百万左右，占编户人口的大约十分之一。僧侣人数越多，政府租税收入越少，农民的赋役负担也就越重。这样下去，必然会激化矛盾，动摇政权的根基。周武帝亲政后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饥荒，政府命令各大寺院，除留下口粮之外，将存粮一律用于放赈救灾。可是僧侣地主不仅不执行政府命令，甚至利用饥谨时机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道宣. 广弘明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3：272a.

当时北周地狭民贫，远不及北齐地广国富，周武帝要统一中原，就必须消灭北齐；而要消灭北齐，就必须富国强兵。于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②，便成为周武帝所采取的政策。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下诏废佛，把各地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院、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充作军费；把近百万僧侣和僧祇户、佛图户编为均田户，作为北周境内生产战线上的重要力量；把适龄的壮丁编入军队，扩大府兵队伍。这种做法在客观上调整了人民的赋税与劳役的负担，就像给压力阀泄气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亲政不到五年，周武帝便出兵灭掉了北齐。

在灭掉北齐之后，周武帝继续执行废佛政策，把北齐僧侣地主的大量财富也全部没收了。整个中原地区，各州郡的寺庙土地、宅舍全部被周武帝赐给王公作为宅第；所辖境内的三百万僧侣，或还俗为编户，或充实军队。北周从此成为当时最为富强昌盛的国家。

灭齐以后，周武帝继续推行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释放奴婢和杂户。早在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就下令把被俘为奴婢的江陵人放免为民；灭北齐后又先后下诏，将东魏、北齐在黄河以南诸州及江陵掠作奴婢的百姓，一律释放为平民。战俘奴隶的放免，标志着鲜卑拓跋氏统治者曾经给北方人民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正在逐渐得到修正。这些经济措施和以上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北周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02 隋炀帝是荒淫无度的昏君吗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55.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64.

骈宇騫，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563-564.

隋文帝实现南北统一后，开始对国家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在隋文帝的经营下，隋炀帝杨广登基时，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史称“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①。用王夫之的话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②甚至有人说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③。如此美好的隋朝，为什么会仅存在三十七年，二世而亡？这得从隋文帝的治国理念说起。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612.

陈立. 公羊义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17：2610.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651.

吴毓江. 墨子校注[M]. 孙启治，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6：110.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71.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37.

随着南陈政权的灭亡，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就此终结，天下重归一统，从此，史书中频繁出现“一统”的概念。比如，“其九年，平陈，天下一统”^④。“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于《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时：“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⑤意思是天下使用统一的纪年。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异常惨烈，诸子百家渴望太平一统。比如，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⑥，墨子主张“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⑦，孟子提倡天下“定于一”^⑧，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⑨。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87.

秦国一扫六合，建立秦朝后，“大一统”成为现实。汉朝结束了秦末的动乱，建立了又一个“海内一统”的王朝。以此为基础，儒家关于“大一统”的理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在不断地丰富。比如，汉武帝说：“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印治。”^⑩显然，“大一统”已经从一种价值观转化为治国的理念、依据和方法。

东汉灭亡，三国鼎立。虽然六十一年之后三国归晋，但是仅十一年后，天下再度陷入大乱。西晋灭亡后，北方混乱不已，时而统一，时而分裂；南方偏安一隅，王朝更迭。从此南北对峙，江山分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大军攻灭陈朝，天下才再度统一。从东汉灭亡到隋朝统一天下，人们经历了将近四百年的乱世，“大一统”的观念成了人们心中的幻梦，仿佛不可能实现。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64.

隋文帝再度一统天下后，二十多年来励精图治，使得国家人口猛增，仓库充实，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这一切，使隋炀帝对“大一统”理念有了新的注解。他说：“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①隋炀帝用“宇宙”替代“天下”或者“四海”，说明隋炀帝追求的“大一统”已经超越天下和四海，要传之万世而不朽。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625.

隋炀帝之所以能够提出超越前人的“宇宙平一”理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自矜才智过人，喜好独断专行，渴望成为千古一帝。隋炀帝说：“天下当谓朕承藉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②意思是，人们都认为我是继承父辈基业，但假如让我与士大夫竞争，我同样能当天子。隋炀帝非常自负，而且向往成为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杰出帝王，甚至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他们。因此，实现“宇宙平一”就成了隋炀帝的毕生追求。

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将自己的政治中心建立在“宇宙中央”。可是，旧都城所在的关中平原物资匮乏，已经对国家稳定 and 未来发展产生了限制。必须寻找新的首都，以适应“宇宙平一”之梦的实现。

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隋炀帝来到洛阳考察。他登上邙山望向洛阳城，深感洛阳特别适合做国都。显然，隋炀帝营建东都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经过对经济、军事、周边环境、交通状况等方面的慎重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洛阳更适合作为统一的隋王朝的都城。从方位上看，它处于帝国的中心位置，可以体现大一统帝国对四方臣民的一视同仁；从交通条件上看，四通八达的洛阳也具有显著优势。

迁都洛阳后，隋炀帝又发动百余万民众，修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有人说杨广修大运河是为了方便自己坐船下扬州猎艳，大运河是其荒淫无度的证据，但这并不符合史实。其实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有四个目的：其一，为战争提供物资补给；其二，连通南北方，以加强统治；其三，为了方便赋税钱粮运输；其四，为了促进商贸。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南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连通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运河的开通，一方面体现了隋炀帝为实现“宇宙平一”所做的宏观布局和切实努力；另一方面，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域交织，以由南向北的水道，将由西向东的水系连接在一起，从而使中原形成一体，使地理上的统一更加显著和牢固。

隋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家各方面初见安稳，亟须巩固。隋炀帝认为，在此情形下坐在宫殿里听朝臣上奏而不到民间了解子民和国家的情况，是难以维持长久统治的。因此，他计划四方巡历一番。在隋炀帝主政的十四年里，他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巡狩，其中三次北巡，一次西巡河右，三次南巡江都。这些都是有利于巩固国防，实现其“宇宙平一”梦想的战略步骤。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83.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5262.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时，见到当地有蜀布、邛杖，经询问得知是从东南方向的身毒国（即天竺）与蜀地商人贸易所得。这表明西汉时，中国西南地区与天竺已存在民间贸易往来，也说明两国之间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

可是，隋炀帝追求的“宇宙平一”梦想与当时的外部环境格格不入，北方边患一直威胁着隋王朝的安定和统一。隋炀帝主张“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①，想用兴兵镇压的方式改变“四海交争”的局面。他首先对吐谷浑出兵，打通了因战乱而阻断的丝绸之路，开始经营西域。尽管隋炀帝与西域三十多个小国建立了使者往来，恢复了朝贡和贸易联系，但是，“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②。意思是，没能与天竺（今印度和巴基斯坦）^③等国打通来往，依然让他深感遗憾。

大业元年（605年），契丹人骚扰边境。隋代的契丹比较弱小，需要寻找强大的靠山，因此它时而投靠突厥，时而依附高句丽，时而内附中原王朝。隋炀帝即位不久，契丹进攻营州，被隋军打败。此次冲突重创了契丹诸部落，使他们的实力遭受极大削弱，元气大伤，也埋下了矛盾与仇恨的种子。

隋炀帝向西北开拓疆土的同时，也在向南方发展。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朱宽出使流求国；同年又派常骏等人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一带）。大业六年（610年），派陈棱率兵前往流求国；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到交州（今越南北部）、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等地平定叛乱。

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曾发兵进攻辽西，虽然被击退，但隋军由于进军仓促，粮草不继，损失惨重。高句丽已经展现出想摆脱隋朝管控的“不臣之心”，

必然引致隋文帝兴兵问罪。隋炀帝继位后，高句丽王高元对隋朝的敌意和叛离之心有增无减，隋炀帝觉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于是准备出兵征讨。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17.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23.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17.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结果“食尽师老，转输不继，诸军多败绩，于是班师”^②。两军交战的战场“骸骨相望，遍于原野”^③，战况极其惨烈。次年，隋炀帝再次攻打高句丽，结果以无功而返告终。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第三次征讨高句丽，高句丽虽未被隋军攻破，但也难以再战，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最终高句丽王“遣使乞降”^④，隋炀帝以名义上的胜利者身份班师回朝。

隋朝四征高句丽，其中三次是隋炀帝御驾亲征。这是隋炀帝完成他“宇宙平一”之梦的重要步骤。可是，隋炀帝倾全国之力，不仅没有达到目标，反而使自身实力严重受损，激化了隋朝的内部矛盾，加速了其灭亡。公元611年，黄河发大水，山东、河南四十多郡被淹；再加上辽东战场覆败，死者数十万，因此发生瘟疫。山东的疫情尤其严重，饿殍千里，民不聊生。

在这危难关头，隋炀帝依然进行着各项宏大的工程。他向往秦皇汉武的功业，并且想超越他们，做大有为之君，成就其“宇宙平一”之伟业，在短短十余年内兴起变革无数，东征西讨不休，土木工程不止，意图以自己一生，完成几代贤君都难以完成的“大业”。但是，这些工程不仅在短期内不能见效，而且极大地加重了百姓负担，以至于隋朝完全失去民心。社会局面最终失控，民众揭竿而起，隋朝由此覆灭。

如此看来，唐代的官方史书对隋炀帝的描写显然存在丑化成分，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抹黑前朝是为自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总之，隋朝二世而亡，并不是因为隋炀帝荒淫无度，而是由于他好大喜功。封建统治者清静无为，老百姓或许能安居乐业。遇到好大喜功的封建统治者，百姓则不可能有好日子过。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此理。

03 弑兄篡位的李世民如何获得合法性

权力由谁掌握，权力如何获得，获得之后如何传承，这关乎古代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历史是王朝更迭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其合法性需要具体分析。因此，古代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之君，往往会努力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从而形成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迫使其父唐高祖李渊立他为太子，不久又逼李渊退位，自己继承了帝位。这场夺嫡斗争充满杀戮与血腥，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的名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直接质疑他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为自己辩护成为他即位后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更棘手的是，在为自身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可能会颠覆其父李渊推翻隋朝、建立唐朝的合法性。面对这个矛盾，李世民该怎么办？他的做法是篡改历史。

如今我们看到的官方正史记载里，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首谋，而李渊和李建成等人完全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事实上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出，李渊一直都有问鼎天下的野心，很早就开始筹划反隋的事业。他早已有乘乱起兵的打算，只是担心儿子们没有聚集到一起而已；他不断地招揽豪杰，收买人心，并且授意李建成、李世民暗中交结英雄豪杰，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李世民通过篡改历史，让我们在正史中看到的李渊成了一个毫无主见、懦弱无能的人。

为了对自己取代太子的行动进行辩护，李世民还极力贬低李建成。比如，平定西秦霸王薛举时，李世民率领的军队曾经有过一场败仗。但是，李世民在这场战役中竟然生病了，从而避免了战败的责难，维护了他常胜将军的威信。再比如，平定刘黑闥的时候，李世民的战果并不圆满，导致山东豪杰多次反叛。此时是太子李建成出手，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平定了刘黑闥，而且安抚了当地的人心，山东集团再也没有反叛。显然，李建成并非昏庸无能，他不但具有军事才能，政治才能也高于当时年轻的李世民。但是，这些功劳在史书中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正史记载，李渊对李世民说要立他为太子，封李建成为蜀王。可是从事态的发展看，李渊没有这样做，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打算，所以这很可能是李世民编造的谎言，因为这是李世民夺取皇位的合法性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证据：如果李渊曾答应把皇位传给他，那么李世民继位就不是谋逆，而是符合帝位继承程序的正当行为。至于李建成打算用一匹烈马谋害李世民；让李渊的妃子进谗言诬陷李世民；李建成请李世民喝酒时在酒中下毒，致使他吐血却未死，这些显然也都是编造的谎言。

对于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史书的描述营造出李世民委曲求全、李建成咄咄逼人的气氛。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李元吉谋划调出秦王府的精兵骁将，准备借出兵突厥之际削弱李世民的势力。从这些记载来看，显然李建成、李元吉已经有了杀李世民的行动方案，而且计划周详，如果李世民坐以待毙，那么终将被杀。万幸的是，李世民安插在太子府上的间谍告知了对方的行动计划，所以他为了自保，决定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伏，一举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因此，玄武门之变不是太子之位的争夺，而是李建成不仁在先，李世民为了自保，不得不出此下策。

就这样，玄武门之变被书写成李世民为了自保而采取的正义性反击。看起来李世民好像从未主动争取过太子之位，而是一直被李建成等人逼迫，不断受到栽赃陷害。通过对太子储位之争、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改写，李世民将自己塑造成深明大义、不断被兄弟陷害的仁人君子，李建成则成了卑鄙无耻、不讲兄弟情义的小人。

在篡改历史的基础上，李世民进一步制造舆论，具体方法就是在凌烟阁内绘制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在唐朝人心目中，凌烟阁是纪念大唐王朝建立不世功勋的名臣猛将的地方，臣子能在凌烟阁图像留名，可以说是荣耀之至，能够流芳百世。士人对凌烟阁的功臣仰慕崇拜，除了英雄主义情结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向往功臣们获得的优厚封赏。

那么，什么人可以进入功臣的行列，荣登凌烟阁呢？标准当然由李世民来定。我们通过凌烟阁内二十四位功臣的名单，就完全可以明白，李世民在凌烟阁表彰的人物，基本上是玄武门之变的功臣，而非大唐王朝的开国功臣。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开国功臣，只是一种掩饰和政治点缀。

比如在凌烟阁中排名第八位的李靖，以及排名仅第二十三位的李勣。二人虽然功勋盖世，却并非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如果不将他们排进功臣的序列，难免遭天下人的非议，但是又不希望二人遮盖玄武门之变功臣的光芒，因此李世民采取了抑制措施，将他们的名次排后，既照顾开国功臣集团和军方势力的情绪，又没有遮盖玄武门功臣的光芒。

李世民需要树立玄武门之变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做得太明显，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他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法，巧妙地将玄武门之变的功臣替换成开国功臣和治国功臣。李世民对凌烟阁功臣形象的构建是成功的，从此，人们对他们充满了仰慕和向往之情。

大量的诗歌可以证明，唐朝人以为自己仰慕的是建立大唐的功臣，其实这种观念是在李世民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原本应该仰慕的对象，被偷换成了玄

武门之变中的功臣。他们无形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就是大唐王朝的开国功臣。这也消解了玄武门之变的不合法性。

对前朝历史的总结和批判，往往由开国之君来完成，但是李渊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只能由李世民来完成。在李世民的引导下，史书对隋炀帝的形象进行抹黑，构建其亡国之君、暴君的形象。正史、野史、唐人笔记小说加上诗词歌赋，不断地层层渲染，终于塑造出一个荒淫无道、贪图安逸享乐的无道昏君形象。

隋炀帝在位时做了很多事情，可是这些事在后世的史书中，却都成了他荒淫无道、劳民伤财的罪行。比如，史书指责隋炀帝荒淫无道、奢侈糜烂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他三下江南。其实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是为了安抚江南的反对势力，联系自己昔日的部下，并对佛教采取怀柔政策，以便利用其稳定统治，目的是增强自己在帝国范围内的统治权威；第二次下江南是为征伐高句丽，征集战争物资；第三次是因为中原烽烟四起，统治岌岌可危，而江都统治稳固，他为了躲避叛乱而前往。

指责隋炀帝荒淫无道的第二个理由，是他三征高句丽耗费民力，使得国力空虚，成为隋朝灭亡的导火索。可是在隋炀帝之前有隋文帝征高句丽，之后有唐太宗、唐高宗征高句丽。直到唐高宗灭掉百济、高句丽，此事才告一段落。为什么隋炀帝征高句丽就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呢？

其实，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之后，洛阳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突厥、吐谷浑已经臣服于隋政权，隋帝国西北边防的压力得到减轻，边防重心因此从西北向东北转移。高句丽一直占据着中国的辽东地区，注定了中原王朝与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高句丽不断侵扰隋朝的东北地区，严重危害东北地区的边防安全。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句丽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被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突厥、吐谷浑等族的臣服，使得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减轻。这些情况，标志着对高句丽发起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因此，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是为了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军事行动，不是好大喜功，也不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李世民通过对隋炀帝历史形象的重新构建和抹黑，标榜自己的统治是“仁政”，认定隋炀帝所行是“暴政”。他企图通过批判隋炀帝，确保自身帝位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

总之，通过修改历史和控制舆论，李世民被塑造成开国之君加建国之君，李唐王朝的合法性与玄武门之变的合法性，最终完全统一。李世民的 effort 成功了。

04 唐太宗如何建构其执政的合理性

社会公权力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古代王朝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利益集中在君王所代表的统治集团。而统治者想要自己统治下的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努力建构其执政的合理性，也就是为民造福以赢得民心，这是王朝走向鼎盛的基本前提，也是王朝长治久安的基础。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的过程存在争议，他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以及编写和篡改历史，为自己辩护，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其杀害兄长、逼父退位、篡夺皇位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李世民自己也缺乏自信。怎样才能让这个皇帝当得心安理得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进行得位合法性辩护的同时，努力建构执政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治理好国家，造福天下苍生，让世人和历史接受你，觉得你继承皇位理所应当。那么，李世民在位期间为建构执政的合理性都做了哪些努力？

当上皇帝后，李世内心充满不自信，除了他弑兄篡位的继承方式遭受诟病外，他更担心李氏家族建立的大唐王朝江山不稳固，因为李世民曾目睹隋朝这样强大的帝国轰然倒塌的全过程，对隋末农民战争的破坏力和中原内战的惨烈心有余悸。他最担心的，就是唐朝也会像隋朝那样二世而亡，因为他自己也是“二世”，而且上位方式并不光彩。这种双重的不自信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使李世民不断反思隋亡的教训，寻求能够长久稳固李唐江山的方法。这种努力与他建构执政合理性的目标完全一致。

骈宇騫，译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261.

骈宇騫，译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523.

唐太宗在分析隋亡之教训时，谈到隋的灭亡就是不行仁义的结果，并得出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仁义的结论。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唐太宗所理解的仁义。比如，唐太宗经常教育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①这就是“以民为本”^②的治国理念，其基础是对百姓心存敬畏，所以君王的行为要有底线，要顾及百姓的切身利益，否则政权就会被颠覆。

骈宇騫，译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315.

理念无论怎样美好，如果不落实在制度和操作方法上，就只能沦为空想。那么，李世民这种“抚之以仁义”^③的治国理念，又是如何转化为制度和方法，在现实

生活中加以落实的？

第一，颁布均田令。朝廷通过均田令，分给百姓一定的土地，在法律上承认百姓拥有土地的合法性，由此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均田制能够抑制土地兼并行为，让百姓可以保有土地，不至于成为失地流民或豪强附庸。因而均田制的推行，对唐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60.

第二，努力增加人口。隋末战乱不断，人口损失非常严重。唐太宗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努力增加人口。他具体采取了如下措施：其一，尽力召回流入或被掠入边疆地区的汉人；其二，奖励婚嫁，鼓励丧偶的成年男女再婚；其三，鼓励生育。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妇人正月以来生男、粟一石。”^①

第三，劝课农桑。贞观三年正月癸亥日，唐太宗举行“藉田”之礼。所谓“藉田”之礼，就是皇帝亲自参与农业生产，虽然形式上类似一种表演，却寓意不凡，是古代十分重要的礼仪。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藉田”之礼曾遭废弃。到了汉代时，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恢复“藉田”之礼。唐初以前是群雄分裂的战乱时代，“藉田”之礼又被废弃了数百年。到唐太宗在位时恢复“藉田”之礼，一来表明局势平稳下来，二来更表达了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第四，设置义仓。贞观二年（628年）春，唐太宗批准了设立义仓的建议。所谓“义仓”，是朝廷为备荒救灾设置的一种具有扶贫性质的机构，一旦遇到灾荒便可以开仓赈济，对帮助百姓渡过灾荒、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兴修水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年间全国各地兴修的渠道、塘堰有二三十处。唐太宗不仅鼓励兴修水利工程，还专门在朝廷的工部设立水部郎中和员外郎，负责全国的水利工程之事。相关法律《水部式》也由此出现，以保障水利设施的合理使用。唐太宗对水利工程的重视，为贞观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六，租庸调制。“租”指每丁每年要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指每丁每年缴纳绢二丈，绵三两；不产绢绵的地方，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指每丁每年要为官府无偿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两天；不愿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替。如果当年遭受自然灾害，可根据灾情轻重减免。租庸调制的实行，使农民可以输庸代役，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036.

第七，轻徭薄赋。唐太宗多次下诏减免赋税。比如贞观元年（627年），“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④。贞观三年（629年），免关中两年的租税。唐太宗以隋为鉴，知道徭役过重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他通过《擅兴律》约束地方官员：地方官员若擅征徭役十人以上，按贪赃罪论处。

降低百姓负担的根本是统治者要降低自己的欲望，减少财政花销。对此唐太宗非常清楚，社会治乱、国家安定与否，关键在于君主能否控制自己的欲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骈宇騫，译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29.

骈宇騫，译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522.

唐太宗认为，君主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⑤。贞观二年（628年），京师地区大旱，接着蝗灾又起。有一天，唐太宗在院子里散步，见蝗虫飞落，抓住几只痛恨地骂道：“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说着就把手中的蝗虫往嘴里塞，左右连忙阻拦道：“恐成疾，不可。”唐太宗说：“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⑥话音未落便将手中的蝗虫吞进肚里。皇帝吞蝗虫固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毕竟显示出唐太宗的决心。

骈宇騫，译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366.

由于强调仁义，唐初法律制度的建设深受儒家理念的影响。比如《贞观律》就以儒家德主刑辅的教化思想为准则，以“专尚仁义”“慎刑恤典”^⑦为指导思想。《贞观律》为唐代法律定了儒家德治、教化的基调，推进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蔡沈. 书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8：189.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79.

刘俊文. 唐律疏议笺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6：466.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536.

儒家仁政与德治教化思想，成为唐代法律修订的主导观念。如《贞观律》减少了酷刑数量，废除斩趾酷刑，缩小族刑和连坐的范围，充分体现了儒家“明德慎罚”^⑧的思想。《贞观律》还主张“一准乎礼”^⑨，强调礼法合一，甚至以礼为立法原则。比如，“同居相为隐”^⑩的规定，源自儒家“父子相隐”的法律观念。《论语》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⑪由此出发，《贞观律》作了“同居相为隐”的规定，意思是同财共居者及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如果犯了罪，可以相互容隐，不追究或减轻其为之包庇的法律责任。

因为以礼作为法的基础，必然推导出仁本刑末的结论。因此唐律将过去判死刑的某些罪行，改为加役流（即在流放的基础上增加两年的服役时间）；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立了五刑、十恶、八议等封建刑法的基本制度。《贞观律》中的刑罚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死刑只分绞、斩二条，废除了腰斩、弃首、夷三族等酷刑。《贞观律》对死刑的执行也十分审慎，死刑复核成为唐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些都是唐初行仁政的体现，为其政权的合理性增色不少。

建构政权合理性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传承中华文化。因此，唐太宗特别重视文化建设。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采纳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以孔子为先圣，专门设置孔子庙堂，并下令各州县都设孔子庙。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殿庙，并专门调拨二十户人家维持其供家。

崇儒便会重视经学，增加王朝的合理性，也加强对思想界的意识形态控制。贞观二年，唐太宗设立国子监，负责管理国家的教育事业；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命颜师古考订五经。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觉得儒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于是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同著名学者贾公彦等人，编撰《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年），《五经义训》完成，后改名《五经正义》，成为一部汇集经典、统一注疏的经学巨著，无论对唐代还是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教育各级官僚子弟。同时还另外设立弘文馆、崇文馆，吸收皇亲国戚和京官三品以上子弟入学；在地方设立京都学及府、州、县学，大力推行儒学教育。

总之，唐太宗在位期间，努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保持头脑清醒，控制自己的欲望；降低赋税、徭役，减轻百姓负担；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促进生产，抵御自然灾害，造福人民；在政治上，以礼为立法原则去制定律法，为政清明，官吏廉洁。这些都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贞观之治成为人们长期传颂的历史佳话。尽管唐朝的建立与李世民获得皇位的方式都不合法，却并不妨碍他通过对国家的治理，向世人及后世证明其执政的合理性。

05 在男权社会，武则天如何成为一代帝王

武则天的墓前有一座“无字碑”。人们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武则天觉得自己功劳太大，文字无法表达，所以干脆不刻字；也有人认为，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还是不写碑文为好；还有人认为，武则天的意思是功过是非任凭后人评说。可是，我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成立。为什么呢？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武则天的“无字碑”，碑上虽然没有字，为镌刻碑文而打好的格子却清晰可见。显然，此碑在制作之初是准备镌刻碑文的，而且格子的密度表明，碑文是有准确字数的。那么，为什么碑上最终没留下碑文？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还得从武则天萌发称帝想法并准备实行说起。

武则天要想称帝并改朝换代，必将面对很大的阻力：其一，她是女性，在男权社会称帝，其合法性必然受到质疑；其二，她是李唐家族的媳妇，称帝这种谋反之举更难具有合法性。那么，武则天怎么办呢？

首先，她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编造神话和祥瑞，以表现天意。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认为有德之君要出现，上天就会降祥瑞预示。武则天称帝面临的最大的合法性挑战是她的性别——一个女人要在男权社会成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得到上天的授命。于是，民间开始出现大量的凤凰形象，以昭示女主当国的祥瑞。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524.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在自己的姓氏上做文章，于是，民间就出现了“当有女武王者”^①的谶言，意思是将来会有一个姓武的女主取代李唐江山。武则天在世人心目中树立起了“武氏当国”的政治合法性，成功地打击了“李氏当兴”谶言，消解了李唐皇室的政治权威，使得武氏称帝具有了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为了给自己称帝的合法性提供辩护，武则天下令修筑明堂。所谓“明堂”，是人间帝王与上天沟通的途径。可是历代儒家学者对于明堂的形制如何，并无定论。人们不知道明堂究竟长什么样，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留存。但是无论怎么争论，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只有伟大的君王才能建设明堂。武则天此举意在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她就是一代伟大的帝王，绝不逊于任何男性皇帝。

李唐家族推崇道教，视自己为太上老君的后人，将李唐家族的正统性抬到无上的地位，以树立自身的宗教权威性和政治合法性，道教也成了唐朝的国教。武则天

为了从宗教方面消除李唐家族的合法性，将目光投向了佛教，并且在佛教经典《大云经》中找到女人成为国王的传说，为其提供了宗教层面的理论支持。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1.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间，不断有朝廷官员、普通百姓、皇室宗亲、四夷首领、沙门和尚、宫观道士，纷纷向武则天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不久，群臣奏称“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④，意思就是请求武则天称帝。连皇帝李旦自己也请求改姓武。武则天接受请求，于九月九日登上则天门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定都神都（今河南省洛阳市），以长安为陪都。几天之后，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以皇帝李旦为皇嗣，改姓武。改朝换代，登基称帝的目的终于实现了。

武则天以女子的身份当了皇帝，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壮举。武则天将李唐王朝推翻，建立了武氏的周朝，这从传统儒家的立场评价，实属大逆不道。可是，她却坐稳了皇帝的宝座。那么，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那场政治争斗中，表面上看是后宫的权力之争，但实质上是李治借此打击朝廷中的一些老臣，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同时也将关陇豪强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赶出政治舞台。关陇豪强集团自西魏开始形成，后来成为北周、隋及唐初的政治势力，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一个多世纪。他们已经完全沦为固守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将他们赶下政治舞台，实际上是在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当初褚遂良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理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修订的《氏族志》中没有武氏这一支，可见武则天出身不高，难以匹配皇后的尊贵地位。武则天在与高宗共同执政的时候，曾经下诏修订《氏族志》，并将之更名为《姓氏录》，且明确规定官居五品者，都升为士族。在提高庶族官僚地位的同时，此举也打击了旧门阀士族。尤其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的界线逐渐消失，不再泾渭分明。

在打击门阀豪强的同时，武则天还通过各种途径，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她眼光独到，对臣子有包容心，又没有刚愎自用、嫉贤妒能的缺点，因此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例如狄仁杰等著名贤臣，号称“君子满朝”。这些贤臣不仅成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成为玄宗朝“开元之治”的贤臣，比如姚崇、宋璟等。

武则天掌权后，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延揽农学家编撰了《兆人本业记》，将之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此时均田制开始瓦

解，民户逃亡现象越来越普遍。对土地兼并现象和逃亡的农民，武则天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对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武则天在位的十五年中，基本上做到了维护王朝的统一。长寿元年（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军击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管理西突厥故地，使其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巩固了唐廷对西域地区的管辖，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以上这些为政措施，证明武则天是一位明君英主，可以说丝毫不输给前朝任何一位皇帝。武则天作为女皇，对提升女子的社会地位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比如，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李治风疾发作，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于是开始让武则天处理朝政。龙朔元年（661年），武则天请禁止天下妇女为俳優之戏，李治采纳。当时从事俳優行业的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此举显然是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023.

武则天还在高宗上元元年（674年）上表，提出“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④，意思是，父亲在世，母亲去世，儿女也应该为母亲守三年孝。高宗认为武后的建议符合礼仪与人之情，因此予以认可。就“父在为母服丧三年”的礼仪而言，显示了子女对母亲的孝，又体现出男女之间的平等，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有一定突破，然而也一定会引起当时人们的争议。

因此唐玄宗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之后，大臣们对这一有争议的礼仪制度进行了大讨论。然而到这时，这一政策实行已久，历经高宗、武周、中宗、睿宗四朝，到玄宗朝时已经对全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因此即使朝廷上下有争议，但是仍然沿用了父在为母服丧三年的做法。开元二十年（732年），玄宗将这一做法载入《开元礼》，从此这一礼仪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延续。

开元十二年（724年），唐玄宗打算举行封禅仪式，封禅典礼的形式成为时人谈论的焦点。因为武则天在公元666年曾以皇后的身份担任亚献，就是第二主持人，并且率领内外命妇参与封禅的礼仪。武则天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武则天这样做是为了提升妇女的地位；有人认为，武则天这样做是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声望，争取更高的政治权益。但是无论其动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武则天的这两个措施，最终都有利于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可是在唐玄宗时代，大臣们把武后篡唐、韦后作难、太平公主乱政的罪

责，全都归于皇后为亚献、率妇女参与禅礼等行为亵渎了神灵。因此，唐玄宗决定，从此不再让女性参与封禅仪式。

总之，在男权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女人称帝并且改朝换代，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武则天最终没有将皇位传给武氏，太子虽然一度改姓武，后来又恢复李姓，皇位依然由李家血脉传承。这说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强大，武则天最终只能向男权社会妥协。那么，究竟如何评价一代女皇备受争议的一生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无字碑上的格子表明，碑文虽已拟好，却很可能没有得到武则天的认可；即使女皇认可，朝中那些男性大臣也未必赞同。因此女皇一旦驾崩，此碑只能留白。好一个“难以言表”，的确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男尊女卑的社会是不公平的，女性权利是理想社会的必然追求。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男尊女卑现象，武则天作为唯一一个女人当上皇帝的实例，当然可以说是女性崛起的典型表现。武则天执政时期的许多政策，固然是为了获取她个人的权力，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唐朝女性的地位。在她离世后，依然出现了许多参与朝政的政治女性。只是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压力下，她的努力最终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女性权利的获得，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很难将其寄托于某一个历史人物。

06 开元年间称得上大唐盛世吗

提起大唐王朝，中国人总会感到非常自豪，尤其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开元盛世，更是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李隆基刚刚即位的时候，局面可以说是一团糟。从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辟开始，各个利益集团，包括皇室内部和各个大臣集团之间，展开了长达八年的权力争夺。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夺取皇位。直到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玄宗失败为止，前后八年多的时间里，一共发生了七次政变，更换了四个皇帝，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所以李隆基即位之初的确非常艰难，上有太上皇禅位却不肯交权，下有亲姑姑太平公主处处掣肘，且朝中重臣大多数是太平公主的党羽。这是何等险恶的环境。那么，唐玄宗要如何开创开元盛世？这还得从他的治国理念说起。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930.

李隆基在铲除了太平公主的政治集团，稳固了皇权之后，开始抉择用什么思想路线和策略治理百弊待革的唐王朝。经过一番斟酌，玄宗皇帝决定，“依贞观故事”^①，意思是走太宗皇帝治国的路线。如此，才能重树李氏皇权清明执政的良好形象，顺应民心思治的历史潮流。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以宽仁治天下。以仁治天下的根本表现是以民为本，玄宗继承贞观君臣的民本思想，在开元初期的主要表现如下：其一能替百姓着想，爱惜民力，减轻徭役负担；其二关心百姓疾苦，赈恤灾民；其三体恤、照顾鳏寡孤老者。

骈宇騫，译注. 贞观政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479.

第二，继承选贤任能的方法。正所谓“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②。唐玄宗用人首重宰辅，开元初期所任用的宰相如姚崇、宋璟等人，皆是一流的政治家。他还非常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坚持量才授官；推行内外官交流，尤其注意宰相班子的协调合作。

董诰，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5.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26.

第三，提出“至道”理念。早在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唐高祖李渊在诏书中说：“思宏至道。翼宣德化。永言坟素。深存讲习。”^③其第一次提出“至道”概念，却没有说明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唐玄宗登基称帝

时，也说：“七代观德。至道洽于生人。三后在天。世裕光于后嗣。”^②也把“至道”作为理想目标。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7.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06.

按照唐玄宗的解释，自高祖开国以来，有唐六代皇帝都以“至道”作为治国的路线，他也应遵循“至道”治国的政治传统，但此时玄宗对于“至道”的具体内涵，在认识上却是模糊的。他说：“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竦然以听。”^③后来又说：“励精至道。将致俗于仁寿。思纳人于轨训。”^④显然，唐玄宗只是把“至道”作为他治国的理想标准和追求目标。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571.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01.

直到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依然说：“至道无名。”^⑤表明他追求的“至道”理想，无法用语言描述。在以后的诏书中，玄宗皇帝多次表示自己仍处于“懵于至道”^⑥的阶段。可见开元初期，玄宗皇帝仍然处于对“至道”政治理想的思考和探索时期。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0.

直到唐玄宗花数年时间注疏《道德经》，他才最终完成了对“至道”的理解，并期望以此为依据，确定治理国家的目标和大政方针。唐玄宗深刻地认识到《道德经》“蕴至道之精”^⑦，是矫正时弊、治理国家的经典，于是下令向全社会宣传和推广他注释的《道德经》，并且将“至道”的政治理念推向社会，使之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实践并施加影响。那么，玄宗皇帝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381.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381.

首先，提出“家给人足”的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唐玄宗在他注疏的《道德经》中，对“我无事而人自富”^⑧一语解释说：“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人足，故云‘而人自富’也。”^⑨在唐玄宗看来，无事好静是实现民富国治的出发点。因此，行清静无为之政，就能为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8.

那么，如何处理好清静无为的主张与政府发挥功能之间的关系呢？简单地说，就是不干扰百姓正常的生产，同时为百姓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用玄宗皇帝的话说，就是“加意劝课。仍令采访使勾当。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扰”^④。京师督促地方官吏，地方官吏督促农民，不失农时，同时又不随意干扰农事。

为百姓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包括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开元初，鉴于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玄宗非常重视让农民保有可耕种土地的政策。可是，均田制实行的前提是政府手里有大量的无主荒地，然后将之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而到了唐玄宗时期，政府手中已经没有可供均田的土地了。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选择逃亡，怎么办？

于是，朝廷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田括户”的运动——就是对现有土地和农户进行普查登记——随即发现大量的黑户黑田，就将黑户重新入籍，并将查出的黑田按照均田制分给黑户，将闲置的荒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使劳力与土地结合，调动并保护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实现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601.

政府还要帮助农民解决自然灾害问题。比如开元二年（714年）四月十一日，唐玄宗派遣杨虚受往江东道安抚，敕书指出：“近闻雨泽应节。杭稻有望。目前之困，糊口犹切。思从蠲省。用救荒弊。……不急之务。一切除减。观察疾苦。量宜处置。”^⑤这是丰收在望的季节，想的却是准备赈灾。

要想战胜自然灾害，最好的办法是兴修水利。唐玄宗在这方面也有突出表现。总体上看，唐玄宗时期是唐代水利工程兴修最多的时期，重点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唐玄宗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完善了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对调节气候与保持水土起到良好的作用。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826.

要实现“家给人足”的目标，还必须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唐玄宗时期的国家赋税制度：“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⑥“租”是粮食；“役”是劳务；“杂徭”是不定期的外派劳务；“调”则是家庭手工产品，用来弥补粮食与劳务的不足。具体规定如下：每个劳力每年缴二石粮食的租，家庭手工产品不限种类，一丁每年服二十天役。没说每户有多少耕地。这显然是人头税，负担并不轻。唐玄宗在位期间，曾经多次下达敕命，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

进入天宝年间，唐玄宗认为“至道”理想已经实现。天宝七载（748年）五月，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二载（753年）十二月，加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那么，唐玄宗的“至道”理想真的实现了吗？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选官制度。唐初通过设立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然后实行“随才授任”的用人制度，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国用其才、人尽其才。但是一段时间后，还是出现了任人唯亲、朋党相轧的现象。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唐玄宗将科举制的选人和用人两大功能分开，礼部掌管选人权，吏部掌管用人权。这就使各类人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且尽最大可能避免与朝廷大臣结党。

第二，司法制度。唐玄宗执政期间，司法制度相对完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部门组成。大理寺是审判机关；刑部是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则是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并兼有部分司法审判权。重大案件或疑难案件，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各派官员会审，三个部门既相互配合，又彼此制约，以此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唐玄宗组织修撰的《唐六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对封建制度下的行政职能部门与百官活动加以规范和法制化，即使是皇帝的意志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监督机制。唐代的国家监督机构也很完备，由御史台和谏官组成，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违法乱纪的官员，有纠举、弹劾的职责。这一机制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有利于改善和促进吏治清明。

第四，军事制度。开元时期，唐玄宗追求富国强兵，因此对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改革府兵制。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自备武器粮食。但随着唐朝经济发展，均田制逐渐瓦解，府兵的土地保障缺失，生活难以为继；且府兵服役负担沉重，常被官员贵族役使，导致逃亡现象严重，府兵制难以维持。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开始招募壮士充任宿卫，这是正式实行募兵制的开始。以后，募兵制基本取代了府兵制。其二，建立节度使制度。为了加强对边境的管理，唐玄宗在前代周边设防的基础上，至天宝元年（742年）之前陆续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完善了边疆的防卫体系。

第五，文化建设。唐玄宗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许多建设性的举措，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宽松开明的社会环境，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盛唐的文学、宗教与科技有了较大发展；其二，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创作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路吉善，编著. 一张年表读懂世界史[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22：177-178.

总之，唐玄宗首先确立了治理国家的“至道”理念，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规划与政策将理念充实、落地，把大唐王朝治理得井然有序。粮食布帛产量丰富，道路畅通，物价低廉，行旅安全，商业繁盛。当时的国土面积达1076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达8000万。^④实现了他心目中的“至道”，使大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中华历史进程中的鼎盛时期。可是，在这鼎盛繁华的同时，衰败的种子已经埋下。

07 安史之乱的起因是什么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命令部将史思明为先锋，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从范阳出发，打着奉皇帝圣旨讨伐逆臣杨国忠的旗号，一路南下。一场夺取全国最高权力的战争爆发了。由于叛乱的头领是安禄山、史思明，因此史称“安史之乱”。那么，安禄山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叛乱？这还得从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矛盾说起。

安禄山的发迹比杨国忠早得多，杨国忠还没入朝为官时，安禄山就已经是节度使，并且被封为东平郡王了。因此，安禄山根本瞧不起杨国忠。杨国忠见不能制服安禄山，就经常对玄宗皇帝说安禄山要谋反的坏话，想借皇帝的手除掉安禄山。玄宗皇帝开始不予理睬，可是架不住杨国忠总在面前挑唆，因此就按照杨国忠的建议，召安禄山入朝试探。杨国忠对皇帝说，如果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就一定不敢进京。

可是，安禄山却大摇大摆地进了长安城，这让杨国忠傻了眼。心怀造反之心的安禄山怎么敢贸然进京呢？因为他事先得到了杨贵妃的通风报信，知道皇帝是要试探自己，如果不来，自己的心思必然露馅。杨贵妃不帮自己的哥哥却帮安禄山，体现出杨贵妃的愚蠢和安禄山的本事。安禄山居然拜比自己小十六岁的杨贵妃为义母，在她面前做出幼儿般滑稽的举动来讨好她，因此，杨贵妃时时处处为安禄山说好话，还向他透露消息。

安禄山知道皇帝要试探自己，于是将计就计，不但进京，而且极力在玄宗皇帝面前表忠心，最终使皇帝更加信任他，甚至打算让他当宰相。杨国忠立刻劝阻道：“安禄山虽然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么能当宰相呢？这岂不让周边四夷轻视朝廷？”玄宗皇帝只好作罢。安禄山听说这事之后，对杨国忠更是恨之入骨。

杨国忠掌握朝廷大权期间，官吏贪腐，政治黑暗，穷兵黩武，致使民怨沸腾。安禄山找到了起兵造反的借口，于是发动了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实际上想夺取最高权力的叛乱。

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已经有几代人没见过战争了，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都震惊不已。河北是安禄山的统辖范围，叛军所经过的州县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因此，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有人向皇帝奏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却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不愿意相信。

安禄山指挥叛军主力进攻洛阳、潼关，意图直取长安。后来洛阳沦陷，但天险潼关却因为高仙芝、封常清等将领的固守，使得安史叛军久攻不下，甚至有了回撤的打算。高仙芝和封常清采取固守的方法，远道而来的敌军想速战速决，却不得逞。守住潼关，也就有力地护卫了长安。可是一些奸邪小人却在唐玄宗面前说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坏话，诋毁他们与安史叛军勾结，所以迟迟不与叛军正面交战。唐玄宗不经调查，将二人斩首，致使朝廷失去两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将领。

杀了两员干将后，唐玄宗派哥舒翰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当时镇守潼关的军队有二十万。哥舒翰正确判断双方形势，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良策。可是时间一长，唐玄宗对他也失去了耐心，杨国忠鼓动玄宗下旨强迫哥舒翰出战。哥舒翰接到圣旨后知道此战必败，但慑于皇权，不得不带兵出战，果然大败，自己被部下绑赴敌营。哥舒翰兵败后，潼关失守，长安告急，陷入一片混乱。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974.

唐玄宗听从杨国忠的建议，逃出长安城，奔向西蜀（今四川省西部地区）避难。玄宗皇帝一行人来到距长安城百里之遥的马嵬坡（今陕西省兴平市西）时，人困马乏，只好进驿站休息。突然，随行护驾的禁军包围了驿站，士兵们将杨国忠父子杀死。玄宗皇帝拄着拐杖走出驿站，见事已至此，只好说：“众位将士辛苦，你们可以收队了。”可是将士们却一动也不动，皇帝突然失去了权威，只好让太监高力士去问个究竟。禁军统帅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杨贵妃是他的亲妹妹，不宜继续留在皇上身边，“愿陛下割恩正法”^④。皇帝脚步蹒跚地走进驿站，拄着拐杖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这个时候京兆司录韦谔跪下请求道：“如今众怒难犯，这可是决定安危的关键时刻，请陛下速决！”说罢叩头流血。玄宗皇帝说：“贵妃一直住在深宫，怎么可能知道杨国忠造反的阴谋呢？”高力士说：“贵妃虽然无罪，可是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父子，而贵妃每天都在陛下身边，他们怎么可能放心呢？愿陛下认真考虑，将士们安心，陛下才安全啊。”

听了这番话，皇帝终于点了点头。高力士见皇帝同意了，立刻找出一条白绫，来到驿站旁一座佛堂的院子里，将杨贵妃缢死在一棵梨树上。然后，杨贵妃的尸体被抬到驿站庭院，召陈玄礼等将领进来验证。将士们见杨贵妃已死，这才保护玄宗皇帝继续向西蜀行进。

这场历时七年多的战乱，给大唐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整个社会遭受了空前的浩劫。那么，这场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均田制瓦解。均田制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分配后可归农民所自有的称“永业田”，土地在农民本人死后还给官府的称“口分田”。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起到了为民置产的作用，轻徭薄赋的好处能够切实落在农民头上而不被地主截留。可是，这种有益于王朝稳定的土地制度，却在唐玄宗当政的后期开始瓦解。

第二，税赋制崩溃。均田制实施的前提条件是政府掌握大量的土地。唐朝前期，战乱导致人口减少，农民逃亡，形成大量荒芜土地并被政府掌握，成为均田制的基础。随着时间推移，和平日久，人口增长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增加，政府却没有足够的土地给新增人口授田。领田者无法得到足额的土地，直接导致唐代的税赋制度“租庸调”崩溃。百姓缴纳赋税以授田为基础，农民有充足的土地，才能足额缴纳租和调，也才有服庸役的动力。均田制配合租庸调制，使得流民安定，百姓富足，国家财政收入稳定而充足，对社会安定起到了重大作用。所以，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它的崩溃与均田制的瓦解同步发生。

第三，府兵制被破坏。所谓“府兵”就是军府的兵。唐初在各地设立折冲府，负责征兵与训练事宜。根据财产状况，唐朝将户口划分为九等，一般从较富裕的上三等和中三等的民户中挑选府兵，并免除其自身的租庸调。府兵战时从军出征，平时从事生产。府兵制同租庸调制一样，以均田制为基础，以在籍人口为依据。但是当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农民生活贫苦，根本当不起府兵时，府兵制也就逐渐失效了。

第四，节度使权力太大。唐朝初期沿袭北周和隋朝的旧制，在重要的地区设置总管，后改称都督，总揽数州军事。唐玄宗时期，西方、北方边境面临突厥、契丹、奚、吐蕃等的威胁，唐朝要在战略防御中占据主动地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重镇，边关险要常驻数万兵马，既可御敌，又可主动出击；二是集权，重镇长官必须独当一面，拥有调动各方资源的权力，不能受到掣肘。唐朝所设重镇就是藩镇，掌握集权之人就是节度使。

府兵制平衡打破后，只能使用募兵制。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大多是无家无业、无依无靠之人，也包括游牧民族的投降士兵。这些人终身从军并且兄弟父子相继，从而世代处于军旅之中。节度使直接掌握着生杀、赏罚部属的权力，因此士兵对节度使极度忠诚与依赖。于是，国家供养的军队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势力，节度使对一方藩镇的军权有了绝对的控制权。

在掌握军事权力的基础上，节度使逐渐得到地方行政权力。为了解决部队军需补给，朝廷将部队的供给来源改由屯田收入解决，节度使于是掌握了财政大权。除了屯田收入的支配权外，唐玄宗时期又赋予藩镇节度使一定的税收权。

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6-1327.）。后禁军人数虽可能因各种因素有所波动，但总体维持在较高数量，是保卫京师与宫廷的主力。

第五，节度使太多。更严重的是，唐玄宗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拥兵兵力共四十九万，而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⑤，这是典型的“外重内轻”。

由此来看，安史之乱并非偶然的个人恩怨，而是唐代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很难说大唐王朝的衰落是安史之乱导致的，因为王朝的衰落征兆其实早已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显现，安史之乱只是捅破了盛衰之间最后一层窗户纸。

由盛转衰，这是历史变化的规律，但是，什么时候是转折点，鼎盛时期能够持续多久，就很难估计了。因此，盛衰的转化表现出一种偶然和无常。但是，其中的教训和根源还是可以追溯的。简单地说，政治清明，社会公权力保持廉洁，有效管理国家，解决社会矛盾，这是保持一个王朝长盛不衰的根本。

08 唐末削藩为什么最终失败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其子吴元济隐瞒丧事，直接继承了淮西节度使的军政大权。消息传到京城，唐宪宗派使臣前往吊唁，并为吴少阳加官晋爵，可是吴元济拒绝迎接朝廷使臣，同时向四处发兵袭扰，这显然是公开反叛朝廷的表现。那么，吴元济为什么敢于公开起兵造反？这还得从元和年间藩镇割据的状态说起。

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却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因为朝廷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不断增设节度使并加强节度使的权力，以应对战争的需要。安史之乱平定后，由于中央朝廷的力量被削弱，战时授予节度使的权力被固定下来。加上唐德宗处置不当，引发四镇联兵、四王之乱，甚至朱泚、李希烈称帝。最后，唐德宗只好与藩镇妥协，承认河北等地的藩镇割据。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全国各地一共有四十八个藩镇，全国主要的军事力量都掌握在各藩镇的节度使手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藩镇都是地方割据政权。藩镇大致可分为四种：其一，河朔型，节度使或父死子继，或将兵自立，然后由朝廷予以承认；其二，中原型，为应付河朔型藩镇叛乱而设，军事力量最雄厚，财赋不上贡，政治上受中央控制，节度使的任免权在中央；其三，边疆型，分西北和西南两部分，因地域贫瘠，需中央财政补贴经费，政治上不独立，受中央控制；其四，东南型，兵力部署最少，为唐主要财政来源，政治上不独立，完全受中央控制。

四十八个藩镇中，与中央对抗的主要是河朔型与中原型。元和时期，对中央构成威胁的主要有河朔三镇与中原的淮西和淄青。吴元济的父亲就是淮西节度使。面对吴元济造反，朝廷迅速做出决定，于元和九年（814年）十月发兵征讨淮西叛乱。朝廷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发兵征讨淮西叛乱，除了吴元济的公开挑衅，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淮西地处江淮腹心地区，四周都是朝廷可以控制的藩镇，基本处于朝廷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下；其次，朝廷前期的削藩平叛战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一些专横跋扈的藩镇主动归附，增强了中央政权的实力，提升了朝廷的威信和决策者的信心；最后，国库储备充裕，能够为讨伐战争提供足够的物资保证。当然，这一有利局面源自宪宗皇帝的一系列举措。那么，宪宗皇帝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19.

元和初年，朝廷内部就确立了对藩镇势力的强硬态度，对叛乱藩镇坚决予以武力讨伐。唐宪宗自即位之初便“慨然发愤，志平僭叛”^②。纵观唐宪宗的一生，很多言行都表明了他的这种政治抱负。在历次艰苦卓绝的平叛战争中，唐宪宗表现出的坚定不移之决心，可以充分说明他内心最深处的政治诉求和治国理念。

宪宗皇帝一朝的宰相之中，主张武力平叛者始终居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唐宪宗的支持和信任。比如宰相武元衡，旗帜鲜明地主张武力平叛，因力主对淮西用兵而遭到刺杀。不久，另一位主战派官员裴度被擢为宰相，继续执行武元衡武力平淮西的政策，并得到宪宗皇帝的坚决支持。从元和平叛战争整体来看，大部分主持政局的宰相是主战派，这是元和年间宪宗一朝宰相的最大特点。

在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翰林学士和枢密使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安史之乱后，朝廷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因此，翰林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军国重事，宪宗皇帝不和中书门下商议，却与翰林学士讨论，以确保决策具有合理性。比如元和四年（809年），宪宗任用宦官为统帅，征讨成德王承宗，结果被翰林学士阻止，皇帝便只好作罢。

安史之乱后，朝廷失去了对河陇地区的控制权，河朔地区处于割据状态，因此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再加上人口流亡、簿册散失，朝廷已无法按原本的租庸调的方法征税。宰相杨炎于建中元年（780年）全面施行“两税法”，其办法是省去租庸等杂税，改征收地税和户税；征收标准主要根据资产确定，并且分夏、秋两季征税。

与此相对，财政机构也进行了变革，最终形成三个机构：户部、度支和盐铁转运司。户部主管田赋籍簿，度支主管收支，盐铁转运司主掌盐利、江淮海盐和物资的转运。三司相对独立，各有分工。经过此番改革，财政主要来源锁定在两税和盐利上，唐朝的财政收入显著提高。

唐宪宗朝采取武力平叛割据势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外部环境。元和时期，大多数情况下，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处于和平相处的状态。经过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回鹘、南诏与唐王朝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盟友关系；吐蕃在唐德宗后期开始与唐王朝保持和平状态。基于这样的环境，唐宪宗朝可以抽出更多人力、物力进行武力平叛。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353.

在和平时期，藩镇的军队由本地财政供给。但内战爆发时，朝廷军队远远不够，只能征调藩镇军。藩镇军一旦离开本道地界，军事供给就由中央财政提供，这就是所谓的“出界粮饷”。“出界粮饷”要高于常额军费，“士卒出境，则给酒

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②。因此有些部队的将士为了获得高额军饷，故意在境外屯兵。战争结束后，朝廷对军队还另有赏赐，这显然又是一笔巨大的军费开支。

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和“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7647.）。若仅算两税收入，按比例推测，其四分之一大致与七百余万贯相符。

唐宪宗平定淮西耗费军费七百余万贯，相当于当时全国两税收入的四分之一^③，这还不算禁军及其他驻京师军队的经费。如此大的财政开支仅凭国库难以支撑，需要皇帝内库支持，因此唐宪宗有意积累内库，甚至鼓励进奉。然而终其一生，他积累的内库财富主要用于平叛战争，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物质享受。

那么，这些钱是怎么花到战争中去的？唐宪宗朝的军事供给系统由三个部门构成：其一，度支使。根据预算从国库支出财物，内库支援军用的财物先预付于度支使，充入国库再行支出。其二，转运使。战争所需粮草等物资和费用，由转运使送达前线。其三，行营粮料使。直接负责战争期间的行军物资调配，主要负责各藩镇军的“出界粮饷”供给。三者构成一个完善的物流供应链，有效地保障了战争物资的供给。

在削藩战争的过程中，对军事供给的要求是及时，因此，具体部门管理者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宪宗皇帝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亲自过问负责军需供给的官员人选。比如在征讨淮西的战争中，度支使杨於陵由于供给军粮不及时而被贬，后来皇帝便任命善于筹划军费的司农卿皇甫镈担任度支使一职，这也是知人善任的表现。

军需品的物资供应链，在任何时期都是腐败高发区。宪宗皇帝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对贪赃枉法之事，宪宗态度非常严厉。元和五年（810年）讨伐节度使成德的战争中，两任行营粮料使贪腐钱粮总数高达四万一千三百贯。当时朝廷判处二人发配，一个到春州，另一个到封州。但唐宪宗觉得惩处力度不够，在流放的敕书下达之后，仍然派人追到潭州，将二人赐死。

同年六月，御史台查出行营粮料使判官和典吏二人共贪污钱数高达一千万贯。御史台将二人交付京兆府判重杖处死。终元和一代，军需供给系统的贪腐案件极为少见，军需供给系统职能得到了有效发挥。内部制度的完善是战争取胜的内在条件。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瞒丧事，自己掌握军政之权，并且公开兴兵反叛朝廷。朝廷迅速决定对淮西进行讨伐。此次征讨派出了六支军队，近九万人，开辟四个战场，从四个方向进攻。平定了吴元济的叛乱后，朝廷威信大增，借着战争胜利的余威，又展开了对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进攻。朝廷组织了三路大军，对淄青形成了合围之势。在军事压力之下，淄青内部矛盾激化，将领哗变，擒获李师道，淄青的割据被平定。至此，河朔三镇归附，众藩镇纷纷听命于朝廷，元和朝对藩镇的战争获得了全面胜利。

唐宪宗自即位之初就坚定了平定藩镇割据的意志和决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起用坚决主张武力平叛的宰相，聚集有智慧的翰林学士以增加决策的合理性，实行两税法解决财政困难，建立完善的供应链保障战争供给，自己力行俭朴以贴补战争费用，最终平定割据多年的藩镇势力。大唐王朝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

但是，“元和中兴”的局面不过昙花一现。究其原因，藩镇割据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节度使拥有重兵并掌握地方财赋，这导致后来河朔藩镇再度失控。同时，元和时期集中力量用于平叛，也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主战派因排斥朝内温和势力而致使党争出现，宦官权势也有所抬头，这些都对后来的政局造成了不利影响。当唐宪宗去世，朝廷应付藩镇的措施出现问题后，河朔地区的形势首先发生变化，终至藩镇割据死灰复燃。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最后形成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六章 文明与落后的较量

农民起义摧毁了唐朝的统治，中央政权轮番被强势的藩镇操控，五十多年间更迭了五个王朝，中原地区之外又分裂为十个小国。宋朝建立之后，同时面对东北的辽和西北的西夏，形成了又一个更大范围的三国鼎立形势。虽然多次爆发战争，但和平的时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北宋王朝的治理，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政治智慧。

北宋维持了八十年的和平局面被崛起的西夏打破，失败的耻辱唤起了北宋求新求变的改革运动。但是，变法派与保守派掀起了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朝政风气败坏，加之皇帝昏聩无能，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之后，与金国议和，又换来近百年的和平与局部繁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可是，充分发达的两宋文明面对的却是来自东、北、西三个方向的游牧民族政权。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文明与落后较量的历史，最终以宋朝灭亡、元朝建立而告终。然而，文明不会灭亡，只会更坚韧地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和繁衍；经过不断地交流融合，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01 杯酒真能释兵权吗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后周世宗柴荣驾崩，其子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由于后周世宗病重期间曾将一些掌握兵权的将军降职并调出京城，以避免威胁新皇帝的地位，同时赋予宰相范质、副宰相王溥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保护新皇帝的安全，所以新皇帝即位之后，后周朝廷的大权几乎完全被宰相范质控制。就在这个时候，从北方传来消息，辽国与地方割据政权北汉联合，趁后周国丧之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后周岌岌可危。

苏辙在《龙川别志》中提及，王溥早已私下投靠了赵匡胤，因此人们推测，王溥有促使赵匡胤掌握军权以便发动兵变的动机。

面对外敌大军压境的危难形势，宰相范质与副宰相王溥商议对策。在王溥^①的极力推荐之下，宰相范质最终下定决心，让赵匡胤统率殿前司和侍卫司这两支部队，北上抗击辽国和北汉联军的进攻。这使赵匡胤成了禁军的总司令，即后周最精锐的两支部队的总指挥。赵匡胤担任禁军总指挥后，立刻下令殿前司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率领先头部队提前一天出发，北上迎敌。这时，开封城内到处传播这样的消息：“大军出征那天，都点检要当天子。”城中居民听到这样的消息，立刻陷入恐慌之中，纷纷准备外逃。

慕容延钊率领先头部队出发的第二天，赵匡胤率大军出城北上。可是，当大部队刚到距离开封城几十里的陈桥驿时，却停下来不走了。就在大军进驻陈桥驿的当天晚上，赵匡胤麾下的一些士兵和几乎全部军官围在驿站门前，大家一致要求，让赵匡胤当天子，不然就不出兵。这个时候，赵匡胤的二弟赵光义和赵匡胤的心腹幕僚们一起商议决定，并且得到全体军官的一致同意：第二天返回开封，夺取政权。

第二天清晨，将士们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然后跪在地上对赵匡胤行臣子之礼，同时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时候，赵匡胤装着刚从酒醉中清醒，半推半就地穿上手下披在他身上的黄袍。然后对跪成一片的军官们说：必须答应我的条件，否则不当这个皇帝。众将士齐声回答：

“请陛下吩咐。”赵匡胤说：一，不得凌辱后周太后、少帝及公卿大臣；二，不得抢劫市民和政府仓库。将士们齐声高呼“遵命”，赵匡胤这才下令大军返回京城。

这仗还没打，部队却哗变了，赵匡胤不但不平息哗变，反而率领哗变的部队返回京城，难道为了当皇帝，任凭敌军大举进攻不成？其实后人推测，压根儿就没有

辽国和北汉联合进攻这事，这都是赵匡胤派人在京城中散布的谣言，目的就是让朝廷将兵权交给他，并且有理由带领大军离开京城，脱离朝廷的控制。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在众位将士的拥戴之下，赵匡胤黄袍加身，立刻带着他的部队直奔开封城。他要在城内举行登基大典，建立自己的王朝了。

进入开封城后，赵匡胤回到殿前司公署，立刻脱下黄袍，命将士们将宰相范质等人带到公署。范质面对如狼似虎的士兵，毫无惧色地质问赵匡胤：“先帝对待太尉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如今先帝尸骨未寒，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显然，范质根本不承认赵匡胤这位皇帝，仍然用“太尉”称呼赵匡胤，太尉在古代就是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突然大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先帝对我恩重如山啊，可是我被手下的将士们胁迫，我没办法啊！事已至此，我有愧于天地，这可如何是好呢？”

没等赵匡胤的哭声结束，他手下的一名心腹拔出刀威胁范质说：“我们这些人不能没有主公，今天必须确认天子。”范质见大势已去，只好要求赵匡胤必须举行禅让之礼，对待太后要像自己的母亲，对待少主要像自己的儿子，如此才不辜负先帝的旧恩。赵匡胤一一答应。于是，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禅让仪式，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天，也就是公元960年2月4日，赵匡胤宣布改年号为建隆，由于赵匡胤曾经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担任节度使，因此新建立的王朝国号为“宋”，继续以开封府为首都，史称“北宋”。

赵匡胤虽然使用诈术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但是，这次最高权力的更替毕竟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没有流血和战争，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形势、巩固政权的措施。比如，对领兵提前一天北上的殿前司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进行安抚，当慕容延钊表示归顺后，立即晋升他为殿前司都点检；对后周的宰相范质、副宰相王溥继续留用。这对迅速稳定新王朝的局势意义重大，因为各地方政府的官员见新皇帝依然重用前朝老臣，便纷纷表示愿意归顺。

但是，仍然有少数地方节度使对赵匡胤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资历比赵匡胤老得多，因此起兵反抗新政权。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赵匡胤出兵平定了地方节度使的反宋战事，其他心怀不满的节度使也不得不表示忠于宋王朝。

随着地方形势逐渐稳定，赵匡胤对那些帮助他夺取最高权位的亲信将领却开始不放心了。为什么？因为黄袍加身这种事并非赵匡胤的创造，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后汉乾祐三年（950年），澶州发生了兵变，哗变的将士中有人将黄色的战旗撕下来，给将领郭威披在身上，以表示黄袍加身。就这样，郭威取代了后汉，建立了后周，史称“后周太祖”。不过，郭威的黄袍加身是将士的临时

起意，撕黄色战旗以代黄袍；而赵匡胤身上的黄袍是兵变发生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这叫蓄谋已久。

后周太祖郭威和宋太祖赵匡胤能够举行兵变、夺取政权的关键，都是因为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两次兵变的形式极为相似，而且赵匡胤的兵变更成熟，事先更有准备。这让赵匡胤不禁感到惊恐：如果此举成为惯例，那他的皇位也不安全了怎么办？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重演，以保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以兵变夺取政权后，赵匡胤必须解决的问题。

有一天，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等几位参与兵变的功臣，几人正喝得高兴时，赵匡胤令身边的服侍者退下，然后对石守信等将领说：“如果不是诸位鼎力相助，我也没有今天的地位，因此一直对诸位感激不尽。可是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安稳啊！”

石守信等人不解地问：“陛下，为什么睡不好觉呢？”

赵匡胤回答说：“原因很简单，我今天的位子谁都想得到啊！”

石守信等人立刻跪倒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谋取皇位？”

赵匡胤说：“诸位将领虽然没有异心，难保你们的部下中没有贪图富贵之人，一旦将黄袍披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即使不愿意又能怎么样呢？”

众将领一个个顿首哭泣地表白道：“我们这些人都很愚蠢，希望陛下可怜我们，为我们指出一条生路！”

赵匡胤说：“人的一生很短暂，那些贪图富贵的人，无非想多得些钱财，享受生活，喜欢娱乐，让子孙不受贫困而已。诸位将领何不交出兵权，到地方去当节度使，多买些田产豪宅，留给子孙，多养些歌舞伎，每天饮酒欢乐，享乐一生，颐养天年。我与诸位将领结为亲家，我们君臣之间互不猜疑，相安无事，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众位将领共同拜谢道：“陛下关心臣等，从此我们就是生死肉骨的关系！”第二天，这些将领都声称有病辞职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其实，杯酒是释不了兵权的，也就是说，仅靠一次酒宴是解决不了武将对皇帝权力的威胁的。因为他们只是从中央禁军首领变成了地方的节度使，依旧手握权柄。为了预防节度使拥兵自重，反抗朝廷，赵匡胤进一步采取了削弱各地节度使的职权和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杜绝兵变夺权的可能性，避免新建的宋王朝遭受夭折的命运。那么，赵匡胤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第一，严格限制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剥夺节度使管理地方政府的治安权和诉讼权；严格限制地方节度使横向干预地方州县的行政事务；同时，将节度使的权力严格限制在本州境内。

第二，收回节度使的财政权。自唐代中叶设置节度使以来，节度使不仅掌握兵权、行政权，而且当地所有赋税收入全归节度使支配，很少向中央政府缴纳。乾德二年（964年），皇帝下旨，各州每年的财政收入，除了日常费用的花销外，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不得私自留用。

第三，削弱节度使的军事实力。具体做法是：从地方部队中挑选精兵，送到京城补充禁军。地方军经过挑选以后，剩下的称为“厢军”，主要作为“役兵”和维护地方治安之用，自然不能与中央的精锐禁军相抗衡。

从此，节度使只是礼遇很高的州级行政长官虚衔，与刺史、知州在职权上没有本质区别，不再是独霸一方的藩镇，对皇权的威胁不复存在。可是，边境地区对外抵御侵略的力量同时被削弱，埋下了宋朝日后国防力量软弱，经常被动挨打的祸根。

02 皇帝真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吗

提起大宋王朝，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依据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留给后人的“勒石三戒”——或者叫“太祖誓约”：其一，保全柴氏子孙；其二，不杀士大夫；其三，不增加农田赋税。正是因为有这样开明的政治，才有了宋代的文化繁荣、经济昌盛、百姓安居乐业。许多人因此无限向往大宋王朝，甚至有人表示，如果能够穿越，就去大宋王朝一览繁华盛景。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就让我们从“太祖誓约”说起。

陆游.避暑漫抄[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49.

陆游.避暑漫抄[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50.

关于“太祖誓约”一事，记载最详细的是《避暑漫抄》。根据此文描述，太祖即位的第三年，命人秘密地刻了一方石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⑫，用销金黄幔遮盖，门上着锁，封闭甚严。宋太祖给有关部门下达敕令：每当新天子即位时，到祖庙拜谒完毕，必须“奏请恭读誓词”^⑬，身边只留一位不识字的小太监，其他人等一律远远地等候。新君来到石碑前，先对石碑施跪拜之礼，再仰视，然后默诵碑文，结束后再拜而出。大臣们都不知道誓约写的是什么内容。反正，每代新君都照此办理，无一例外。

陆游.避暑漫抄[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50.

陆游.避暑漫抄[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50.

直到靖康之变，太庙寝殿的这一神秘夹室被打开，人们终于看到了室内的真相：只见一方石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⑭。石碑上第一行内容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第二行内容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第三行内容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⑮。

我认为这个所谓“太祖誓约”有太多疑点，很难证明其真实性。

首先，宋太祖对后代继承者的治国要求为什么要严格保密？按照常理，将这些内容公之于世，更利于赵氏的统治。士大夫是封建王朝的主要支柱，他们对最高统治者拥戴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安危存亡。假如实有此物，公布于世，岂不更使士大夫感恩戴德，衷心地拥戴赵氏王朝吗？再说赵氏乘人之危夺取帝位是人所共知的事，理应优待柴氏子孙。太祖真有此意，立此存照并公

之于众，更能收买人心，平抑舆论。富有政治经验的宋太祖却将此约藏于密室，令人费解。

其次，“太祖誓约”的内容其实只有两条：其一，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二，优待柴氏子孙。可是，太祖本人并未遵守任意一条。就第一条来说，根据《宋史》本纪的记载统计，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杀掉了十八个贪官，其中有五个地方官员，其余的都是朝廷命官。要说第二条，宋太祖更没有做到。比如，宋太祖刚即位时，就将周恭帝母子迁到西京洛阳，此举已经包含贬意；建隆三年（962年），又将其迁往房州。房州地处大巴山区，位置偏僻，交通阻塞，人烟稀少。开宝六年（973年），二十岁的柴宗训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很难说其中没有被贬谪迁徙的因素。

最后，除了《避暑漫抄》之外，几乎任何史料中都不见记载“太祖誓约”。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正史不可能疏漏。

根据以上三个疑点，我认为，所谓“太祖誓约碑”纯属子虚乌有。那么，“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还得从宋神宗主持变法说起。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5370.

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召集群臣讨论王安石变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文彦博说：“祖宗制定的法规制度，不需要改变，以免失去人心。”宋神宗反驳道：“变革法制只是令很多士大夫不高兴，对于百姓而言有什么不好呢？”文彦博直截了当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④这是史料中关于提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的最早记载。历代学者对此语皆有争议，分歧点在于“为与”二字的解释有所不同。

从字面上理解，“为”是原因，也有目的之意；“与”的本义是赐予和给予，但作为介词时，“与”表示动作的指向，比如“与虎谋皮”，这里的“与”就是介词，与“和”的意思相同。由于“为与”二字的复杂性，对“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就有不同的解释。既可理解为“为了士大夫治天下”，也可以解释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么，文彦博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得先解释一下“士大夫”的含义了。

在周代，“士大夫”指的是贵族中最低的两个级别“士”和“大夫”；到了汉代，“士大夫”可以解释为通晓儒家经典的官僚；而宋代对这个词的解释，则是朝廷的文官。因此，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解读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包括皇帝在内，文武百官对文彦博的这句话既没有任何反驳，也没有表示赞许，说明在当时，这是朝廷百官的共识。

可是，文彦博这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除了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源出《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各类史籍之外，包括《宋史·文彦博传》在内的其他各类史料都没有记载，也没有看到其他宋代人直接引用或者讨论这句话，直到元代和清代，才有人再次提及此语。这句能够概括宋代政治统治方略的话语意义如此重大，为什么会突兀地出现在历史著作中，又神奇地消失于大多数史料？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3624.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2.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43.

其实，这种共治天下的观念古已有之，对于北宋时期的当事人而言并不突兀。比如，周朝建立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将天下最重要的几个方国分封给姬姓子弟，就是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的模式。到了汉代初期，中央集权与藩王分封并存，是为天子与诸王共治天下的变种。汉武帝建立了纯粹的中央集权制，但此后的皇帝依然表达了共治天下的理念。比如，汉宣帝说：“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①所谓“二千石”主要指州郡的太守，相当于更早时的诸侯，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治天下的理念依然深入人心。东汉末年，中央政权崩溃，地方豪强崛起，曹操为争天下，以天子的名义发布求贤令，其中说道：“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②明确将与天子“共治天下”者的范围扩展至“贤人君子”。一旦中央政权建立，地方秩序恢复，共治天下的对象又回到了从前的标准。比如，北魏孝文帝元宏就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③所谓“牧民者”，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员。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492.

陈亮. 陈亮诗词集[M]. 徐小飞，编.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6：7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600.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20：468.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20：643.

到了唐代，共治天下的对象开始变化。比如，唐玄宗曾经说：“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④共治天下的对象包括了县级地方长官，说明受最高统治者信任的统治阶级阵营在扩大，这是国家政权稳定的表现。显然，汉唐以降一直到宋代，“共治天下”是朝廷君臣经常讨论的话题。比如，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宣称：“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⑤宋太宗对众侍臣道：“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⑥范仲淹说：“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令，即古之诸侯。”^⑦不过他特别强调：“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⑧显然，能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并非全体士大夫，而是其中的位高权重者；

随着官僚队伍的壮大，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群体范围也在扩大。总之，与前代相比，宋人言论中以百官贤士为“共治”者明显增多，这与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变化有关。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287.

车吉心，总主编. 中华野史：唐朝卷[M]. 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60.

然而，文彦博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虽然扩大了共治者的队伍，却完全背离了儒家的传统，因为他将“共治”的治理对象锁定在百姓身上。当然，这种背离是由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性质决定的。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完善，这种背离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正道。比如，隋文帝说：“君为元首，臣则股肱，共治万姓，义为一体。”^⑤唐太宗也说：“今与诸公共理百姓。”^⑥唐玄宗说得更直白：“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显然，共治者是皇帝与朝廷重臣，被治者是普通百姓。

蔡沈. 书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8：117.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5370.

然而，这样的观念与儒家的传统统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尚书·咸有一德》曰：“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⑦意思是，匹夫匹妇不能够自尽其意，君主就不可能成功。因此，文彦博在回答宋神宗的诘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⑧的时候，居然声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这种观点显然与儒家传统完全违背，同时也暴露出宋代所谓“士大夫”的真正嘴脸。

总之，皇帝即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只是扩大了统治阶层的范围，这些士大夫不代表民众的利益，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是社会公德的化身。因为北宋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儒生社会地位提升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即所谓的“士大夫”，他们与广大普通百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当王安石的新法损害地方豪强利益时，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新法。即使有些新法对农民有利，依然遭到反对并被废除。显然，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在两宋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大夫阶层不仅空前活跃，而且对“共治天下”的理解也与传统有了根本区别。

03 如何评价“澶渊之盟”的历史是非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和萧太后率大军南下进攻宋朝。在宰相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当宋真宗北上到达韦城（今河南滑县）时，宋军统帅王超因畏敌怯战，按兵不动，拒绝南下接应。随行的人员见没有大军接应，开始慌乱。皇帝身边有人建议皇帝南逃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宋真宗犹豫不决。寇准反对说：“虽然现在大军没有南下接应，处境危险，可是一旦南逃，辽军必然会全力追击。到那个时候，不仅到不了金陵，而且有被俘的危险。我们只有继续北上与大军会师才安全。”宋真宗这才决定继续北上，与宋军主力会师。

十月中旬，辽军猛攻瀛州，十多天攻城不下，死伤众多，只好放弃攻城，绕过瀛州城南下，前锋直达天雄军（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宋真宗任命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率领宋军列阵于城外，将运输车辆围成防御阵地；任命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与李继隆一起率部抗击辽军。战斗十分激烈，辽将萧挾凛亲自督战，被宋军的箭击中前额，伤重败退，宋军乘势追击。萧挾凛逃回军营，当晚伤重而亡。

这个时候，辽国方面派人给宋真宗送来一封密奏，表达了议和的意向。惧辽怯战的宋真宗马上表示同意，并且派使臣前往辽军营中商议。宋真宗到达澶州之后，辽国使臣也到了澶州，与宋朝方面的谈判代表在澶州正式议和。同年十二月上旬，双方签订和约，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岁币，以换取和平。澶州郡名澶渊，因此这次签订的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据考证，辽朝鼎盛时期，人口数量约为1056.9万人。也有其他研究认为辽国人口大约在900万~1000万人，其中汉人占比较大，约570万人，契丹族约230万人，还有女真族、渤海人等其他民族。北宋人口则较多，据《宋史》等史料记载，大观三年（1109年），北宋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亿人。有学者认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耻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有2340万户、1.26亿人。

一定有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宋军并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签订这样屈辱的和平协议？原因很简单，以宋真宗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从内心惧怕辽国。虽然在长达二十五年的宋辽战争中，双方各有胜负，但是从两个国家的总量对比看，谁强谁弱，一目了然。辽国鼎盛时期人口一千万左右，北宋鼎盛时期人口超过一亿。^④如此悬殊的体量对比，双方却在战场上打了个平手，而且辽国胜多败少，宋朝在武力方面的弱，不言而喻。

显然，这就是宋朝长期实行重文轻武国策的结果。然而，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延续二十五年的战争状态。虽然对宋朝来说，这是屈辱的协议，但它从客观上促成了此后宋辽两国之间的百年和平，为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条件。正是这难得的百年和平，使得北宋进入了鼎盛和辉煌时期。那么，大宋王朝的辉煌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就让我们从一幅画说起。

这幅画叫《清明上河图》，在五米多长的画面中，作者绘制了人物八百多个，各类牲畜九十多头，大小船只二十多艘，建筑物一百多幢，还有许多车辆及轿子等出行用具。作者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北宋时期首都汴梁的繁华景象。不过笔者认为，《清明上河图》表现的并不是整个汴梁城，而只是汴河上游的清明坊。

所谓“坊”就是街区，坊的层级上面还有“厢”，这种城市管理体制叫“厢坊制”，属北宋时期特有，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北宋时期，整个汴梁城一共有八厢，管理着一百多个坊，清明坊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地处汴梁城东南门之外。一个城外的清明坊都如此繁华，整个汴梁城的繁荣景象就可想而知了。

北宋政府之所以在汴梁城内采用厢坊制，一方面是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则是加强对赋税征收的管理。为此，北宋朝廷还专门颁布了《商税则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工商税法。它具体规定了征收商税的种类和税率，以及对偷税、漏税和逃税的处罚措施。商业税法的贯彻执行，既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要求政府依法征税，禁止征收没有法律依据的苛捐杂税，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例证。

《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各类牲畜、大小船只及许多车辆，表明汴梁城的交通运输非常繁忙，物资与人口的流动都很大，这意味着不仅汴梁经济繁荣，而且国内许多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广大农村经济也很繁荣。因为没有农业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工商业是不可能兴盛的。

正是由于宋代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政府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设立了镇，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当然，他们的主要职能是收税。唐代的“镇”是军事要地，派驻节度使防御外族入侵，实力强大，甚至割据对抗朝廷，称为“藩镇”。而在宋朝，“镇”成为乡村的经济中心。总之，北宋的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

几十年的和平与稳定，城市和乡村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也与北宋朝廷的政策密切相关。比如，赵光义当了皇帝之后，降低了科举录取标准，扩大了录取名额，且在他当皇帝期间几乎年年如此。这种做法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皇帝本人也大力提倡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比如，宋真宗曾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

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在官方的鼓励下，民间纷纷兴办各类私学，有专门启蒙的，也有辅导科举考试的。规模较大的私学就是“书院”。由于每年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不断增加，民间办学已无法满足朝廷对人才的需求，政府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负责朝廷行政事务；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下旨各州府办学校，兴起了第一次办学高潮。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并开始变法后，又兴起了第二次办学高潮，要求有条件的县都要办学。虽然县级官学数量有限，但自此全国各地都有了官办学校。

政府在教育内容和方针上予以指导，具体做法就是科举制度的变革。比如，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对使用华而不实的骈体文的考生一概不予录取，而是录取那些用先秦古文文体、写言之有物文章的应试者。以后的科举考试都贯彻这样的原则。熙宁年间，科举不再考背诵，专门考对经典意义的理解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这使学校的教育不再过分强调背诵，而更注重结合现实理解经典。

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北宋朝廷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第一，考官的亲属参加考试时必须用化名。第二，严格考场制度，杜绝作弊行为；一旦发现作弊，终身取消考试资格。第三，主考官员接受任务之后不许回家，以杜绝“走后门”的现象。第四，实行糊名制，就是将考生姓名密封，阅卷之后再拆封。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人才选择的程序公正。重视制度建设，是宋朝在政治领域的重大成果。

制度合理，教育发展，使得一些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对文官的重视，也使他们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更加关心民生疾苦，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因此不满意过去的骈体文，而是用先秦古文写文章，从而引发了文学领域的革命——古文运动。比如，王安石的散文关注政治，为改革变法服务，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苏轼的散文更加气势宏大，达到中古散文的最高境界。

三十多年的和平，社会经济的繁荣，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学艺术的成就，终于使代表宋代最高学术水平的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形成儒家思想的新阶段——理学。其特征有三：其一，不做章句训诂，只探求儒学经典的义理；其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改善时政；其三，在吸收佛道学说基础上超越它们。

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最早记载了蟾蜍的药用价值：“虾蟆味辛，寒。主邪气，破症坚，血、痈肿、阴创。服之，不患热病。”（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卷三第147页。）虽未明确提及蟾酥强心，但为后世蟾酥药

用奠定了基础。蟾酥作为独立药材名称首载于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书中提到“蟾蜍眉间白汁，谓之蟾酥……发背疗疮，一切恶肿”。南宋时期，雷氏兄弟利用极品蟾酥为君药，研发出极品蟾酥养心汤，用于治疗心疾，这是蟾酥在强心方面的具体应用。

知识分子地位提升，思想自由和宽松，必然带来科学的繁荣。第一是数学。数学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学科之一，比如沈括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第二是天文和历法。崇宁五年（1106年）修成的《纪元历》，对回归年、朔望月等计算得相当精确。第三是物理学，最典型的成果就是指南针的发明。第四是化学，最高成就是火药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第五是医药学，在传统内科、针灸、外科、儿科和五官科等五科的基础上，增加了妇产科、眼科、风科、口齿兼咽喉科，并对外科做了细化。药学方面的成果是《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编撰，药品制作也成就辉煌，比如，用曼陀罗花制作麻醉剂，用蟾酥制作强心剂，^④用罂粟制作止痛药等。

总之，北宋在文化与科学等方面，既达到了中国历史最高水平，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成果的取得，有赖于朝廷政策的开放和支持，根植于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这一切都必须在平时时期才能取得。因此，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盟”，虽然包含着屈辱，但毕竟为宋朝赢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04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责任在谁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登基称帝，建立的国家号称“大夏”，史称“西夏”。第二年正月，李元昊派遣使臣来到北宋的京城汴梁，上奏宋仁宗，要求承认其帝位。宋仁宗大怒，立刻下诏削夺赐给李元昊的姓氏和官爵，停止宋与夏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捉拿李元昊。

李元昊的目的是称帝，北宋朝廷不承认其帝位，他便发动战争，并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宋朝。面对李元昊蛮不讲理又咄咄逼人的态度，宋朝廷向边境各重镇调动部队，宋夏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宝元三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趁宋军不备，突然大举进攻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攻占保安之后，很快到达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城下。宋夏之间的战争就此爆发。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中，宋朝军队均惨败。

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初，北宋朝廷答应每年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等，西夏这才以臣属的身份签订了和平协议。十二月，北宋朝廷正式下诏，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朝西北边疆的这场危机，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平息了。西夏和宋朝在经济和人口等方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而且西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水平也比宋朝落后很多，可是宋军却屡战屡败。这充分暴露了宋朝在军事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北宋朝廷中，无论是皇帝还是一些正直的官员，都深感大宋王朝岌岌可危，决心改变这种局面。

西夏和北宋双方开始议和后，宋仁宗立即将改革朝政提上议事日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朝廷将范仲淹从陕西前线调回，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范仲淹由枢密副使升任参知政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把改革朝政作为当务之急，下决心彻底革除弊政。范仲淹经过认真思考并与同僚商议后，向宋仁宗上奏，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其中，除了厚农桑、修武备和减徭役属于经济内容，其余七项都是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改革正式开始。可是，这些改革措施必然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实施不久就遭到多方面的攻击。攻击的口实是：改革派借口改革拉帮结派，是“朋党”，甚至要另立新皇帝，实在大逆不道。范仲淹等人感到压力太大，开始谋求退路。宋仁宗只得免除了范仲淹执政大臣的头衔，让他出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156.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希望实现“强兵富国”^④的愿望。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主持变法，并且组建变法领导机构。从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中旬开始，新法陆续推行，主要内容有十项条款。

第一是“均输法”。在因灾荒歉收而物价较高的地区，将应该上交给中央财政的物资折算成钱，再用这笔钱到丰收且物价较低的地方购买物资上交；如果各地同时丰收，物价都低，就选择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是利用市场规律，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措施。

第二是“青苗法”。农民可在粮食收获前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度过春荒。等到粮食收获之后，附带一部分利息偿还官府即可。如此，一来使困难的农户免受高利贷剥削，二来不影响农业生产，三来官府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第三是“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依据谁受益谁出工出钱的原则进行。既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又能完成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是“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即官府出钱雇人完成徭役。钱的来源有二：其一，应服徭役的各户按土地数量出钱，称“免役钱”；其二，原先不服徭役的女户、单丁户、未成年户和城镇户，以及享有特权的官户、僧人和道士，按田产或资产，比照同等的徭役户减半出钱，称“助役钱”。这是将徭役货币化，以避免徭役干扰农民的正常生产。

第五是“保甲法”。就是把散户组织在一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一家如果有两个儿子，必须出一个为保丁。这样一来，既加强地方治安、百姓管理，政府又不需增加管理成本。

第六是“市易法”。政府宏观调控市场价格，平抑物价，既保护商人不因物价大跌而亏钱，也保护普通民众不因物价过高而受损，同时还使国家获取利润。

第七是“方田均税法”。就是丈量土地，合理收税。使那些无地却继续承担田赋的农民免除田赋，让那些有地却不承担田赋的豪强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缴纳田赋。既减轻农民的负担，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第八是“保马法”。由于西夏割据，宋朝失去了传统养战马的基地，此法可以鼓励农民养马，以解决军马缺乏的问题。

第九是“免行法”。根据各行业的利润多少，按月或季度征收“免行钱”，此后各行商店不再低价向朝廷和后宫提供物品，这是以商业税的方式避免官府和后宫对工商业的强制剥削。

第十是“将兵法”。就是让部队由固定的将官进行训练，从而使士兵和将军相互认识熟悉，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显然，这十项新法如果能够切实执行，的确是富国强兵的好措施。但是，任何变法都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利益受损害的人必然会拼命反对。这些人联合起来，不断上书，攻击新法。宋神宗在保守派和王公贵族的压力下，命令王安石修改新法以符合皇亲国戚及保守派的利益。王安石愤然辞职。随着王安石的退出，熙宁变法半途而废。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继续王安石的新法并且加强力度，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强军事力量；其二，改变中央官僚体制的混乱状况，奠定了北宋后期及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其三，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利用西夏发生宫廷政变的机会对西夏用兵，然而以失败告终。

宋神宗的变法与王安石的变法在富国强兵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宋神宗把加强国家实力放在优先地位，王安石则是把抑制兼并、祛除民间疾苦放在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宋神宗侧重国家利益，而王安石侧重社会利益。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单纯追求富国强兵而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最终往往是会失败的。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初五，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政权完全被掌握在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手中。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建议太皇太后广开言路，随后又上疏抨击新法，并提出由太皇太后主持废除新法。不久，太皇太后开始重用保守派官员，改革派遭到打压和排挤。随着司马光地位提升、权力扩大，保守派中废除所有新法的主张占据了上风。

然而，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导向，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从总体上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熙宁变法”针对当时的弊政，不仅大体实现了宋神宗富国强兵的初衷，改变了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且也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所以尽管因政治需要，攻击改革派，废除一切新法的呼声很大，但是，保守派中也有不少人从实际成效、政府财政及国防治安需要出发，不同意完全废除新法。最终，新法只废除了一部分。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亲政。吏部侍郎上疏请求皇帝恢复神宗新法，并且推荐被贬的改革派章惇为宰相。宋哲宗于是将保守派宰相吕大防罢免，任命章惇为宰相，又让改革派的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这标志着改革派重新开始执政。绍圣二年（1095年）八月开始，北宋政府放弃元祐时妥协退让的政策，采取积极进取、抗击西夏入侵的战略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收复了元祐初年割让给西夏的领土。元符元年（1098

年），西夏梁太后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平夏城，连续攻打十三日，都被宋将郭成率守城军士击败。西夏军伤亡惨重，粮尽退兵。此战取得了宋夏战争中少有的胜利。不久，西夏派使者到宋朝表示臣服，宋与西夏之间再度恢复和平。

可是章惇等人执政以后，一方面为改革派恢复名誉，让改革派大臣担任朝廷要职；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打击保守派官员，使哲宗时代的改革变了味道。以国家强盛和人民福祉为变法目标时，变法措施的确是有成效的。然而，当朝廷大臣只图个人利益，执政只为争权夺利时，变法就沦为了党派之争的工具，不但变法变了味道，而且将直接导致朝廷的政治生态毒化，王朝的颓势就不可挽回了。

05 “靖康之耻”是不可避免的吗

根据《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吴松弟著）的研究，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北宋的总人口约为1.1275亿人；宣和六年（1124年），北宋的总人口约为1.26亿人。此外，学者王曾瑜在《宋代人口浅论》一文中也指出，据徽宗大观三年的统计，北宋当时有2000多万户，因此人口应在1亿人以上。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宋朝都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军俘虏，金国人将赵氏皇族、后宫妃嫔及朝臣等三千多人押解北上。金兵北撤之前，将东京城内的国家财富和百姓积蓄劫掠一空，北宋王朝灭亡。由于此难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耻”。可是比较当时的综合国力，宋比金强大得多，北宋当时人口已经超过一个亿^①，金国人口只有将近五百万人，其中女真族人不到一百万人。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靖康之耻”为什么会发生？要解开这个谜，还得从金国突然举军南侵说起。

公元1125年，金军兵分两路进攻宋朝。西路进攻太原及山西各地，东路进攻燕山府，也就是今北京及河北各地。面对金军的疯狂进攻，很多人疑惑不解：当时宋与金是合作灭辽的同盟关系，金军为什么要对盟友发动突然袭击？

覃仕勇. 两宋之变[M]. 沈阳：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3：31.

有人说，金国人背信弃义，撕毁盟约，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可实际上，撕毁盟约的不是金国，而是宋朝。比如，从招纳降金的平州知州张觉（又作张穀）那里，金人获取了宋徽宗写给张觉的御笔手诏，徽宗在手诏中说“吾当与汝灭女真”^②。既然双方是盟友，徽宗皇帝为什么要暗地准备毁约开战呢？

显然，这是这位宋朝最高决策者昏庸无能的表现。由于北宋末期综合国力比较强大，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北宋统治集团颇为自负。在金兵打到开封之前，宋朝在与金国交往时一直看不起对方，视金国为藩属小邦。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花钱买打手”以收复辽国占据的燕云地区；达成契约之后，北宋朝廷又不把契约放在眼里，不仅连续违约，甚至企图灭掉金国。北宋统治者的这种表现，表明他们既没有自知之明，同时也低估了金国的军事力量。可是，金国在攻打辽国时摧枯拉朽，辽国根本无力抵抗，宋朝统治者怎么仍然会低估金国的力量？

金国在建国初期，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与文化水平，和宋朝相比都相差甚远，可以说不在一个等级上。全面衡量宋金的综合国力，毫无疑问是宋强金弱。然而，金国的军事能力在当时是一流的。即便如此，金军攻宋，只能逞一时

之勇，一旦陷入持久战，金军必败。只要北宋王朝的统治者不犯错误，金国就不可能灭宋，也就是说“靖康之耻”不可能发生。可是，金国统治集团把本国有限的实力和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北宋统治集团却把自身的劣势暴露到了极致。其实，金国南下灭宋之战，是不计后果的错误决策，因为金国低估了北宋的综合实力。如果北宋决策层不犯错误，金国本不可能得逞。可惜的是，在宋金对抗过程中，北宋统治集团的所有决策都是错误的。

比如，用地方官牒和御笔手诏而不是用国书与金交往；擅自任命金使为官并且发全俸，将金国视为自己的属国；主动提出把输给辽国的“岁币”转交给金国；与金谈判的关键时候，误听谍报，轻易断交；战争爆发，却视战争如儿戏，不认真广泛动员、周密部署，导致战争失败；当金国占领燕云地区之后，宋决定花费巨资赎买并签订契约，却又不想履约；明知金军在追捕辽帝，却贸然招纳辽国的天祚帝；双方签订盟约并划分疆域之后，却在金国境内招纳降将张觉，并且在给张觉的信中说要灭掉金国；打算灭金国，却根本没做任何切实的准备。这等水平的统治者当政，国家如何不亡？

大金吊伐录校补[M]. 北京：中华书局，2006：329.

丁特起. 靖康纪闻[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33.

可是在与金国的战争中打了败仗之后，北宋统治集团的态度瞬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内部的主战力量百般摧残，对民众的抗金力量坚决镇压；由蔑视敌人转向委曲求和，甚至屈膝投降；甚至在金兵肆意践踏开封城的时候，北宋统治者却表示“久蒙恩惠，深用感铭”^④。为了换取自己的性命，皇帝可以答应敌人提出的一切苛刻条件，甚至在写给金国的降表中说：“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⑤堂堂大宋，真是奇耻大辱啊！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250.

对金朝卑躬屈膝的北宋朝廷，对主张抗战的将帅却极力排斥，对自发组织起来武装抗金的人民则竭力镇压。比如，北宋朝廷早就视李纲、种师道为眼中钉，开封城第一次解围之后，立刻以年老为名，解除了种师道的兵权；几个月后，又调李纲出京师，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⑥的罪名将他放逐。其他朝臣只要稍有一点主战的表示，也会马上遭到打击。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31.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245.

在北宋朝廷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投降派，对破坏抗战不遗余力。比如，宰相耿南仲说：“惟主和议，故战守之备皆罢。”^⑦他当政仅几天，就把李纲等主战派首领

苦心经营的开封防守设备完全拆除。对于抗金的战役，北宋政府更是蓄意破坏。比如，李纲领十万兵马与金人战于高平，北宋政府指责李纲“尽遣城下兵追敌，恐仓卒无措”^④，下令将各位将领紧急调回，致使战役功败垂成。

当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城时，全国各地部队纷纷入京师勤王，却遭到北宋政府的百般歧视和排斥。他们以百姓经济困难，无力养活数十万大军于城内为借口，将数十万援兵全部解散。结果，来到京师地区的勤王兵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犒赏，更没有资助，最后由于饥饿流离，困厄道路，体弱者填满沟壑，强大者沦为盗贼，声势浩大的抗战武装就这样被朝廷瓦解了。

面对朝廷的不抵抗甚至投降政策，京城内的太学生纷纷起来抗议。靖康元年（1126年），陈东领导的太学生请愿事件便是其中的典型。当时，金国大军突破黄河，包围了东京，形势危急。大臣李纲和东京军民力主守城抗金，宋钦宗却罢免了李纲，任命投降派李邦彦为相，并准备以赔款割地为条件，向金国求和。靖康元年二月初五，陈东带领数百名太学生至宣德门伏阙上书，直接批评宋钦宗重用奸臣、罢免忠臣的行为，要求朝廷给李纲复职，罢黜投降派官员。东京军民听说有太学生在请愿，纷纷前去宣德门声援，很快就聚集了数万人。在太学生和群众的压力下，宋钦宗最终迫于形势妥协，立刻给李纲、种师道复职。这次请愿运动，以太学生为代表的民众获得了胜利。

面对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人民武装，北宋统治集团予以坚决镇压。比如，开封城第二次被围时，宋钦宗赵桓亲自到敌营谈判。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致，谣言四起，有人恳请加强军备以应对敌军，可是朝廷不同意，民间便有许多人自发组织起武装。朝廷怕民众生事端，破坏和谈，就将十七个所谓“造谣者”处斩于市。虽然当时抗金的力量十分强大，人民反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北宋朝廷坚持投降政策，抗金力量始终不能积极地发挥作用，终于导致“靖康之耻”的发生。

人们一定会进一步追问：北宋政府为什么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据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北宋时期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比如，北宋末年爆发了方腊和宋江的起义，尤其方腊起义，是整个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腐败的北宋朝廷对百姓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激化了社会和阶级矛盾。即使在“靖康之变”前夕，百姓反抗暴政的斗争仍时有爆发。

宋史全文[M]. 汪圣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6：1088.

第二，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北宋统治者非常惧怕人民武装。当金兵南下，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广大民众以民族大局

为重，转而支持北宋朝廷，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武装举起抗金大旗，转化为抗金的坚定力量，并在第一次开封保卫战中挽救北宋王朝于危亡之中。可是，北宋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地破坏与摧残人民抗敌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发组织起来抗金的人民武装是“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④。他们宁愿向敌人屈膝称臣，也不愿丝毫放松对人民的控制，唯恐人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在他们看来，人民是动摇他们统治的最可怕的因素。

丁特起.靖康纪闻[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40.

第三，北宋统治集团一直对外族入侵者抱有幻想，希望用屈膝投降来换得苟安，用出卖民族利益来维持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把人民的抗金斗争看成投降政策的障碍。比如，当河东河北人民坚守不降时，宋朝政府居然下达诏令：“汝之忠勤反为宗社之祸，不如早与烧毁楼橹，开门出降抚定。”^⑤

全宋文：第一百五十八册[M].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428.

第四，北宋统治集团对其内部的抗战派十分防惧，唯恐坏了他们的投降政策。比如，投降派官员攻击李纲等人，说：“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胁制天子。”^⑥这显然是宋朝重文轻武国策的极端发展——都要亡国了还担心武将会威胁他们的统治。投降派之所以防范抵抗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抵抗派对待人民的态度与投降派完全不同。抵抗派主张联合人民的力量，一致抗敌，自然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这就让北宋统治集团对抵抗派更加疑惧，将其视为眼中钉，多方打击陷害。

通过对“靖康之耻”发生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宋王朝在政治上彻底腐朽，导致社会公权力完全沦为统治者的私权力，统治者只考虑自身利益，因此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江山是人民的，却被统治者据为己有，因此他们特别惧怕人民；惧怕人民者，必然谄媚外敌，因为在人民面前，他们都是强盗。对外谄媚，必定对内残酷，这是王朝末期统治者的共性。

06 北宋灭亡，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成了金军的俘虏，与皇室宗亲、妃嫔、宫女及朝廷大臣数千人一同被押往金国，北宋灭亡。在这场天崩地坼的灾难中，赵构却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他于靖康二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开启了他为期三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以及宋王朝的重建历程。当时的赵构刚满二十岁，面对混乱不堪的战争局势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他如何躲过杀身之祸，成功上位成为南宋王朝的开国之君的？这还得从他以亲王的身分前往金军大营当人质说起。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军发动对宋朝的战争。第二年正月，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在兵临城下之际，为解开封之围，北宋朝廷以犒军为名，赠予金军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缎一百万匹、马一万匹等，并且答应割让中山、河间和太原三镇，确认金宋之间为伯侄关系。金国方面怕宋朝廷不守信誉，要求送亲王和宰相各一人到金军大营作为人质。

胡建林，主编. 太原历史文献辑要：宋辽金元卷[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35.

胡建林，主编. 太原历史文献辑要：宋辽金元卷[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35.

宋钦宗召集诸王问道：“谁肯为朕行？”康王赵构“越次而进”^①——就是越过前排几位兄长来到皇帝面前，请求前往金军大营当人质，这一年赵构年仅十九岁。宋钦宗欣然同意。临行前，康王赵构低声对皇帝说：“朝廷可以灵活处理问题，不要因为我而影响决策。”完全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当他发现副使张邦昌正在流泪时，便说：“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②张邦昌惭愧地止住眼泪。可是，赵构到了金军大营之后不久，金国人就提出了退换人质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因为金国人怀疑赵构根本不是亲王。那么，金国人为什么会对赵构的身分产生怀疑？

赵构到达金军大营几个月后的一天，与金朝皇族一起射箭，竟然连发三箭，箭箭射中靶心。金国人因此觉得赵构的身份可疑，有这种身手的人，只能是将门之后，不可能是生长在深宫里的皇子。更重要的原因是，赵构在金军大营中充当人质期间，宋军将领居然偷袭金军大营。金国元帅致信北宋朝廷，质问为什么在和谈期间劫营？北宋朝廷回信坚决否认有此举，给出的理由是：“朝廷专门派宰相和亲王到你们军中为人质，又派执政大臣作为使者一起前往，如此重要的人物都在你们的军营中，我们怎么可能不顾这些人的生命，不顾及君臣之义和骨肉之

情，偷袭你们的军营呢？”金国人根本不相信这种解释，更加怀疑赵构并非亲王，于是提出用皇叔越王赵偁与赵构交换。宋朝廷只好派肃王赵枢替换了赵构，同时请求金方，肃王到达时，立刻放还康王。金国人既然认为赵构不是亲王，当然不会留他，因此肃王一到，赵构就被金国人放还。如果不是金国人怀疑赵构的亲王身份，赵构就会作为人质与他的父兄一起被押往金国，那就没有以后即皇位的事了，也就没有后来的南宋，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然而，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宋朝面对兵临城下被迫签订的城下之盟，心不甘情不愿，当金兵退去，各路勤王之师齐聚京师之时，北宋朝廷对轻率割让三镇的举动自然感到后悔，于是重新起用被革职的宰相李纲，主战派当权，将逃往南方的宋徽宗迎回京都。北宋朝廷无意履行盟约，拒绝割让三镇。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国以宋朝违约为由，再次兵分两路南下。太原被攻克之后，两路金军迅速向南推进。面对金国的压力，宋钦宗只好将李纲贬谪，并于十月再次派赵构为使臣，前往河北的金军大营求和。虽然因副使王云拖延，十一月十六日赵构才离开汴梁，但是，赵构再一次摆脱了被俘的命运。

十一月十七日，金国使臣到了开封，向宋朝廷提出要求：“以黄河为界，割让黄河以北的河东与河北。”对此一概不知的赵构，于十一月二十日到达黄河边上的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宗泽对赵构说：“肃王已经一去不返，大王再往金营何益？不如留在磁州。”赵构觉得磁州不安全，因此不采纳宗泽的建议。磁州有人怀疑王云要将赵构带到金营，因此杀了王云。不久，赵构在知相州汪伯彦的邀请之下，从磁州退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汪伯彦亲自率领军队在黄河岸边迎接，赵构大为感动，于是带着手下一千多人来到相州。到达相州后，赵构开始公开招募军队，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将汪伯彦倚为心腹，对他言听计从。

十一月二十五日，东路金军到达开封城下；闰十一月初二，西路金军也进抵开封。宋钦宗一面授予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命他率领勤王之师前往救援；同时又派人缒城而出，带着皇帝的亲笔蜡诏来到相州，拜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要求他们从速领兵进京保卫皇上。可是，赵构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被金兵攻破，徽、钦二帝和朝廷百官都被金国人控制了。

十二月初一，赵构在相州开大元帅府，广招兵马，人数很快达到一万多人。宋钦宗再次派人带蜡书来到相州，要求赵构尽发河北之兵救援。可是，赵构却领兵向东前往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此时，各路勤王的宋军纷纷前来会师。宗泽率两千士兵首先到达，并且提议将军队直接开往黄河要津澶渊，截断金军的退路，以解东京之围，却被赵构和汪伯彦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赵构只求自保，惧怕与金兵交战。他们在大名府一带徘徊几天，退入山东境内。为了掩护逃跑，

赵构命令宗泽进驻澶渊，制造赵构就在澶渊的假象，以吸引金军的注意。从此，赵构将主战派人物宗泽排挤出领导中枢。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初三，赵构抵达山东东平，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等人率领几千人马前来会合。黄潜善与汪伯彦一样，也是力主向金人妥协的投降派，他们两人从此成了赵构的心腹。二月二十三日，赵构一行退至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各路宋军和义军陆续前来投奔，其中有东道副总管朱胜非、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侍卫马军都虞侯刘光世等文武官员。此时大元帅府的军队号称百万，分布在济州和濮州等地，直接受赵构统率的部队已经达到八万余人。

北宋灭亡后，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史称“伪楚”。赵构得知父兄和家人被俘北去以及金国人另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的消息，先是痛哭流涕，继而不知所措，依然按兵不动，并准备逃到长江以南去。但他的想法遭到了所率军队将士的坚决反对，于是赵构只好暂时在山东境内驻防。

金军撤退后，失去军事支持的伪楚皇帝张邦昌知道自己此举大逆不道，于是决定主动退位，拥立宋朝皇室成员为新的皇帝。此时幸免于难的宋朝皇室成员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康王赵构，另一个是哲宗的皇后孟氏——因为被废为尼，得以幸免。张邦昌打算迎立康王赵构为帝，于是首先迎来废后孟氏，先称她为“宋太后”，不久又改称“元祐皇后”。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42.

黄以周，等，辑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 北京：中华书局，2004：1912.

四月初八，张邦昌派人将“大宋受命之宝”送到济州，赵构“恸哭跪受”^⑤，但是担心张邦昌有诈，不肯回开封。四月十一日，元祐皇后在张邦昌的敦请之下垂帘听政，张邦昌退居左相。四月十五日，以元祐皇后的名义昭告天下，命赵构“嗣宋朝之大统”^⑥。三天后，元祐皇后的手书被送到济州，随后百官劝进，赵构必定又故作姿态地拒绝一番。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8：111.

四月二十一日，赵构离开济州，继续向南退却，于二十四日到达应天府。第二天，张邦昌来到应天府向康王表示“待罪”^⑦。五月初一，赵构在应天府登坛祭天，然后在府衙正厅即皇帝位，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元祐皇后为隆祐太后，太后撤帘归政。从此，南宋王朝拉开了序幕。

通过分析康王赵构即皇帝位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出使金军大营与更换人质，让赵构侥幸逃生；民族的灾难与王朝的灭亡，为赵构提供了绝佳的机

会；国家政权处于真空状态，使赵构得以乘虚而入，获取最高权力。这种侥幸与偶然，使他的即位并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当了皇帝的赵构缺乏自信，加上他原本只是一个朝廷使臣，临时被加封“兵马大元帅”头衔，手下区区几万临时组建的部队根本不是如狼似虎的金兵的对手。因此，赵构即位之后，无论是战还是和，是守还是逃，一切手段只指向一个目标：争取金朝的承认，保住皇帝的位子。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

07 既然屈辱，为什么还要议和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与金双方经过艰难漫长的谈判，终于达成一致，签订和约。其主要内容是：宋向金称臣，金册封宋高宗赵构为皇帝；划定双方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疆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自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开始。由于此和约签订于绍兴年间，因此史称“绍兴和议”。令人不解的是，绍兴年间，宋军对金军入侵的反击其实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宋金双方势均力敌，南宋政府为什么还要与金国签订如此不平等甚至称得上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这还得从赵构即位之后，宋金之间的争斗说起。

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皇帝位，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以南宋当时的实力，根本无力抵抗金军。因此，赵构即位后不久，就派使臣向金国表达议和的请求。金太宗不仅拒绝了议和请求，而且决心彻底消灭赵构建立的南宋。赵构只好乘船南逃，来到扬州。

建炎四年（1130年），金军渡过长江向江南地区进攻，江南重镇相继沦陷。赵构被迫放弃临安府，乘船逃往海上。金军乘船追击，遭遇宋朝水军拦截，吃了败仗之后，沿运河北撤。赵构获悉金军北退的消息后才辗转返回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结束了海上流亡生活。

金太宗遭此失败，感到短期内不可能消灭南宋，遂于建炎四年七月在大名府立宋朝降将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史称“伪齐”。十一月，刘豫改元阜昌；次年四月，刘豫迁都开封，改称“汴京”。就这样，又一个傀儡政权在金人的扶持下诞生了。金国人建立傀儡政权的目的是有三：其一，贯彻“以宋治宋”的策略，控制新占领的北宋疆域；其二，在金与宋之间构筑战略缓冲地区，缓解南宋对金的军事压力；其三，借助伪齐的势力消耗南宋国力。

在建立伪齐的同时，金国西路的进攻遇到了顽强抵抗。宋将吴玠率部多次击退金军对陕西南部地区的进攻，粉碎了金军由陕入川的企图，并且收复了凤州（今陕西省凤县）、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陇州（今陕西省陇县）三地，川陕的形势稳定下来，南宋王朝的侧翼暂时安全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磨炼，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南宋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六七万，江淮的正面战场趋于稳定，形成了南宋与伪齐的对峙局面。金要想消灭南宋，基本不可能了。

绍兴四年（1134年）春，岳飞奏请朝廷出兵收复襄阳地区，得到朝廷的批准。岳飞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西上，移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五月

初，北上攻占郢州（今湖北省钟祥市），随即率主力直奔襄阳，伪齐的襄阳守将闻讯弃城而逃。收复襄阳后，南宋中部的防线由汉水下游向北推至淮河一线，对南宋政权的稳定起到很大作用。

这时，伪齐不断南侵，南宋朝廷决心打击伪齐的嚣张气焰，于是开始了第一次进军中原的战争。可是在进攻伪齐的各路宋军中，只有岳飞所部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然而一支部队孤军深入，一时难以立足，因此只好退兵。岳飞退兵不久，伪齐发兵三十万，号称七十万大军进攻南宋。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杨沂中所部与伪齐东路十万大军相战于藕塘镇（今安徽省定远县），杨沂中率部全线进攻，大败伪齐军，俘虏敌军万余。面对如此无用的伪齐，金国干脆废了它，将其管辖的地区变成金国的一个省。赵构想投降金国，取伪齐而代之以的想法破灭了。可是过了不久，投降金国的绝佳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

绍兴七年（1137年）初，从金国传来宋徽宗去世的消息。赵构立刻派王伦赴金国迎奉宋徽宗的灵柩，同时向金国提出议和的请求。王伦带回金国方面的意见，同意赵构的请求，并且答应归还黄河以南的土地，具体条件慢慢谈，但必须由秦桧单独主持议和之事。在秦桧的主持之下，金宋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其内容有四：①南宋对金国称臣；②南宋每年给金国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③将河南和陕西地区划给南宋；④送还宋徽宗的灵柩和赵构的生母韦太后。至此，南宋收复了长期沦陷的故都，得以遣使祭扫皇陵。从当时的形势看，这是对南宋非常有利的议和条件，比可以接受的底线高出很多，所以赵构比较满意。

正当赵构和秦桧为投降求和成功欢呼庆贺的时候，金国统治集团内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河南、陕西的土地刚一交还，金国内部就发生了政变。由于和约对宋有利，金国方面反对的人很多。金国方面主和的人，正是将秦桧放归的完颜昌，与秦桧不清不白的关系，成了他受攻击的口实。由于金兀术等主战派对完颜昌的专权不满，政变成功后，主和派人物完颜昌被杀，主战派上台，金与南宋之间的和平协议被撕毁。金国元帅金兀术等人在夺回河南和陕西等地之后，渡过淮水，进攻宋朝的淮南地区。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395.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一日，消息传到临安，南宋朝廷命三大宣抚使韩世忠、张俊、岳飞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之衔，分别晋封太保、少师、少保，让他们负责指挥对金作战，抵御金军的入侵，收复失地。六月下旬，岳飞自鄂州到达德安府（今湖北省安陆市）时，赵构派来的监军李若虚也赶到了，并向岳飞传达了皇帝的旨意，让岳飞不要轻举妄动，在适宜的时候班师退兵。可是，岳飞认为北伐

中原收复失地的时机到了，坚决不同意退兵。李若虚说：“事已至此，不可退兵，违抗皇帝旨意的罪名，我李若虚承担。”岳飞在李若虚的支持下继续向北进军。经过几次恶战，岳飞所部收复了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颍昌（今河南省许昌市）、淮宁（今河南省淮阳区）、郑州、中牟及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战果。所向披靡的金军骑兵，终于在岳家军面前失去军事优势，金兀术感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⑩

可是，就在岳飞的先锋部队距离开封城仅百里的时候，赵构的班师诏书到了。岳飞不甘心，立刻上奏章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并且强调说：大功马上告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但是，岳飞的上奏刚发出，却接连收到十二道班师诏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十二道金字牌，岳飞只好下决心退兵。

就这样，一场因为金国背盟南侵而引发的战争，南宋方面在赵构和秦桧的阻挠下功败垂成。金兀术不甘心失败，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再次南侵。此次南侵同样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战场上的胜利，让赵构和秦桧觉得求和的最好时机到了。金国方面经历了这场失败，终于认识到宋军已今非昔比，消灭南宋已不可能，于是接受了南宋的议和要求。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3.

绍兴十一年九月，金国方面将宋朝两位被俘的将领送回，并让他们带话：金国要准备发动军事进攻，要求南宋做好准备。这显然是在胁迫南宋投降，赵构心领神会，立刻给金国回信，一方面对宋军击败金军表示歉意；另一方面表示，若金军再次南侵，宋军将坚决抵抗。最后请求金国方面宽宏大量，与宋朝重新签订和约。不久，金国使臣来到临安，带来了金国方面的议和文件：第一，金宋两国，以淮水为界；第二，宋朝每年给金国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第三，岳飞总想进攻河北，所以“必杀岳飞，而后可和”^⑪。

为了达成议和，在赵构的授意下，秦桧与张俊合谋，逼岳飞的部下王贵告发岳飞谋反。起初王贵不肯，可是张俊手中有王贵违法的把柄，王贵只好指控岳飞与副都统制张宪勾结，想占据襄阳谋反。张宪在镇江被捕，随后被押往临安大理寺监狱，岳飞和岳云父子二人也同时被捕。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绍兴和议签订；十二月末，岳飞被害于临安大理寺的监狱中，岳云和张宪也一起被处斩。

赵构为了与金国议和，不但答应了金国方面的全部条件，而且将唐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和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割让给金国。绍兴十二年（1142年）九月，金国派册封使臣到达临安，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帝，国号宋，世代臣服，永为藩属。许多人一定会感到不可理解：赵构在南宋与金国军力相当，而且在战场上取胜的情况下，为什么偏要放低姿态去求和，甚至如此屈辱地对金国称臣？

其实原因很简单。赵构怕金国扶持他的兄长宋钦宗赵桓当傀儡与他抗衡，从而影响甚至取代他坐上皇位。赵构内心的惧怕当然说不出口，表面却虚伪地说：“如果归还我父亲的灵柩和我的生母，我不怕屈辱求和；如果不归还，我也不惧怕战争。”实际上，赵构的生母及宋徽宗的灵柩到达临安时，南宋与金的议和早已完成。表面上看，赵构签订绍兴和议是为了迎回父亲的灵柩和生母韦氏，但这显然是借口。赵构的私心就是要获得金国皇帝的册封，使其建立的南宋得到金国的承认，具有“合法性”。这才是赵构的真实意图。就这样，由岳飞等爱国将领浴血奋战赢得的大好局面，被赵构的一己之私葬送了。

08 蒙古帝国如何实现南北统一

公元1279年，宋元双方在崖山外海进行了大海战，史称“崖山之战”。宋军战败，丞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至此，亚洲大陆基本被蒙古帝国征服，成为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帝国。那么，蒙古人是怎样造就这一格局的？这还得从蒙古人的崛起说起。

大蒙古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蒙古语意为“海洋”或“强大”之意。渴望帝国四周被大海环绕，就是要征服全世界。公元1206年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国称可汗，然后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历程。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汗，至蒙哥汗，前后发动了三次西征，共灭了40多个国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军灭西辽。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进攻花剌子模。灭了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继续在西波斯、高加索等地转战；击败格鲁吉亚人后，越高加索山进入钦察草原，大败钦察、斡罗思联军，横扫东欧草原。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第二年夏，末帝李睍投降，西夏灭亡。灭西夏前夕，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

成吉思汗病逝后，第三子窝阔台为新任大汗。窝阔台即位之初，派绰儿马罕率三万蒙古军远征波斯，彻底消灭花剌子模的残余势力，劫掠迪亚巴克尔（今土耳其东部）、美索不达米亚、埃尔比勒（今伊拉克北部）、起刺特等地。蒙古人的势力延伸至小亚细亚中部，直接与东罗马帝国毗邻。

公元1231年，蒙古军出征高丽，迫使高丽称臣；公元1233年，蒙古灭辽东的割据政权东夏国；公元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

公元1235年，蒙古军再次西征。公元1237年占领莫斯科，公元1240年攻占基辅。公元1241年，蒙古军兵分两路进攻波兰、匈牙利，在里格尼茨战役中歼灭波兰、日耳曼联军，赛约河之战歼灭匈牙利军六万，前锋一度抵达维也纳近郊。公元1241年年初，窝阔台病逝，远征军收到消息后停止作战，撤军东还。

公元1246年，贵由继汗位。公元1247年，西藏被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版图。公元1248年春，贵由突然病逝。公元1251年，蒙哥继位。蒙哥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公元1253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于次年灭大理国。

公元1253年，蒙哥指示其弟旭烈兀发动第三次西征。公元1256年，蒙古军抵达波斯，攻破木剌夷的城堡。公元1257年9月，旭烈兀率军向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发起进攻；公元1258年占领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公元1259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叙利亚，相继攻陷阿勒颇、大马士革等城，兵锋直抵加沙。

公元1258年，蒙哥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他本人亲率大军入四川；忽必烈领兵攻鄂州；大将兀良合台在灭大理后，迂回至越南北部，企图从南宋防御薄弱的湖湘地区发起攻击。公元1259年，蒙哥在攻打合州钓鱼城时去世。攻鄂州的忽必烈闻知蒙哥死讯后，匆忙与宋守臣贾似道议和，北返争位。

蒙哥去世后，忽必烈继承汗位。蒙古帝国分裂为五个各自为政的汗国。忽必烈实际管辖的版图主要包括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吐蕃地区、蒙古草原全境、西伯利亚南部及新疆东半部。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表明想成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从而使灭宋的战争成为统一国家之战。本来蒙古灭夏和金之后，就准备向南灭宋，可是，蒙古旋风却一直没有南下。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宋朝文化发达，经济富有，实力雄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这是不可否认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蒙古军队的长项是骑兵，在平坦的原野上可以如旋风一样所向披靡、驰骋千里。但是，南部中国河流纵横、城郭林立，蒙古战马无法发挥它的优势，因此，南宋因地利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南宋周边有很多政权，它们一旦联合起来，蒙古帝国要灭宋，难度就会更大。为了灭宋，蒙古帝国必须先先将南宋王朝孤立起来。因此，蒙古骑兵暂时放下南宋，征服南宋周边的国家，以形成对南宋的战略包围。这一点也的确证明了南宋真的很难被征服！

当北方各国均被征服之后，忽必烈于元宪宗三年（1253年）九月率十万大军出征攻打大理国。蒙古大将汪德臣率部入蜀，配合蒙古军主力的行动。忽必烈率大军兵分三路，全歼了大理国军队的主力。大理城内的王公贵族大部分溃逃，蒙古军很快进入大理城。忽必烈采纳谋臣姚枢的建议，下止杀令，安抚民众，稳定秩序。随后又派兵进攻大理国各地。1254年，大理国灭亡。

1273年，高丽投降，成为元朝的征东行省。这样一来，南宋王朝的东西两翼就完全被切断了。后来，元朝又征服了安南即现在的越南，南宋的西南方向也受到了威胁。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年仅三十五岁的宋度宗病死，其四岁的长子赵昀即位，是为恭帝。同年九月，元军分兵两路，西路由伯颜统帅，东路由合答领兵，分别继续向南进攻，目标是攻取荆湖地区。

咸淳十年十月，伯颜率主力二十万进攻郢州（今湖北省钟祥市），抗元名将张世杰率军抵御，元军受阻于郢州城下。伯颜遂决定绕过郢州，顺汉水南下进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张世杰派副将赵文义率军追击撤退的元军，赵文义战败身亡。十二月中旬，伯颜率部进攻长江北岸的阳逻堡（今湖北省武汉市阳逻）渡口，宋军坚守抵抗，击退元军进攻。

于是，元军派偏师乘雪夜从上游的青山矶（今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渡江。宋军守将率部抗击，战败受伤逃回鄂州。伯颜再次攻打阳逻堡，宋军守将战死，阳逻堡失守。于是元军开始大举渡江，鄂州守将献城投降。消息传来，南宋朝野震惊，贾似道任都督指挥各路军马，并向全国发出紧急诏书，调动各地兵马入京勤王。

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元军顺江而下，南宋重镇相继陷落。贾似道派使臣前往元军营中请求称臣、纳岁币以求和平，但是被元军拒绝。元军在东进途中与宋将孙虎臣所率宋军激战，宋军被打败。贾似道、孙虎臣乘船逃往扬州，弃守长江防线。郢州守将张世杰率军东进保卫临安，江西提点刑狱文天祥起兵勤王，来到临安。

德祐元年三月，元军接连攻占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十一月，伯颜亲率元军主力攻陷常州，随后兵分三路直取临安。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伯颜率元军主力到达皋亭山（今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南宋遣使请降，请求保留南宋社稷，封为小国。德祐二年二月，南宋恭帝出城投降。

景炎元年（1276年）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大臣在福州立年仅七岁的赵昀为帝，是为宋端宗。端宗的母亲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改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改年号景炎，延续宋朝政权，继续进行抗元斗争。这个时候南宋的疆域大部被元军占领，只剩下福建、广东、浙江东南和江西南部等地。

景炎二年（1277年）十一月，元军进入福建，张世杰、陈宜中等带着宋端宗和杨太后乘船逃亡海上。文天祥率军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地区，战败被俘，誓死不降，最终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市）。宋端宗、杨太后和张世杰等人的船队一直转战于福建、广东的沿海，未能成功登陆。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宋端宗病逝。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昀即位，年仅六岁，是为宋末帝，改年号为祥兴。陆秀夫任左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即1279年3月19日，元军在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东南）大举进攻张世杰所部，宋军战败。陆秀夫背着南宋末帝赵昀投海自尽，南宋灭亡。

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五十多年里，先后灭亡40多个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征服人口数目达6亿，建立了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可是，蒙古帝国的灭宋战争却花了二十多年。南宋是欧亚大陆最后被蒙古征服的国家，是蒙古帝国最难战胜的对手。

09 忽必烈的“祖述变通”为何行不通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64.

元宪宗十年三月二十四日（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在开平府（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登基，成为大蒙古国可汗。忽必烈在登基诏书中宣布：“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①那么，忽必烈究竟是怎样“祖述变通”的？这还得从他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说起。

元宪宗十年五月初一（1260年6月11日），忽必烈正式建年号为“中统”。王朝建立年号的制度由汉武帝开创，从此形成传统，一千多年来延续不变。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过去不知道何谓年号，现在终于有了年号。

忽必烈以“中统”为年号，表示他是中原的统治者。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将开平城升格为上都，作为驻夏行在；八月，又下诏将燕京（今北京市）改名为中都，准备在此建都。八月十六日，忽必烈根据《易经》中“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1264年）。

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十五日，忽必烈接受汉族大臣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改国号为元，既是对汉文化的承袭，又是标志着新文化的开启。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

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大都的设计遵循中国传统建筑样式。至元十年（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定都在大都，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从和林转移到大都（今北京市）。将首都迁到大都，又将国号改为大元，就是忽必烈的变通举措。

然而，忽必烈并没有丢下蒙古族祖先留下的传统，他遵循的是“祖述”与“变通”的统一。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初六日，南宋海上流亡政权残余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被消灭。至此，蒙古族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完成中华统一的少数民族。要想统治这个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完全靠蒙古族传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向中原学习。这就是忽必烈主张“变通”政策的依据。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65.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65.

忽必烈同时继承了蒙古可汗征服世界的野心。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元军第二次远征日本。再次失败之后，征服世界这项“祖述”的事业就此中止，但是，“祖述”的内容在忽必烈的治国政策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忽必烈反复强调，不敢忘掉“烈祖之规”^⑫，主张“稽列圣之洪规”^⑬，就是尽可能保留蒙古族的旧制。

但是，治理如此庞大且复杂的国家，光靠祖先的方法根本无效，必须“变通”。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99.

忽必烈在改元诏书中说：“拯民者莫如实惠。”^⑭这是为他的执政建构合理性基础。他必须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恢复战后经济、改善民生。忽必烈把自己看作拯救百姓的救世主，而拯救百姓就是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也是儒家治国理政的一贯主张。

忽必烈建立的大一统的大元王朝，是蒙古贵族长年征战的结果，这也意味着社会动乱不定而人民不能正常生活，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财政困难。因此，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家元气，人民生活安定，是忽必烈即位后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也是他确定经济方针的主要出发点。

忽必烈建立元朝、将首都迁到大都，尤其是灭了南宋政权统一全国之后，过去那种单纯的畜牧业经济远远不能适应这一新局面。因此，在“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指导下，忽必烈以解决人民温饱为主，从实际出发，采取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政策，以达到国泰民安，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

李修生，主编. 全元文[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54.

可是，忽必烈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在当时很难贯彻下去，因为“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用牧放孳畜”^⑮。为了贯彻发展农业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委派专职人员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和管理；颁布赏罚条例，促使各级官吏抓农业生产；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严禁伤害农民；采取宽裕的赋税政策，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并繁荣。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98.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98.

在原汉族聚居地区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忽必烈也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严禁以牧伤农，号召“蒙古户种田”^⑯，规定“有马牛羊之家，其粮住支；无田者仍

给之”^⑤，鼓励蒙汉杂处，提倡蒙古士兵与民共耕。扶助畜牧业、发展舍饲畜牧业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畜牧业生产也出现繁荣景象。

忽必烈还废止忽里勒台制度，改变裂土分封的旧传统，将全国领土完全置于中央集权制统治下；并且接受儒家的等级观念，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框架，维护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比如，忽必烈在接受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提升可汗的权威和对黄金家族的尊崇，并且将其发展为严格的等级制度。

然而，蒙古人的传统，忽必烈必须继承，这就是所谓的“祖述”。忽必烈建立元朝所沿用的蒙古旧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蒙古军队。忽必烈即位以后，一些传统的蒙古军事力量仍很有影响力。忽必烈保留了成吉思汗的御林军怯薛军，并给予他们特权和奖励。怯薛军人作为蒙古精英的一部分，一般都保有一定的军阶，忽必烈需要用他们来平衡他所征募的汉军势力。因此，他依赖怯薛军而不是汉军作为自己和宫廷要员的护卫军。同样，忽必烈在元朝境内各地驻军的过程中，觉得需要维持蒙古军的优势地位。这些驻防在首都、边疆地区、中亚及一些不安定地区的驻军，一直受蒙古将领的监督。

第二，继承分封制度。这种制度是成吉思汗确立的大蒙古国的统治方式。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国的势力不断南下，占领的中原地区被分封得七零八落。忽必烈即位之后，着手整顿了地方诸侯各自为政的现象。在中央，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并根据需要在全国设置固定或临时的分司机构，比如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对地方进行管理。

第三，沿袭达鲁花赤制度。“达鲁花赤”是蒙古语，意思是“盖印官”。他们是诸王、贵戚封地上的管理者，职责是维护诸王、贵戚的权益。忽必烈灭南宋并统一全国以后，继承了这一制度并向全国推广。在各局、院、司、所及各府、州、县，普遍设置达鲁花赤，充分体现了忽必烈处处维护蒙古贵族特权，防止大权旁落的意图。

第四，实行斡脱制度。“斡脱”是突厥语，意思是“伙伴”，专指突厥人和回族生意人。蒙古人本来不会做生意，他们将掠夺来的钱财交给斡脱放高利贷，做各种买卖，蒙古人分利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斡脱凭借蒙古统治者的支持，操纵了元代的商业，并享有种种特权。诸如不纳税，可以携带武器，不支差役，等等。元朝政府为他们设置“斡脱总管府”，他们成为元朝的官商。

第五，保护蒙古文化。为了防止蒙古族被汉族同化，忽必烈将蒙古人和汉人严格区分，以保护蒙古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比如，忽必烈会定期举行蒙古传统仪

式。每年八月，在离开上都前往大都度过秋冬前，他都会举行酹洒马奶的仪式。这种仪式由四个萨满共同主持，据说能保证来年的好运气。牺牲品包括马和羊，仪式中要祝天，并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

第六，坚持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忽必烈坚持蒙古族的许多生活习惯，比如，蒙古族妇女没有采用中原的缠足风俗；许多蒙古族人继续穿着本民族的毛皮服装；保持甚至迷恋狩猎活动，是忽必烈坚持蒙古族生活习惯最显著的标志。忽必烈在个人生活中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传统，他的四位妻子都是蒙古族人。

坚持民族传统，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对自己民族传统中落后的部分依然抱残守缺的话，就会埋下王朝灭亡的种子。

第一，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忽必烈采取汉法经营中原而不是汉化，蒙古贵族的特权得到了延续，草原的游牧生存方式得到了保护。在作为中国皇帝和元朝缔造者的统治期间，忽必烈一直试图维护他的蒙古统治者形象。他选择蒙古将领带领军队，在行政部门，他不完全依赖汉人，而是聘用非汉人帮助他治理国家。他把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

第二，实行军官世袭制。大蒙古国统兵的将领，根据手下士兵人数的多少决定官爵和地位的高低，他们的官爵是世袭的。忽必烈将这种世袭制度基本继承了。忽必烈所谓的“祖述”不是随便说说，而是身体力行，因为，忽必烈毕竟代表了蒙古贵族。

第三，保持野蛮的蓄奴制。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在社会形态上比较落后，基本处在奴隶社会。因此，在攻城略地的同时掠夺大量人口充作奴隶，是大蒙古国自建立以来的基本国策。忽必烈继承了这一传统，因此，元朝盛行蓄奴，各个领域都会使用奴隶，如军需品生产、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这给元代的经济制度打上奴隶制残余的烙印。

第四，控制马匹供应。作为蒙古人，忽必烈当然知道马的军事价值，因此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马匹供应体系，以满足帝国扩张领土、抵御敌人的需要。为了提供稳定可靠的马匹供应以备战争，忽必烈创建“马政”，并制定章程来保护马匹。他对私藏马匹的汉人家庭严惩不贷，一些企图横跨边界向忽必烈的敌人走私马匹的汉人和回族商人，也受到了严厉处罚。

第五，取消科举制度。起初，忽必烈曾试图迎合汉人，建立了一个类似传统中原王朝的政府，而且通过采用儒家礼仪，赢得了许多汉人的拥戴。虽然他聘用了许多汉人在他的朝廷里担任要职，但是他没有采用汉人传统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

这使得大量有文化、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民间，成为当朝的不合作者，最终演化为王朝的推翻者。

第六，坚持扩张政策。忽必烈一直坚持蒙古传统的扩张政策，他在统治王朝的最后十多年中，发动了一连串军事远征，导致惨重的损失。比如对日本和东南亚进行的战争都是冒险行动，对国家毫无益处。再加上忽必烈本人和蒙古宫廷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

总之，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世界历史上空前庞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他虽然是背负深厚游牧传统的可汗，但是却有着独特的眼光，采取“变通”的治国理念，使王朝一度成就辉煌。然而，他的“祖述”没有彻底摆脱某些落后的传统，他在世时，王朝内部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最终，庞大的“大元大蒙古国”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

第七章 落日与残阳的挽歌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将元朝势力赶过长城，形成明与北元对峙的局面。朱允炆即位后，在儒生的影响下以仁政治国，却消失在那场宫中大火里；燕王朱棣兴兵“靖难”，推翻建文朝，改元永乐，征蒙古，下西洋，耀大明之国威，却劳民伤财；于谦是抵抗外敌的英雄，却被明英宗下旨处斩；王阳明“知行合一”，却险些丧命；世宗皇帝为维护个人权威，下令廷杖大臣；张居正铁腕行政，死后却被抄家；朱由检这位末代皇帝，最终以自缢的方式结束生命。总之，大明王朝虽然辉煌过，却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末期。明清之际，天崩地坼，这是历史上最后也是最惨烈的一次王朝更迭。

大清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专制王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开辟了仅次于元朝的广袤疆土，并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样性，给今天的共和国留下丰厚的遗产。

01 朱元璋为何犯兵家之大忌

朱元璋. 明太祖文集补编[M]. 合肥: 黄山书社, 2024: 42.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甲子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出发前，朱元璋发布《谕中原檄》，其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①这口号虽然振奋人心，但朱元璋的战略决策却犯了兵家大忌。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得先讲一讲朱元璋的战略部署了。

朱元璋在发布《谕中原檄》的同时，下达了北伐和南征的命令，而且兵分四路：第一路，徐达和常遇春率主力军北伐中原；第二路，胡廷瑞由江西进入福建；第三路，戴德率部出湖广进攻广西；第四路，汤和与廖永忠率领水军，肃清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之后，由海路进攻福建。南北两线，四路用兵，这就犯了兵家大忌，直接影响了北伐的战略方针和最后结果。限于手中的兵力，两线用兵、四路作战的朱元璋只能制订一个分四步完成的作战计划：先攻克山东，再占领河南，然后拿下潼关，最后进攻大都。这个作战方案看起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却并非最佳方案。那么最佳方案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让汤和率领全部水军悄悄北上，进攻海津镇（今天津市），登陆之后向北占领长城一线，切断元朝政府退往草原的道路。与此同时，徐达、常遇春率主力迅速北上，对大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举拿下大都之后，将元军主力合围在长城内线一带予以歼灭。

朱元璋不会想不到这个方案，因为他灭张士诚时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朱元璋制定了一个“剪除两翼，中心决战”的战略方针，彻底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继续采用这样的战略方案？原因很简单，他并不否定元朝政府的合法性，不想做前朝的推翻者，更不想落下弑君篡位的恶名。他希望成为元朝合法的继承人，并且得到元朝政府的承认。出于这种考虑，他当然不能对元朝政府赶尽杀绝。这正是他敢于犯兵家之大忌，采取两线作战、四路出兵的原因。

当徐达和常遇春攻占济南的消息传到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时，朱元璋立刻举行登基大典。新一代王朝建立，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此时，前方将士还在浴血奋战，朱元璋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

据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占领山东之后，新王朝就有了抵御元军南下的屏障；第二，登基称帝之后，朱元璋的作战行为就不再是地方军阀扩张势力范围，而是中央政府统一天下的行为了。因此，登基大典完成之后，北伐的第二步就开始了。很快，明军占领汴梁（后改称开封），不久又拿下潼关，北伐的第三步也完成了。

就在这个时候，明军却突然停下了进攻的脚步，因为朱元璋从南京北上开封。名义上是他要视察前线部队，并且考察开封城——据说，朱元璋有意将大明王朝的首都建在这里。朱元璋视察完开封之后，将其更名为“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陪都。几个月之后，朱元璋才下令进攻元大都。

可是当徐达率领明军进入元大都时，元惠宗早已带着太子、嫔妃和朝廷一百多名王公大臣逃出大都，奔往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一个完整的元朝政府北上进入蒙古草原，史称“北元”。元朝的精锐部队在元惠宗的带领下退回蒙古草原，为日后北元与明朝之间的对抗埋下无穷的后患。

攻占元大都后，明军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北伐。目标不是上都，而是肃清山西、陕西及附近地区残余的元军，这就给北逃的元惠宗留下了喘息的机会。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九月，明军分两路进攻山西，一路由常遇春率领，攻克保定和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攻克怀庆（今河南省焦作市），然后由南向北进入山西。第二年元月，徐达从东向西进入山西；当年三月，明军占领冀宁（今山西省太原市）。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徐达率军渡过黄河进入陕西，数月后就占领了陕西大部分地区。十二月，扩廓帖木儿率军围攻兰州。明军立刻出兵救援，结果中了扩廓帖木儿围点打援之计，明军的援军全军覆没，明将于光战歿。西路明军严重受挫的同时，东路明军的统帅常遇春猝逝，年仅四十，明军遂暂停了对元朝残余势力的追击。

常遇春去世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极为悲痛。当常遇春的遗体运到南京举行国葬时，朱元璋亲自送葬，并且将徐达等将领从前线召回参加葬礼。当徐达等主要将领奉召回南京的时候，扩廓帖木儿乘机骚扰平凉和兰州。好在兰州守将顶住了围攻，扩廓帖木儿未能得逞。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调整战略。在制定新的进攻方略时，包括徐达在内的所有将领都建议，大军应直扑元顺帝所在的应昌（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亚达里诺尔湖西侧），逼扩廓帖木儿从兰州撤兵。有人因此说徐达等人不愿与扩廓帖木儿交锋，多少对他有些畏惧。可是我认为这是围点打援之计，是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的最佳方案。朱元璋却力排众议，命令明军兵分两路。西路由大将

军徐达自潼关经西安，解兰州之围，并伺机歼灭扩廓帖木儿；东路由接替常遇春的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兵直捣应昌，进攻元朝皇帝。朱元璋用主力进攻扩廓帖木儿，实际上就是想放元朝皇帝一马。

当时，扩廓帖木儿虽然击溃明朝援军，但无法攻陷兰州，只好移驻安定（今甘肃省定西市），派游击部队四处劫掠，百姓颇受其害。洪武三年（1370年）春，朱元璋再次任命徐达为大将军，自潼关出发，向西进兵，直捣定西，进攻扩廓帖木儿。当徐达率军到达安定时，扩廓帖木儿退守沈儿峪。徐达领兵与元军对峙。徐达对元军发动进攻，元军拼命抵抗。第二天，双方为争夺沈儿峪，殊死决战。最终，明军击溃了元军，俘虏了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一千八百六十多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多人，马驼杂畜数以万计。扩廓帖木儿带着妻子和几个随从杀出重围，逃离甘肃，穿过宁夏，直奔和林（今蒙古国哈拉和林）而去。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986.

洪武三年四月，元惠宗在应昌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元昭宗。朱元璋得知元顺帝驾崩的消息之后，追谥元惠宗为“顺帝”，理由是元惠宗“知顺天命，退避而去”^④。意思是元朝皇帝顺应天命，退避到草原上，把江山让给了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就是元朝政府合法的继承人，而不是弑君篡位者了。

就在北元处在大丧之际，李文忠率领明军，突然对应昌发起猛攻。北元后妃及元昭宗的儿子买的里八剌被俘，只有元昭宗率十几个人骑马突围，逃往和林。大胜形势下，朱元璋却突然下令停止进攻，结束了第二次北伐，同时命令傅友德率主力南下进攻四川。这就给了北元残余力量再一次喘息之机。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还是那个原因，他不否认元朝的合法性，不愿对北元君臣穷追猛打，怕留下弑君篡位的恶名，甚至希望北元政府承认大明王朝。

就在朱元璋的大军南下进攻四川的时候，元昭宗与扩廓帖木儿在和林会合了，君臣二人为了匡复元朝大业，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元昭宗任命扩廓帖木儿为右丞相，共谋大计。显然，这个时候的北元政府和扩廓帖木儿再度成为大明王朝的劲敌，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第三阶段的北伐。

洪武五年（1372年）三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准备深入蒙古腹地攻击和林。号称十万大军的扩廓帖木儿，这次再度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徐达调集了十五万骑兵，兵分三路。中路由徐达亲自率领，由雁门关出发直趋和林，意图摧毁北元大军的指挥部；东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领，由居庸关出发至应昌，然后直扑图拉河，从东北方向袭击和林；西路由征西将军冯胜率领，进入甘肃作为疑兵，令北元君臣摸不清明军的真实意图。

徐达的中路军遭到扩廓帖木儿的伏击，明军战死数万人。东路军由李文忠率军进至鄂尔浑河时，被元军包围。李文忠虽然杀出重围，却损失惨重。只有西路的冯胜取得胜利。这次战役挫败了明军的锐气，保住了北元的命脉。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将元昭宗的儿子买的里八剌遣返回草原，给元昭宗带回一封信，希望元昭宗能够承认大明王朝，更希望买的里八剌能够继承皇位，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可是，洪武年间北元对明朝的敌对政策一直没有改变。

总之，由于朱元璋不愿彻底推翻元朝，避免落下弑君篡位的骂名，幻想让元朝廷承认大明王朝的合法地位，因此在北伐战争中采取了错误的战略，致使元朝廷逃进草原深处，形成北元与明朝对峙的局面。在后来的十五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基本采取守势。明朝与北元从此以长城为界，形成对峙局面。虽然永乐年间，朱棣曾经五次亲征漠北，但是明朝北部的边患始终没有消失，一直伴随到大明王朝的灭亡时刻。

02 施仁政的建文帝为何葬身火海

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朱棣率大军攻入首都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并包围了皇宫。朱棣下令停止进攻，皇宫却突然起火，大火被扑灭之后，建文帝朱允炆从此下落不明。朱棣率军进攻首都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靖国难”，史称“靖难之役”，其实这不过是发动兵变的借口，推翻建文帝，篡夺皇位才是目的。那么，朱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还得从建文帝改革说起。

朱元璋. 明太祖文集补编[M]. 合肥：黄山书社，2024：50.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日，朱元璋驾崩。根据朱元璋的遗诏，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成为大明王朝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为什么将皇位直接传给了孙子，而不传给儿子呢？因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太子朱标突然去世，年仅三十八岁。朱元璋为了维护“国家建储，礼从长嫡”^①的制度，便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时候，年纪刚满十五岁；朱元璋去世后的第七天，朱允炆即位，年仅二十一岁，无论才能、勇气还是谋略，他都无法和叔叔们相比。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皇位继承人，不是因为能力，仅仅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这说明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合法，却并不合理。因为它无法保证最优秀的人继承全国的最高权力。

年轻的建文帝温文尔雅，富有书卷气，可惜他没有治国经验。温顺的性格和儒家的教育使得他最关心的是减轻祖父高压政策对百姓的影响，他向往的是儒家推崇的仁政。因此，朱允炆即位后不久就实行了一些较大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却招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这灾难并非仁政本身造成，而是因为当时的现实及朱允炆的个人能力，无法将仁政真正落实。

建文帝的所作所为与他的三位儒家师傅密切相关，他们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黄子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他在朱元璋时代担任过很多官职，建文帝任命他为翰林院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齐泰是一位经学家，同时又精通兵法，所以建文帝让他担任兵部尚书；方孝孺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但没有中过举，建文帝即位之后他才被召为翰林院侍讲。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年轻的皇帝。建文帝与这几位儒家师傅有一致的理想，因此对他们言听计从，并且开始进行政治和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恢复丞相的职能。建文帝召集这三位儒生

参与国事，主管朝政，并且将他们的地位置于六部之上。这三个人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职能与以往的丞相极为相似，缺少的只是丞相的头衔；第二，提高文官的待遇；第三，加强儒生的作用。

建文帝不仅改革国家制度，而且采取的治国方法和政策也与朱元璋不一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恢复法治。禁止根据《御制大诰》审理案件，要求严格遵守《大明律》。第二，宽刑省狱。纠正了大量洪武时期的冤假错案，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比洪武朝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第三，减轻赋税。建文帝制定了一些新措施，减轻前朝过重的税收，最重要的是减少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和松江两个府的土地税。

显然，建文帝的这些做法，都是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人用儒家治国理念指导皇帝的结果。这三个人制定这些新政策，努力实现儒家的仁政，表明他们都是勇敢、正直、有理想的人。但是，他们毕竟是书生，既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又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大都限于书本知识，纸上谈兵，甚至可以说是“书生误国”，最典型的就是削藩之举。

虽然建文帝仁慈、宽厚的治国精神比朱元璋有更大的道德优势，但却暴露出他无法克服的局限和弱点。当然，这些局限和弱点并非仁慈、宽厚本身的问题，而是朱元璋留下的政治遗产不允许建文帝仁慈、宽厚地当皇帝。那么，朱元璋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那就是他分封在全国各地的二十五个藩王。

朱元璋为了巩固朱家的天下，把自己的儿子们都封了王，并且赋予军权，让他们保卫大明江山。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后，朱元璋坚持挑选嫡长子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但是这位皇储不但年轻，而且过于柔弱，怎么办呢？朱元璋担心开国元勋尾大不掉，性格柔弱的皇太孙驾驭不了他们，于是痛下决心，屡兴大狱，滥杀功臣，目的就是替皇太孙扫清执政的障碍。朱元璋清理了异姓功臣之后，让同姓藩王守朱氏江山。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同姓藩王，成了朱允炆登基之后最大的麻烦。

这二十五位藩王都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尤其是朱元璋九个年长的儿子，封在北部边境和长江中游，任务是抵御蒙古侵略和镇压国内叛乱。藩王享有巨额年俸和很大的特权，并且世代相传。虽然他们对封地内的平民百姓没有直接行政权，但是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部队。其中以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他们各自带有十多万军队，可以说兵强马壮。

因此，朱允炆即位之后，拥兵自重的藩王根本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建文帝面对藩王的威胁，与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人商议应对之策，最终一致决定削藩。于是即位仅几个月，建文帝就开始削藩，半年之内连削了五个藩王。洪武三

十一年（1398年）十二月，为了防范燕王谋反，朱允炆任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今河北省唐山市），并调走了原属燕王管辖的北平军队。

在建文帝开始削藩的时候，朱棣就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其实，燕王朱棣对这一天早有准备。比如，他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自己的部队，同时让对新帝不满的宦官在宫中做内应。只是朱棣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此前建文帝因担心燕王造反，让他将三个儿子送到南京当人质。

为了让朝廷放心，朱棣开始装病，后来又装疯，目的是欺骗朝廷，好将他的三个儿子放回北平。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建文帝批准朱棣的儿子回到北平，燕王这才开始全力策划军事行动对抗朝廷。但是燕王府长史葛诚向朝廷告密，皇帝因此知道朱棣是装疯，于是下密旨，令张昺、谢贵逮捕燕王府的官属，令张信逮捕燕王本人。令人意外的是，张信却将皇帝的密旨内容告知了朱棣。

朱棣得知皇帝下密旨要逮捕自己，立刻找姚广孝商议对策，二人很快达成一致：立刻起兵。就在这时突然风雨交加，檐瓦落地，朱棣觉得是不祥之兆。可是姚广孝却说：“这是祥兆，飞龙在天，风雨从之；房瓦落地，要变颜色。”朱棣不再犹豫，命令张玉和朱能带八百勇士在燕王府潜伏。

张昺、谢贵遵从皇帝密旨，于当年七月初四带兵包围了燕王府。朱棣假称已将他的属下全部捆绑起来，请二人进府查验。待二人进府后，燕王府内潜伏的勇士突然杀出，将二人擒获，连同府内叛变的葛诚等人一同处决。当天晚上，朱棣领兵攻下北平九门，进而控制了整个北平城。于是，燕王朱棣以诛杀齐泰、黄子澄等奸臣的名义，打出“靖难”的旗号。

燕王领兵南下，姚广孝留守北平，辅佐世子朱高炽守城，一场争夺皇位的内战爆发了。朱棣起兵之初，燕军只据北平一隅，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可是仅三年多时间，燕军就攻进南京，包围了皇宫，建文帝自焚而死，建文朝被推翻，仁政举措失败。

建文帝削藩之举为什么会失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优柔寡断。比如，朱元璋死后，诸位藩王要来南京奔丧，如果要削藩，这就是最好的机会。但是，建文帝却下诏书不允许诸王进京奔丧。第二，操之过急，即位仅三个月便开始削藩。第三，战略失误。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等藩王，剪除燕王的羽翼，然后等时机成熟再一举削掉燕王。结果他却打草惊蛇，让燕王有了准备。

总之，由于建文帝的优柔寡断、操之过急加上战略失误，燕王朱棣得以打着“靖难”的旗号挑起内战。三年内战，皇帝的军队被燕王打败，南京守将开城投降，

京城陷落，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之后销声匿迹。建文帝主持的改革就此终止，所有新政全部被废除，一切又回到朱元璋的洪武时代。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仅有儒家的仁政理想，没有合适的方法与政治头脑，是极难成功的。

03 一代名臣于谦为什么被处斩

明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的西市也就是西四牌楼，兵部尚书于谦将要被公开处斩。这天的北京，阴霾密布，乌云压顶，西四牌楼挤满了为于谦送行的百姓。有的人用酒祭奠，有的人暗自流泪，很多人失声痛哭，人们都知道于谦是冤枉的。那么，英宗朱祁镇为什么要处死于谦？于谦究竟犯了什么罪？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629.

当时指控于谦的罪名是“迎立外藩”^②，这可是谋逆之罪。于谦真的犯下了这种谋逆之罪吗？这还得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故说起。

这一天，明英宗亲率二十多万明军主力，在土木堡与瓦剌军交战，结果全军覆没，近百名文武官员战死，明英宗朱祁镇被俘。面对这种局面，明朝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应对危机。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帝一旦被俘，明朝政府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就在这紧要关头，明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宣布：由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暂时负责处理朝廷事务，并且要求各位大臣必须听从郕王的命令。两天之后，孙太后又下诏，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郕王朱祁钰为摄政王。其实这是孙太后将全国最高统治权交给朱祁钰的条件，以确保皇位不会离开自己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一脉。

更为棘手的是，瓦剌人将明英宗朱祁镇当作人质，来到边境各关隘叩关。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瓦剌太师也先挟持着朱祁镇来到了大同城下，向城内守将提出用钱赎回皇帝的要求。他答应，只要付给足够的赎金，就可以将明英宗接回去。大同守将郭登信以为真，为了将皇帝从瓦剌人手里赎回来，按照也先的要求，凑足了一万两白银送上，可这一万两白银，就如同“肉包子打狗”。

面对大明王朝空前的军事危机，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讨论解决办法。还没等大家发表意见，一个名叫徐珵的翰林院侍讲建议：“根据我近几天的观察，发现天象有灾变，因此，解决目前灾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首都迁到南京去。”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545.

就在这个时候，于谦厉声呵斥道：“谁说要把首都迁到南京去，就应该斩了他！难道你们忘了宋朝南迁的历史吗？”郕王朱祁钰在孙太后的支持下，也完全赞同于谦的主张，决心死守北京，与来犯之敌战斗到底。于谦请求郕王朱祁钰立刻下

令，紧急征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也就是预备役部队，山东沿海一带的“备倭军”也就是海防部队，以及周围各府的运粮军，立刻前往京师。一句话，调动全国的力量，准备迎战瓦刺人的入侵。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军队和粮草纷纷抵达北京。京城很快聚集了二十多万人马，京师地区“人心稍安”^⑤，局面得到了稳定。郕王朱祁钰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保卫战。

这个时候，皇帝成了敌人手中的一张王牌，明朝政府完全受制于敌人。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改变，否则这仗没法打。于是，以礼部尚书胡濙、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与朝廷中许多大臣联名给孙太后上疏，请求孙太后同意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面对瓦刺人的压力和大臣们的建议，孙太后只得同意。这一招叫“釜底抽薪”，让瓦刺人手里的明英宗这张牌彻底失去要挟的力量。几天之后，登基大典举行，朱祁钰即皇帝位，尊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改年号为景泰。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明代宗朱祁钰下达敕令，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成为明朝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开创了明朝文臣掌握军事权的先例。与此同时，瓦刺太师也率全军挟持太上皇朱祁镇，攻破紫荆关。京师地区的局势非常危险，右都督石亨建议，收缩兵力入城，在城外实行坚壁清野，以困敌军于京郊。于谦反对说：“万万不可，我们一旦收缩兵力，敌人会更加轻视我们。”在否定了石亨的建议之后，于谦立刻调兵遣将，在北京各个城门之外布置防御阵地，于谦和石亨等人专守德胜门外，因为这里是瓦刺军的主攻方向，防守的任务最为艰巨；同时命令兵部侍郎吴宁坚守京城，关闭所有城门，亲自督战。

谷应泰，等.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2015：485.

这个时候，在土木堡之战中投降的太监喜宁给也先出主意，让明朝的大臣出城迎接明英宗大驾，如果想要把明英宗安全带回国，必须付白银一万万两。京城守军回应：“在上天和祖先的保佑之下，大明王朝已经有新的皇帝了。”朝廷中有人主张答应也先的条件。于谦回答说：“社稷为重，君为轻。”^⑥

索要赎金被拒绝，提出谈判被否定，手里的人质失去作用，也先只好硬着头皮开始进攻，瓦刺军主力直扑德胜门。于谦命令石亨在城外无人居住的民舍中设下埋伏，因为这里的居民事先都撤进了城，然后再派出少数骑兵到瓦刺军的阵营前诱敌。也先立刻派一万多骑兵追过来，这时，事先埋伏在民舍里的神机营突然出现在敌骑兵周围，一阵猛烈的炮火打得瓦刺骑兵落花流水，也先的两个弟弟当场被炮火击毙。也先见德胜门无法得手，就转而进攻西直门、彰义门（即现在的广安门），但都被明军官兵奋力击退。

也先带着瓦剌军在北京城外与于谦带领的明军官兵相持了整整五天，觉得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达不到了，占不了什么便宜，又听说全国各地的勤王部队正在逼近京城，害怕被断了后路，只好带着朱祁镇向西退却。于谦带着明军乘胜追击，一直将瓦剌军赶出关外。

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第二年，也先派代表向明朝政府提出议和的请求，并且提出将太上皇朱祁镇送回北京。明代宗朱祁钰派出使者迎接朱祁镇回京，随后却将他软禁在南宫，由锦衣卫严加看守，不让他与任何人联系。朱祁镇名义上是太上皇，其实和阶下囚没有多大差别。

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不顾众多大臣和皇后汪氏的反对，执意废黜太子朱见深，改封他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朱见济被立为太子后不久便暴病身亡。朱祁钰只有一个儿子，皇位的传承再次成了大问题。有的大臣力主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朱祁钰听后大怒，立储的事情就此被耽搁下来。很显然，朱祁钰觉得自己还不到三十岁，一定能够再生儿子并立其为太子。可是朱祁钰一直疾病缠身，到了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病情开始恶化，连每年正月十三日举行的祭祀大典都无法出席了。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大将军石亨、宦官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曾经主张首都南迁的徐理）发动政变，拥立明英宗朱祁镇复辟，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朱祁钰被废为郕王，迁出皇宫回到郕王府。一个月后，朱祁钰病逝。

明代宦官史料长编[M]. 胡丹，辑考.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374.

“夺门之变”让朱祁镇恢复了皇帝身份，于是，他立刻将于谦等人打入大牢。徐有贞、石亨等人在弹劾书中对于谦的指控是：“欲召外藩入继大位，事虽传闻，情实显著。”^⑤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言下之意是，我认为你有这种想法，就可以给你定这个罪名，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550.

于谦究竟有罪无罪，皇帝朱祁镇心里当然非常清楚。虽然他成功复辟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将于谦以“谋逆罪”关进了死牢，可是，他无法否定于谦为大明王朝建立的功勋。没有于谦保卫京城，他朱祁镇根本不可能重返北京。然而，朱祁镇还是一边说着“于谦实有功”^⑥，一边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那么，朱祁镇为什么非杀于谦不可？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550.

说来原因很简单。通过“夺门之变”这种手段恢复皇帝权力的朱祁镇，首先面临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此次政变的合法性。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①意思很明白，如果于谦无罪，我们夺权就有罪；如果给于谦定罪，那么我们夺权就是合法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朱祁镇不再犹豫，下旨杀了于谦。显然，于谦是皇位争夺与同僚倾轧的牺牲品。

由于土木之变、京师保卫战、皇位争夺和于谦被杀这一系列事件，大明王朝在军事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其一，军事上从此一直居于守势，而且被动挨打；其二，皇帝的军事权力被文官集团控制；其三，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出现了矛盾；其四，文官集团内部出现朋党之争。这一切，使得大明王朝衰落的趋势更加明显，也是导致大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04 王阳明为什么受到诬陷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同年七月初，朱宸濠亲自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号称十万大军，从他的封地江西南昌出发，连续攻克南康、九江两城之后，出鄱阳湖，顺江东进，围攻安庆，兵锋直指南京城。

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随后，王阳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仅用三十五天就平定了朱宸濠的叛乱。然而，王阳明的赫赫战功却差点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得说说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了。

朱厚照不愿意受到任何束缚，可是，当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因此首先，他想方设法摆脱了后宫（例如他的母后）对他的控制。他在紫禁城外修建了一处园林住宅，因为其中豢养了一些虎豹，因此称为“豹房”。朱厚照下令在园里的空地上搭建帐篷，他不住房间而住帐篷，似乎是在追求野外宿营的感觉，但更渴望体验军旅生活。帐篷内不但放置铠甲，而且还有炸药、佛郎机（即葡萄牙）炮。炸药和火炮都是军事演习用的，附近的居民不仅能听见战马的嘶鸣声，而且经常能听见隆隆的炮声。

正德十四年七月，宁王朱宸濠举兵造反，明武宗朱厚照立即意识到，自己掌握全国军权的机会到了。因为自从他的曾祖父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后，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权就完全落在了文官集团手中。为夺回军权，朱厚照不顾文官们的坚决反对，决定御驾亲征。当年八月二十日，朱厚照与江彬等人率一万大军从北京浩浩荡荡地出发，前往江西征讨宁王叛乱。可是第二天，王阳明派的信使就到了京师，向朝廷汇报朱宸濠的叛乱已经被平定了。内阁首辅杨廷和接到捷报，立刻命人将捷报送到武宗皇帝驻扎的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

无论是内阁首辅杨廷和，还是跟随武宗皇帝一起出征的大学士梁储、蒋冕等人，都劝武宗皇帝班师回朝，没有必要再去江南。可是，皇帝朱厚照、随行的将领，以及皇帝身边的佞臣，都不甘心让王阳明夺了头功，也都认为平叛的功劳本应该属于他们。江彬、张忠等人揣摩到武宗皇帝不想回京的心理，就将矛头指向了王阳明。他们诬陷王阳明与宁王朱宸濠勾结，只是看到形势不对，才转头擒拿宁王，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平定了叛乱？

如何从王阳明手中把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劳抢回来？武宗朱厚照和众位将军及太监、佞臣们一起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朱厚照在山东临清停留，派出张忠和许泰日夜兼程赶往南昌，同时命令太监张永驻扎在浙江杭州。

张忠和许泰给王阳明罗织了四大罪名：其一，王阳明与宁王朱宸濠有勾结；其二，王阳明假传圣旨，调动各处兵马；其三，王阳明打乱了朝廷征伐宁王的计划；其四，王阳明放纵属下，抢夺宁王府中财物。在这四条中，只有第二条属实，但这也是王阳明迫不得已做出的决断。张忠、许泰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让王阳明把宁王朱宸濠放了，然后由武宗皇帝亲自抓他一次。这样一来，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劳就是皇帝的了。

面对如此荒唐的皇帝，王阳明能怎么办？经过深思熟虑，王阳明决定将宁王朱宸濠交给太监张永，以免除自己的祸患。决心下定之后，王阳明赶到杭州，要求面见张永。张永本来不想见王阳明，怕给自己惹麻烦，可是看到张忠、许泰、江彬等小人要故意加害王阳明，他又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接见了王阳明。经过一番交谈，张永不仅为王阳明的才学、眼界所折服，还被王阳明的胸襟、气度感动。他决定帮王阳明一把，便将朱宸濠收监在杭州的牢里，并且劝王阳明向武宗皇帝低头，把功劳让给皇帝。王阳明立刻答应照办，并火速回到南昌。

此时，张忠、许泰已经领着北方官军进了南昌城。其目的有三：一是从王阳明手中抢宁王朱宸濠；二是查抄宁王府，搜罗金银财宝；三是罗织王阳明的罪名，置王阳明于死地。可是朱宸濠已经被王阳明带到杭州交给了张永，宁王府也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没有留下任何金银财宝，而且王阳明此时并不在南昌，他们连盘问的机会都没有。张忠、许泰的三个目的都没达成，不禁怒火中烧。

张忠、许泰将所有怒气都转嫁到了南昌官员和百姓身上。他们放纵京城来的将士在南昌城胡作非为，惹怒了吉安知府伍文定，后者要对张忠、许泰等人动武。张忠、许泰为了杀一儆百，将伍文定逮捕入狱，要给王阳明一个下马威。除掉伍文定就能削弱王阳明的实力，并且震慑南昌所有官员。为了罗织王阳明的罪名，张忠、许泰探听到王阳明的学生冀元亨曾经去过宁王府，便对冀元亨严刑逼供，让他指认王阳明勾结宁王谋反。冀元亨忍受了各种酷刑，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诬蔑王阳明的话。

王阳明赶回南昌，知道伍文定被囚，弟子冀元亨受酷刑，顿时心如刀绞。但为了大局着想，王阳明只能忍住内心的怒火，努力阻止这帮佞臣继续祸乱南昌。按理说，王阳明并没有得罪张忠和许泰，他俩为什么对他恨之入骨？就是因为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抢了他们的头功。他们对京军士兵说，王阳明抢了本应该属于京军的战功，并且将宁王府的财宝全部据为己有，中饱私囊，还让京军在南昌受苦。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165.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王阳明思索着如何化解矛盾，度过危机，全身而退。经过几天的观察，王阳明发现，如果要想让张忠、许泰离开南昌，就必须消除京军的疑惑。虽然张忠、许泰故意放纵京军对王阳明进行谩骂，可是王阳明不为所动。当时南昌的天气开始转凉，京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初到江南，不适应既冷又潮湿的气候，很多人都生病了。王阳明对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京军士兵，特意找来郎中给他们看病；对客死异乡的士兵，王阳明让衙门好生安葬。这一系列真诚的举动，终于赢得了京军的好感和信赖，纷纷表示：“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

张忠、许泰见京军被王阳明感化，自己有可能被孤立，觉得不能再在南昌待下去了；再待下去，京军就都成了王阳明的支持者了。可是，既没有抓到宁王，又没有捞到财富，也抓不住王阳明的任何把柄，他们实在太不甘心了。于是，他们决定向王阳明敲诈一笔钱。当二人索要钱财时，王阳明却回答：“江西这些年来一直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经济困难，实在拿不出多少钱了。”巧妙地拒绝了张忠等人的敲诈勒索。张忠、许泰一点好处都没有捞到，当然不想善罢甘休。可是，京军将士已经在南昌住不下去了，一致要求返回京城。张忠、许泰只好决定班师北归。

王阳明心里清楚，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张忠、许泰和江彬等人一定会在武宗皇帝面前进谗言、告刁状。果然，武宗皇帝到达南京后，许泰多次假传圣旨，让王阳明去南京觐见，想等王阳明进了南京后再设法陷害他。幸亏太监张永暗中传递消息，王阳明才没有钻进许泰的圈套。许泰见王阳明不上当，于是就跟武宗皇帝打赌，说王阳明心里有鬼，听到皇帝的召见，必定不敢来见皇上。

太监张永立即将这个信息通知了王阳明，让他做好应对之策。王阳明知道这次是真的召见，特意向武宗皇帝呈上了自己北上的行程，表明自己不日即将到达南京。武宗皇帝赢了与许泰的赌局，非常高兴，于是下旨让北上的王阳明原地待命，先不要进南京。王阳明只好在芜湖弃船登岸，上九华山到处游览，过了一段优哉游哉的日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可是宣读皇帝圣旨的使者并没有返回南京，而是暗中跟踪王阳明，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669.

王阳明上了九华山后，这位使者立刻回到南京向皇帝汇报。武宗皇帝被王阳明的举止逗乐了，于是再次下诏，令王阳明返回江西。王阳明回到南昌后，重新上报平定宁王叛乱过程，将平叛的功绩归于武宗皇帝的运筹帷幄，并且夸张地描述张忠、许泰等人冲锋陷阵，只字不提自己在战斗中的表现。这下武宗皇帝觉得自己有面子了，张忠、许泰也觉得有了功绩，于是不再给王阳明罗织罪名，王阳明终于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危机。也许有人会因此指责王阳明为保命而撒谎，对皇帝与

佞臣过于谄媚，但是用王阳明的话说：“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为浮云，已忘之矣。”^④或许这就是圣人的境界吧。

05 嘉靖皇帝为何对大臣大打出手

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包括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各级官员在内的两百余名朝廷大臣，在紫禁城的左顺门集体下跪并大声哭喊，抗议明世宗朱厚熜违背祖制礼法。几百个朝廷大臣公开聚集在一起，以哭跪的方式向皇帝的权威挑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朱厚熜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派人将几位领头闹事的大臣打入大牢。群臣的情绪更加激愤了，左顺门前出现骚乱。矛盾的激化使朱厚熜起了杀心，他立刻下令，对左顺门前闹事的大臣们实施杖责——就是用棍棒狠狠地打。一时间，大臣们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溅左顺门。然后，又有一百多人被逮捕，八十多人待罪。这些被杖责的大臣被抬回家后，不治而亡的就有十七人。这就是大明王朝嘉靖年间著名的“左顺门血案”。大家一定会问：皇帝朱厚熜和大臣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皇帝竟然下令锦衣卫大打出手？为了说明血案的原因，还得从武宗皇帝驾崩说起。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年仅三十一岁。他没有子嗣，国无储君，这可怎么办？内阁首辅杨廷和秘不发丧，然后以《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为依据，拟发“遗诏”，确定了朱厚照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乘坐的车驾到达北京城外，正准备入城时，礼部官员出城迎接，要求朱厚熜以皇太子的身份从东安门进紫禁城，然后住进文华殿，等待选择良辰吉日再举行登基大典。可是朱厚熜拒绝了。朱厚熜说：遗诏中明明写的是让我继承皇帝位，并不是让我继承皇子位。因此，朱厚熜坚持不接受礼部官员提出的要求，并且拒绝进城。

礼部官员马上回去向杨廷和汇报。杨廷和只好亲自出马，当面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规矩行事。朱厚熜坚决不答应，因为只有朝廷大臣才从东安门进紫禁城，而皇帝应该从正南面的大明门进入紫禁城。

其实，大臣让朱厚熜从东安门进入紫禁城也合乎规矩，毕竟他还没有登基。而朱厚熜坚持不从东安门进紫禁城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就是来当皇帝才进北京的，不过就差一个登基大典。显然，杨廷和是故意给朱厚熜来个下马威，就是要让新皇帝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安排。朱厚熜不答应，大家就僵在那里，谁也不肯让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传来皇太后的旨意：“皇帝位置不能空缺太久，既然准备即位的君主已经到达北京，朱厚熜乘坐车驾周围的大臣们应该赶快上书，劝朱厚熜立刻即位。”面对皇太后的压力，杨廷和与礼部的官员们只好妥协。

朱厚熜坐在自己的车上接受了众位大臣的劝进信，坚持从大明门也就是正南门进入紫禁城。进紫禁城之后，朱厚熜也没选择良辰吉日，就在当天正午时分即皇帝位，宣布第二年为嘉靖元年。显然，这个小皇帝一进城就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接受任何人的控制。这样一来，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朱厚熜即皇帝位的第三天，派人到家乡去迎接自己的母亲进京城。这又是一件麻烦事。朱厚熜的母亲本来是兴献王妃，现在儿子当了皇帝，她究竟应该以王妃的身份进京，还是以太后的身份进京呢？更麻烦的是，母亲的身份如果有所变化，那么已经去世的父亲称号是否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

谷应泰，等.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2015：735.

礼部尚书在杨廷和的授意之下，联合了六十多位言官给朱厚熜上书，建议皇帝以孝宗皇帝朱祐樞为父亲，称自己的父母，即兴献王和王妃为叔父和叔母；在给自己父母祭祀的时候，署名为侄子而不再是儿子。平心而论，礼部的要求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的。如果朱厚熜不称朱祐樞为父亲，朱祐樞这一脉的香火就断了。朱厚熜既然继承了朱祐樞一脉的皇位，就应该过继给朱祐樞为儿子，不能只接受权力，不尽义务。可是朱厚熜是家中独子，如果为了继承皇位而称自己的父母为叔父、叔母，那么他父亲这一支的血脉就断了。因此，朱厚熜看了言官们的联合上书之后冷冷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⑧这些言官见皇帝不听建议，于是不断地上书，但朱厚熜一律不予理睬。

谷应泰，等.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2015：737.

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朱厚熜的母亲抵达通州。礼部议定，让皇帝的母亲从东安门进入紫禁城。朱厚熜坚决不答应，命令锦衣卫，就按照太后的规格准备迎接母亲进城。与此同时，在通州等待进京城的朱厚熜母亲，听说朝廷要让自己的儿子称死去的朱祐樞为父亲，气愤地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⑨遂待在通州就是不进城。朱厚熜听说母亲不进城的消息，一时间泪流满面。他立刻进宫面见张太后，对张太后说：这皇帝我不当了，情愿陪着母亲回自己老家去。大臣们只好妥协，同意朱厚熜的母亲从大明门中门进入紫禁城。

看到大臣在自己的执着面前妥协了，朱厚熜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要为自己的父母争取应有的头衔。朱厚熜对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说：“朕接受祖宗的伟

业，成为天下的君主。可是，我父亲只生了我一个儿子，他现在既得不到血脉的继承，又没有合适的称号，朕面对父亲的养育之恩，心里如何安宁？希望各位爱卿想想办法，让朕能够表达对自己父亲的一片孝心。”

面对小皇帝的要求，杨廷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随口应付道：“列位祖宗心安，皇上才能心安。”朱厚熜看杨廷和上套了，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为了让逝去的父亲心安，我要封父亲兴献王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这样祖宗才能心安，朕才能心安。杨廷和没有想到朱厚熜用自己的话封住了自己的嘴，一时无法反驳，只好按照皇帝的意志拟写了诏书。但是，他却是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达的懿旨。这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太大了。他这是在向满朝文武暗示，这个决定是皇太后的意思，不是朝廷的意思，更不是他杨廷和的意思。这就为皇帝与文官集团的进一步冲突埋下了伏笔。

无论是谁的意思，总之，朱厚熜终于为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赢得了兴献皇帝的称号，为自己的母亲赢得了兴献皇后的称号。有了皇后的称号之后，朱厚熜的母亲才从通州出发，由大明中门进入了紫禁城。朱厚熜亲自将母亲迎进皇宫。这样一来，朱厚熜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他与文官集团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越来越激烈了。而且朝中大臣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坚决反对朱厚熜给自己的父亲加封皇帝称号——被称为“护礼派”，另一派则坚决支持朱厚熜给自己的父亲追加皇帝尊号——被称为“议礼派”。这就是大明王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之争”。两派互相争论，各自引经据典，似乎都有道理，吵得不可开交。这一吵，就吵了整整三年时间。最终，这场争论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早朝之后，众位大臣聚集在文华殿中，群情激愤。监察御史徐文华对众位大臣说：“皇帝根本不理睬我们的上书，一定会将孝宗皇帝改为皇伯考，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的。这样一来，孝宗皇帝的血脉岂不就中断了？”吏部侍郎何孟春大声鼓动，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左顺门前去跪哭，让皇帝收回成命！”经筵侍讲杨慎大声喊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我们应当为了大臣的节操和国家的大义而死，正在今天！”在杨慎等人的鼓动之下，二百二十九名朝廷大臣一起跪在了紫禁城的左顺门前，大声哭喊，抗议皇帝朱厚熜不遵守祖宗礼制。这些大臣们从上午七点多，一直跪到下午一点。

朱厚熜动怒了，下令对在场大臣大打出手。这场经历三年的“大礼议之争”，实际上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朱厚熜以地方藩王的身分登上皇位，在满朝文武中几乎没有自己的势力。因此，左顺门前的这场政治风波，表面上看缘于对朱厚熜生父朱祐杬尊号的争议，但实质上是皇帝为打击文官集团所采取的措施。朱厚熜是在排除异己，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皇帝权威，而文官集团却想通过人

多势众，要挟皇帝就范，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左顺门事件以皇帝胜利、文官集团失败告终。皇帝朱厚熜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了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此后的四十余年里，朝廷中再没有人敢挑战嘉靖皇帝的权威了。

06 张居正死后为何被抄家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明神宗朱翊钧突然下诏，查抄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全部家产。朝廷的抄家大员接到圣旨，立刻出发前往位于荆州府江陵县的张居正老家。其实，还没等抄家大员赶到江陵县，当地的官员早已封了张府，张居正家的亲属和仆人被困在宅内，无法出入，十余口人因此饿死。

随后，朝廷的抄家大员赶到进行彻底的查抄，虽然抄出黄金一万多两，白银十万多两，但实在和抄家者想象的数额相差太远。于是，抄家大员下令对张居正的家属严刑拷打，追问财产究竟藏匿到什么地方去了。张居正的三儿子张懋修被屈打成招，后投井自杀但未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实在受不了各种折磨和屈辱，上吊自杀，临终前留下一份血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其余家人都被发配到边疆充军。要知道一年前张居正刚刚去世的时候，明神宗给张居正赐的谥号为“文忠”，葬礼举办得非常隆重，可谓极尽哀荣。为什么仅一年多后，明神宗就下令抄家，没收全部财产，将张居正的家属全部发配充军呢？对这个问题，明神宗在他下达的圣旨中宣布的张居正的四条罪状，算是做了回答。就让我们对此逐条分析，看看张居正被抄家是罪有应得，还是被冤枉了。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M]. 董其昌，辑.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873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651.

明神宗在圣旨中列举的第一条罪名是“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①。意思是，张居正被指控诬蔑皇帝家的亲戚，并且侵占王爷的坟地和王府宅第。此罪名的根据是被废的辽王次妃王氏的弹劾：“金宝万计，悉入居正。”^②可是在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后，并没有发现张居正曾将辽王的宅第据为己有的证据，所谓的“金宝万计，悉入居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董其昌，辑.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873.

明神宗在圣旨中列举张居正的第二条罪名是“钳制言官，蔽塞朕聪”^③。意思是，张居正控制舆论，不让言官说话，从而蒙蔽皇帝。所谓“言官”是指明代政治体制中由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构成的一股非常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职责是对朝廷百官进行监督，无论是朝廷的政治和行政事务，还是社会各界存在的问题，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上疏直言。言官制度的存在，对明代政治的良性运转起着独特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就言官职能的发挥而言，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言官们能否理性、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从明朝言官的作为来看，由于素质参差不齐，他们很难做到独立、客观地反映真相，不是年轻气盛、激愤不已，就是主观盲目、随心所欲，或者陷入派系、党同伐异，或者风闻言事、上纲上线，或者发泄私愤、相互攻击。

既然言官制度弊端很多，那么朝廷的行政领导就不可能让言官牵着鼻子走，这样一来，行政部门与监察机构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不但没有什么好办法控制言官，其行为还招致了言官的怨恨。因此，张居正与言官之间的矛盾很深，可以说是势同水火。当张居正与言官政见不同的时候，他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言官采取高压政策，不是削职就是下狱，甚至杖责或发配边疆。言官们因此非常畏惧张居正，内心更是感到愤愤不平。张居正一去世，他们就开始上疏弹劾，上疏的内容很广泛，不论是否属实，都集中反映了对张居正执政的不满。内阁首辅只要是铁腕人物，都有可能压制舆论，钳制言官。但这不应该成为抄张居正家的理由。那么，皇帝到底为什么要抄张居正的家？

董其昌，辑.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873.

答案就在明神宗给张居正定的第三条罪名中，“恃权乱政，罔上负恩”^①。意思是，张居正独揽朝廷大权，扰乱朝廷秩序，欺骗皇帝并且辜负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张居正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这就得从张居正走上权力巅峰的过程说起了。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堉驾崩。根据皇帝遗诏，内阁成员高拱、张居正、高仪与司礼监太监冯保同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高拱此人自视甚高，为人比较骄横，无法容忍与太监冯保一起成为顾命大臣，于是就联合其他内阁大臣，想方设法驱逐冯保。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7801.

高拱起草了一份旨在剥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想以内阁大学士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当高拱征求张居正的意见时，张居正一口答应，可私底下，张居正却悄悄把高拱上疏的内容透露给了冯保，让冯保有所防备。而且张居正还将隆庆皇帝驾崩时，高拱在内阁边哭边说的一句话告诉了冯保。冯保听到这句话，不禁大喜。什么话让冯保这么高兴？高拱当时哭着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将这句话改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②“十岁太子”改成“十岁孩子”，意思全变了，然后向皇太后和小皇帝告密。皇太后听了非常震惊，小皇帝的脸色也变了。显然，皇太后和小皇帝都觉得高拱没有将皇帝放在眼里，甚至不承认十岁的朱翊钧是太子。

谷应泰，等.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2015：1596.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圣旨要宣读，命文武百官到会极门接旨。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置冯保，颇为兴高采烈。只听一位太监捧着圣旨高声念道：“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便着回籍闲住。”^⑧意思是，高拱由于擅权而被皇帝革职还乡。高拱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听完圣旨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跪在那里都起不来了。在锦衣卫的押送下，高拱被送回家乡。

另一名顾命大臣高仪当时卧病在家，听说高拱被驱逐出京，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而死。就这样，三位顾命大臣，一个被驱逐，一个病死，就剩下张居正一个人，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内阁首辅。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 辑校万历起居注[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94.

当然，光有太监冯保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张居正要想独揽朝政，还必须得到李太后的支持，李太后也的确是张居正强大的幕后支持者。这使万历初期的内阁，成了张居正一个人的内阁。对此，张居正有时也不讳言，他说：“盖圣母与皇上以腹心手足待臣，实与群臣不同。”^⑨意思是，太后和皇帝将我当成他们的心腹和手足，所以我与众位大臣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张居正与支持他的太后和冯保，形成了一个权力铁三角，构成了万历前期的政治特点：太后、宦官和首辅的联合执政。万历皇帝年纪太小，因此完全被这三个人架空。这样一来，张居正专权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张居正是否像万历皇帝指控的那样“罔上负恩”呢？

董其昌，辑.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873.

这就要说说万历皇帝在圣旨中列举的张居正的第四条罪名，“谋国不忠”^⑩了。所谓“谋国”，是指张居正在掌握首辅大权之后的所作所为；所谓“忠”，是一心一意为国家、朝廷和皇帝运用手中的权力，不能有任何私心。那么，皇帝对张居正的这第四项指控是否成立？张居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之后，究竟是一心为国家，还是心怀一己之私利？

我认为这项指控根本不成立，从张居正对万历初期作的贡献就可以对其进行反驳。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改革。具体措施是严格考核官员，要求名实相符。这一点很像现代社会的绩效考核制度。从此以后，各级官员职责分明，不敢玩忽职守，因此出现了强有力的政府管理机制。

第二，经济改革。嘉靖末年，国家粮仓里的储备还不够用一年的；隆庆时更是财政空虚，入不敷出。但是经过张居正的经济改革之后，国库充盈，积银达四百万两，粮食的储备更是十年都用不完。

既然张居正在万历初期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劳，为什么万历皇帝还要抄他的家？据我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四。

第一，君臣之间的十年积怨。张居正开始辅佐万历皇帝时，朱翊钧年仅十岁，为了稳定政权，皇后和皇帝都对张居正非常倚赖，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是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管束过严，干涉过多，使万历皇帝在心里对他逐渐由亲近、尊重转向畏惧和厌恶。长大成人的万历皇帝必然要扳倒张居正，夺回皇权，一消这十年的积怨。

第二，皇帝为了走出张居正的阴影。张居正死后，皇帝仍然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下。比如，每有诏令，群臣就会观望、比较，假如张先生在，将会怎样决策？这让万历皇帝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受到极大的损伤，从而使他的逆反心理和仇恨心理更加膨胀。

汤钢，南炳文. 明史：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677.

第三，万历皇帝贪财好利。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弹劾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①，已废辽王次妃王氏也奏称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贪财好利的皇帝怎能不动心呢？

第四，张居正得罪的人太多，想要报复他的力量不小。

综合以上四个原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家被抄的根本原因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此举也标志着皇权对相权的完胜。当然，这一结局的出现，也包含了万历皇帝刻薄寡恩、过河拆桥，张居正刚愎自用、揽权擅政的因素。因此，张居正被抄家就在所难免了。

07 崇祯皇帝为什么选择自杀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35.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李自成的军队攻占京城。崇祯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登上万岁山，在一棵树下自缢而亡。临死前，他咬破手指在内衣上写下了一篇遗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①意思是，我因为才能和德行浅薄，触犯了上天而受到责罚，然而这些都是众位大臣耽误了我，到了九泉之下我没脸见列祖列宗，只好先摘去皇帝的冠冕，用头发将我的脸遮住，任贼寇分裂我的尸体，绝不要伤害一个百姓。就这样，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朱由检，一个渴望大明中兴却未能如愿的年轻皇帝，凄惨、哀怨地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三十四岁。

朱由检为什么选择自杀？他真的无颜见列祖列宗吗？在我看来，与明朝其他十五位皇帝相比，朱由检虽然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依然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为什么这样评价崇祯皇帝呢？我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朱由检很勤奋。他的勤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勤奋读书。朱由检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坚持读儒家的经典著作，朝廷举办经筵，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朱由检每场必到，除非发生重大事情。朱由检每次听讲儒家经典，都会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如果平常不坚持读书，是不可能做到的。其二，勤奋习武。朱由检虽然出身皇室，但并不是一个公子哥儿，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喜欢骑马射箭，能够拉开三石（即三百六十斤）的弓，而且射箭百发百中。

第二，朱由检很勤俭。虽然这种勤俭不能和普通百姓相比，但是作为皇帝，朱由检的勤俭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提倡勤俭之风。朱由检登基后不久，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下令苏杭织造局停止为宫中生产奢侈的丝织品，首先在宫中提倡勤俭之风。其二，穿打补丁的衣服。崇祯皇帝生活非常节俭，他的衣服、裤子、袜子，都是打了补丁的。

第三，朱由检很勤政。他几乎没有无故不上朝的时候，而且工作起来非常努力、认真。白天上朝，晚上还要加班阅读大臣的奏章，经常每天工作近十四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早还要继续上朝，即使逢年过节也不例外。像这样勤政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崇祯皇帝不是亡国之君，而是末代皇帝，赶巧了大明朝灭亡时他是皇帝。如果朱由检生在万历年间或者更早，大明王朝不可能亡在他手里。这就是历史宿命。就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言，几百年重复一次的治乱循环，呈现为一种客观的必然，任何个人都无法抗拒。作为一代君王，朱由检恰恰遇到了由治到乱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登基当皇帝的时候，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仅凭他个人的主观努力，根本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

那么，朱由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宿命？或者说，大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据我分析，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土地兼并，民不聊生。中国是小农经济国家，农民有地耕种，天下就太平。可是当土地的兼并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大量农民破产，从自耕农沦为雇农，一旦遭遇重大自然灾害，这些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无路可走之下，这些人只得揭竿而起，推翻腐败的王朝。明朝末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一方面朝廷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灾民造反，直至局面无法控制。

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450.

第二，政治腐败，积重难返。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权是绝对的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缺乏自我更新能力。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这种政体不可能将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推向最高管理层。所以，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后，其继任者的整体素质趋向一代不如一代，行政效率衰退和政治腐败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严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执政十七年间，朱由检一共更换了五十位内阁成员，十九位内阁首辅。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朱由检一直想组建一个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支持他中兴大明王朝的最高领导班子，可是却一直未能如愿。最后，朱由检得出的结论是“诸臣误朕”“文武官个个可杀”^③。可是朱由检哪里知道，这不是诸臣误他，而是传统的封建体制和思想文化根本不可能培养出能够力挽狂澜的人才；即使有这样的人才，当时的政治体制也根本无法将他们选拔出来。

第三，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朱由检虽然很优秀，但是他当皇帝的这十七年里，遇到了两个强劲的对手，他们在各方面都更为优秀。一个是农民领袖李自成，另一个是清国皇帝皇太极。这两个人共同特点是在政治上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在军事上极有谋略，并且亲自领兵在战场上厮杀——这是朱由检根本无法抗衡的。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由于自然灾害而失去了生存保障，只得揭竿而起。他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面对这样的对手，朱由检只能甘拜下风。而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族贵族，虽然在社会形态上还很落后，但是正处在上升时期，再加上游牧民族能征善战，极富侵略性，朱由检就更不是对手了。

以上说的是明朝灭亡的客观因素。但是，从一个帝王的角度来看，朱由检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也不是中兴明主。也就是说，他对大明王朝的灭亡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或者说，大明王朝的灭亡，也有朱由检主观方面的原因。

第一，生性多疑。这本来是帝王的共性，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帝王对任何人都都不放心，尤其对手握重兵的将军更是疑心重重，生怕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不过，朱由检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最典型的就是对袁崇焕一案的处理。由于对手握重兵的统帅一直怀有戒心，他很难在各种谣言和他人的诽谤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错杀袁崇焕，是朱由检自毁长城。袁崇焕死后，明军在与清军的交战中再也没有取得过任何胜利。

第二，不敢承担责任。作为一个帝王，这是最大的弱点。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需要朱由检勇于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却不敢承担责任。比如，崇祯十五年（1642年）时与清国议和，由于和谈秘密内容泄露，朝廷舆论哗然。为了推卸责任，他将主持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处死，结果失去了与清国实现和平的机会，导致清军再度入关，形成大明王朝不得不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朝廷无力顾及中原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壮大。

第三，优柔寡断。这是朱由检性格上的又一大弱点。在政治或军事斗争的关键时刻，需要朱由检朝纲独断，可他却偏偏优柔寡断。比如，在首都南迁的问题上，朱由检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专制权力，下决心实施计划，谁敢阻拦就免了对方的职务，让同意南迁计划的大臣坚决执行自己的命令。可是，朱由检却始终没有痛下决心，致使南迁未能成行，从而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第四，急于求成。皇帝朱由检遇事总是急于求成，这又是他的性格缺陷。比如，崇祯元年（1628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弹劾天下最大的贪官，崇祯皇帝便让韩一良五天之内查出天下最大的贪官，结果让这次反腐倡廉不了了之。再比如，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他迎合皇帝朱由检急于求成的心态，提出要五年收复辽东，结果在收复辽东的战略上犯了根本性失误，导致第二年皇太极大举进攻北京。还有在松锦之战中，本来洪承畴坚持要与清军进行持久战，可是朱由检急于结束战争，一再下死命令让洪承畴出战，结果导致明军大败。

虽然朱由检有各种缺陷，但是他宁死不当俘虏，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烈，的确令人肃然起敬。随着朱由检的自缢，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灭亡了。中华大地从此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乱和动荡。

08 八旗铁骑为何所向披靡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举行仪式，祷告上天，宣布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努尔哈赤自称天命汗。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和建立金国的过程中，他领导的八旗铁骑可以说是所向披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得说说努尔哈赤创立的制度了。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建立了八旗制。所谓“牛录”是女真族的狩猎组织，平时耕作、狩猎，战时应征为兵，不但在军事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具有行政和生产职能。八旗制度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优势。

赵铎. 清开国经济发展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364.

女真人作为一个居于满洲边陲的少数民族，能以区区数万人众迅速崛起，最终入主中原，在此期间的各项英明睿智的策略，都是通过八旗制度来体现和实施的。一方面，八旗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促进了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接纳和认同；另一方面，旗人对八旗的归属感乃至八旗意识的形成，又反过来加强了八旗制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八旗制度建立在“兵民合一”的基础上，入关前士兵是没有兵饷的，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①。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族成员皆隶于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努尔哈赤将臣民编入各旗，旗人生活在八旗制度规定的严密组织体系之内，在日常劳作时直接听命于甲喇、牛录组织的生产安排，为国家统一的整体战略服务；在战争时又直接服从最高统帅努尔哈赤的军事调度。这样组建的军队，号令统一，纪律森严，训练有素，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可是后金建立之后，并没有受到天命的眷顾，反而因为连年大旱，境内粮食奇缺，百姓开始逃亡，国家根基发生了动摇。努尔哈赤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移社会矛盾，下决心向西进入辽东平原，发动一场以抢夺粮食、财富，劫掠人口为主要目的战争。

李治亭，主编. 清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4.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发出了战争的宣告：“今岁必征大明国！”^①要打仗，光喊口号是不够的，还得寻找开战的理由，也就是为主动挑起战争寻找正当性。努尔哈赤终于提出“七大恨”。祖父和父亲被杀是必须讲的，可这是个人仇恨。为了团结自己的部落共同对敌，他还需挑起民族矛盾，例如明朝人擅自进入我方边界，毁坏我们的庄稼，有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

抚顺由于距离赫图阿拉城最近，因此首当其冲。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之后，把人口、牲畜、粮食、财物劫掠一空，然后将抚顺城夷为平地。与此同时，他派骑兵排成一百多里长的横队，对抚顺周边地区像梳头发似的梳了一遍，五百多个村镇被抢劫一空，掳获人畜三十多万。俘虏们被编为千户，迁到赫图阿拉城附近地区为金国从事劳动生产，其实就是当奴隶。此时的后金还顾不上扩张领土，只是劫掠粮食、金银、布匹等财富以缓解经济危机。

抚顺失陷了，明军自然不肯罢休。几天之后，辽东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讨伐，结果中了努尔哈赤的埋伏，主力部队全部被歼，张承胤本人战死。此战，努尔哈赤缴获战马九千匹、甲冑七千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实力大增。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努尔哈赤决定再次出击，目标清河堡（今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此地是通往辽阳、沈阳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七月初，他对外宣称攻打叶赫部，率军出征。大军出发不久，却突然调转方向，攻击清河城。到清河城附近驻扎下来后，努尔哈赤先派奸细伪装成商贩进城，然后里应外合，发动进攻。清河城守军仅万余人，最终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清河，打败辽东总兵张承胤之后，觉得大明朝不堪一击，不仅胆子更大了，而且态度更加蛮横，手段更加残暴。他将三百多名被俘的村民押到辽东长城的抚顺关，全部杀掉，只留下一个活口，将他的双耳割掉，然后令他给明朝政府送信。努尔哈赤在信中说：“你们如果认为我做得不对，那就约个时间和我决战；如果不敢决战，那就是认为我做得有道理，拿钱来，我们就不再进攻了！”完全是强盗的口气。

南炳文，汤纲. 明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033.

抚顺、清河失守和总兵张承胤战死的消息传到北京，万历皇帝惊呼：“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②并且立刻下令，动员全国力量，一举歼灭努尔哈赤。明朝政府集中了将近十万人马，联合朝鲜和女真族的叶赫部，号称四十七万，兵分四路向赫图阿拉城扑来，企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的后金。对后金来说，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斗。后金能否存在，关键在此一役。

正当这十万大军集结完毕，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对大明朝来说，那真是天公不作美，可是对后金来说，这可是老天爷在帮忙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天降大雪，天上地下白茫茫一片，给明军大部队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进攻日期不得不一拖再拖。终于决定出征了，可是明军总指挥杨镐却将明军的出征时间、进攻地点和进攻方向写在一封信上，托人交给努尔哈赤。杨镐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自己手中有十万多的正规军，而努尔哈赤的乌合之众只有六万人，根本不堪一击。

谷应泰，等.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2015：1412.

努尔哈赤看到这封信之后，果断地收缩兵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④那么，努尔哈赤会先打哪一路？他在捕捉战机，也就是等敌人犯错误。

离赫图阿拉城最近的是西路大军。这是明军主力，共有六万人马。西路总指挥杜松是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之所以叫他太师，是因为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了。这个人久经沙场，打仗勇猛，为人十分骄横。他要抢头功。所以出发前就喊过：“谁也不要和我争，努尔哈赤的人头是我的！”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他率领的西路军，先期从抚顺出发，直扑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已经明确明军主力就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进发，寻求决战。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劫粮之类的事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今辽宁省抚顺市东浑河南岸）扎营的时候，他已然胜券在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留守萨尔浒的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杜松战死。

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此时他的位置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但马林是个文人，没有实战经验，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努尔哈赤的攻击。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带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马林面对三倍于他的敌人，在最后关头抛下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北路军就此覆没。

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但东路的刘却毫不知情，因为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不久就迷了路。三月初四，刘终于遇到杜松的使者。使者传达杜松的命令，让刘去与他会合。可是当刘带着一万多人马来到距离

赫图阿拉城只有几十里的地方时，就被努尔哈赤的六万人团团包围了。刘战死，东路军覆灭。

南路军的指挥官李如柏是李成梁的儿子，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婿。因为部队行军速度太慢，他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已经全军覆没，李如柏只好率领南路军回撤，除了在回撤时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基本毫发无伤。可是言官们不放过他，一致弹劾这个独自逃跑的人。李如柏终于受不了，选择自杀，结束了生命。

大战就此结束，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310名，死伤士兵45870人，战争资源损失不计其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一战取得完胜之后，后金开始迅速扩张。先向北反取开原和铁岭，再向西攻陷沈阳，接着向南占领辽阳。然后渡过辽河，进入辽西地区，袭取广宁等城。结果，整个山海关以东除了辽西走廊外，基本上都落入后金国控制之下。

此仗，明军在财力、物力、兵力等方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但为什么却吃了败仗？据我分析，有如下原因。

第一，急于求成，对战场局势做出错误判断；第二，大意轻敌，低估了这个新近崛起的对手；第三，决策失误，不顾茫茫大雪，与努尔哈赤决战；第四，指挥不当，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第五，战斗力差，明军是雇佣兵，而后金八旗全民皆兵，战斗力极强。

后金国以及后来的大清国在军事上的优势，直到清军入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持着，明朝的确遇到了强劲对手。

09 郑成功收复台湾有何历史意义

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九月，郑成功北伐失败后，率残部退至福建思明州（今福建省厦门市）。就在郑成功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名叫何斌的人前来求见。

何斌是福建南安人，其父早年赴台湾谋生，经常往来于两岸之间，与南安的郑氏关系密切。何斌长大以后在老家从事贸易，受到郑泰的提携，出入广南等地，显然与郑芝龙的海上势力有关。1648年，何斌的父亲在台湾去世，何斌从广南前往台湾继承父业。何斌的父亲是荷兰人开的公司的翻译员兼汉人长老，又担任汉人“民事委员会”委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何斌在父亲去世后，很快就接任了公司翻译员的职务，同时成为汉人长老。

就在郑成功北伐失败的第二年三月，因为与荷兰人发生债务纠纷，何斌逃到思明州。何斌见了郑成功之后，就鼓动郑成功攻取台湾，同时献上台湾地图，讲解水路变化、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当听何斌说台湾的粮食与军用物资充足，贸易位置理想，又有海峡天险时，郑成功动心了。

其实，郑成功与何斌早就认识，何斌父子曾经是郑芝龙的手下。郑芝龙先被明招安，后又降清。何斌与郑芝龙之间没有直接来往，但是通过郑成功的叔叔郑泰，一直保持联系。郑泰是郑成功手下专门主管贸易、财税的官员。郑成功及其家族的许多对外活动，都由郑泰主持，而何斌则是郑氏集团在台湾的代理人。

公元1656年，郑成功与荷兰人的关系恶化，郑成功开始实行海禁。第二年，荷兰人为了摆脱困境，派何斌到厦门与郑成功谈判。通过谈判，两岸恢复通商，但谈判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未能达成一致。什么内容呢？就是收税问题。郑成功提出，将到达地收税改为起运地收税，可是荷兰人并不接受。矛盾因此而起。

公元1657年8月，何斌返回台湾，9月他开始替郑成功收税。此事很快在社会上传开来，但荷兰人并没有就此进行调查，只是把何斌找来质问。他坚决否认，此事便不了了之了。何斌深知征收关税事关重大，无法暗中操作，必须找合适的机会与荷兰侵略者首领揆一交涉，并将情况禀报郑成功。

公元1659年初，何斌在台湾替郑成功收税的事被揭发，荷兰人将他拘捕问罪，进行处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何斌携妻儿和亲属逃回大陆。何斌的出走在台湾引起了很大震动，他留下的巨额债务使很多人濒临破产。

见到郑成功，何斌竭力劝郑成功进攻台湾。台湾的荷兰侵略者也从逃难到台湾的一些华人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荷兰侵略者认为，郑成功将进攻台湾。

荷兰侵略者的长官揆一紧急备战，向巴达维亚城（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总督报告，请求援军。公元1660年7月16日，巴达维亚总督派遣司令官范德兰率领12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运1453人前往台湾。然而范德兰并不认为郑成功会攻打台湾，抵台不久便坚持要去攻打澳门，与大员港方面的荷兰官员激烈争执。公元1661年2月27日，他率领所有随行军官返回巴达维亚，只留下4艘船和不到600名没有军官率领的士兵。这时，大员港地区的总兵力为1500人。

北征失败的郑成功，回到厦门就开始厉兵秣马，做收复台湾与防备清军南下的两手准备。此时，清军已经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封锁的办法，命令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断绝对郑军的供应，想困死郑成功。同时，清安南将军达素率大军南下。郑成功为避免两线作战，将收复台湾的事暂时放下，全力应对达素即将发动的进攻。

公元1663年正月，达素率大军至福州，准备一举歼灭郑成功。郑成功实行战略收缩，将各地军队调回，重点防守金门、厦门。五月，达素率领施琅等以大型战船出漳州，小型战船出同安，合力进攻金、厦两岛。两军在海门、同安两地交战。海门一处，郑成功利用潮汐之便，大败清军；同安一处，清军刚登陆就遭到痛击，达素猝不及防，亦大败。

郑成功此战虽胜，但内部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郑成功亟须一条既可以转移各方关注焦点、掩饰其内部虚弱之状，又可借此重新凝聚军心的出路。所以，收复台湾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公元1661年2月，郑成功传令大修船只，听令出征，并召集将领商讨攻台事宜。

公元1661年3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将士，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之后，准备直取台湾。荷兰侵略者听说郑成功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恐。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城（今台湾省台南市安平镇）和赤嵌城（今台湾省台南市中西区）两座城堡，将几艘破船沉入鹿耳门港口，以阻止郑成功的船队登岸。

三月二十七日，郑成功率军驶抵柑橘屿（今东吉屿、西吉屿）海面时，突然刮起暴风，大军只好返回澎湖。因大风不止，郑军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如果无限期停驻澎湖候风，就不能按预定日期开进鹿耳门港了。因为要顺利进入鹿耳门港，必须利用每月初一和十六日的大潮，如错过时机，就要向后推迟半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强渡。

三十日晚，郑成功亲自率船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经过一夜与风浪搏斗，第二天拂晓，船队航行到鹿耳门港外。郑成功先换乘小船，由鹿耳门港登上北线尾岛踏看地形，并派出潜水健儿进入台江内海，侦察荷军情况；同时叫何斌领航，决定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鹿耳门，强行登岛。

荷军作为据点的台湾城和赤嵌城一带海岸曲折，两城之间有一个内港，叫“台江”。台江西南面有七座山屿相连，其间的海面叫“大员港”。北线尾岛的北侧为鹿耳门港。荷兰人修筑的台湾城城堡在台江西侧山屿上，赤嵌城则在台江的东侧，两城堡互为犄角。

从外海进入台江有两条航路：一条是大员港，叫南航道；一条是北航道，在北线尾岛与鹿耳门屿之间。南航道口宽水深，船容易驶入，但港口有敌舰防守，陆上有重炮压制。北航道水浅道窄，只能通过小舟，大船必须在涨潮时才能通过。荷兰人认为，只要用舰船封锁南航道海口，与台湾城、赤嵌城的炮台相配合，就可阻止郑成功大军登陆了。

郑成功之所以选择在鹿耳门港突入，一是因为掌握了该地的潮汐规律，即每月初一、十六两日大潮时，这里的水位要比平时高五六尺，大小船只均可驶入；二是郑成功早已探测了从鹿耳门到赤嵌城的港路。四月初一中午，鹿耳门海潮果然大涨，郑军的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后，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登上北线尾岛，另一路驶入台江，准备在禾寮港登陆。荷军原以为中国船队会从南航道驶入，准备用大炮拦截，未料到郑成功的船队从鹿耳门驶入台江，在大炮射程之外。

面对郑军船队，荷军束手无策。郑军船队沿着预先测量好的港路鱼贯而入，切断了台湾城与赤嵌城荷军的联系，迅速于禾寮港登陆，并在台江沿岸建立起滩头阵地，准备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在北线尾岛登陆的一支郑军，则驻扎于鹿耳门，以牵制荷军兵船，同时坚守北线尾岛。台湾民众见祖国大军到达，争先恐后地出来迎接，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

郑军主力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并切断了其与台湾城的联系。战斗中，侵略军以“赫克托”号战舰攻击。郑成功一声令下，把敌军紧紧围住，六十多艘战船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击沉。看着“赫克托”号渐渐沉下去，另外三艘荷兰船见形势不妙，吓得掉头就逃。与此同时，郑军又击溃了台湾城的援军。荷兰侵略军遭到惨败，龟缩在两座城里不敢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说只要郑军肯退出台湾，他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慰劳，被郑成功严词拒绝。

敌军继续顽抗。郑成功命令切断水源，三天后，赤嵌城的荷兰人乖乖投降。盘踞台湾城的侵略军也在被困八个月之后，扯起白旗投降。最后，荷兰人交出所有城

堡、武器、物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名荷兰军民，乘船撤离台湾。至此，郑成功结束了荷兰人对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宝岛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功不可没。

10 “三藩之乱”的起因是什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杀了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兴明讨虏”为旗号，起兵云贵，占据湖南，继而西进四川，沿途各省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台湾等地，都有汉官、汉兵、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及一些地区的农民造反武装迅速响应。一时间，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燃起战火。人们不禁要问：吴三桂为什么要举兵造反，挑战大清王朝？这还得从吴三桂与清廷的矛盾说起。

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清廷因吴三桂擒杀南明永历帝有功，晋封其为亲王，兼辖贵州，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被选为额驸，号称“和硕额驸”。至此，吴三桂的权力和声望达到顶点。可是，他与清廷中央政府的矛盾开始尖锐甚至激化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吴三桂想做“世镇云南”的平西王，就是想让他的爵位世代相传，可是清廷却另有打算。在吴三桂剿杀永历帝之后不久，清廷就开始裁抑吴三桂的权力，再次印证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法则。

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由，收缴了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将推荐和选拔官员的权力收归吏部。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下令云南、贵州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吴三桂的司法特权。吴三桂则蓄意挑起与苗族的战事，借机扩军，并向朝廷索要军饷。吴三桂和清廷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因此，康熙皇帝最终下决心撤藩。

康熙十二年八月，清廷命礼部侍郎哲尔肯赴云南即平西王吴三桂的封地，吏部侍郎陈一炳赴福建即靖南王耿精忠的封地，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即平南王尚可喜的封地，分别下达皇帝撤藩的谕旨。清廷同时命令陕西总督鄂善，总督云南军务；宁夏总兵桑额，提督云南军务。这是要解除吴三桂的兵权。吴三桂得知消息之后，立刻和他的同党加紧密谋，准备起事。

徐凯. 吴三桂讨清《檄文》原文本考[J]. 清史研究, 2017（3）：140-145.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礼部侍郎哲尔肯、学士傅达礼等人到达云南，下达撤藩圣旨，吴三桂随即起兵造反了。他杀了云南巡抚朱国治，拘捕了按察使以下不顺从的官员，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④，佯称拥立“先皇三太子”，兴明讨清，蓄发、易衣冠，向全国发布檄文。同时派人给平南王、靖南王、各地故旧将吏，以及台湾的郑经送信，邀约共同举事。郑经是郑成功的长子，郑成功去世后继任其位。

耿精忠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在福州杀了福建总督范承谟及范之幕僚五十余人，起兵响应吴三桂，同时也到台湾联系郑经，以提供战船给郑经，换取出兵。郑经应允此事。五月，郑经从台湾出发，抵达厦门，要求耿精忠将漳州、泉州交给自己。耿精忠这时已经拥有整个福建，认为郑经兵力太少，早已取消了他共同作战的计划，因此拒绝了郑经的要求。郑经于是占领海澄、同安，耿精忠则以断绝和郑经贸易作为报复，双方交恶。

耿精忠打出“总统兵马大将军”的旗号，分三路兵出福建：东路攻浙江温、台、处三州；西路攻江西广信、建昌、饶州；中路攻浙江金华、衢州。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惊。康熙皇帝一方面派兵进攻福建，下诏削去耿精忠的爵位，收禁他在北京的兄弟；另一方面劝谕耿精忠改过自新，趁机剿灭郑经，继续镇守福建。做着天子梦的耿精忠，自然不予理睬，继续进攻，队伍扩大到十余万。

不过，平南王尚可喜的态度却完全相反。朝廷下令撤藩，尚可喜服从决定，正准备举族迁回辽宁海城时，吴三桂起兵反清。康熙帝立刻命令尚可喜留镇广东，并加封其长子尚之信为镇南王，次子尚之孝为平南大将军。可是，尚可喜手下的将领刘进忠、祖泽清等人举兵响应吴三桂，控制了广东沿海群岛。尚可喜坚持效忠清王朝，以广东一省之力牵制十多万叛军无法全力北上，为清朝廷最终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

郑经与耿精忠和解之后，立刻派手下将领刘国轩进攻尚可喜，并击败其子尚之信。郑经率军抵达海澄，并且迅速攻占漳州。广东的局势非常危急，清廷先派尚可喜之子、额驸尚之隆率领人马救援，却在江西遇到阻拦；第二次派简亲王率兵增援，行至江西再次遇阻。为了稳住尚可喜，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康熙帝下旨，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此时广东十郡已有四郡被叛军攻占，广州城岌岌可危。尚可喜在后院堆满柴火，随时准备在危急时刻举火自焚。

就在这个时候，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被吴三桂收买，发动兵变，夺取了广东最高指挥权，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号。尚可喜悬梁自尽，被左右救起。几天之后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夺取兵权后的尚之信响应吴三桂的号召，参与造反。至此，清初的三位藩王都参加了造反，因此史称“三藩之乱”。

吴三桂出兵云贵，进据湖南；清军云集荆州、武昌、宜昌，但不敢渡江与叛军交战。吴三桂在湖南沿江布防，不再向北发展，康熙帝抓住机会调整战略，安排兵力。他首先坚决打击吴三桂，对其他的反叛者却实行招抚，通过分化策略来孤立吴三桂。

康熙十五年（1676年），尚之信被郑经的军队击败，并将惠州割让给郑经。这时，郑经已经拥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但领地附近都是盟友，没有清军控

制的领土。如果他扩张地盘，必定会与盟友发生冲突。五月，耿精忠计划联合吴三桂进攻江南，调汀州总兵刘应麟出兵。刘应麟拒不发兵，暗中联络郑经攻占汀州，导致郑耿同盟再度破裂。

康熙十五年（1676年）八月，清军攻入福建，随即派大将军杰书招降耿精忠。在清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耿精忠被迫袒身露体，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耿精忠请求仍留靖南王爵，从征剿灭郑经军，以功赎罪，清朝廷准许了。耿精忠率兵击败郑军，郑经退守厦门。接着，耿精忠又进军潮州，击败尚之信的军队，康熙帝命耿精忠驻守潮州。不久，尚之信投降。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大封诸将，但这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秋，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位。叛军无主，众心瓦解，从此一蹶不振。清军趁机发动进攻，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逐步被清军攻占。但马宝、胡国柱等叛军负隅顽抗，节节抵抗；历时两年，清军才进逼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年底，清军围攻昆明。吴世璠势穷自杀，余众出降。耿精忠降清后尚蓄逆谋之心，被部下告发。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以耿精忠心存异志，诏耿精忠入觐，以负恩谋反罪革去王爵，交司法审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贾小叶. 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J]. 近代史研究，2014（4）：69.

郑经战败后，一度试图坚守厦门。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十八日，郑经派遣刘国轩先攻下虎渡桥，切断漳州、泉州的联系，经过约三个月的包围，攻陷海澄，但接下来在漳州、泉州一带的战斗，都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况出现僵局。同年的和谈中，清廷表示，若郑军退守台湾，则郑氏可永据台湾。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清福建陆路提督万正色率舟师进攻金、厦。郑经率诸将回台湾。秋八月，清廷致书郑经，准照朝鲜事例，“不必登岸，不必薙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②。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水军2万人、战船230余艘，进军澎湖。郑军大将刘国轩率军2万，战船200艘，防守澎湖。由于六月台风较多，不利海战，刘国轩认为施琅只是虚张声势，因而未作充分防备。当施琅率领的清军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仓促应战。施琅分派左右各50艘战船夹击郑军，自率56艘战船从中央突进。澎湖被占领后，郑氏政权已无力抵抗清军，只得投降，台湾从此成为清朝领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行政建制始与大陆地区划一。

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割据分裂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康熙贸然削藩，将吴三桂逼上绝路，导致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给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康熙若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制订比较完整详细的撤藩计划，妥善安排好藩王的待遇，“三藩之乱”也许是可以避免的。然而，这次平叛战争最终也取得了胜利，消除了割据状态，使国家实现了统一，大清王朝从此进入和平建设时期。